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3](#_Toc54534358)

[導讀 歷史的曖昧角落 4](#_Toc54534359)

[一 4](#_Toc54534360)

[二 5](#_Toc54534361)

[三 6](#_Toc54534362)

[序 9](#_Toc54534363)

[第一部分 解放心態 14](#_Toc54534364)

[第一章 歡騰 14](#_Toc54534365)

[第二章 饑餓 30](#_Toc54534366)

[第三章 復仇 39](#_Toc54534367)

[第二部分 清理廢墟 61](#_Toc54534368)

[第四章 回家 61](#_Toc54534369)

[第五章 瀝干毒藥 76](#_Toc54534370)

[第六章 法治 119](#_Toc54534371)

[第三部分 絕不讓歷史重演 134](#_Toc54534372)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34](#_Toc54534373)

[第八章 教化野蠻人 147](#_Toc54534374)

[第九章 同一個世界 159](#_Toc54534375)

[跋 171](#_Toc54534376)

[注釋 173](#_Toc54534377)

[第一章　歡騰 173](#_Toc54534378)

[第二章　饑餓 175](#_Toc54534379)

[第三章　復仇 176](#_Toc54534380)

[第四章　回家 178](#_Toc54534381)

[第五章　瀝干毒藥 180](#_Toc54534382)

[第六章　法治 181](#_Toc54534383)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83](#_Toc54534384)

[第八章　教化野蠻人 184](#_Toc54534385)

[第九章　同一個世界 185](#_Toc54534386)

[鳴謝 187](#_Toc54534387)

[索引 188](#_Toc54534388)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 導讀 歷史的曖昧角落

許知遠

## 一

大約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書店，我隨手撿起一本《傳教士與浪蕩子》（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它歸屬于“亞洲興趣”（Asian Interest）一欄。

彼時的香港，殖民地的氣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輕易感受得到。在灣仔的六國酒店、在銀行家穿梭的中環、還有舊中國銀行上的“中國俱樂部”，你能感受到那個吉卜林、奧登與大班們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與東方交融的產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滿了殖民地的異域風情。連Asian Interest這個書分類名稱都帶有明顯的這種痕跡，Asia是歐洲人創造的概念。

這本書是這種視角的延續嗎？至少看起來，標題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個裸露雙肩的東方女人顯露出驚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時刻，香港都感覺像一座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的城市，它只有一個狂熱的現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歲月》一章時，正讀到這句話。文章寫于1990年，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緒，舊秩序正在退隱，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敘述吸引，個人游記、新聞報道、文學批評、歷史敘述、政治分析，毫無縫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僅捕捉住這稍縱即逝的時代情緒，還給予了這情緒以更大的歷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對陳詞濫調的逆反，他用追問、質詢、嘲諷來對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斷，他既質疑西方眼中的東方主義，也懷疑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比如對于香港，他顯然不同意這是一座純粹的經濟城市，他看到了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發展一個政治身份，人們必須有連續感，共同分享一個過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個他們可以為之負責的未來，他們作為公民、而非臣民。”

我買下了這本書，記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一個曾長期在亞洲生活的荷蘭人，通曉包括日語與中文在內的六種文字。未曾料到，這本書也隨即成為一種隱喻、一個指南，它開始緩慢卻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寫作與生活方式。

馬尼拉、加爾各答、東京、首爾、臺北……我去了他去過的地方，試圖像他一樣觀察、交談與書寫。我也尋找到他的其他作品，從20世紀80年代的《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上帝的塵埃》（God’s Dust），到90年代的《罪行的報應》（The Wages of Guilt）、《伏爾泰的椰子》（Voltaire’s Coconuts），再到《壞分子》（Bad Elements）與《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還有那本迷人的小說《中國情人》（The China Lover）……

在某種意義上，他與奈保爾（V. S. Naipaul）、保羅·塞羅克斯（Paul Theroux）、珍·莫里斯（Jan Morris）一樣，變成了我過去十年中反復閱讀與模仿的對象。他們來自不同區域，年齡、性別不同，所關注的題材也不盡重合，卻分享著相似的特質——都因個人身份的焦慮而獲得了對外部更敏銳的觀察，有某種局外人才有的洞見，都在極度個人視角與龐雜知識世界之間達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們中，布魯瑪或許是游歷的地理與涉獵的知識最廣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與16世紀的人文主義者或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繼承了他們對他人的文化與生活的廣泛興趣，除了知識、思想，更有對歷史中模糊、曖昧、灰色的地帶的興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據著顯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邊緣人，這種誠實正是理解、接受、慶祝人類情感與思想的多樣性的基本態度。

但在這多樣性中，思想的清晰性與道德的嚴肅性，從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國與日本的戰爭罪責與社會記憶的著作《罪行的報應》中的陳述：“沒有危險的人民，只有危險的情境，它不是自然、歷史規律或民族性格的結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結果。”

一些時候， 1951年出生于荷蘭海牙的伊恩·布魯瑪讓我想起他的先輩伊拉斯謨。后者在16世紀開創了人文主義傳統，倡導一種寬容、多元的價值觀，他也是世界主義者的先驅，從不受困于具體的地域、語言與文化。布魯瑪不具這種開創性，卻是冷戰結束后涌現出的新的全球經驗書寫浪潮中的重要一員。2008年，他獲頒伊拉斯謨獎，被認定是“新世界主義”的代表人物，“將知識與超越距離的擔當結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會發展”。

## 二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既是布魯瑪一貫風格的延續，他為被不斷論述的二戰勝利帶來了新視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結構上，還從他慣常的松散文集，變成了一本更有系統性的專著。

在西方讀者熟知的敘事中，1945年是一個英雄主義、充滿勝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戰勝了法西斯的挑戰，是羅斯福、丘吉爾的光輝歲月，戰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來。

布魯瑪卻描繪了歷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們——她們是法國的、德國的、日本的——對于到來的盟軍士兵的強烈情欲，勝利者不僅意味著正義與力量，更是強烈的性感。而勝利不僅意味著舊秩序的崩潰，更是被壓抑欲望的巨大釋放。一位法國女小說家伯努瓦特·格魯曾這樣描述她與美國大兵情人的關系：“四年的敵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貞操讓我胃口大開……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兩天前在華盛頓下的雞蛋，嚼著在芝加哥罐裝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戰爭可真是好東西。”這些來到歐洲的士兵也像是歷史性的隱喻，作為解放力量與歷史新動力的美國不可阻擋的誘惑，格魯感慨被美國大兵壓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陸同床共寢，而你“無法拒絕一片大陸”。

被釋放的不僅是情欲，也有饑餓感、報復欲。它們都帶來了道德上的混亂。所有人都成為極度自私者，如德國作家波爾所說的：“每個人掌握的只是屬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們手上的東西：煤炭、木頭、書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氣壯地指責別人偷竊。”

報復行為也隨著這失序到來，那些昔日關押在集中營里的人們成了殘酷的報復者。報復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猶太人即使在德國人的壓力下幸存，卻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擊，而在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華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為攻擊對象。

讓我尤其難忘的是大町的命運。1945年秋天，她是安東市七萬多日本僑民中一員。對于這些帶著希望與憧憬來到偽滿洲國的日本人來說，這是個失敗與惶恐的時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戰敗，涌來的蘇聯紅軍則讓他們憂懼不已——自1905年日俄戰爭以來，俄國人的殘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的強暴與混亂，日本僑民領袖決定成立一個“卡巴萊舞團”，它以歌舞表演的名義提供妓院式服務。

大町四十歲出頭，是個昔日的藝伎，她成為這個歌舞團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說服她們要為日本獻身，犧牲自己來保持更大的群體的安全與尊嚴。據說，因為秉承“不問政治”的立場，對于所有客人一視同仁，使得歌舞團駐守的安寧飯店很快成為安東的避風港。光臨的不僅有蘇聯人，還有日本退伍軍官、新來的國民黨軍官、中共黨員、昔日的漢奸……他們在此或尋歡作樂、或尋找情報。對于這個中朝邊界的小城來說，一切都曖昧不明，日本人失敗了，接下來的掌權者將是誰，它將給這群日本人帶來什么樣的命運？

這個例證恰好說明了這本書的迷人之處，它既是歷史事實，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歷史中的曖昧之地，也顯示作者著力要從昔日的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中擺脫出來。

除去中日關系，他也寫出印尼的蘇加諾對于日本的曖昧態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種解放者——它至少驅逐了上一個殖民者。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緬甸與越南，這些國家年輕的民族主義者都想在這混亂中重獲對命運的自主權。1945年是一個高度復雜的圖景，很多被壓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書寫。

## 三

“這個世界是如何從廢墟中站起來的？當數以百萬計的人餓著肚子，一心只想報仇雪恨、血債血償，又會發生什么？人類社會或‘文明’將何去何從？”布魯瑪在序言中寫道。

對他來說，1945年代表著父輩的世界，“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義、歐盟”，都是父輩理想的產物。理解1945年，不僅是出于對于上一代人的天然興趣，也是對此刻的回應。戰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 而在過去幾年中，他“見慣了寄托著推翻獨裁者、建立新民主國家這一宏愿的各類革命戰爭”，他很希望父輩的故事能為此刻提供某種參照，因為“我們都生活在過去長長的陰影中”。

塑造我父母與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結束的二戰，而是1947年開始的冷戰。1945年不是一個勝利時刻，更是一個通向新的混亂的前奏，是真正勝利的一個必要過渡。

在我成長歲月的歷史敘述中，1945年的意義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著一種新秩序的形成，被賦予了解放的意義。加入蘇聯陣營的中國開始了一段嶄新的歷史軌跡，也創造了一種封閉、特定的歷史敘述。在這種意義上，1945年的意義被雙重忽略了。因為意識形態的問題，它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被忽略，因為中國的自我封閉，中國的角色在全球敘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歷史潮流已經開始。在中國國內，一股民族主義的傾向將強化1945年代表的勝利意義，而在國際舞臺上，伴隨21世紀的中國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歷史作用將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舊金山會議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國之一了。

這意味著伊恩·布魯瑪對中國讀者的雙重意義，它提醒我們被壓抑、被遺忘的歷史，同樣重要的是，你要學會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態度理解他人，理解歷史中的曖昧含混之處，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陳詞濫調。當中國愈來愈成為新世紀的主要角色時，這種視角變得更加迫切。

獻給我的父親 S.L.布魯瑪和友人布萊恩·烏爾庫哈特

保羅·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畫的是一個天使，看樣子正要從他聚精會神注視的事物旁抽身離去。他凝視前方，嘴巴微張，翅膀打開。這就是人們心目中歷史天使的形象。他的臉面向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不斷堆起尸骸，并將它們拋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將破碎的一切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一場風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無法將它們收攏。風暴無可抗拒地將他推向背對著的未來，而面前的殘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際。這場風暴，正是我們所謂的進步。

——瓦爾特·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九》

# 序

長久以來，父親的故事總有讓我困惑不解之處。對于跟他年齡、背景相仿的人來講，他在二戰期間的經歷談不上有什么特殊之處。事實上慘絕人寰的故事多了去了，但他的經歷著實也夠凄慘的。

我第一次聽父親講起他的戰爭歲月時年齡尚小。跟一些人不同，他并不忌諱重提舊事，即便有些陳年往事再回憶起來只會勾起痛苦。他講的故事我很愛聽，與之相配的還有一些勉強算得上是插圖的黑白照片，尺寸很小，夾在一本相冊里。我從他書房的一個抽屜里拿到了這本相冊，閑來翻翻聊以自樂。照片拍得中規中矩，但在我看來卻足夠奇特，不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有張照片拍攝的是東柏林一座條件原始的勞工營；另一張里，我父親齜牙咧嘴地扮著鬼臉，毀了本來挺正式的照片；還有一張里有幾個文官模樣的德國人，身上穿著帶納粹徽章的西裝；此外有幾張是周日去湖邊郊游的留念；最后一張里，一群滿頭金發的烏克蘭女孩笑容可掬地看著鏡頭。

照片記錄的還算是比較好的光景。那時跟烏克蘭人來往估計是被禁止的，但每每回憶起這些女子，父親眼里還是會閃動著一絲懷念的神情。他曾經險些死于饑餓和體力透支，飽受害蟲摧殘的他不得不在一個浸滿水的彈坑里解決內急，與此同時，這個“公共廁所”還兼具唯一澡盆的功能。這段苦難史都沒有相片為證，但讓我困惑的并不是這點，而是后來他返鄉后發生的事。

父親的家在荷蘭東部小鎮奈梅亨（Nijmegen），鎮上居民大多篤信天主教，那里是1944年阿納姆（Arnhem）戰役爆發的地方。經過一番激戰，盟軍攻占了奈梅亨，阿納姆則正是那座“遙遠的橋”[[1]](#_1___Yao_Yuan_De_Qiao_____A_Brid)。我祖父1920年代曾作為新教牧師被派駐到那里，負責照顧一小撥門諾派教徒[[2]](#_2_Zuo_Zhe_Zhu__Wei_Bi_Mian_Wu_J)。奈梅亨是個邊陲小鎮，從父親家出發，步行就能到達德國。由于德國物價相對便宜，全家人常常會選擇去那兒度假，這種習慣到了1937年前后不得不畫上句號。納粹在當地的勢力已經發展到了即使游客也已不堪忍受的地步。有一天，父親一家在途經“希特勒青年團”的一片訓練營時，親眼目睹了幾個小伙子遭到穿制服的青年團的毒打。還有一次，一家人乘船游覽萊茵河，我祖父吟誦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贊美萊茵河女神“羅蕾萊”（Lorelei）的一首詩（海涅是猶太人），讓同船的德國乘客很是尷尬（他也許是故意為之）。我祖母最終決定，德國是去不成了。三年后，德軍大舉越過了邊境。

即使處于德占期，人們的生活一切照舊。這說來有些奇怪，但對于大多數荷蘭人，只要他們不是猶太人，日子還是照常過，起碼最初一兩年都是如此。1941年，我父親進入烏得勒支（Utrecht）大學攻讀法律。如果將來想做律師，有一件事在當時勢在必行（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現在依舊如此）——加入聯誼會這個所謂的學生團體。這是個排他性組織，而且會費很高。盡管我祖父在社會上備受尊重，但單靠他那點做牧師賺來的微薄薪水遠不足以支付我父親的開銷，于是一位有錢的舅舅決定出資贊助他的社交活動。

然而，父親入會那年，學生聯誼會已經被德國當局取締了，理由是擔心這是個窩藏抵抗力量的大本營。就在這前不久，凡是有猶太血統的教授都被荷蘭的大學開除了。為抗議此舉，萊頓大學法學院的院長魯道夫·克萊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演講前，他在包里備好了牙刷和換洗衣物，以防有人來抓他，他后來也的確被捕了。學生罷課游行，大多數參與者曾是學生聯誼會的成員。萊頓大學（Leyden）關門停課。在阿姆斯特丹，德國人出臺禁止招募猶太人的規定后，那兒的聯誼會就已經被自己人解散了。

但是烏得勒支的大門依舊對外敞開，聯誼會也照常活動，只是由地上轉到了地下，這意味著欺侮新會員的入會儀式也得在暗中進行。那些在社團里被叫做“胚胎”的大一新生再也不用被強行剃頭了，因為這么做會向德國人暴露他們的身份。但是慣例終究是繞不開的，“胚胎們”被人勒令像青蛙一樣跳來跳去，不讓睡覺，被人當奴隸使喚，在各種滿足學長施虐欲和想象力的游戲里受盡羞辱。我父親跟有同樣出身和教養的人一樣，沒有奮起反抗，而是默默屈從于這種折磨。規矩歷來如此（現在也不例外），用施暴者喜歡賣弄的拉丁文說，這是“慣例”（mos）。

到了1943年，年輕人面臨一項更加嚴峻的考驗。德國占領軍逼迫所有學生在一份效忠宣言上簽名，發誓自己絕不會參與任何同第三帝國作對的活動。拒絕簽字的后果是被遣送至德國，被迫為納粹的戰爭工業效力。同85%的學生一樣，父親拒絕簽字，之后便開始了東躲西藏的日子。

那年晚些時候，他收到了一封烏得勒支學生抵抗組織寄來的信，號召他返回家鄉。這么做的動機至今不甚明朗，寫信人要么處于惶恐之中，一時糊涂作出了錯誤決定，要么本來就是無能透頂。畢竟，這些人只是學生，不是什么久經沙場的游擊隊戰士。于是父親就跟著祖父來到了火車站，不幸的是，納粹守株待兔，選在這個時候圍捕送去德國做苦工的青壯年。月臺兩邊都被德國警察堵住了去路，家長受到威脅，說如有人膽敢逃跑，賬就記在他們頭上。因為擔心連累自己的父母，父親只得簽了名。這個決定經過了深思熟慮，但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跡，直到今天他依然時不時為此感到困擾。就這樣，他和別的小伙子一起被裝上車，運到一個臟兮兮的小型集中營。看管他們的荷蘭嘍啰在黨衛隊的培訓下，學會了一整套野蠻的管理手段。父親在那兒沒待多久，后來輾轉至柏林，在一座工廠制造火車使用的制動設備，一直干到戰爭結束。

這是一段復雜的經歷，至少一開始是這樣。只要不主動跟德國人對著干，荷蘭學生工人就不必被關進集中營。縱然工廠的工作單調乏味，給敵人干活有失國格，供人睡覺的營房又冷如冰窖，害蟲到處亂爬，十分不舒服，但未成想這些不幸遭遇竟然也換來了補償。父親記得，當初聽過幾次柏林愛樂樂團的音樂會，擔任指揮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3]](#_3_Wei_Lian__Fu_Te_Wen_Ge_Le__Zh)。

另外，克諾爾（Knorr）制動設備廠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樣鐵板一塊。廠里有個叫埃里松（Elisohn）[[4]](#_4_ElisohnShi_Dian_Xing_De_Ji_Yo)先生的人，長著一頭黑發，為人沉默寡言，一看到荷蘭學生工人朝他走來，轉身就溜。另外一些工人也不太愿意跟人接觸，他們有的名叫羅森塔爾（Rosenthal）[[5]](#_5_RosenthalShi_Dian_Xing_You_Ta)。過了很久，父親猜測這家工廠也許在藏匿猶太人。

1943年11月，情勢急轉直下。英國皇家空軍開始對德國首都展開綿延不斷的轟炸。到了1944年，英軍的蘭開斯特轟炸機迎來了新搭檔：美國B-17s型轟炸機。但是，真正針對柏林和其居民無休止的地毯式轟炸始于1945年初那幾個月，轟炸和隨之燃起的熊熊烈焰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美國人和英國人分晝夜輪流出擊發動空襲，到了4月，東線蘇軍的“斯大林管風琴”（Stalin Organs）[[6]](#_6_Ji_Ka_Qiu_Sha_Huo_Jian_Pao)開始炮擊這座城市。

學生們有時會想辦法擠進防空洞，或鉆進地鐵站躲避空襲，反觀集中營的囚犯是沒有這個待遇的。有時候，他們唯一能找到的掩體只是一條匆忙挖就的塹壕。據父親回憶，面對空襲，學生們是既興奮又害怕。其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轟炸和炮擊幾乎從不間斷，吵得人根本沒法睡覺。耳邊不時會響起防空警報、爆炸聲、人們的尖叫，以及磚塊掉落和玻璃碎裂夾雜在一起的噪音。然而，學生們還是為英美兩國的轟炸機歡呼叫好，盡管這些飛機輕易就能要了他們的小命，而且這種事不是沒發生過。

1945年4月，勞工營已經不能住人了：狂風掀去了屋頂，大火燒坍了墻壁。通過向熟人求助，父親或許從不那么親納粹的新教教會處獲得了幫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別墅里找到了棲身之所。房東太太叫雷恩哈德（Lehnhard），接納父親之前已經收留了從柏林市中心廢墟里逃難至此的其他難民。他們中間有一對德國夫婦，男的叫魯梅林博士（Dr. Rümmelin），是個律師，他妻子是猶太人。丈夫成天擔心有人來抓他老婆，于是在屋里藏了把左輪手槍，一旦事情真的發展到那一步，夫妻倆死也要死在一起。雷恩哈德太太喜歡唱德語歌，父親就彈鋼琴為她伴奏。用他的話講，在柏林最后一戰的大破壞中，只有這種時候才“讓人感到人類社會尚存一絲文明”。

在他去往東柏林工廠上班的路上，父親穿過一條條滿目瘡痍的街道，蘇德兩軍曾在這里的屋舍之間展開巷戰。他站在波茨坦廣場上，看著身前的“斯大林管風琴”發出尖利的嘶鳴聲，對著希特勒的總理府一番狂轟濫炸。自打那時起，父親余生都對爆炸和焰火充滿了恐懼。

4月下旬，抑或是5月上旬，雷恩哈德太太的家里來了一群蘇聯兵。這些不速之客的到來通常伴隨著對婦女的輪奸，且不分老幼。不過這一次暴行沒有發生。然而，當蘇聯士兵從屋內搜出魯梅林博士的左輪槍后，父親差點為此丟掉性命。當兵的里面沒一個會講德語或英語的，所以解釋手槍由來純屬白費口舌。父親和魯梅林博士是屋子里僅有的男丁，蘇聯人命令他們背靠墻壁，準備槍斃他倆。父親至今還記得當時那種聽天由命的感覺，他那時已見慣了死亡，輪到自己大限將至，居然一點都不感到意外。但就在千鈞一發之際，決定生與死的重要關頭，命運神奇地站到了他們這邊。門外來了個會講英語的蘇聯軍官，聽罷魯梅林博士的解釋后決定相信他。槍決被叫停了。

父親和另一名蘇聯軍官之間也建立起了某種友誼，軍官在戰前是列寧格勒的高中教師。由于語言不通，他們只能通過哼唱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進行溝通。這位名叫瓦倫丁（Valentin）的軍官開車載了我父親一程，把他送到一個接送人的關卡，那里曾是西柏林郊外工薪階層的居住區，經過戰火摧殘，現在只剩下一堆瓦礫。父親得從那兒出發，找到一條通往城東某個戰時流離人員收容站的路。在斷壁殘垣間艱難跋涉的過程中，他遇到一個同行的荷蘭人，父親猜那人要么是勾結納粹的通敵者，要么是原黨衛隊軍人。因為連續幾周沒吃過一頓飽飯，沒睡過一個安穩覺了，父親舉步維艱。

還沒走多遠，他就摔倒了。形跡可疑的同伴拖著他走進一棟破損的樓房，跨過幾級樓梯，來到一戶人家家里。房主是這個男人的相好，是個德國妓女。之后的事情父親記不太清了；他多數時候大概全無知覺。這個妓女救了他一命，經過她的悉心照料，父親恢復了精力，成功地抵達了流離人員收容站。那里已經聚集了一千來號人，他們國籍不同，有些還是集中營的幸存者。所有人只能從一個水龍頭里取水用。

六個月后，父親回到了荷蘭。因為戰時的饑餓，照片里的他依舊顯得身材浮腫。他穿著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裝，褲子上還有尿漬，這套行頭有可能是美國門諾派慈善組織送給他的，也有可能是他父親傳下來的。總之，盡管體型有些虛胖，膚色蒼白，但照片里的他看起來還是神采奕奕，四周是和他年齡相仿的小伙子，大家高舉啤酒杯，嘴巴張開，看樣子在歡呼，或者高唱學生歌曲。

父親重返烏得勒支聯誼會應該是在1945年9月，他那時22歲。因為戰時入會是悄悄進行的，團體元老們決定重啟種種整人儀式。父親記不清是否被迫學過蛙跳，是否曾被撞得東倒西歪。這些待遇更多是用來“招待”初來乍到的新生，一些人也許剛剛脫離集中營，且條件要比我父親待過的惡劣得多。當中估計也有猶太學生，他們曾躲在別人家的地板下，一躲就是數年。勇敢的異教徒救命恩人挺身而出，不惜冒生命危險庇護他們。然而，我父親不記得有誰對這些歷史感到難堪；沒人對生平故事感興趣，不管是猶太人還是別的什么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作為迎接新人入會的一個環節，“胚胎們”被人扯著嗓子罵，戲弄，甚至人擠人關進狹小的地窖里（后來的聯誼會圈子管這個游戲叫“玩轉達豪”[[7]](#_7_Da_Hao__Dachau__De_Guo_Di_Min)）。

好了，這就是讓我疑惑的地方。在經歷了那么多磨難后，父親怎么還能忍受如此毛骨悚然的做法呢？再說總該有人覺得這很荒誕不經吧？

沒有，父親連連搖頭。不，這很正常，過去都是這么干的，這就是慣例，沒人會質疑。他日后為自己的話進行了辯解，說欺負猶太幸存者很可恥，但別人是不是這么想他說了不算。

我對此感到困惑，但漸漸地，我覺得自己想通了。這種“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條幫助理解的線索。人們太想回到納粹占領前他們熟知的那個舊世界，在那個世界里，沒有炸彈，沒有集中營，沒有殺戮，而整整“胚胎”則稀松平常。這種想法意在重溫舊夢，恢復傳統，似乎這樣，就算回歸了本原。

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也許在那些目睹過血腥暴力的人看來，學生之間的游戲相對而言溫柔多了，年輕人嘛，就好這口，打打鬧鬧也無傷大雅。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些極其熱衷于整人的人，本身并沒有怎么受過欺負。面前擺著個充男子漢的大好機會，而且如果受害者吃過的苦頭遠遠不止這點兒的話，那么整人所勾起的快感會更加強烈。

\* \* \* \* \*

父親的這則故事——如前文所述，不算最慘，但也夠辛酸的了——讓我對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慘烈的戰爭結束后不久發生的事很是好奇。這個世界是如何從廢墟里站起來的？當數以百萬計的人餓著肚子，一心只想報仇雪恨，血債血償，又會發生什么？人類社會或“文明”（當時是個熱門詞）將何去何從？想要找回一切照舊的感覺，是人類應對災難的慣有態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實際。因為世界可以按照戰前狀態重建這種想法，就好像以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臨的那個慘絕人寰的十年可以當作失憶被抹掉一樣，只能是一種幻想。

然而，不光政府抱有這種幻想，作為個體的人也抱有這種幻想。法國和荷蘭政府幻想它們能夠收復殖民地，生活一切照舊，一如日本入侵東南亞之前的狀態。但這只能是幻想，因為世界已經大變樣了。發生了太多的事，太多的變化。太多的人、甚至是整個社會喪失了根基。而且，除了許多人以外，多國政府也并不希望世界回到戰前的狀態。英國工人打仗時愿為國王陛下和祖國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戰后卻再也不愿茍活在舊的階級體制下，他們在希特勒倒臺僅僅兩個月后，就投票把溫斯頓·丘吉爾趕下了臺。約瑟夫·斯大林也無意讓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復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即便在西歐，共產主義也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反法西斯”道德外衣下，使不少知識分子都將其視為比舊秩序更可行的替代選項。

在亞洲，處于萌芽階段的變革比歐洲來得更加民主。印尼人、越南人、馬來人、中國人、緬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樣是亞洲國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義列強羞辱得體無完膚，從此就徹徹底底摒棄了西方無所不能的觀念。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也會迎來重塑。與此同時，跟德國人一樣，日本人在見證了領袖狂妄自大的迷夢化為泡影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戰勝一方的盟國占領軍軟硬兼施塞給他們的變革了。

戰爭時期，英美兩國的女性投身勞動大軍，她們再也不甘淪為“賢妻良母”，放棄經濟獨立。當然了，許多女性依舊在家相夫教子。這和殖民地贏得全面獨立是一個道理，都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人們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過去“正常狀態”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變革，從頭再來，希望建立不再有毀滅性戰爭的美好新世界。兩種想法不停地作著較量。希冀源于真誠的理想主義。國聯未能阻止二戰爆發，但這沒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義。于是，到了1945年，他們轉而寄希望于聯合國能維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這些宏愿如同想要把時鐘往回撥一樣，只能是人們的幻想。不過，這一事實并未削弱理想主義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們的目標。

戰后1945年的歷史從某些方面來講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古希臘人清楚地了解人類復仇渴望所潛藏的巨大破壞力，他們的悲劇家濃墨重彩地描繪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審判，而不是冤冤相報。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關于人類東山再起夢想的歷史記載均是汗牛充棟。基于嶄新理想的社會，將屹立在昔日戰爭廢墟和如今的建筑空地之上。不同于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類似觀念往往并不新穎。

我本人對戰后初期的興趣部分源于時事。近年來，我們見慣了寄托著推翻獨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國家這一宏愿的各類革命性戰爭，但我主要還是想走進歷史，讀懂我父親和他那代人身處的世界。這么想部分是因為對家長經歷的好奇是孩子的天性，隨著孩子長大，年紀超過同齡時期的家長，這種好奇心便愈發強烈。而如果父輩經受過苦難的考驗，后人對此只能憑空猜想的話，好奇心則尤為炙熱。

但是原因不止于此。父親差點在戰爭中送命，他作為一分子在戰爭廢墟上重建起來的世界是我輩長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輩理想所孕育的產物：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義、歐盟。除了這一面，1945年締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產黨在俄國和東歐推行專政，毛澤東在國共內戰中異軍突起，還有冷戰。

我們父輩創造的這個世界大體上已經灰飛煙滅，或正在高速解體，分崩離析。當然了，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戰波及的幾乎所有地區，如今的生活在物質條件上都要遠遠優于1945年。人們最害怕的一些事終究還是沒有發生。蘇聯帝國崩潰了，冷戰最后的戰場雖說是朝鮮半島，但差一點就落在了狹窄的臺灣海峽。然而，就在我寫作本書的時候，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討論西方的衰落，西方既包括美國，也包括歐洲。如果人們在戰后初期的一些擔憂已經減輕，那么同樣消逝的還有夢想。如今很少還會有人相信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能保障永久和平，甚至也不再相信聯合國有能力阻止武裝沖突。原先對于社會民主體制和福利國家的種種愿望——這是導致1945年丘吉爾下野的直接原因——如果還沒被扼殺殆盡的話，也已經在意識形態和經濟約束的夾擊下遍體鱗傷。

我對人類能以史為鑒的看法一直將信將疑，至少從認識到過去的愚蠢行為可以防止未來再犯同樣錯誤這點來看，我的質疑不是沒有道理。歷史歸根到底是一門闡釋的學問。對過去的錯誤闡釋往往比愚昧無知更危險，對舊傷和仇恨的記憶又會點燃熊熊烈火。話雖如此，但還是有必要搞清楚過去發生了什么，并且試著加以領會。因為不搞清楚的話，我們就無法讀懂當下的時代。我想探尋我父親的經歷，這能夠幫我了解自己，甚至了解所有人，因為我們都生活在過去長長的陰影中。

[[1]《遙遠的橋》（A Bridge Too Far），1977拍攝的戰爭片，描繪的正是盟軍在荷蘭遭遇的最大挫敗。（說明：本書頁下注除特別標明“作者注”外，皆為譯者添加。）](#_1)

[[2]作者注：為避免誤解，在此需要提一下，荷蘭的門諾派教徒和他們在美國的教友有很大區別。荷蘭的門諾派非常進步，對其他信仰不抵觸，而且也不崇尚遁世。反觀美國和德國的門諾派則不是這樣。因此，穿著老派的黑西裝、留著大胡子的人來奈梅亨拜訪我祖父時，總會造成幾分尷尬。](#_2)

[[3]威廉·富特文格勒，著名的德國指揮家。](#_3)

[[4]Elisohn是典型德籍猶太人的姓。](#_4)

[[5]Rosenthal是典型猶太人名。](#_5)

[[6]即喀秋莎火箭炮。](#_6)

[[7]達豪（Dachau），德國地名，曾經是大型集中營所在地。](#_7)

# 第一部分 解放心態

## 第一章 歡騰

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垮臺后，盟軍從德國集中營、勞工營和戰俘營里解救了數以百萬計的俘虜。他們本以為這些囚犯肯定很聽話，而且對救命恩人感恩戴德，任何形式的要求一概樂意配合。毋庸置疑，事情有時的確如此，但通常情況是，盟軍遭遇了后來俗稱“解放心態”的問題。拿一個目擊者有些官僚口氣的話來講：“這其中包含復仇心理、饑餓和歡欣鼓舞。三種因素結合起來，讓剛剛重獲自由的戰爭流離人員在行為和舉止上都問題重重，這對他們的安頓、食物供給、殺菌消毒和遣返都構成了挑戰。”[1]

“解放心態”不光體現在流離人員收容所里的囚徒身上，這個詞還可以用來形容剛取得民族解放的國家，有時候戰敗國亦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個富庶的國家，因為生得晚，所以未曾見識過饑餓的后果，但還是能隱隱約約感受到報復心理和喜慶歡騰的回響。對那些勾結敵人，或者更惡劣的，和敵人上床的人的報復，以一種悄無聲息、幾乎鬼鬼祟祟的方式依舊在上演，且大都并不激烈。人們從不會在某家店鋪購買日用品或香煙，因為“是個人”都知道，那些店的店主在戰時“底子不干凈”。

另一方面，歡慶光復在荷蘭經過制度化后，已然被確立為一年一度的國家儀式：即每年5月5日的光復日。

自打我孩提時代記事時起，5月5日這天必然是艷陽高照，教堂鐘聲回蕩在空中，紅、白、藍三色相間的荷蘭國旗在輕柔的春風中迎風飄揚。12月5日的圣尼古拉節本來是個更隆重的家庭節日，但光復日這天是彰顯愛國熱情的大好契機，至少在我兒時的五六十年代時是這種情況。由于荷蘭人不是靠自己擺脫德國占領，而是被美、英、加和波蘭軍隊解放的，因此一年一度的愛國熱情大爆發總讓人感覺有些怪怪的。話雖如此，由于荷蘭人跟英美兩國的人一樣信奉自由是民族認同的構成要素，所以德國戰敗在國民意識里被淡化這點就很好理解了，需要加強的是荷蘭在十六至十七世紀期間的八十年戰爭（Eighty Years’ War）中戰勝西班牙王國的集體記憶。

作為戰后六年出生的一輩，我和同齡人每當看到蘇格蘭風笛手頂著槍林彈雨在諾曼底海灘上行軍奏樂，以及法國民眾高唱《馬賽曲》的影像時，總是很容易淌下動情的淚水。當然，這些畫面并不源自記憶，而是好萊塢大片。不過，我也算親歷過一些歡慶場面，1995年5月5日，為慶祝荷蘭光復五十周年，當年加拿大部隊進入阿姆斯特丹的場面得以重現。但實際情況是，盟軍5月8日才抵達阿姆斯特丹，但這點無關緊要。當時的場面一定是盛況空前，據親歷此事的一名英國戰地記者回憶：“荷蘭人又是親我們，又是哭著對我們千恩萬謝，我們被人擁抱，捶打，直到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累到不行，耳邊尖叫聲、喊聲一片。荷蘭人把自家花園挖了個空，花朵就像下個沒完的雨點一樣落在盟軍車輛上。”[2]

五十年后，上了年紀的加拿大老兵穿著筆挺但褪了色的軍裝，佩戴軍功章，登上老式吉普車和裝甲車再次駛入阿姆斯特丹，他們眼含熱淚地向人群揮手致意，回憶起自己叱咤風云的崢嶸歲月，盡管這些事跡孫兒們早就聽膩了。為期幾天的歡慶過后，當年的戰斗英雄們在卡爾加里（Calgary）和溫尼伯（Winnipeg）解甲歸田，有的做了牙醫，有的當了會計。

讓我感到詫異的，不是這些老先生“好漢重溫當年勇”，而是荷蘭老嫗們的表現。毋庸置疑，她們穿著得體尊貴，但卻跟其他人一樣陷入了癲狂狀態，跟孩子似的上躥下跳，那股子大喊大叫的勁頭活像置身搖滾演唱會的小姑娘。她們中有的還張開雙臂去摸吉普車里老兵的軍裝，嘴里不住地重復“謝謝！謝謝！謝謝！”，激動得不能自已。這些老婦人也在重溫曾經的歡樂時光。這是我見過的最奇特的情色場景之一。

\* \* \* \* \*

事實上，之前已經提過，加拿大軍隊進入阿姆斯特丹的時間并非5月5日，戰爭也不是在這天正式結束的。沒錯，就在一天前，納粹海軍上將漢斯——格奧爾格·馮·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和埃伯哈德·漢斯·金澤爾（Eberhard Hans Kinzel）將軍來到位于呂訥堡（Lüneburg）野外的軍帳內，向人稱“蒙蒂”（Monty）的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Bernard Montgomery）呈上了投降書。自此，德國西北部、荷蘭和丹麥境內的所有德軍全部繳械投降。這兩個德國軍官坐著奔馳轎車、沿著鄉間小路前往蒙哥馬利指揮部，恰好被一位名叫布萊恩·烏爾庫哈特（Brian Urquhart）的年輕英國軍官看到了。就在前不久，他作為首批盟軍軍官之一進入了附近的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Belsen）。據他稱，那里被解救出來的囚犯“就算覺得找到了可以與我們溝通的語言，似乎也無法口齒清晰地講話”。因為距離稍遠，起初被烏爾庫哈特誤認為是圓木的東西，后來證實其實是堆積成山的尸體，“視線所及之處”，無所不在。[3]幾天后，美國報紙發表了一篇記錄德國暴行的報道，依舊穿著精美皮質軍大衣的海軍上將馮·弗里德堡讀罷勃然大怒，斥之為對他國家的造謠中傷。

5月6日，瓦赫寧恩（Wageningen）附近一棟殘破的鄉間小屋里舉行了另一場受降儀式。德國將軍約翰內斯·布拉斯科維茨（Johannes Blaskowitz）帶著他的部隊在這里向加拿大中將查爾斯·福克斯（Charles Foulkes）遞交了降書。阿納姆此時已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經歷了1944年9月的炮戰后，小城只剩下殘磚碎瓦。同月，美、英、加、波聯軍本計劃挺進荷蘭，結果遭受了一場滑鐵盧，史稱“花園廣場行動”（Operation Market-Garden）。烏爾庫哈特是預見這場軍事失利的人之一，他當時在一位行動主要策劃人綽號“男孩”（Boy）的布朗寧將軍（F.A.M.Browning）手下擔任情報官。布朗寧為人風流倜儻，手上血債累累。烏爾庫哈特給長官看照片，證明阿納姆附近埋伏著德軍的坦克旅，正等著迎頭痛擊盟軍。但上峰卻不聽，責令他去休病假。誰都休想搞砸蒙蒂的派對[[1]](#_1_Zuo_Zhe_Zhu__Shi_Shi_Shang__Z)，更別說是一個芝麻綠豆大的情報官了。

但戰爭此時仍未結束，在荷蘭也一樣。5月7日，人們聚集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壩廣場，在荷蘭王宮前歡呼雀躍，載歌載舞，揮舞著象征荷蘭王室的橙色旗幟，滿心歡喜地等著迎接高奏凱歌、即將到來的英國和加拿大部隊。透過廣場上一所紳士俱樂部的窗戶，德國海軍軍官看著興奮的人群。因為自尊心受損，他們最后時刻起了殺心，下令在屋頂上架起機槍，向人群掃射。結果導致22人死亡，100多人重傷。

但這起慘案也并非戰爭暴力的絕唱。5月13日，也就是光復日過去一周后，有兩人被德軍處決。死者是德國人，因為反對納粹，他倆開小差當了逃兵，之后藏匿在荷蘭人中間，其中一人的母親還是猶太人。5月5日這天，兩人走出藏身之處，向荷蘭抵抗運動成員投誠，后者把他們移交給加拿大人。然后，他們就不幸淪為典型戰時混亂的犧牲品。5月4日，蒙哥馬利接受德國投降后，由于荷蘭境內盟軍兵力不足，無力解除德國人的武裝，或負責戰俘的吃喝，德國軍官就被暫時允許繼續行使指揮權。這兩個倒霉的逃兵被分配到阿姆斯特丹郊外一所廢棄的福特汽車組裝廠里，與其他德國兵為伍。當官的按捺不住最后一次擺官威的沖動，草草設立了一個軍事法庭，并判處兩個逃兵死刑。為了處決“叛徒”，德國人向加拿大人借槍。對條例認識模棱兩可、又不想打亂臨時安排的加軍還真同意了。兩人被迅速處死。類似的厄運也發生在別人身上，加拿大人最終制止了這種亂象，但為時已晚。[4]

官方給出的歐戰結束時間，即歐洲勝利日（V-E Day），是在5月8日。雖然早在5月6日晚上，法國蘭斯（Rheims）一所學校內就已簽署了全體德軍無條件投降聲明，但慶典還不能開始。聽聞艾森豪威爾將軍自以為是接受了東西兩線德軍的投降后，斯大林怒不可遏。在他心里，只有蘇聯人才有權這么做，而且地點必須是在柏林。斯大林希望把歐洲勝利日延遲至5月9日，但這反過來又惹惱了丘吉爾。

全英國的人已經在忙著烤面包，做三明治慶祝勝利了；國旗和橫幅都已準備就緒；教堂的鐘聲等待人們敲響。讓所有人困惑的是，率先在電臺里宣布戰爭結束的居然是德國人。消息發自弗倫斯堡（Flensburg），海軍上將德尼茨（Doenitz）坐鎮當地，名義上依舊控制著氣數已盡的德意志帝國。BBC獲悉了這則消息，很快，美、英、法等國家的報紙號外便出現在街頭。在倫敦，大批人群涌向皮卡迪利圓環和特拉法加廣場，期待首相丘吉爾宣布勝利，并繼而拉開史上最大慶典的序幕。在紐約，大街上鋪天蓋地飄散著電報紙條。然而，盟軍首腦們遲遲不發表正式聲明，宣告對德戰爭已經結束。

就在5月8日午夜前不久，心狠手辣的軍事奇才格奧爾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帥在設于卡爾斯霍斯特（Karlshorst）的蘇軍指揮部——那里距離我父親被關押的勞工營不遠——接受了德國人的投降。海軍上將馮·弗里德堡不得不再次在投降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大名。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面無表情，一本正經，舉手投足之間透露出普魯士軍人的做派。他告訴俄國人，德國首都遭破壞程度之嚴重讓他觸目驚心。話音剛落，一名蘇聯軍官便反問凱特爾，數以千計的蘇聯村莊和城鎮被夷為平地，包括兒童在內的上百萬蘇聯人因此長眠于廢墟之下，他凱特爾作為下達侵略命令的人，是不是一樣感到觸目驚心。凱特爾聳聳肩，沒有回話。[5]

受降儀式結束后，朱可夫令德國人離開。接著，俄國人就同美、英、法盟友一起開始慶祝，他們噙著淚花發表演講，大口大口地灌下紅酒、干邑和伏特加。翌日，同一房間里還召開了慶功宴。席間，朱可夫向艾森豪威爾敬酒，稱贊他是史上最偉大的將領之一。酒敬了一輪又一輪，包括朱可夫在內的俄國將軍都跳起舞來，直到全部醉倒在地。

5月8日，紐約的人們已經欣喜若狂，倫敦大街上一樣是萬人空巷，但英國民眾還是平靜得出奇，似乎是在等丘吉爾發話，好宣布慶典的開始。丘吉爾決定不理睬斯大林將歐洲勝利日挪至9日的愿望，計劃在下午3點整發表演說。杜魯門總統已經先他一步了。夏爾·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也不甘被丘吉爾搶了風頭，堅持要在同一時間向法國民眾發表告國民書。

丘吉爾在BBC的講話通過電波傳遍了全世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裝了喇叭，外面的國會廣場上人山人海，連挪腳的空間都沒了。人們疊羅漢似的簇擁在白金漢宮門口。在倫敦西區，馬路已經被蜂擁至此的人堵得水泄不通，車輛根本無法通過。接著，大本鐘敲了三次，人群安靜下來。終于，丘吉爾深沉而洪亮的聲音從喇叭里冒了出來：“對德作戰就此終結……幾乎全世界都聯合起來，對抗邪惡勢力，他們如今已俯首稱服……現在，我們務必集中精力和資源，去完成我國在國內外的使命……”講到這兒，他的嗓音陡然一變：“前進大不列顛！自由事業萬歲！上帝保佑國王！”不多一會兒，他又站在衛生部的陽臺上，做出代表勝利的V字手勢。“上帝保佑各位，勝利屬于你們！”人群高聲回答：“不，勝利屬于您！”

《每日先驅報》（Daily Herald）是這樣報道當時情景的：“倫敦市中心陷入了一派狂熱慶祝的場面，人們又是歡呼雀躍，又是翩翩起舞，又是開懷大笑，已經無法自已了。他們把公共汽車團團圍住，跳上轎車車頂，扒掉了一段臨時圍墻，在堤道上燃起篝火；他們親吻警察，還拉后者一塊跳舞……司機摁車喇叭，奏響勝利的最強音。河道上航行的拖船和輪船也在夜晚鳴響汽笛，與陸地上的勝利奏鳴曲遙相呼應。”

我母親那年才18歲，也置身于人群中，寄宿制學校放了假，她也不用再照看弟弟。我的外婆名叫維尼弗雷德·施萊辛格（Winifred Schlesinger），父母分別是德國和猶太移民，這種時候她高興是理所當然的，她對丘吉爾的崇拜之情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在“興沖沖、醉醺醺的人群，特別是美國佬中間”走丟，她就有點緊張。

在紐約，50萬人走上街頭歡慶勝利。官方解除了宵禁，各大夜總會——科帕卡巴納、凡爾賽、拉丁區、鉆石馬蹄鐵、摩洛哥——客滿為患，通宵達旦地營業。桑給巴爾酒吧請來了萊昂內爾·漢普頓（Lionel Hampton）[[2]](#_2_Lai_Ang_Nei_Er__Han_Pu_Dun__M)駐場演出，羅斯福燒烤酒店則由艾迪·斯通（Eddie Stone）[[3]](#_3_Ai_Di__Si_Tong__Mei_Guo_Jue_S)撐臺面。在杰克·鄧普西酒吧，提供的美食“量大得驚人”。

在巴黎的共和國廣場上，《解放報》（Libération）的一名記者目睹了“高舉盟軍旗幟、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名美國大兵盡管長著一對大長腿，但為了拍照還是使勁地踮腳，搖來晃去的樣子讓人忍俊不禁。他的卡其褲口袋里塞著兩瓶干邑酒，一瓶滿的，一瓶已經空了”。一位美國轟炸機飛行員駕著米切爾B-25型飛機，飛越了埃菲爾鐵塔下的拱門，看得在場人群擊節叫好。在巴黎的意大利街上，“一個大塊頭美國水手和一個帥氣的黑鬼”商量著賭一把，他們把每個路過的女人攬入自己“寬闊的胸膛”，然后數誰臉上留下的口紅印多。好事者給兩人下了注。在凱旋門附近，人群比往日任何時候都要龐大，他們向戴高樂將軍致謝。見此情景，平時不茍言笑的戴高樂也難得綻放出一絲笑容。人們齊聲高唱《馬賽曲》和戰時風靡大街小巷的《瑪德隆》：

在很遠的布列塔尼有家館子，

疲憊的士兵喜歡去那找樂子。

老板的女兒名叫瑪德隆，

在他們歡笑和閑扯時斟上酒……

噢，瑪德隆，你就是唯一，

噢，瑪德隆，為了你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沒見過女人好久了，

你就行行好親我們一口吧。

然而在巴黎，一些人卻覺得勝利日這天過得有些意興闌珊。畢竟，法國在1944年就獲得了解放。回憶起當晚的情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這樣寫道：“和我記憶中經歷過的其他節慶相比，這天的體會格外復雜，也許是因為我的情緒有些五味雜陳。勝利是在距離家門口十萬八千里外的地方取得的，我們并沒有懷著焦急的心情，像盼著光復一樣翹首期盼這一天的到來；很久以前就有人預見到這一天，因此沒帶來什么新的希望。從某種角度來看，這樣的結局跟死亡差不多……”[6]

反觀莫斯科市民，9日凌晨聽到勝利宣言后則蜂擁至大街上。許多人不顧身上還穿著睡衣睡袍，跳起舞來。“勝利啦！我們勝利啦！”的縱情歡呼響徹夜空。在寄給英國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的信中，曾擔任斯大林翻譯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回憶道：“我們自豪，因為終于戰勝了狡猾而邪惡的敵人；我們悲傷，為的是那些戰死的英靈（我們那時還不知道蘇軍在戰場上陣亡三千萬人）；我們滿懷希望，但愿世界永遠和平，和戰時盟友能繼續合作。所有這些情緒交織在一起，匯集成一種既釋然又憧憬的別樣心情。”[7]

也許5月8日刊發的《解放報》說的沒錯：勝利日總體上是年輕人的派對。“只有年輕人興高采烈地跳上盟軍的吉普車，似乎跳上的是隆尚（Longchamps）賽馬場的觀眾看臺。車子駛過香榭麗舍大街，年輕人的頭上繞著國旗，嘴里引吭高歌。當然事情本該這樣，對于年輕人來講，危險過去了。”

我外婆人在英國，心里卻還惦記著在印度服役的丈夫，無心分享子女的興高采烈。跟她感同身受的人無疑還有很多。她們思念遠在他鄉的丈夫和兒子。有些人在戰爭中失去了太多，已經不愛說笑了。讓人頗感意外的是，身為移民的女兒，我外婆的反應卻像個典型的英國人。“我是如此想念你，所以無心慶祝勝利，”她在給我外公的信中這樣寫道，“所以借著這大好時光，我在花園里會多干些零活。”

我父親甚至都不記得戰爭是哪天正式結束的，他只依稀記得俄國人曾鳴槍慶祝。朱可夫元帥在回憶錄里寫道：“我們（在5月9日）走出宴會廳，聽到外面各種武器開火的交響曲……槍炮聲連綿不絕，響徹柏林部分市區和郊外。”[8]我父親已經聽慣了槍聲，所以沒怎么在意。

年輕的英國情報官烏爾庫哈特當時被困在了德國北部。不久前剛見證貝爾森集中營慘狀的他從心底里高興不起來：“要想再現當時那種大變局下我的心理活動，并非易事。從最初的絕望，到最后的勝利，過去了差不多六年。這六年里，我有好幾個朋友死于戰爭，我目睹了難以置信的荒涼和破敗……我會想起戰時照片里見過的那些無名氏的臉，他們中有難民、囚犯、遭遇空襲的平民、家園被毀置身冰天雪地的俄國人，還有那些即將沉沒的商船上的海員——他們當中又有多少能與家人團聚呢？”[9]

但對于在紐約、巴黎和倫敦尋歡作樂的人，這些想法可不會掃了他們的興。勝利日既是年輕人的節日，也是燈光的盛宴。這么說一點也不夸張。《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5月9日頭版頭條的大標題寫著“紐約城燈火璀璨！”。5月8日出版的倫敦《每日先驅報》也聲稱“夜色中的倫敦再度流光溢彩”。在巴黎，歌劇院的景觀燈自1939年9月以來第一次點亮，綻放出藍、白、紅三色光芒。在黑燈瞎火多年后，照明燈一盞接著一盞重新亮了起來，將凱旋門、瑪德蓮教堂和協和廣場照得燈火通明。《先驅論壇報》不無驕傲地報道：“景觀燈照亮了巴黎貝利街大樓前方的星條旗、米字旗和法國三色旗，巨大的旗幟呈波浪形在風中飄舞。”

紐約市自從1942年頒布燈光管制令以來，燈光一點點地變暗，到了1943年10月后進而發展為“局部斷電”，只有自由女神像的火炬還能發出微弱亮光。但根據《紐約每日新聞報》（New York Daily News），到了5月8日晚上8點，“百老匯皇冠上鑲嵌的所有珠寶光彩奪目，熙熙攘攘的人流像是在燈光里游泳，燈火溫暖人心”。

倫敦特拉法加廣場上的納爾遜紀念柱被探照燈鎖定。作為倫敦金融區被轟炸后幾乎碩果僅存的一棟建筑，圣保羅大教堂沐浴在景觀燈光中。燈火通明的電影院把萊切斯特廣場映照得一片妖嬈。從倫敦一路北上，直至蘇格蘭，夜空中無不閃耀著萬堆篝火發出的溫暖紅光。

既然不用再害怕德國人的炸彈和“超級賽車”（即德國V1飛彈），燈光又亮了起來，這讓人如釋重負。不僅如此，燈光的回歸還帶有一層感人的象征意義。讀著這些當時的文字，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俄國學者在莫斯科給我講的一則故事。她醉心于研究法國文學，一輩子都夢想能看一眼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卻只從書本上讀到過它們。終于，1990年，柏林墻被推倒后，她美夢成真，獲準乘火車赴巴黎旅行。我問她對旅途中哪些見聞感觸最深，她回答說，夜車從東柏林到西柏林的一瞬間，四周突然有了燈光，這一刻讓她記憶猶新。

\* \* \* \* \*

燈光的盛宴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可追溯至人類點亮的第一支火把。這種儀式往往有著神秘的起源，同季節變換和新生命的開始有關聯。人們對光復初期的回憶部分帶有一種很明顯的宗教熱忱，這點在女性對盟軍士兵的熱情接納上尤其顯著。來自海牙的年輕姑娘瑪利亞·哈嚴（Maria Haayen）回憶到，她平生第一次看見加拿大坦克轟隆隆地駛向她時，有個士兵從炮塔口伸出腦袋，向外張望。那一刻，“我渾身的血都像被抽干了，心里默念：我們解放了。坦克駛近時，我無法呼吸，當兵的站起身，他看著就像個圣人”。[10]

這種情緒也許在年輕姑娘中間更為普遍，但也有男人持相同看法。據一名荷蘭人回憶：“當時哪怕是摸一摸加拿大軍人的衣袖都是件了不得的事，每個加拿大大兵都是基督，是救世主……”[11]

從某種重要維度來看，1945年夏，盟軍士兵在被解放國家的經歷也許可以同二十年后甲殼蟲樂隊造訪這些國家時的情況相提并論。那時，表達解放的方式很狂熱，首當其沖地體現在男歡女愛上。1945年，在諸如荷蘭、比利時、法國——戰敗的德國和日本更是如此——男丁無處可尋。就算有，也是被關著，或者窮困潦倒，營養不良，情緒消沉。異族占領和軍事失利多多少少摧毀了本國男性的權威——至少暫時如此。當時某位荷蘭史學家有過這么一段描述：“荷蘭男人1940年在軍事上吃了敗仗，1945年又在性事上吃了敗仗。”[12]同樣的話也適用于法國、比利時或任何曾被異族占領的國家。戰爭的一大后果是許多女性再也不會百依百順，逆來順受。她們出門工作，為抵抗組織效力，或肩負起照料家人的重擔。拿當時法語里一句很不客氣的話來講，女人都變得“男性化”（hominisée）了，她們的舉手投足開始像男人。

跟瘦骨嶙峋、澡也不洗、衣衫襤褸的荷蘭、法國和德國男人相比，加拿大人干干凈凈，美國人高高大大。他們伙食好，軍餉足，穿著征服者軍裝的模樣實在是又性感又帥氣，看著肯定跟神仙差不多。不少荷蘭女人后來嫁給了加拿大軍人，拿她們當中一個人的話來講：“面對事實吧，我們旱了那么久，加拿大人看著就美味可口。”

沒有什么比跟盟軍一起到來的音樂更能說明解放的性意味了，納粹曾取締這類音樂，其中有搖擺樂，爵士樂，比如格倫·米勒（Glenn Miller）的《情緒正正好》（In the Mood），另外，湯米·道爾西（Tommy Dorsey）、斯坦·肯頓（Stan Kenton）、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萊昂內爾·漢普頓等音樂家的作品也在取締之列，比如那首Hey! Ba-Ba-Re-Bop。巴黎年輕人在俗稱“勝利唱片”——發給美軍的爵士樂唱片——的音樂中翩翩起舞。而法美混搭的精神也傳遞到法語香頌（chanson）[[4]](#_4_Ji_Fa_Yu_Zhong_De_Ge_Qu)中。1945年由雅克·皮爾斯（Jacques Pills）唱紅的一首熱門歌曲歌詞如下：

歐拉拉！（Oh! Là là!）[[5]](#_5_Oh__La_la__Shi_Fa_Yu_Li_Chang)

早上好小姐，

歐拉拉！

哈羅，就是這樣啦，

歐拉拉！

我覺得你好美，

歐拉拉！

你是帥氣的阿兵哥……

1945年，西線盟軍依舊被明文禁止跟德國人往來。在荷蘭和法國，這種行為倒是得到了積極提倡，甚至還出現了“親善行動”（Operation Fraternization）。到了7月，在朱莉安娜（Juliana）王妃和伯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授意下，荷蘭成立了娛樂管委會，目的是為逾10萬名加籍軍人提供會講英語的女伴。具體而言，年輕女性可以陪同這些當兵的參觀藝術展、博物館，一起看電影，或去有人監督的舞廳跳舞。

本來此舉可謂用心良苦，人們期待這些女性可以“維護吾國的榮譽”。我的荷蘭祖母作為新教牧師的太太，受命監督這類舞會，以確保加拿大軍人和他們的荷蘭女友不會做出什么有辱國格的事來。跟她一起行使這項權力的是一位名叫奧格特洛普神父（Father Ogtrop）的天主教牧師。男男女女們跳舞時喜歡和著“Hey! Ba-Ba-Re-Bop”的拍子，大聲喊出神父的名字。我吃不準這些舞會上都發生了什么，但借一名加拿大士兵的話來講，他還從來沒“遇到過比荷蘭女人更積極主動的”。[13]

從盟軍士兵的角度來看，這種安排也還過得去，畢竟他們的長官對買春嗤之以鼻。即使在法國，紅燈區也是不得光顧的。反觀在德占期，妓院（maison de tolérance）的生意異常紅火。部分美國老兵對1918年一戰結束后的巴黎依舊懷有美好的回憶，那時“豬巷”（Pigalle）里的妓院可是向這些大頭兵敞開了溫柔的懷抱。即便二戰結束，禁止嫖娼的條令也無法得到完全遵守。至少有一起記錄在案的事例可以證明，瑟堡（Cherbourg）的幾家妓院就是美國軍方間接經營的。[14]一些專對黑人士兵開放，另一些只做白種人的生意，妓院門口還有美國憲兵把守，確保排隊秩序。但總的來講，這一次，那些有充分理由擔心因為缺乏有組織性交易，將導致性病大肆傳播的人可是失算了，因為勾搭當地女人完全是基于你情我愿的原則。

這倒不是說占領軍和當地女人的關系是平等的。男人有錢，有奢侈品、香煙、絲襪，更重要的是，他們手里有人們迫切需要并賴以為生的食物。解放者收獲的各式各樣的諂媚之辭顯示出雙方之間很可能存在一種恥辱性的倒貼關系。然而，把女人看成頭腦簡單的動物，因為崇拜英雄，所以主動去勾搭軍人，或者無力抵抗，任人玩弄的看法都是不盡準確的。波伏娃在回憶錄里寫到過一個年輕的巴黎女人，她的“主要消遣方式”是“獵捕美國人”（la chasse àl’Américain）。

日后成長為知名小說家的伯努瓦特·格魯（Benoîte Groult）和她的妹妹弗洛拉（Flora）一起記錄過她們“獵捕美國人”的戰果。姐妹倆給這部小說起名叫《四只手寫日記》（Journal à Quatre Mains），說是小說，但內容實際上絕非虛構。格魯會說英語，她同其他法國女人一道，向美國紅十字會報名，志愿和美國兵交往。但她經常出沒的地方其實沒有這么健康正面，大多數夜晚她都流連于巴黎的夜總會之間。那些夜總會只對盟軍士兵開放，歡迎法國姑娘，但將法國男人擋在門外。通常，它們的名字看起來沒什么異樣，比如“加拿大俱樂部”、“獨立”、“彩虹一角”。

格魯對美國和加拿大軍人的體態描寫很具體，而且筆觸和那些自以為見到了圣人的人一樣充滿好感。只不過在她筆下，姐妹倆高度現實，大兵也絕非什么清心寡欲的圣人。她描寫自己如何征服男人時的口吻和一些男人吹噓自己“把妹”本事如出一轍。她經常光顧的夜總會在小說里叫“奴隸市場”，但在眼下，“奴隸”卻成了打勝仗的英雄。

這里有一段格魯描寫美國戰斗機飛行員柯爾特的文字：“他鼻子較短，略微有點朝天鼻，這讓他看起來有幾分美國人普遍的孩子氣；因為長期在平流層飛行，他的皮膚曬成了古銅色；他雙手粗壯，肩膀寬得像紅毛猩猩……臀部完美，筆直，算是平衡了身體其他部分的臃腫……”柯爾特從不看書，只對美食和飛機感興趣。但她又怎會在乎呢？誠如她在日記里所言：“我渴望被白癡擁抱，被白癡親吻。他有著迷人的笑容，嘴角上翹，露出一口美國人的潔白牙齒。”[15]

簡言之，格魯在法國男人眼里一定是個徹頭徹尾的男人婆。她結過婚，丈夫死于戰爭。1944年那個光復之夏給了她在男人懷抱中尋求歡愉的資格和欲望，盡管事后她和這些男人此生不會再見。這種自由千金難買。事實上，對這段感情更認真的人倒是柯爾特，他給格魯看父母的照片，表達了將她作為戰爭新娘帶回美國的意愿。對于格魯這位胸懷文學抱負的巴黎文青而言，這自然是不可能的。

格魯也許格外老于世故，也許只是故作老成，但她的文字印證了一位法國史學家對于德占期的看法。據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 Buisson）稱，戰時法國大量青壯年的德國男子給許多女人提供了反抗的機會：其中既包括那些身陷不幸婚姻或活在壓抑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女人、被雇主欺負的女傭人、無人問津的老處女，也有可能是任何階層的婦女，她們一心只想掙脫保守的家長制社會的種種桎梏，哪怕只是一時半會兒。跟占領軍往來還能帶來物質上的好處，讓這些女人過得比別人好，有時還好過她們昔日的主子，這無疑加強了報復的快感。[16]

而且不光女人如此。按照常理，所有少數派都會同強大的外來者結盟，借別人之手擺脫多數派的欺凌，這點是一切殖民社會的共通之處。然而，戰時法國的同性戀人數畸高，他們有的選擇通敵，有的則把巴黎當成縱情性愛的樂園。這種情況也許跟他們都看不慣養尊處優的資產階級有關。鑒于此，納粹和維希政府（Vichy）反對同性戀的宣傳沒起到什么阻礙作用。外國占領并不一定受到擁護，但其打開了機會之門。

無論如何，跟盟軍解放者“勾勾搭搭”總比跟德國人穿一條褲子要好，因為這么做沒有叛國的恥辱感。很難弄清楚同性戀之間的親善活動到底有多廣泛，因為這種事人們顯然都喜歡藏著掖著。曾經在荷蘭國家芭蕾舞團擔任舞蹈演員、撰稿人和編舞的魯迪·范·丹齊格（Rudi van Dantzig）對此就有過十分精彩的描述。他在1944—1945年“饑荒之冬”期間曾從阿姆斯特丹逃荒至一個北方村莊。基于這段經歷，范·丹齊格寫了一部名叫《獻給迷途士兵》的小說。當加拿大軍隊抵達他所在的村莊時，他只有12歲，但心里卻充滿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熱望。一輛軍車停在鄉間小路上，車上伸出一只手，把小范·丹齊格拉上車。小說的主人公男孩杰羅恩正是在此刻邂逅加軍士兵沃爾特，并在最后受到了他的性誘惑。不過這本書絕不是在控訴戀童癖，相反，這是一曲挽歌：“包圍我的臂膀溫暖而舒適，就像包圍我的椅子。我幾乎帶著一絲喜悅，任由這一切的發生。我心想：‘這就是解放，事情就該是這樣，跟過去不同。這是場派對。’”[17]

伯努瓦特·格魯十分清楚和美國人上床能得到什么物質好處。在她筆下，性饑渴和對食物饑餓感之間的關聯很清晰。她感慨道，躺在床上，被柯爾特壓在身下的感覺就好像跟整片大陸同床共枕；“況且你無法拒絕一片大陸”。完事后，他們找東西吃：“四年的敵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貞操讓我胃口大開，好吧，差不多是二十三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兩天前在華盛頓下的雞蛋，嚼著在芝加哥罐裝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戰爭可真是個好東西啊！”

午餐肉、雞蛋和好時巧克力一到手就會被一掃而光，絲襪也會穿上腿，但好彩、駱駝、切斯特菲爾德和法國高盧等香煙則會被拿到黑市上去交易，以換取更多的食物。美國大兵補給充足，這點跟他們寬闊的肩膀、甜美的笑容、筆直的臀部和精致的制服一樣，都成了一種難以估量的誘惑。光是能輕易搞到香煙這點，就讓他們在貧窮國家搖身一變成了有錢人。因此也不難得出結論，跟他們上床的女人實際上比妓女好不到哪里去。

持這種想法的人也確實不在少數，特別是那些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女人，或者被攔著不讓進只對解放者和他們本地相好開放的舞廳、電影院和娛樂中心的男人。這種猜測也因為某一事實得到了加強：一些勾搭上盟軍官兵的年輕女人，依舊裹著頭巾，遮住她們最近被人剃得精光的腦袋。這是對她們不久前和德國人睡覺的懲罰。

毋庸置疑，有些女人是自愿出賣肉體，特別是在戰敗國，提供性服務是她們自己和孩子得以活命的唯一辦法。但即便是那些見風使舵、急吼吼地把德國情人換成盟軍情人的女人，這么做的理由也不純粹都是為了錢。法國的某個小鎮上，一名“橫向通敵者”（horizontal collaborator）不久前剛被人剃光了頭發，折磨她的人還不罷休，揚言要進一步懲罰她的“不道德”行為。對此，女人只是對著這群自詡替天行道的人冷冷地說道：“我才不管你們會不會剃我頭發，我跟我丈夫（過去的戰俘）已經斷了聯系，我可不會因為自己是有夫之婦就不和美國人快活了，只要我想，我就會。”[18]

讀著后來人的記述和媒體評論，人們也許會得出這樣一種印象：1945年的夏天燃燒著漫長的情愛之火，外國軍人和駐在國女性或出于貪婪，或出于情欲，或出于寂寞沉湎其中。數據似乎支持這種印象：1945年，巴黎因感染性病而住院的女性人數要比1939年高出五倍之多。在荷蘭，1946年有7000多名新生兒是私生子，比1939年高出兩倍。對于性病高發的解釋多種多樣，既有缺乏醫療救護和避孕藥，也有貧困地區糟糕的衛生狀況，還有若干其他原因。然而，實際情況是，許多男男女女這么做只是在尋求溫暖、陪伴、愛情，甚至是婚姻。雖然解放后最初幾個月的確存在嚴重的濫交情況，但人們還是渴望回到正常狀態。不應被忽略的一點是，1946年，荷蘭全國合法出生的新生兒數量達到了277000人，是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高的生育數字。

\* \* \* \* \*

貝爾森集中營于4月12日解放。德里克·辛頓（Derrick Sington）中尉指揮的一隊英軍接到命令，讓他們火速趕往那里。戰爭尚未結束，但集中營里情況過于惡劣，當地人擔心自己會感染上斑疹傷寒——這種傳染病幾周前剛剛奪去了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6]](#_6_An_Ni__Fu_Lan_Ke__Anne_Frank)的生命。由于德國當局既無能力、也無心應對爆發傷寒的風險，他們不顧兩國尚處于交戰狀態，同意讓英軍進入貝爾森。

士兵開車經過成堆的尸體和散發著糞便和腐尸臭氣的營房時，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一切。貝爾森的圖片是第一批發表在西方媒體上的集中營照片。在英國，貝爾森成了納粹大屠殺的主要符號。據布萊恩·烏爾庫哈特回憶，他對納粹的反猶主義有所了解：“但即使如此，所謂的‘最終解決方案’其實旨在肉體消滅幾百萬人，這讓人難以想象。貝爾森讓我們措手不及。”[19]但無論是他，還是其他英軍官兵都不知道的是，貝爾森其實還算不上是一座滅絕營。真正的滅絕營在波蘭，其中的大多數在德國人向西后撤之前就已經被毀掉了。

辛頓中尉沒停車，他通過擴音器告訴生還者他們自由了，但大多數人已經神志不清，根本無力作出反應。接著，他來到關押女囚犯的主營前，手里依舊拿著麥克風。

幾秒鐘后，車子被上百名婦女團團圍住，她們歇斯底里地號啕大哭，難以控制情緒，導致擴音器里傳出的話一句都沒聽清。集中營的營地上種著白樺樹苗，女人們采下嫩芽，掰下小樹枝，拋向車輛。[20]

這些女人還算是走運的，她們還能走路。一名學醫的英國兵志愿加入救助行列，他在一間營房里目睹了以下場景：

我驚恐萬分地站在這間骯臟不堪的屋子里，努力適應混著解剖室、下水道、汗水、傷口化膿味道的氣味。突然，我聽到地板上有動靜。借著昏暗的光線，我低下頭，看到有個女人正在腳下爬。她濃密的黑發結成一團，肋骨根根突出，好像中間根本沒有肉……她在大便，但她如此虛弱，以至于無法將屁股抬離地面。她拉稀了，黃色的稀屎在大腿內側糊了一片。[21]

醫生和醫護志愿者迫切地需要更多食物、藥品和醫療器材。他們所面臨的疾病和饑饉規模前所未見，甚至想都不敢想。每天都有幾百人死去，有時是因為吃了軍糧——囚犯的腸胃已經萎縮，再也無法消化肥膩的食品。然而，軍隊有時也效率低下，而且德國的局勢十分混亂。4月下旬的一天，集中營里迎來了一批神秘的貨物，打開后，里面裝著大量的口紅。

這被證明是場及時雨。英軍救護車隊的指揮官戈寧中校（Gonin）回憶道：

我相信，沒有什么比口紅對女囚犯們幫助更大的了。她們躺在沒鋪床單的床上，身上也沒穿睡袍，但嘴唇卻涂得緋紅。你看到她們走來走去，肩上除了披了條毯子外，什么也沒有，但她們的嘴唇卻是紅彤彤的……總算有人做了件善事，讓她們重新變成了人。她們是人，不再只是文在手臂上的號碼。她們終于有心思關心起自己的外表來。是口紅率先把人性還給了她們。”[22]

日后成為英國著名哲學家的理查德·沃爾海姆（Richard Wollheim）時任情報官，跟烏爾庫哈特一樣，他在5月份被短暫派往貝爾森，那里情況依舊糟糕，但對比之前已經沒那么慘不忍睹了。部隊某些長官自以為出了個好主意，想為官兵和貝爾森幸存者組織一場舞會。沃爾海姆受命操辦此事。可惜結果卻是災難性的，因為當匈牙利集中營看守（他們殘暴成性，聲名狼藉）組成的樂隊穿著民族服裝，拉起手風琴舞曲時，引發了誤會。由于語言不通，女人們露出手臂，給人看文在身上的集中營記號。男人們無言以對，只是抓住女人們的手，希望能和她們跳上一曲。匈牙利人越拉越快，女人們嚇壞了，開始對官兵拳打腳踢。[23]

然而，這次泡湯的舞會只能算是意外。差不多同一時間，營房之間的空地上還舉辦過另一場舞會，這回伴奏的換成了皇家空軍軍樂隊。一名英國兵描述道，雖然有些姑娘“幾乎無法走路”，還有些“看起來一動都要斷成兩截”，但這次舞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位身材特別高大的加拿大軍官抱著一個嬌小的姑娘，姑娘的腦袋剛剛到他腰的位置。他倆跳著華爾茲。“女孩特別高興，在場的人看了無不動容，為她歡笑，為她落淚。”[24]

這則故事或許比沃爾海姆的更具典型性，因為許多在集中營工作過的人，不論是美國猶太拉比[[7]](#_7_La_Bi__You_Tai_Jiao_Mu_Shi)，還是聯合國義工，多多少少都對幸存者快速復蘇的性意識表達過贊許或非議。正如口紅一樣，性欲的恢復幫她們找回了一絲人性，除此之外，她們已孑然一身。

如果說1946年荷蘭的出生率很高，那么流離人員收容站里的出生率就更高了。僅僅在美占區，收容站里每個月就有750名嬰兒降生。年齡在18歲到45歲的猶太婦女中，有接近1/3的人生過孩子，或者懷有身孕。[25]包括貝爾森在內的昔日集中營曾因為條件無比艱苦，吞噬過數千條生命，如今它們則成為性行為高發之地，就好像幸存者都迫不及待地想向自己和全世界證明他們還活著——不僅如此，他們還能孕育新生命。

義工有時對此很震驚，提起收容站，特別是猶太人收容站的時候，會說“囚犯們縱欲無度，毫無節制”。有人將此歸咎于百無聊賴，畢竟，除了喝酒和交媾外，還能干什么呢？另外一些人則恪守道德原則。一名為慈善組織服務的法國醫生明顯對這一現象嗤之以鼻，他如是寫道：“集中營幸存者中有不少道德水準低下……糜爛的性行為已經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但他也承認，這些情況實屬情有可原，人們實在不該怪罪這些剛經歷過煉獄的年輕姑娘，她們“被想要重新去愛、忘卻過去的欲望捆綁著，無從抵抗，只能通過手頭僅有的手段來滿足這種欲望”。[26]

其他觀察者提出了更加詳盡的解釋。一名叫瑪爾塔·科爾文（Marta Korwin）的波蘭籍義工相信，集中營的受害者存在一種幻想：他們苦難的結束將促使一個完美世界降臨人間，似乎“他們過去的所有磨難都會被淡忘，自由會將他們帶回那個一切正常的舊世界……”但當他們發現在收容站的生活依舊痛苦不堪，愛人一去不復返后，希望破滅了，只能通過買醉或濫交來逃避現實。[27]

所有這些解釋都頗有道理，但還漏了一層理由——傳宗接代。一個身陷危機的族群必須通過繁衍后代才能生生不息。流離人員收容站里的多數猶太人都不是滅絕集中營的幸存者，因為很少有人能在那兒活下來。許多人來自蘇聯，因為之前在那兒避過難，這才逃脫了納粹的魔掌，但大多數猶太人失去了兒女、父母、兄妹和其他親屬。上了年紀的人沒有辦法，只能靠回憶往事了卻殘生，但年輕人渴望重組家庭，有了家人才有活下去的動力。況且，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其他猶太旗手也正兒八經地提倡族人多生育后代。許多猶太男女見面才幾周，甚至幾天就結為夫妻。猶太收容站里，避孕藥沒有市場，人們把盡可能地多生孩子看成是一種責任。性愛并不只是出于魚水之歡，而是一項抗拒滅亡的行為。

\* \* \* \* \*

1945年，一個人若身為德國人或日本人，跟身為法國人、荷蘭人、中國人相比有著迥然不同的境遇，遑論猶太人了。這點也適用于描述同外國占領軍的往來。“阿米”（德語俚語里對美國佬的稱呼）或“阿米庫”（日語里的說法）和同他們一塊到來的加拿大人、澳洲人、英國人和蘇聯人可不是什么解放者，而是征服者。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句話也適用于許多意大利人，特別是意大利南部的人，盟軍的入侵讓當地人本來就苦不堪言的生活雪上加霜。城市在空襲中灰飛煙滅，經濟形勢十分困窘。這讓賣身為娼在許多時候成為一種必須。

在柏林，娼妓被人稱為“廢墟里的老鼠”（Ruinenmäuschen）。姑娘和女人們在城市的廢墟間游蕩，試圖搭上個當兵的，換點錢、吃的或香煙。有些女孩進入青春期沒多久，卻已經在黑市商人設在廢墟中的臨時妓院里操起了皮肉生意。男孩有他們自己的接客地點，叫做“廢墟男娼館”（Trümmerbordellen），接的大多是美國兵，其中有個綽號叫“安娜阿姨”的人，后來成為法蘭克福黑社會里一號臭名昭著的人物。

求生的欲念通常能消解階級之分。有個叫諾曼·劉易斯（Norman Lewis）的年輕英軍軍官曾被派駐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力作《那不勒斯1944》里，他寫道，有一天，一位意大利貴族前來指揮部拜訪。訪客是南部的莊園主，隨行的還有他的妹妹。

兩人的外貌十分接近：瘦瘦的，皮膚極其蒼白，臉上掛著一副名門望族慣有的冷淡表情，甚至有幾分嚴厲。他們來訪的目的是想打聽有沒有可能安排妹妹進入軍隊慰安所服務。我們解釋說英軍沒有這樣的機構。“好可惜，”這位王公貴戚回答。他和妹妹曾在英國女家教手下學習過，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哎，路易莎，看樣子是行不通了，行不通了。”他們禮貌且平靜地謝過我們后就離開了。[28]

在日本，賣淫嫖娼從一開始就是制度化的。日本人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日軍曾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大肆奸淫婦女，官方于是擔心盟軍士兵會如法炮制，強暴日本婦女。在1937年淪陷的南京和1945年“玉碎之戰”里幾乎被摧毀殆盡的馬尼拉，都有成千上萬的婦女慘遭強奸，然后被剁掉手足。如果經歷這些獸行的受害者一息尚存，往往還是會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之下。這只是兩起極端惡劣的事件，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在中國戰場，日軍大范圍地強暴和蹂躪婦女，以至于激起中國人更強烈的抵抗，給軍事推進造成了麻煩。為了應對軍紀敗壞的問題，日本有時會在其占領下的地區——特別是朝鮮——征募年輕女性，但更多時候是把她們擄了去充當所謂的慰安婦，即日軍慰安所里的性奴。

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宣傳機器從沒有停止過嚇唬國民，說是一旦日本戰敗，婦女就會遭到外國軍人奸淫、折磨甚至殺害。為了避免這種可怕而恥辱的命運，日本人被命令要么戰死，要么玉碎。太平洋島嶼和沖繩的婦孺被勒令拉響手榴彈，或者跳崖自盡。很多人照做了。

鑒于此，8月18日，即日本投降后第三天，日本內務省指示各地警署官員為占領日本的盟軍設立“慰安機構”，招募女性加入“特殊慰安設施協會”（RAA），為盡愛國義務“犧牲她們的肉體”。前首相近衛文麿公爵——挑起太平洋戰爭的主要責任人——告訴警視廳廳長，“拜托閣下保衛日本的年輕女性”。[29]也許此舉能安撫來犯的外國人，這樣，出身較好的日本婦女就敢于走出她們的藏身之處，走路也不用怕遭人調戲了。

這注定是門齷齪的勾當。建造特殊慰安設施的工作進行得如此倉促，以至于里面都沒有床鋪供士兵和“舍身取義”的女人所用。只要有空間，交媾行為哪都有可能發生，大多數情況下是在地板上，或者在簡易妓院的過道和走廊里。幾個月過后，日本人才作出較為高效的安排。在東京郊外的船橋市，一棟大體量、形似機庫的妓院拔地而起，人稱國際宮殿（International Palace），或者IP。IP提供的是流水線式的性服務，其有個別名叫“威羅蘭”（Willow Run），這當中有個典故：戰時，福特公司曾在底特律附近設有工廠，專門制造轟炸機，廠址就選在威羅蘭。光顧此處的男人在踏進這棟狹長建筑之前，要把鞋子留在門口，完事出來后，去另一頭取回擦得锃亮的鞋子。

在軍隊招待所，譬如東京的野村飯店，女人來往十分頻密。她們對外要么自稱職員，要么是清潔婦，但常會在飯店里過夜。有些還拖家帶口，以躲避冬季嚴寒。東京市中心有家大型舞廳，門外掛著用日語寫的招牌：“愛國女青年們！來做舞女，為日本重建出力吧！”[30]軍隊福利社（PX）這種特供商店向占領軍成員兜售食品、服飾和其他補給品，其中還有避孕套。

跟德國情況不同的是，在日本，盟軍最初并沒有禁止“同當地人員親善行為”的明文規定。作為盟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知道這種禁令形同虛設。他曾告訴手下的一名幕僚：“有人一直想方設法想讓我出面，阻止這些‘蝴蝶夫人’在眼皮底下晃來晃去，但我不會這么干……我不會下達禁止親善的命令，就算說破了天也不行。”[31]

占領初期，駐日美軍差不多有60萬，此外還有一些澳洲、英國和少數其他國籍的軍人。因此，駐軍和當地人存在大量往來。1945年10月，一位名叫威廉·西奧多·德巴利（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美國海軍軍官——也就是日后顯赫一時的中國和日本問題學者狄百瑞——當時在一封信中談起自己在九州佐世保海軍基地的所見所聞：

親善本身成了個問題。事實上，我們指揮部旁邊的大橋上總是擠滿了人。饑渴的海軍陸戰隊士兵跟友善的日本老百姓打著手語交流，對方不知所云，只是笑呵呵的。最后憲兵不得不出面，阻止橋上聚集更多的人。情況從一開始就是這樣。[32]

盡管美國國內存在一種相當種族主義的宣傳，這種情況并未因此銷聲匿跡。比如，這里有段摘自《周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關于盟軍占領日本的文字：“日本女人平胸、塌鼻子、扁平足。對于大多數美國男人而言，她們的吸引力跟有一千年歷史的石頭人偶差不多。說實話，還不如人偶。美國人喜歡給人偶拍照。”[33]

如果我們積點口德的話，該文作者可以說不知所云。早在1945年，最高司令官手下的多數高級軍官都給自己找了日本情婦。由于起初日本國內鮮有西方女性，出現這種情況當屬意料之中。局面只有在新一波的軍官到來后才發生改變，新來的人通常包容度較差，而且沒有親自上陣打過仗。在德國，雖然禁止與德國人親善的條令已經解除，但軍官們還是決定在日本加強軍紀，宣布多數公共場所，比如餐館、溫泉勝地度假區、電影院和軍隊賓館為“禁區”。

結果，親善照常進行，只是隱秘性更高罷了，此外還出現了越來越多作為“個體戶”的賣淫女，她們的存在對控制性病發病率只會起到反作用。妓女在受過轟炸的街道和城市公園里有自己的地盤，俗稱“島嶼”。有些女人一次性交易只收區區1美元，在黑市上差不多只能買到半包香煙。這種生意十分紅火，而盟軍當局不顧日方建議，執意要在1946年取締有組織賣淫后，更是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日本人做事情喜歡分門別類。娼妓中的個體戶，人稱“潘潘女”（panpan girls），被劃歸為幾類：專門服侍白人士兵的，專門服侍黑人士兵的，只服侍日本人的，不過也有一些大膽的女人才不接受這套清楚分類的勞什子。一些妓女只侍從一位客人，她們叫做onrii（大致是“唯一”的意思）；那些特別放蕩淫亂的女人則得到了batafurais（即花蝴蝶）的稱號。東京市中心的部分地區，比如正對麥克阿瑟將軍指揮部的日比谷公園，或毗鄰的有樂町車站，成為了典型的“潘潘女”活動區域。[34]

涂著鮮艷口紅、腳穿高跟鞋的“潘潘女”是日本人恥笑的對象，因為她們象征著民族墮落，但同時也激發了人們的好奇心，當中還夾雜著些許羨慕。她們的物質生活要比大多數無家可歸、饑腸轆轆和一貧如洗的日本老百姓富足得多，這些“上班族”姑娘還是美國貨最早的消費者和擁躉。她們比多數日本人更了解戰勝者的流行文化。操著由日本俚語和從美國大兵處學來的散裝英文混搭的黑話，“潘潘女”也比大部分日本人更能掌握占領者的語言。

從某種意義上講，“潘潘女”與日本一種特別下三濫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職業固然卑賤，但卻有光彩照人的一面。東京在古時候叫江戶，這一時期，妓女的穿著就代表時尚潮流，這點透過浮世繪和歌舞伎可見一斑。盟軍占領的起初幾年里，“潘潘女”的文化內涵大大失去了當年的雅致韻味。軍事失利、再加上戰時審查制度和軍國主義教育的覆滅，使得根植于過去的性商業文化死灰復燃，但如今更多地帶有美國色彩。內容色情猥褻的低俗雜志，譬如《可人兒》（Lovely）、《維納斯》（Venus）、《性愛奇幻》（Sex Bizarre）和《美女墻照》（Pin-up）等大紅大紫。原先的娛樂區里開設了脫衣舞館，大都是在彈坑邊草草搭建的窩棚。便宜的舞廳里，皮條客、黑市商人和穿著夏威夷襯衫的年輕混混摟著他們的女友跳著曼波舞。日本的搖擺樂隊和爵士樂歌手再度活躍起來，多年前，因為諸如此類的“外國腐朽文化”遭到查禁，他們一度銷聲匿跡。現在，大眾對布基伍基（Boogie Woogie）的靡靡之音又是趨之若鶩了。

許多女人走上賣身這條路是為現實所迫，但也不盡然。當時的調查顯示，不少女性成為“潘潘女”是“出于好奇心”。[35]比起單純的錢色交易，這一初衷是“潘潘女”遭人極端蔑視的一大原因。“犧牲”肉體，維系一戶貧農家庭的生計，或履行愛國義務，這些借口都還說得過去，甚至還有可能贏得贊賞；但若因為好奇心的驅使，或者出于對錢、香煙或絲襪的物欲，那就是一種恥辱。有組織賣淫在日本歷史悠久，而且是為社會所容許的。但“潘潘女”因為自甘墮落而廣受譴責。這樣的社會氛圍，讓她們孤立無援，身陷險境。

盡管十分艷俗，而且饑不擇食，但1945年的性商業文化好比曼波舞和布基伍基音樂，起到了解放人心的作用，其受到一些人歡迎的同時，也為其他人所不齒。1946年，日本有差不多9萬名新生兒的母親都是單身未婚女性，這一點不可能歸因于純粹的性交易。[36]在接受了蠻夷外國兵是強奸犯和殺人犯的大量負面宣傳后，許多日本女人真正見到美國人時，發現他們根本沒那么嚇人，于是心里的石頭落了地。一位女作者曾在享有極高口碑的女性雜志《婦人畫報》（Fujin Gaho）刊文，她的話值得參考：“我覺得他們有禮貌、很友好、無憂無慮而且十分開朗。跟過去住在我家附近軍營里那些傲慢、小氣和粗魯的日本兵一比，反差真是太明顯了，這可真叫人悲哀。”[37]

這倒不是說盟軍士兵從來不施暴，尤其是在占領日本早期。根據一項估計，1945年下半年，平均每天就有40名女人遭到強暴，而且這個數字很可能偏低，因為許多受害者出于恥辱感都沒有報案。[38]再說了，這樣的數據不可能出現在受到占領軍審查的媒體報道中。盡管如此，大多數日本人仍然覺得美軍的軍紀比他們原先擔心的要好多了，特別是對比他們自己的子弟兵在海外奸淫擄掠的行為。

有些吊詭的是，性風俗的變遷和美國人企圖“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傳工作是相契合的。要轉型成為民主國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須得到平等對待。“潘潘女”的出現也許是改造者們無心插柳的結果，但他們鼓勵日本人學習美國人，更加開放地通過肢體動作表達愛意。拜美國人的循循善誘所賜，1946年，日本銀幕上第一次出現了接吻鏡頭，這部電影名叫《年輕的心》（Hatachi no Seishun），旨在使日本觀眾得到熏陶。影片在年輕觀眾中十分風靡。

當然，日比谷公園里招攬美國兵生意的站街女和開創先河的銀幕一吻之間可謂天南地北，但是公眾對色情娛樂和有著豐富性暗示的流行音樂的確胃口巨大，這顯示出被解放民族和戰敗民族之間的區別其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對日本人而言，隨著格倫·米勒的一曲《情緒正正好》一起到來的還有一種嶄新的自由意識。

在西德，情況如出一轍。但在蘇軍占領的東德，情況就大為不同了，至少就性方面來講是這樣。如果說“勾搭”是對德國人和外國軍人關系最佳闡釋的話，那么強奸就是被蘇聯紅軍擊敗后的多重詛咒之一。當然了，在西德強奸案也有發生，雖然別的地方也有，但法占區尤其高發。舉例而言，在斯圖加特，多達3000名德國婦女聲稱遭到了法軍的強暴，施暴者主要是阿爾及利亞人。[39]而在當時面積最大的美占區，美軍在1945年全年犯下的有記錄在案的強奸案，沒有超過1500起。[40]

有若干原因可以解釋西占區的強奸案發生率為何低于蘇占區。也許除了法軍之外，盟軍并沒有蘇聯人那么強烈的報復心理，而且他們的長官也沒有鼓勵下屬肆意蹂躪德國女性。（斯大林本人說過一句臭名昭著的話：當兵的行軍幾千里，經歷了血雨腥風，槍林彈雨，當然有權利“和婦女們快活快活”。）另外，德國女人也十分樂意和盟軍官兵“勾三搭四”，所以強奸根本沒有必要。1945年之夏，美國大兵中間盛傳這樣一句玩笑話：德國女人是“塔希提（Tahiti）以西”最好得手的。[41]

毫無疑問，這句俏皮話有夸大之嫌，積極傳播它的人不僅有得了好處的美國兵，也有德國人自己。在他們看來，這些女同胞的行為無異于在民族自豪感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不少德國人對此很是憤慨。盡管如此，許多士兵還是宣稱，比起法國女人，有著“小姐”、“皮草”和“友善的納粹”等綽號的德國女人更愿意同他們發生性關系。對于這一現象，一名返鄉的美國兵曾作出過分析，雖然聽起來沒有人性，但不無道理。“盡管可能泄露天機，”他寫道，“但有必要承認，美國軍人在歐洲只想要一筆‘好交易’——這包含‘盡可能頻繁地勾搭當地女人的機會’。”他接著寫道：“自然而然，美國兵在德國收獲了最好的交易……到了法國情況就不同了，美國兵沒有享受到在德國那種抱大腿的禮遇。跟他從老爹和1944年解放法國的美軍口中聽來的說法不同，法國并不是可以供人褻玩的玩物。”[42]

當然，那時德國國內的女人遠比男人多，比例差不多是16比10，而那些剩下來的男人多半又老又瘸，或者遭人嫌棄。導演羅塞里尼（Rosselini）曾在柏林廢墟里拍攝杰作《德意志零年》，借電影里一個年輕德國人的話來講：“我們曾經是男人，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現在只是納粹。”

伯努瓦特·格魯在文學回憶錄里寫到法國光復時，不禁要對比“漂亮的美國男人”和“在我眼里普遍皮膚粗糙、黑不溜秋和營養不良的法國男人”。[43]德國和日本男人灰頭土臉的程度則會有過之而無不及。著有《藍天使》（1930）的德國戲曲和電影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在1946年曾作為美國文化參贊回到故鄉。他采訪過一名德國女服務生，對方的態度代表了德國女人普遍的心聲。女服務生不肯碰德國男人，她說：“他們太軟弱，再也不是男人了。過去他們威風過頭了。”[44]

在我看來，對喪失男性氣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描寫出自小說家野坂昭如之手。1945年時他已長大成人，整天混跡于大阪的黑市。野坂的中篇小說力作《美國羊棲菜》（1967）便是圍繞男子氣概和種族血統這一主題展開，小說的主人公是個和他年齡相仿的日本男孩，戰時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老師告訴他西方人比日本人高，但體格要弱，特別是在臀部這塊，因為他們是一群娘娘腔，習慣于坐椅子，而不像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地板。所以哪怕身材矮小，任何有著強壯大腿和頑強意志的日本男人都能擊敗他們。老師經常向學生們提起山下奉文將軍。山下人稱“馬來亞之虎”，曾在新加坡接受英國將軍白思華（Percival）的投降。對比身材敦實、脖子粗短的山下，白思華兩條長腿細如棒槌，露在卡其短褲外，顯得格外滑稽，實在算不上威武。

但后來，這個日本孩子近距離見識了真正的西方人，偶然看到的美國兵形象讓他難以忘懷，“他的手臂粗得就像圓木，腰桿壯得就像磨盤……臀部散發著陽剛之氣，身上的軍裝褲子閃閃發亮……哎，難怪日本會戰敗了。”[45]顯然，并非所有盟軍士兵都是這般人高馬大，肌肉發達，許多日本男人也不算矮小。但野坂的這種看法，一個饑餓男孩的第一印象，則會成為一段永恒而傷感的戰爭記憶。這場戰爭在日本人心目中原本被描繪為種族對抗，對壘雙方是高貴的亞洲武士和傲慢自大的白種人。因為秉持這種心態，戰后盟軍和戰敗的日本人之間第一次碰面所造成的心理沖擊，要比在德國來得更大。

在德國，起初西方當局（不包括蘇聯人）竭力想實行禁止親善的政策。“漂亮姑娘能毀掉盟軍的勝利。”美軍廣播電臺昭告官兵。“聰明的官兵不會去勾搭德國人，”《星條旗》軍報警告道，“別學參孫（Samson）去靠近大利拉（Delilah），她想減掉你的頭發，而且是在脖子這里動手。”[46]倫敦的《泰晤士報》也加入了聲討親善的行列，發文說道，取消禁令“恐怕會讓許多留守后方的軍嫂心寒”。[47]不過這些大道理對身處當地的男人毫無作用。“情婦部隊”這個詞當時在西方盟軍中間很流行，指的是那些被美軍軍官包養的德國情婦（出于某些原因，被英國軍官包養的情婦數量要少；英國人似乎更鐘情于飲酒作樂）。上頭的這種風氣繼而引發了下級軍官的嫉妒，有人還編了酸溜溜的笑話來形容這種心態：“這政策只是給了領導們先上漂亮妞的機會。”[48]

喬治·巴頓將軍和麥克阿瑟將軍一樣，也覺得禁止親善沒什么好處。不愁吃喝的美國士兵真的應該拒絕給饑餓的孩子糖吃么？難道所有德國人都是納粹？（需要提到的是，巴頓對德國人要寬宏大量得多，哪怕他們曾經當過納粹。而他對共產主義盟友或猶太人可沒這么慈悲為懷。）即便是很少充當公眾輿論急先鋒的《紐約時報》，在從占領區發來的報道中也批評了禁止親善令。該報的駐德通訊員在6月寫道，他“還沒碰上過一個當兵的希望維持禁令的，不管他的老家在倫敦，密西西比河谷，還是阿爾伯達的麥田”。同樣是這位記者，還曝光了為強化禁令所采取的一系列荒唐措施。盟軍往美占區的一個村子里派駐了一支反間諜小分隊，目的是監視一名保安，而他正在監督一名“和德國女孩打得火熱”的憲兵。[49]

6月8日，艾森豪威爾將軍下令解除了同兒童親善的禁令，自此，英美兩國軍人跟年輕姑娘打招呼的慣用問候語就變成了“你好，小孩！”到了8月，盟軍士兵又獲準可以同成年人講話，甚至和成年女性手牽手，前提條件是他們必須身處戶外的公共場合。終于，到了10月1日，盟國管制委員會——統轄四國軍事占領的機構——徹底解除了禁令。促使禁令破產的一大因素是當英美兩軍抵達柏林時，先他們一步的蘇聯人早就和德國人無拘無束地勾搭上了。這種差別讓西方軍隊越來越無法容忍，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對和德國人親善開綠燈是早期大國對抗的結果。然而，取消禁令還是有附加條件的：和德國人通婚或者把德國人安頓在軍隊招待所里的做法依舊遭到禁止。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這點同樣成了一紙空文，上萬名德國女人跟著她們新嫁的老公，跑到美國去過承諾過的好日子了。

德國也有自己的“潘潘女”，其中最卑微、最饑不擇食的當屬“廢墟里的老鼠”。不過，所有處于軍事占領下的國家都存在這樣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情愛、欲望和賣身之間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蘇聯治下的東柏林，無論老幼，很少有女人沒受到過性侵，哪怕戰爭結束已經幾個月了，蘇軍強奸德國婦女的事件依然時有發生。即使如此，跟外國軍人的性關系并不總是赤裸裸的。對此，《柏林女人》這本書提供了最出色、同時也最揪心的文字記錄。這是一部日記式的自傳體作品，作者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女記者，她靠向一位俄國軍官求助，才擺脫了被無名士兵無休無止強暴的命運。溫文爾雅的中尉阿納托爾（Anatole）最后成了她的固定情人。畢竟，她寫道，“他追求的不是單純的肉欲快感，而是更有人性、更富女人味的撫慰。我愿意向他提供這種撫慰，甚至還挺高興的……”[50]

在西占區，大部分從美國男友那里收受物質好處的德國女人很快被貼上了妓女的標簽，反觀她們如果是從德國男人手里收禮，則不會輕易招來如此罵名。話說回來，能搞到軍隊福利社的物資對許多人來講都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在嚴冬的幾個月，哪怕是一家供暖良好的夜總會，也比躲在遭受過轟炸、冷如冰窖的房間里，另外還要和許多陌生人共處一室來得更讓人欣慰。然而，好彩香煙、巧克力和絲襪，乃至搖擺樂和美國大兵隨和的性格，都向婦女和許多男青年展現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因為在專制的第三帝國曾被查禁，只會激起人們對其更為炙熱的向往。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們還是對其誘惑心馳神往，因為舊世界的崩潰是以如此恥辱性的方式到來的——不光是物質上，而且是文化、智識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潰。對光復的國家是這樣，比如法國和荷蘭，對于德國和日本更是如此。以“親善”為肇始，戰后兩國文化的美國化程度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走得更遠。

至少有一個女人預見到了這一切的本質——不過是一場夢，既然是夢，終究會讓人失望。話雖如此，但總還會留下些許印記。伯努瓦特·格魯在最后一次拒絕美國情人柯爾特的求婚后，決意終止自己“獵捕美國人”的游戲。事到如今，她寫道：“古老的歐洲形單影只，我感覺自己跟歐洲一樣，老態龍鐘，而且絕望消沉。今晚我剛跟整個美國說了拜拜，也跟斯蒂夫、唐、泰克斯、沃爾夫、伊恩在內的你們所有人都說了拜拜，你們曾帶著醉人的笑容走進我的生活，但現在我要關上心門了……跟來自遙遠西方的各位廝混再也無法讓我感到快樂：你們來的地方過于遙遠，而且馬上就要打道回府了。你們解放了我，現在是時候讓我重拾自由了。”

\* \* \* \* \*

日本小說家永井荷風以擅長用懷舊筆觸描寫他心愛的東京的丑陋一面而聞名于世。日本戰敗兩個多月后的10月9日，他曾寫下這樣一篇日記：“在山王飯店吃了晚飯。看到了七八個年輕的美國人，模樣像是軍官。他們似乎并不缺乏教養。飯后，我看到他們坐在吧臺邊，跟日本女侍應生交談，練習日語。跟日本兵相比，他們的舉止實在像謙謙君子。”[51]

一個月前，永井在他的日記里寫道，報紙上講，美國兵不知廉恥地跟日本女人鬼混。哦，他總結道，“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是對日本兵在中國占領區所作所為的報應”。[52]

永井是個見過大世面的怪人，他熱愛法國文化，對尋常觀點不屑一顧。實際上，他這種態度上的反差很是罕見。對于美國人勾搭日本女人一事，即使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中間，普遍的反應也是橫挑鼻子豎挑眼。比永井年輕、相對更寬宏的作家高見順因為曾經支持過戰時政權窮兵黷武的民族主義而感到羞愧，盡管他的立場十分模棱兩可。他在日記里記述了10月某個夜晚在東京火車總站里目睹的一幕。一群大嗓門的美國兵調戲兩個女乘務員，慫恿她倆在他們身邊坐下來。姑娘咯咯直笑，而且看起來心甘情愿，一點都不扭扭捏捏。用高見的話來講：“看她們的樣子，似乎這么被人調戲有種無法抵擋的快感。這時，又走來另一個乘務員，她的一切神態都說明她也想嘗嘗被人哄的滋味。這種場面真是讓人無比恥辱啊！”[53]

不論是這幅場景還是看客的觀感，想必一定很普遍。但高見口中所說的恥辱到底是指什么？是因為這種打情罵俏讓他感到恥辱，還是因為日本姑娘在和外國人調情？抑或這份恥辱只是他自己的感受，作為一個日本男人的感受？對這種親善交往的不滿還可以通過更為暴力的方式表達。受雇為駐北海道美軍工作的日本女孩抱怨她們隔三差五會因為和外國軍人的關系遭到日本男人毆打。鑒于此，美軍不得不派武裝卡車護送她們回家。

無疑，嫉妒心理對男人惡從膽邊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這種情緒很泛濫：戰敗的男人羨慕戰勝一方、美軍羨慕蘇軍（美國的禁止親善令依舊有效期間）、士兵羨慕軍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小說《美國羊棲菜》里，野坂昭如就寫道，這種情緒可以持續很久。故事的男主人公長大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太太在夏威夷度假期間，和一對美國中年夫婦成了朋友。夫婦倆后來造訪日本，這個曾經帶給希金斯先生美好回憶的國度。在老婆敦促他要善待客人后，日本丈夫決定盡地主之誼，讓曾是占領軍一員的希金斯先生好好樂樂，于是便帶他去東京看現場性愛表演。一個號稱日本“頭牌”、無比陽剛的表演者承諾要讓觀眾見識下日本男人的雄風。然而，當晚“頭牌”的能力并未讓希金斯心悅誠服，日本丈夫心中再度涌起一股似曾相識的恥辱感，他不由回想起當年第一次在大阪廢墟里見到美國大兵的場景，想到他那圓木般粗壯的手臂和被包裹在閃亮華達呢軍褲里的結實臀部。

希金斯先生是白人，戰時日本的宣傳機器不會提及黑人，除非是拿這點做文章，來抨擊美國的種族主義，進一步貶低敵人。然而，一支多種族部隊占領所帶來的后果要比單純的性能力對抗更讓人憂慮。美軍審查官曾截獲一封日本女人的來信，信里提到一則謠言，說是“在橫濱，多達兩萬名婦女和盟軍士兵有曖昧關系。縣政府也已注意到，在關西地區，將有13 000名混血兒降生。光是聽說橫濱有3 000日本婦女懷了黑鬼的孩子，就夠讓人不寒而栗的了”。[54]這里，真正讓寫信人憤怒的并不是不倫行為本身，甚至也不是賣淫，而是純凈的血統受到了玷污。

在德國也能感受到類似的情緒，特別是1945年臨近戰爭結束前夕。那時禁止親善的命令剛剛撤銷，正好趕上許多德國青壯年男子逐漸從戰俘營里獲釋回家。跟日本的情況如出一轍，年輕老兵對“勾搭”這個問題尤其敏感。有份在紐倫堡廣為流傳的小冊子對“黑鬼的女人”（Negerweibern）進行了譴責：“臉上濃妝艷抹，穿得色彩斑斕，指甲涂得緋紅，絲襪上還有個洞，鳥嘴里還叼著根又粗又大的切斯特菲爾德香煙，趾高氣揚地挽著她們的黑人騎士四處轉悠。”[55]另一個用來形容勾搭占領軍的德國女孩的詞叫“巧克力女人”（Schokoladeweibern），這個詞一語雙關，一來說明這些女孩對物質的貪欲，二來說明她們恬不知恥，居然對有色人種情有獨鐘。

正因如此，講述占領期歷史的日本和德國電影中，有相當一部分表現黑人美國兵糟蹋本國婦女，就肯定不是巧合了，因為似乎施暴者的種族會加重戰敗一方的恥辱感。一份德國宣傳冊如是警告：“我們現在鄭重告訴你們，我們會剪掉你們的頭發，黑名單已經準備好，等時機一到就動手。”[56]實際上，有些婦女在1945年就已領教過這種羞辱。在拜羅伊特（Bayreuth），有個女人還被燒死了。在維爾茲堡（Würzburg），有三人因組織名為“黑豹黨”的恐怖團伙而被逮捕，他們威脅要剪掉“所有跟有色人種士兵出雙入對的德國女孩”的頭發。[57]一個二十來歲的前納粹分子這樣描述跟盟軍來往的女人：“德國人的氣節難道蕩然無存了么？……我們可以戰敗投降，可以被人羞辱，但不能親手玷污自己的榮譽！”[58]

無獨有偶，正如高見順所用的“恥辱”一詞，德國人對榮譽的提及很能說明問題。女人的榮譽（遑論她們選擇跟誰交往的權利）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男人的榮譽，他們才是真正覺得被羞辱了的人。當然，這點在所有傳統上由男人主導的社會里都是如此，戰后的局勢顛覆了舊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擺布，這也許才是她們罪孽深重之處。

分析怨恨情緒的一種辦法是將其與盟軍希望扼殺的反動政治觀點聯系起來看。即使這種觀點并非源自他們的祖國，也至少出現在戰敗國國內。日后成為《生活》雜志編輯的美國陸軍中尉朱利安·塞巴斯蒂安·巴赫（Julian Sebastian Bach）曾記錄過占領德國期間的一些心得。他認為“德國人接受‘親善’的程度好比一根溫度計，反映出他們接受戰敗事實、克制民族自豪感和展望未來美好新生活的程度。顯然，看到德國婦女和美國占領軍混在一起就發怒的多半是‘未經改造’的德國人，而不是那些急切地想和我們合作的德國人”。[59]

在最初憤慨于女站務員自輕自賤的可恥之舉后沒幾天，高見順在日記中也表達了同巴赫類似的看法。這一回，還是在火車站，作家看見一個日本女人從火車車窗里探出上半身，跟她的美國兵男友說“拜拜”，其余日本乘客向她投來憎惡的目光，但她似乎熟視無睹。高見在這一幕里讀出了一種別樣的凄楚。他寫道，在包括自己在內的旁觀者看來，這個女孩“看著就像出身于‘特殊慰安機構’”。但這姑娘根本就不是妓女，而且她似乎也不在乎別人怎么看她。相反，她看起來“對能和美國兵這樣大膽地表現愛意十分自豪”。高見因此預言，此情此景在日本會變得越來越稀松平常。此外，他還寫道：“這其實是件好事……這樣的場面多多益善。這對日本人會是一種很好的鍛煉，因為屆時，更加自然和唯美的社會關系就會來臨。”[60]

高見富有人情味、甚至理性思考的看法固然讓我吃驚不小，但同樣的一番話，出自朱利安·巴赫這位美國占領軍中尉之口，卻又顯得太天真，太以自我為中心了。這是因為，男男女女對巴結敵人的同胞的嫉妒和仇視，并不僅僅在未經改造的法西斯分子身上才有。毫無疑問，戰敗一方的恥辱感要強烈得多，但在獲得解放的人們中間這種情緒也很普遍，即便是一開始把盟軍官兵看作神圣的戰勝者、向他們拋撒鮮花致意的人，也有臉上無光的時候。

戰后的荷蘭有首膾炙人口的歌謠，歌名叫《姑娘，管好你自己》，歌詞是這么唱來著：

勇敢的小伙，驕傲的戰士，

千里迢迢來到這里。

他們為我們贏得了自由，

所以他們理應快活快活。

但不少“荷蘭女孩”，

很快拋卻了尊嚴，

就為了一包香煙，

以及一塊巧克力……

許多向匈奴人點頭哈腰的人，

已經付出了代價。

女孩，你對祖國榮譽的背叛，

絲毫不遜于前者……

沒有荷蘭小伙子愿意再看你一眼，

因為你讓他們寒了心……

所有令人不齒的元素一應俱全：民族榮辱，道德敗壞，物質貪欲，拋棄本國小伙。這里最具啟發性的一點，是將跟德國占領者有一腿的女孩同傍上英國或美加兩國軍人的女孩做直接對比。意思再清楚不過了，女性傷風敗俗事大，情郎乃何國人事小。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一些同加拿大軍人卿卿我我的荷蘭女孩落得和“德國佬婊子”（Moffenhoeren）一樣的下場，也被憤怒的暴民剪掉了頭發。

無論是在獲得解放的國家還是在戰敗國，有幾件事加劇了異族占領引發的道德恐慌。占領軍錯誤的政策對軟化當地人的仇恨心理無濟于事。盟軍征用電影院、咖啡館、舞廳和游泳池，供自己享用。這些設施對本地人是不開放的，但對傍上盟軍士兵的當地女孩卻又大開便利之門。這種區別對待自然會招致怨恨。在烏得勒支，一伙荷蘭青年逮住一群姑娘，試圖剃光她們的頭發，原因是有人看到她們和加拿大士兵在一起。加拿大人擺出一副自衛的架勢。接著，有人拔出了刀子，有人扔石塊，槍聲響了。這起事件里沒人喪生，但傷者甚眾。

盟軍當局取締有組織賣淫的規定也為性病肆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宣布戰爭結束后不久，身在德國的美國人中間曾流行這樣一句話：“歐戰勝利日（V-E）先來，性病（VD）緊隨其后。”在德國的美占區，據說從勝利日直到1945年底，性病發病率激增了235%，也就是說，從每年每千名士兵里有75個性病患者上升至每年250人罹患性病。[61]盡管在火車站和紅十字會俱樂部，常有人給美國大兵發放裝有避孕套和高錳酸鉀藥丸的“勝利小包裹”（V-packets），但依然未能杜絕這種情況。在德占期，荷蘭就已呈現畸高的性病發病率，而戰爭一結束，這一趨勢又進一步加強。媒體散播聳人聽聞的文章，說是有大約一萬名婦女感染上了性病，自己卻還渾然不知。在法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恐慌。

在意大利南部，道德恐慌上升到了將性病的危險與民族恥辱相提并論的高度，而這種恐慌，在庫爾喬·馬拉帕爾泰（Curzio Malaparte）的名作《皮膚》一書里得到了一種典型的夸張化表述。馬拉帕爾泰對自己信口雌黃之處倒也從不否認，他對法西斯主義者的同情也不止是表面功夫。不過，他在表達大眾情緒上很有一套，雖然有時為了達到效果會杜撰一些無中生有的細節。在他的書里，盟軍入侵被比作一場瘟疫，感染后，“四肢看上去依舊完好無恙”，但“靈魂已經腐敗潰爛”。馬拉帕爾泰解釋道，在德國占領期間，“只有妓女”才跟占領軍睡覺。但如今，美國人和英國人掌權后，“由于這種可憎的瘟疫，首先遭到腐化的是女人的榮譽和尊嚴感”，恥辱已經感染了每一戶意大利家庭。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有害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于自輕自賤成了一種值得歌頌的行為，甚至可以證明一個人愛國與否。所有男男女女不僅不臉紅害臊，反而對他們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甘墮落感到分外光榮”。[62]

這當中恐怕有夸大其詞的成分。但是除開作者，也許還有不少人抱有同感。跟外國軍人上床無異于出賣肉體。如果是出于自愿，那就更糟了。

駐扎法國的美國大兵看了部名叫《良家女孩也會得性病》的紀錄片。不管她們身在阿姆斯特丹還是東京，被占領城市的女性經歷的諸多恥辱之一就是時不時被人隨機攔下，檢查是否患有性病。毋庸置疑，戰后的亂局中，醫療機構數量不足，衛生狀況堪憂，青年男女缺乏經驗，這些因素加劇了醫療問題，這一點，在保守、禁欲的社會里也時有提及。但有些緊張過頭的馬拉帕爾泰，卻一語切中了要害：出于一系列原因，女人的行為太過隨心所欲。

并非所有人都對此嗤之以鼻，一些思想進步的人，比如荷蘭婦科醫生、性問題改革家維姆·施托姆（Wim Storm）就認為親善政策存在有利的一面：其為女性解放打開了一個突破口，也標志著一些過時觀念可算壽終正寢了——譬如男性擁有特權和妻子應順從丈夫。女人在加拿大人的“卡其布臂彎”中尋歡作樂，“接觸了一門嶄新的語言，學跳吉特巴舞，學會如何去愛，”這么說吧，“所有這些女人都清楚她們想要什么。”說她們是為了一塊巧克力或幾根香煙就出賣自己“是一種很過分的侮辱”。[63]解決性病蔓延的最好辦法是向女性發放更多避孕套，并且在年輕人當中普及性教育。

但是諸如施托姆這種人只是少數，他們的看法不會為人所認可，至少暫時不會。在一片道德恐慌的氛圍中，那些呼吁重整倫理綱常、在傳統道德基礎上重建社會的聲音要強大得多。在荷蘭是如此，以至于連《荷蘭國家日報》（Het Parool）這樣一份隸屬于自由派、由反納粹抵抗運動創立的報紙，也解雇了旗下一名編輯，理由是他發表了一篇贊同向婦女分發避孕藥的文章。該報對此的解釋是：“本報將教育吾國人民追求更高的道德準則視為我們應盡的義務……從而會反對各種形式的放任自流。”[64]同樣的論調也出現在法國。戴高樂將軍的臨時政府十分擔心戰時淪陷和后來的光復會削弱公共道德，對“法蘭西民族”的繁衍生息構成致命威脅。[65]在獲得解放的法國，禁止墮胎和通奸的法律跟維希政權時期一樣嚴厲，有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針對一些人認為的道德崩潰，采取清教徒式對策的絕不只有宗教保守派或者政治右派。在法國，一大批效力抵抗組織的男男女女出于革命浪漫主義情懷或理想主義，都加入了共產黨。戰時的局勢讓常規道德法則出現了松動。但在戰后，法國共產黨在黨魁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帶領下，迅速終結了這種狀態。忠于黨、保持穩定的家庭生活成了黨員熱情踐行的信條。由戰爭和同外國軍隊親善而引發的“墮落行徑”備受譴責。無獨有偶，在東德，共產黨人在他們蘇聯主子的卵翼下，強化了對本地區的控制權。與政治壓制一同到來的還有一種道德新秩序。共青團書記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千方百計想說服女青年不要再沉溺于輕浮的搖擺樂和性愛之歡中，希望能贏得她們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支持。但他感到努力受挫了，其中的根源在他看來十分清楚：“我們必須打壓她們對享樂的偏好（Drang nach Lebenesfreude）。”

綽號“昂尼”的埃里希·昂納克對享樂生活其實并不陌生，他跟比自己小得多的女性有過幾段風流韻事，所以沒必要瞎操這份閑心。人們歡騰的狀態不會維持多久。到了1945年末，收復河山帶來的快意已經開始漸漸退去。外國軍人一波波地回國，每批人數都在增加。德國和日本仍會保留大型軍事基地，英國和意大利的規模則相對較小。道德恐慌為制定保守對策奠定了基礎。在歷經多年的危險、混亂和剝奪后，人們對女性掌握性愛自由的擔心以及對資產階級穩定狀態的共同向往，不久便會在光復和戰敗的國家恢復一種更為傳統的秩序。到了1950年代，1945年的夏天仿佛已是一段遙遠的記憶。性解放還得再等個二十年，那時節育藥得以問世，相伴而來的還有第二波盎格魯——撒克遜式享樂主義。披頭士樂隊和滾石樂隊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是格倫·米勒和本尼·古德曼做夢都想不到的。

即便這樣，戰后的無序狀態盡管短暫，但也不是一點積極效果都沒有。伯努瓦特·格魯重塑自由的愿望并非建立在徹頭徹尾的幻想之上。早在法國光復前，法國女性便在1944年3月被臨時政府賦予了投票權——這種權利源于男人的匱乏，前提是老婆可以代表缺席的丈夫發表意見。1945年，意大利女性也獲得了這一權利，一年后輪到了日本女性，1946年，好運又降臨到了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女性頭上，到了1948年，比利時女性也喜獲特權。不管有些人多么渴望回到過去，世界再也不可能退回到昔日狀態了。

[[1]作者注：事實上，這次行動在籌劃階段的代號叫“派對”，阿納姆戰役中最著名的將領之一的約翰·弗羅斯特上校甚至想把高爾夫球桿運到荷蘭。](#_1_1)

[[2]萊昂內爾·漢普頓，美國爵士音樂家，演奏電顫琴。](#_2_1)

[[3]艾迪·斯通，美國爵士音樂家，演奏吉他和鍵盤。](#_3_1)

[[4]即法語中的歌曲。](#_4_1)

[[5]Oh! Là là! 是法語里常用的一句口語，表達無奈感慨之意。](#_5_1)

[[6]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1929——1945），生于德國法蘭克福的猶太女孩，二戰猶太人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死時年僅15歲。安妮用13歲生日禮物日記本記錄下了從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親身經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記被梅普·吉斯發現并保存下來，1952年以《安妮日記》為題出版，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_6_1)

[[7]拉比，猶太教牧師。](#_7_1)

## 第二章 饑餓

如果說5月到來的加拿大軍隊被一些荷蘭人視為救世主的話，那么荷蘭光復還留下另一種同樣讓人意氣風發、難以磨滅的印象——“嗎哪行動”（Operation Manna）。幾十年過后，說起1945年5月由英國皇家空軍和美軍轟炸機空投、再由紅十字會分發的“瑞典白面包”時，荷蘭人依舊會留下感激的淚水。孩提時代的我曾經幻想過那個奇妙的情景，想象大塊大塊的白面包像雨點一樣從天而降。實際上，當人們站在紅瓦屋頂上興高采烈地揮舞廚房抹布時，超低空飛行掠過他們頭頂的蘭開斯特轟炸機和B-17s型轟炸機投下的不僅僅是一袋袋面粉，此外還有一個個柳條箱，里面裝滿了巧克力、人造奶油、腌牛肉、雞蛋粉、香煙、咖啡和口香糖。英國人給這次行動起名叫“嗎哪行動”[[1]](#_1_Ma_Na__manna__Sheng_Jing_Gu_S)，美國人叫“貪食行動”（Operation Chow Hound）。

對于英美兩國的轟炸機飛行員而言，在荷蘭空投食物是一項令人歡迎的差事。一名英國飛行員寫下這樣一張字條，藏在巧克力罐頭和一袋裝面粉中間：

致荷蘭人民，

別擔心跟德國的戰爭，就快要結束了。空投食品和我們平時執行的轟炸任務不一樣。我們會一直帶來新的食品供給。你們要振作起來，祝好。

一名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1]

荷蘭人對此感激涕零，許多人已經饑腸轆轆。5月，光復后不久，《紐約時報》提起鹿特丹的一所“饑餓醫院”，那里“憔悴的病人”每天“進食6份清淡的病號飯”。據報道稱，30來歲的男男女女，“看著像60歲，他們眼眶凹陷，皮膚長出黃疸，四肢嚴重浮腫，顯示出獲救之前經歷的苦難之重”。與此同時，鹿特丹卻還有餐館開門營業，向“衣著品位良好的客人”提供“精美的大餐和種類繁多的飲品”。憤慨的荷蘭人“得知還存在截然相反的一面時，迅速斥之為‘黑市’”。[2]

這種局面在歐洲大陸比比皆是，而且許多地方的情況要比鹿特丹惡劣得多。在蘇聯的部分地區，數以百萬計的人死于饑餓。但荷蘭的饑荒有其特殊之處：荷蘭是唯一一個遭受饑荒的西歐國家，而且是作為一種有意為之的集體懲罰。斯拉夫人也經歷過這種懲罰，但其他西歐人并沒有領教過挨餓的滋味。

1944年9月，為了協助蒙哥馬利從阿納姆揮師東進、橫跨萊茵河的行動，荷蘭鐵路工人舉行了罷工。結果行動慘遭滑鐵盧。作為報復，德國人切斷了向依舊處于占領下的荷蘭西部的食物供給。不僅如此，他們還拉了電閘，淹沒良田，禁止荷蘭人乘火車。禍不單行，1944年和1945年的“饑餓冬天”格外寒冷。有18000人死于因饑餓和營養不良而引起的各種疾病。僥幸活下來的人通過燃燒家具來取暖，靠吃寵物（如果還能找得到的話）過活。他們也吃死馬，馬匹在街上一倒下肉就被分搶一光；他們還吸食從帶刺蕁麻和煎炒過的郁金香花苞里提取的汁液。

饑荒的問題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種類不對，一樣可以要了人的命。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遞過來的餅干，吃下去的結果也可能是災難性的。餅干可誘發極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涼水來解渴。而大量飲水會導致沒有消化的餅干在胃內膨脹，最終撐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會死亡。

放眼世界各個角落，不論是在光復的國家還是在戰敗國，因為所有公共服務一概陷入停滯，經濟不再運轉，幾乎各地都是餓殍遍野。除荷蘭外，還有其他地方也不得不依賴空投食品。野坂昭如在《美國羊棲菜》里寫到的那個日本少年，曾目睹美國轟炸機投下一個帶降落傘的鋼桶。一開始，日本村民以為這又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彈。他們聽說過廣島的事，投在廣島的原子彈就吊在降落傘下。然而，這個鋼桶并沒有爆炸，于是乎，人們的饑餓和好奇心便勝過了恐懼。村民撬開桶蓋，發現了許多裝食品的包裹。他們猜這些原本是要空投給附近一所戰俘營里的俘虜的，但是在糧食短缺的情況下，很難再對陌生人發善心。包裹里有面包、巧克力、口香糖。小孩們連著幾天把口香糖嚼了又嚼，淡而無味、硬邦邦的一團團膠泥在他們之間“口口相傳”。另外還有一個包裹，里面包著棕褐色的東西，村民以為這肯定是紫菜，也就是日語里的“羊棲菜”。這在日本可是一道很受歡迎的美味佳肴。但這玩意吃起來味道極差，哪怕用沸水煮過還是很難吃，而且很硬，不易吸收，村民們十分好奇美國人的胃居然消化得了這樣的東西。盡管這些被當成“美國紫菜”的東西其實是難以下咽的紅茶茶葉，日本人還是把整袋東西吃了個底朝天。

在飽受饑餓的一年里，最糟糕的情況發生在集中營內。日本設在東南亞的集中營里饑饉狀況令人發指，但跟大多數德國集中營比，則顯得小巫見大巫。德國人把那里的奴工和“死亡行軍”（death marches）幸存者撂在一旁，任其自身自滅。據大部分當時記載來看，最骯臟不堪的當屬貝爾森集中營，建造初衷是為了“交換猶太人”——用那些地位顯赫的猶太人來換取德國戰俘的自由，但實際上這樣的交換鮮有發生。后來，集中營里還來了政治犯和刑事犯。1944年末，貝爾森成了一個垃圾傾倒場，負責收容從蘇聯紅軍解放地區死亡營里遷來的猶太幸存者。其中就有安妮·弗蘭克，她在離集中營解放不到一個月前死于傷寒。貝爾森從一開始就人滿為患，到了1945年初更是變得極度擁擠，囚犯幾乎是疊羅漢似的睡在彼此身上，他們缺乏清潔衛生設備，到最后連吃的和喝的都沒了。有些餓極了的人尚有一絲體力，竟然分食起堆在營房外的尸體來。只有黨衛隊看守能吃飽肚子，集中營的長官約瑟夫·克拉默（Josef Kramer）還派人養豬，專供他個人享用。

由于英國人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們唯一能提供給這些饑民的只有軍糧：火腿、培根、烘豆、香腸、牛排和腰子派。但囚犯們萎縮的腸胃哪能再吸收得了這種食物，所以食物幾乎是穿腸而過而未作停留。即使如此，許多人還是不顧一切地狼吞虎咽。最后死了2000人。

英國人僅有一次見識過如此大規模的饑荒，那是在1943年的孟加拉。水災的爆發致使作物歉收，政府官員又無能，腐敗橫行，戰時秩序混亂，官方的麻木不仁令人震驚。在這些因素的統一作用下，共有300萬人喪生。鑒于此，英國軍醫借助不久前的研究成果，使用了一種名為“孟加拉饑荒大雜燴”的藥方。具體成分是加了糖、奶粉、面粉和水的粥，味道甜得發膩。除此以外，他們還試驗了滴鼻液和注射氨基酸的辦法。在貝爾森，“孟加拉饑荒大雜燴”是給那些還能吞咽的人吃的，氨基酸、滴鼻液留給那些沒法進食的人。這兩種辦法都失敗了。“大雜燴”太甜，囚犯們吃不下去。而藥物注射和滴鼻液這兩種辦法最后也只能作罷，因為死亡營的幸存者對任何看似醫學實驗的做法都充滿了恐懼。他們確信自己死期將至，嘴里念叨著集中營里的德語：“我不要火葬。”[3]

許多人最后活了下來，這既得益于英國軍醫和醫學生的不懈努力，也不能忘了那些本身就是醫生的集中營幸存者。通過一次次的試錯，他們找到了食物和水的合理配比，讓奄奄一息的囚犯恢復體力。集中營里幸免于難的醫生中有一位名叫哈達薩·賓科（Hadassah Bimko）的波蘭牙醫。還在貝爾森的時候，她嫁給了別名“約西勒”的約瑟夫·羅森薩夫特（Josef “Yossele” Rosensaft）。他是波蘭猶太人，十分頑強，曾經數度被送往奧斯維辛，卻都設法中途逃脫，他后來成為貝爾森集中營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我們在本書后面的章節里還會談到他。夫妻倆的兒子梅納赫姆（Menachem）[[2]](#_2_Ji_Yi_Se_Lie_Qian_Zong_Li_Mei)就出生在貝爾森。

\* \* \* \* \*

對比荷蘭、意大利、南斯拉夫或德國的生活，英國人的日子過得可是舒坦多了，但也遠不到殷實的程度。事實上，到了1945年5月，戰時食物配給還一度減量：家家戶戶分到的烹調油少了，培根也少了。到了1946年，甚至連面包都搞起了配給制。許多人依舊睡在倫敦地鐵的隧道里，而且就算戰后一年里，供暖也是時有時無的，以至于1946年和1947年之交的那個嚴冬盛傳著這樣一句順口溜，“跟欣維爾一塊哆嗦，跟斯特雷奇一塊挨餓”。伊曼紐爾·欣維爾（Emanuel Shinwell）時任英國的燃料和能源大臣，約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則是糧食大臣。

美國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曾在1945年夏天造訪倫敦。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他在倫敦的霍本區散步，走著走著，他聞到了一股惡臭。轉過身，他看到了“一個小型市場，一面打開窗戶的窗臺上攤著一排排死烏鴉。很明顯，這家店只賣這個”。[4]

到了12月，一艘載有香蕉和橙子（還混著四個一靠岸便跳進水里的牙買加偷渡客）的輪船抵達布里斯托（Bristol），受到了以該市市長為首的官方委員會的熱烈歡迎。這還是戰爭開始后英國人第一次見到香蕉。

倫敦在慶祝勝利幾個月后依然顯得很壓抑，不單單是因為缺少像樣的食物。埃德蒙·威爾遜用他自己的話總結了當時英國社會的普遍情緒：“戰爭一結束，一切突然顯得那么空虛、病態和沒有意義！我們一蹶不振，生活窮困潦倒，灰頭土臉，而在眾志成城抵抗外敵時，卻可以全然忘記這些困難。我們所有的努力最終只收獲了破壞，卻無力在廢墟上建起我們賴以為生的東西。”[5]

法國人的心態更加消沉和低落。供應部長保羅·拉馬迪埃（Paul Ramadier）被人戲稱為“拉馬丹”（Ramadan），即穆斯林禁食的齋月；每天那點少得可憐的食品供給則叫“拉馬迪厄特”（Ramadiète）。[6]法國農民拒絕以固定價格出售糧食，因為他們依靠無處不在的黑市可以賺得盆滿缽滿。要是沒有黑市，大部分法國人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過。詩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當時身在德國，受命為英國政府撰寫一篇關于文化生態的報告，他曾前往法國休了幾個月的假。對比英法兩國國民的精神狀態，他察覺到一種重要的反差。在英國，人們不需要求助于黑市就能吃飽穿暖。但在法國，斯彭德不用走進窮人的生活，就能不時碰到類似巴黎大學教授那樣的人，“他的西裝差不多大了兩號”，而且還要“面帶苦笑地解釋自己已經兩個月沒去黑市了，一直就是這么過的”。[7]

但法國至少大體上做到了“國破山河在”：歷史名城、教堂和大教堂都完好無損。在剛目睹了德國滿目瘡痍的斯彭德看來，這只會讓一切顯得更加陰沉。法國，他寫道，是一堆“看不見的廢墟”。跟德國一樣，法國必須“推倒重建”，但“盡管社會上彌漫著這種情緒，高墻依舊巋然不倒，咖啡館依舊門庭若市（雖然沒有咖啡供應），而且黑市永遠存在”。[8]

由于法國經濟被德國人全方位榨干了，黑市在法國的存在已經有些年頭。光復后主要的問題并不只是食物緊缺，而是將食物從鄉村運往饑腸轆轆的城市變得很困難。運載卡車和汽油十分緊俏。因此掌握這些重要交通資源的人就能迅速致富。瞅準了這個機會，一些很能鉆營的美國兵——他們中有些在老家還有犯罪記錄——開小差做了逃兵，在巴黎組織起黑幫。他們計劃盜取軍用卡車，然后偽造文書，或賄賂看守油庫的門衛，以取得燃油。這些油接著被倒賣給法國黑幫。美國“倒爺”從中發了一筆橫財，但很多人因為太過招搖，花錢無度，結果東窗事發被抓。一旦往美國國內匯款，他們的行跡就會敗露，于是這些人選擇在巴黎花天酒地，他們揮金如土的闊綽勁兒引起了官方的警覺。想在歐洲大陸像王公貴戚一樣逍遙自在，就得干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間打擦邊球的勾當。也只有在這樣的世界里，在黑市餐館和夜總會里，香檳和美酒依舊流淌，各種珍饌應有盡有。

埃德蒙·威爾遜在倫敦搭乘了飛往羅馬的航班，在他看來，羅馬這座城市“比過去更加臟亂和腐敗”。[9]一次，他和來自美國的朋友在一家黑市飯店吃飯，一干人圍坐在露天餐桌旁。一開始，威爾遜的心思全在享用美食和同朋友交談上，沒注意周圍有什么異常，不知何時，他身后已聚起了一群人，“伸手從我們的盤子里拿東西”。接著，負責看場子的人出現了，他把一名老嫗打翻在地，人群往后縮，其中多半是婦女和小孩。“有些人知難而退，但剩下的站著沒走，隔得老遠，眼巴巴地望著我們這些食客。”[10]

跟巴黎差不多，羅馬大體上沒有經受戰火的摧殘，但諸如帕勒莫和那不勒斯這些城市則毀壞嚴重。米蘭也在經歷了盟軍轟炸和內戰后傷痕累累。5月，在造訪米蘭的威爾遜看來，這座城市“儼然地獄的一角。有些破爛不堪的綠皮電車依舊在運行，部分居民還是照常過日子，但整個城市都像是經過震撼后陷入了停擺。那些面無血色、營養不良的人們，身上隨隨便便套了塊舊布遮蓋皮膚，他們看起來像是被禁錮在……一種永恒的負擔之中”。[11]

匈牙利小說家馬勞伊·山多爾（Márai Sándor）親歷了布達佩斯的解放過程。這座受到戰火嚴重戕害的城市在1945年2月蘇聯紅軍解放前被圍困了兩個多月，隨之而來的是惡性通貨膨脹。一美元或一塊金子的價值隔夜就能漲至幾十億。農民“知道他們的好日子來了”，“靠在布達佩斯的市場上用一頭注水豬換一臺鋼琴或拿破侖金幣”發了橫財；而“知識分子、工人和公務員則一天天地等待轉機，越來越蒼白，越來越饑餓，越來越絕望……”馬勞伊回憶道，在物價飛漲的日子里，“多數布達佩斯的居民都變得骨瘦如柴，就好像解剖學教科書里那些人體骨架素描一樣，一點肉和脂肪都沒有”。[12]

然而，對比柏林和大多數德國城市，布達佩斯的情況就算是好的。因為在柏林、法蘭克福、漢堡、不來梅、德累斯頓，以及規模更小的市鎮——比如1945年仿佛事后才被人想起并加以摧毀的維爾茲堡（Würzburg）和普福爾茨海姆（Pforzheim）——所剩下的只有余煙未盡的碎瓦頹垣，其間還散發著死亡的惡臭。戰后最初幾個月里，這些地方靜得出奇，這讓初來乍到的參觀者吃驚不小。

站在柏林市中心，左右手邊分別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最時髦的咖啡館——羅馬咖啡館——和已是尺椽片瓦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回憶起這里在戰前的樣子：路上車水馬龍，汽車喇叭聲不斷，人們嘰嘰喳喳地聊天，購物，喝酒吃飯。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獨自一人置身于一片寂靜的廢墟中。這時他聽到身旁一陣輕微響動，只見一個瘦弱的小男孩，腳上穿著木拖鞋，正拖著一輛小手推車穿過遍布殘骸的卵石路。風輕柔地吹過眼前這片破敗景象，楚克邁爾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然而，他寫道：“與此同時，在德國上下還存在著一種持久的感官刺激，就像一個巨大的蟻丘，在不停地爬動，抓撓，觸弄人的神經……來來去去的腳步從不停歇，徘徊，行走，穿越；這是幾百萬只鞋子摩擦地面的聲音。這就是‘黑市’……在這個世界里，游走著無家可歸者、難民、流民，還有兇神惡煞般的青年。”[13]

這里還有一段文字，出自斯蒂芬·斯彭德之手，描述的是另一座已是華屋秋墟的德國城市科隆：“這座城市的毀壞反映在居民內心的頹廢上。他們活著，卻無法變作覆蓋城市創傷的瘡疤，反而成為噬咬死尸的寄生蟲，在斷瓦殘垣間挖掘藏在下面的食物，在靠近大教堂的黑市上做著買賣——這是一種毀滅、而非創造的營生。”[14]

如果說科隆或柏林夠凄慘了的話，那么東京或大阪——遑論廣島——的情況恐怕更糟。這還沒算上馬尼拉、華沙、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在軸心國鐵蹄下蕩為寒煙的城市。英國的正統派猶太教首席拉比所羅門·舒恩菲爾德博士（Dr. Solomon Schonfeld）當年12月造訪華沙，他告訴記者：昔日整個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幾乎是一片覆蓋著殘磚碎瓦的巨大荒地。街道還保留著猶太人被盡數滅絕那一天的原貌，一望無垠的磚塊和人骨下，躺著幾千具尸體，我還撿了幾塊骨頭”。[15]

摧毀華沙猶太人隔離區是一項大規模罪行的一部分。轟炸日本城市的動機則不同，但造成的破壞性結果卻差不多。日本人的房子大多用木材搭建，地毯式的轟炸和之后迅速蔓延的熊熊大火幾乎把一切都燒了個精光，只剩下公共澡堂的幾根石頭煙囪還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焦土之上，景象頗為慘烈。跟德國一樣，日本國內也是沉默處之。在寄給日后成為日本文學研究巨擘的唐納德·金（Donald Keene）的一封信里，美國海軍中尉謝伍德·莫蘭（Sherwood R. Moran）如是寫道：“東京是我第一個親眼目睹的戰爭受難者，這座雍容華貴的城市如今毀于一旦，但最讓我震撼的還是這里的死寂：沒有汽車喇叭聲，沒有人的叫喊聲，沒有金屬碰撞聲——所有城里人既憎恨卻又期待聽到的聲音，這里一概沒有。依我看，對于東京和全日本，災難已經是過去式了，但所有人依舊在死一般的靜默中凝視著。”[16]

在戰敗國，饑荒和疫病肆虐的可能性是實實在在的。德國城市已經爆發了斑疹傷寒、普通傷寒、肺結核等傳染病。在日本，1945年有2萬多人死于痢疾，到了1948年，有將近70萬人感染上了斑疹傷寒、普通傷寒、肺結核、霍亂和脊髓灰質炎。[17]在鄉村地區生活略好，那里還能找到吃的。但日本城市比起德國來恐怕境遇要差很多。愿意工作的德國人都領到了食物配給證，《揚基人》（Yank）這份美軍軍刊曾刊登過一篇發自柏林的報道，文中描述了一名養育6個孩子的體力勞動者一家一天的伙食標準：早餐，每人一杯茶，一片黑面包；晚餐是用一個洋蔥、一個土豆、半品脫牛奶再加一丁點兒花椰菜煮成的土豆湯。這點量肯定不夠吃，但足以讓人活命。

日本人在戰爭結束前很久就已經開始餓肚子了。政府當局指導國民如何用橡子、谷皮、鋸屑（用來做煎餅）、蝸牛、蚱蜢和老鼠做菜。等到戰敗后大批軍人返鄉時，本來就很困頓的局面演變成一場危機。許多無家可歸的人只能住在火車站的地下過道里，狹長、迷宮般曲折的地道宛如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的貧民窟。在這個狄更斯式的世界里，父母雙亡的孤兒靠撿拾煙蒂換取吃的東西，除此之外要么當扒手，要么出賣他們營養不良的肉身。東京的上野車站作為城市無家可歸者的老巢，尤其惡名遠揚。成群結隊的饑餓兒童被人叫做“呷鈴小孩”（charinko），在日語里，charin是模仿硬幣丁零當啷的象聲詞。[18]照片中這些穿著粗布亂服、吸著煙屁股的頑強的小家伙看著像未馴化的動物，而不像是人。這與一個英國兵對在破敗的德國地下通道或火車站里的流浪漢的描寫不謀而合：“他們渾身上下沒一塊干凈的地方，黑不溜秋的，人在哪兒你都看不清。”一見到外國兵，他們就作鳥獸散，再出來時手里拿著石塊或鐵棒。“他們的牙齒很黑，有些都斷了。”身上唯一一塊干凈的地方是“他們的眼白”，而那種眼神就像生了病的豹子幼崽，“唯一的敵人就是人類”。[19]

為了更好地了解這段歷史，我們還應該銘記家園毀于戰火、幾萬萬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在蔣介石委員長統率的國統區，美國軍人吃驚地發現竟然有小毛孩溜進他們的軍營，從垃圾箱里翻找食物。一名美軍中士回憶道：“牽著年幼女兒的母親們來到我軍的崗哨前，提出想把小女孩送給我們，換點糖果和香煙。”[20]與此同時，有中國人會鉆到軍隊廁所下方，透過地板上的裂縫淘糞，然后把糞便兜售給農民當肥料。

戰后人類經歷的苦難程度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幾乎沒必要在不同國家之間作對比。德國不僅要安頓本國國民和返鄉士兵，還要應對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遠道而來的1000多萬講德語的日耳曼族難民，他們被驅逐出土生土長的家園，這種排德潮還得到了同盟國政府的官方批準。許多難民死在了前往德國這個他們從未謀面的國家的路上，有些還是被人殺害的。幾乎所有人都變得一貧如洗。這股龐大的難民潮大大增加了四處游蕩、尋找食物和棲身之所的流民的數量。

1945年可怕的糧食歉收，進一步加劇了日本和德國的糧食危機。農業生產遭到了戰爭的巨大破壞，牲畜減少，農田被毀，農具變成廢鐵，勞動力稀缺，再加上冬季的嚴寒，可謂雪上加霜。在德國東部，大量的農業機械要么毀于戰火，要么在戰爭最后幾個月里被洗劫一空。戰時頂替德國人勞作的外國雇農在戰后紛紛離開。日本帝國曾依賴其治下的亞洲各地提供糧食，如今則被切斷了供應。

10月，日本財政大臣告訴美國記者，如果不能馬上進口食品，在即將到來的冬季將有1000萬日本人餓死。在德國，人們也作出了同樣災難性的預計。下薩克森州的一名社會民主黨行政官表示：“如果昔日的敵人不提供援助，很難說德國人何時會餓肚子。”[21]英國議會對德國即將崩潰的報告進行了討論。聯合國救災署官員阿瑟·薩爾特（Arthur Salter）提出嚴正警告：“如果我們現在的擔心成為現實，即數以百萬計的人將在今冬饑寒交迫，這種局面將不會是資源破壞和全世界物質短缺導致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下院議員被提請重視這一“人類迄今為止所面臨的最大災難”。[22]

這種觀點后來被證明言過其實。一些在德國旅行的人發現，那里的狀況，特別是西占區，并不比許多其他西歐國家來得差，事實上，比起東部地區還要好些。不過即使能依靠從被占領國家掠奪來的余糧儲備度日，德國人的生活的確處境維艱。柏林尤其窘迫，但從德國各地傳來的信息來看，其他地方情勢一樣不容樂觀。一位美國記者在漢堡附近目睹了以下場景：“一天晚上，一名穿著西裝的德國老者在一片遍布沼澤的洼地上用拐杖打死了一只鴨子。關于食物短缺還有很多段子，但這則故事可謂高度概括。”[23]

所有這一切當然都讓人生起惻隱之心，但一想到納粹德國曾經的受害者還在類似貝爾森集中營這樣的地方挨餓，想到在日軍戰俘營里的囚犯飽受煎熬，想到上百萬的難民和流離人員需要被遣返回鄉，想到英國人、荷蘭人、法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自己都只能靠少得可憐的食品供給果腹，而菲律賓人、中國人、印尼人分到的只會更少，最后再想到對德國陸軍和黨衛隊全面饑餓政策記憶猶新的蘇聯人，公眾對日本人和德國人的同情心只能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要說服美國議員，特別是那些傾向采取孤立政策的共和黨人出錢贊助國際救災機構，比如UNRRA（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向遭受德國和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伸出援手，就成了一件相當困難的事。花更多納稅人的錢，或按照一些人的建議，削減英國人自己的配給，去供養昔日的敵人，這樣的政策自然更是難以推行。

但是總得做點什么，哪怕不是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實際考慮。德國和日本的全盤崩潰將使盟國政府肩負難以承受的壓力，并使任何有序的——遑論民主的——戰后秩序重建工作化為泡影。英國親工黨的《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在士兵當中擁有大量讀者，該報用簡明扼要的標題表明了其對提供援助的看法——“喂飽野蠻人？”報紙清楚地指出，根本沒必要對德國人甚至是那些被趕出家園的日耳曼難民報以同情。不，“并不是什么同情心理作祟，催使我們強調有必要對當下局勢做出反應”。問題在于，“如果任由歐洲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就要花更長的時間讓其重見天日——導致占領也得持續下去”。[24]

關于援助還有其他考量，這種考量對美國議員更具說服力。即使UNRRA的國際主義理想有同情共產主義之嫌，美蘇之間愈演愈烈的對抗迫使美國必須采取行動，而UNRRA在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議員丹尼爾·弗拉德（Daniel J. Flood）向同僚呼吁：“饑饉、荒蕪、疾病會醞釀動亂，催生共產主義的幽靈。饑民是反上帝學說的肥沃土壤，他們很容易被那些企圖將全能國家等同于上帝的人蠱惑。”[25]

于是，盟國采取了行動。在德國的英占區，自11月下旬起，英國將軍杰拉德·坦普勒爵士（Sir Gerald Templer）開始主推“大麥粒行動”（Operation Barleycorn）。他下令釋放約80萬名德國戰俘，讓他們在農場干活，搶救僅剩的一點收成。為了向德國出口更多食物，英國國民被迫進一步勒緊褲腰帶；這就是1946年搞面包配給制的原因。同樣，遵照1944年參謀長聯席會議關于“西北歐俘虜之戰俘處置問題”的一紙手令，美國人開始向德國人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援，以“防止疾病與動亂”。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保障德國人的最低生活標準。至于到底有多低則沒有定論。崇尚“強硬和平論”的政客希望制裁德國，解散工業，讓其國民只能過上基本溫飽的生活。這一強硬方針的主要倡導人是亨利·摩根韜（Henry Morgnthau），羅斯福時期的財政部長。他計劃把德國改造成一個田園牧歌式的國家，讓其失去再次發動戰爭的能力。同樣，日本的盟軍司令部也收到了類似的嚴苛指令。參謀長聯席會議第1380/15條命令嚴令麥克阿瑟將軍限制向日本人發放救災物資，“只需達到避免出現危及占領軍或阻礙軍事行動的大面積疾病和動亂的程度即可。諸如此類的進口品只能限于最少量的食品……燃料、醫療衛生用品……”[26]

值得德國人和日本人慶幸的是，這些懲罰性指令不是被束之高閣，就是被人為弱化了。因為那些真正負責管理被占領國的長官對這些措施的危害性心知肚明。美國高級專員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將軍的財政顧問，就曾將參謀長聯席會議第1076號令斥為“經濟白癡”的杰作。克萊將軍沒有摧毀德國的工業經濟，從而避免引發更為深刻的騷亂。在得到華盛頓強力人物——譬如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后，他很快放開手腳幫助德國人重建經濟。比起財長摩根韜，史汀生更能體會德國人的疾苦，他懷疑后者正“因為自己猶太人的怨念變得心胸狹隘”[27]——史汀生的看法雖然讓人不悅，但卻同英美政府不少高層人士不謀而合。指望這些大人物會顧及猶太人的感受是不著邊際的想法。他們真正擔心的是德國人一怒之下會轉投共產主義，或者孕育復仇思想。麥克阿瑟將軍并不打算幫助日本人將工業水平恢復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萊的想法一致，認為“饑餓……能輕而易舉地讓一個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種能帶來食物、維系生命的意識形態”。[28]

德國大部分農業都集中在東部，此外還有幾大工業基地（比如萊比錫、德累斯頓、開姆尼茨），但東德的蘇聯統治當局并未出力重建德國的經濟基礎。相反，碩果僅存的一些工廠和其他資產被蘇聯人哄搶一空。機械設備、火車、電車、卡車都被裝上載重列車運往東方。銀行金庫里的金子和債券被搶了個精光，研究所的檔案也一點沒剩，眾多藝術珍品被當作戰利品沒收充公。剛剛從納粹監獄獲釋和從莫斯科流亡歸來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此無能為力，只能眼看著他們“兄弟同志般的”俄國主子強取豪奪。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滿洲，也就是今天的中國東北。自1930年代初，日本人在當地扶植了“滿洲國”這一偽政權，并借此建立殖民統治。偽滿洲國是日本帝國的工業重鎮。蘇聯在美國的敦促下，于8月8日，也就是戰爭臨近結束前不久才對日宣戰。

8月9日，廣島原子彈爆炸后三天，蘇聯舉兵南下攻打偽滿洲國。日本人靠殘酷鎮壓當地人后建造起來的重工機械廠、現代鐵路、采礦設備，均被蘇聯人以風卷殘云之勢分搶得干干凈凈，所搶物資悉數運回蘇聯。工廠被整間整間地拆卸分解，化整為零，運上一列列早就準備就緒的火車。發展到最后，蘇聯人連火車也偷，甚至連鐵路的枕木也沒放過，全部運了回去。還沒等中國人有機會奪回東北，就出了這種事情。不管是中共，還是蔣的國民黨，根本無力制止如此肆無忌憚、明火執仗的強盜行徑。而且，如果蘇聯人有機會入侵日本北方的話，必然會在那里重演這出掠奪資產的戲碼，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決意盡快結束太平洋戰爭的一大原因。

蘇占區的德國人，包括共產黨人，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因為他們的國民經濟正在遭受蘇聯人的大肆劫掠，但除了養活自己外，他們還要供養蘇聯占領軍。有許多例子表明，德國工人本來已經用殘留機械的零部件把被洗劫過的工廠重新拼湊起來，結果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廠子又被人大卸八塊，工人抗議的話還會遭到毆打。這些待遇使得德國工人很難對共產主義事業產生同情。當時一首膾炙人口的小曲這樣唱道：

歡迎歡迎，解放者！

你們拿走了我們的雞蛋、肉、黃油、牲口和飼料，

還順走了手表、戒指和其他物件。

你們把我們從汽車到機器的所有一切中解放出來，

帶著火車皮和鐵路設備滿載而歸。

你們把我們從這一切沒用的勞什子中解救出來！

我們興奮得痛哭流涕，感激涕零。

你們對我們真是太好了。

過去的日子太苦，現在無比幸福。

你們真是善良的大好人啊！[29]

話說回來，蘇占區里許諾發放給德國人、讓他們得以活命的食品配給并不比盟軍占領區的份額低：每個在職人士每天差不多可以分到1500卡路里；廣泛的共識是，一個成年人要想保持健康，一天最少需攝入1200卡路里。實際上，1945年時，大多數城市居民能分配到一半熱量的食品就已經算得上走運了。即使面包充足，新鮮食品還是寥寥無幾。是軍糧，讓德國人和日本人在戰后第一年里避免了滅頂之災。秋天一到，駐日盟軍的人數從60萬減至20萬，大量軍用食品，比如腌牛肉和豆子，被轉交由日本政府分發給國民。多數日本人都吃不慣這種食物。有些出身上流社會的日本名媛抱怨吃了豆子后，肚子里會脹氣，很是丟臉。有人向賓客發牢騷：“新的配給食品吃了讓人斯文掃地。”[30]但不吃，他們又會挨餓。1946年夏，東京市民從本國渠道依舊只能獲得150卡路里的熱量。[31]

然而，即使有了盟軍提供的給養，大部分歐洲人和日本人還是得依靠龐大的犯罪網絡——也就是黑市——來維持生計。在許多地方，貨幣交易已經被以物換物的形式所取代，香煙成了主要的硬通貨。對于占領軍而言，這種機會難以抵擋。在荷蘭，加拿大產的香煙，特別是“甜心下士”牌香煙，在黑市的賣價最高。黑市商人以每根1荷蘭盾的價格收購該煙，再以5荷蘭盾的價格轉手。一個加拿大軍人可以讓人從老家寄1000根香煙來，郵費只要區區3美元，然后就能賺取差不多1000荷蘭盾的利潤。[32]

而且用香煙幾乎什么都能買到：精美的古董手表、看戲用的小型望遠鏡、鉆戒、萊卡照相機，以及人們愿意拿出來交換燃料和食物的那些物件。用香煙還能買到一些必備品。5月，德國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納（Erich Kästner）來到奧地利鄉下。一天，他看見一長隊德軍士兵，一眼望不到頭，他們剛從東線戰場上撤下來，或步行或一瘸一拐地踏上返鄉之路。他在日記里寫道：“為了換點現金，他們兜售手頭的香煙，價格從1馬克到3馬克不等。對于平民衣服的需求從來沒斷檔過，但供應量幾乎為零。住在我隔壁屋里的一個人用一條舊褲子換了450根香煙。我不介意拿褲子換煙，但我身上只有一條褲子。這交易和結果太丟人了。只穿一條褲子的人可沒法做這買賣。”[33]

日本雜文和短篇小說作家坂口安吾常常和其他活躍在戰后初期的作家一道被歸為“無賴派”或“新戲作派”。他注意到，那些受訓為天皇陛下光榮捐軀的年輕士兵和飛行員，搖身一變成為黑市投機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與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戰爭寡婦，她們把對自己戰死丈夫忠貞不貳、恪守婦道的原則全拋之腦后，給自己物色了新情人。事實就是這樣，安吾寫道。他對此也并無厭惡之意。因為通過頹廢墮落，通過舔嘗人類最原始的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夠找回他們共有的人性。讓愚蠢的天皇崇拜見鬼去吧！讓開著自殺式飛機舍生取義那套見鬼去吧！“我們變得如此墮落，不是因為吃了敗仗，我們墮落因為我們是人，因為我們還活著。”[34]

毋庸置疑，許多日軍的退伍老兵都進入黑市，謀得了一份營生，同樣以此為生的還有朝鮮和臺灣黑幫、日本混混組成的團伙，以及一個垮掉社會里的其他無業游民。當時流行一句順口溜：“女人當潘潘成站街妹，男人給黑市做運輸隊。”[35]全日本共有超過15000個黑市，主要分布在火車站周圍。當年的黑市有些至今還在，比如“アメ橫市場”（Ameyoko-cho），從讀音來看跟美國人有些淵源。這是位于東京上野鐵路沿線一塊熙熙攘攘的狹長形商業區，小吃店和服裝店林立。過去，民眾去那里購買賴以為生的必需品，或在幾千個被風一刮就倒的小吃攤上吃點東西。小吃從油炸青蛙到雜碎湯一應俱全，如果食客走運，雜碎湯里的食材可能取自不同動物的內臟；曾有謠言說湯里還放了人體內臟。

什么東西都能拿來賣，也會被人買走，包括血跡斑斑的醫院舊毛毯。在中國東北，日本殖民者騎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了十五年，蘇聯軍隊一殺到，輪到他們害怕了，而且由于無法回國（大多數交通工具都留給部隊和高級日本官員），他們不得不在黑市上變賣所有財產，換口飯吃：有和服、家具、古董，有時甚至還賣親骨肉。經過殖民主義教化，日本人天生智商就比中國孩子高的觀念讓日本嬰兒十分吃香，對于將來需要男性勞動力的中國農民而言更是如此。日后成為日本央行副總裁的藤原作彌在戰爭結束時還是個孩子，家住中國東北。他的父母把家里值錢的東西都拿去黑市賣了。藤原至今仍記得當初聽見中國人吆喝：“有賣小孩的么？有賣小孩的么？”開價介于300—500日元之間。有時孩子剛買到手，立刻就被轉手賣出更高的價格。[36]

日本黑市上的大部分商品來自部隊給養，盟軍士兵將其轉賣給日本黑社會。我曾和一個退隱江湖的日本黑幫成員攀談過，他在聊起當年的好日子時不禁淚眼蒙眬。那時，通過在黑市倒賣從美軍福利社弄到的商品，他掙了不少錢，錢多到他買得起一部美國大轎車，里面塞滿了鈔票，一直堆到車頂。但跟那些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日本人一比，他這點能耐就是小巫見大巫了。那些人設法在戰爭末期藏匿了70%的軍用物資，剩余的30%里有各式各樣的機械設備和建筑材料。美國人后來將這筆物資轉交給日本政府，用以造福百姓。不過這些大體上跟先前被中飽私囊的物資一樣不翼而飛了，許多日本官員——有些還是昔日的戰犯——因此富得流油。

德國人和日本人在文化、政治和歷史上有著明顯的區別，但是就類似局面下的人類行為而言，他們又十分相似。對于靠犯罪支撐起來、乘人之危發國難財的經濟形態，其一大后果是社會凝聚力的崩潰——也就是坂口安吾形容的“墮落”形態之一。具體體現在每個男人——或者更常見的是——每個女人都只顧自己，不問他人。用海因里希·波爾（Heinrich Böll）的話來說：“每個人掌握的只是屬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們手上的東西：煤炭、木頭、書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氣壯地指責別人偷竊。”[37]

指責別人正是大多數人的做法。在德國，猶太人和流離人員經常被詬病為暴力行為和投機倒把的元兇。在日本，人們眼里最惡劣的犯罪分子是朝鮮人、中國大陸人和臺灣人這些“第三方國籍人員”——既非日本人，也非美國人。他們中許多人被運到日本做奴工。朝鮮和臺灣的幫會當然要同日本人奪食，參與黑市交易的猶太人和流離人員亦是如此；他們一樣也得想法子生存。貝爾森集中營因此成了黑市活動的幾個主要窩點之一。不少流離人員——猶太人、波蘭人、烏克蘭人、南斯拉夫人——被困在集中營好多年，一直缺這個少那個。卡爾·楚克邁爾在他關于德國和奧地利的報告中警告道：“只要缺乏解決流離人員問題的國際性手段，就無法根除德國的反猶主義”。[38]實際上，德國人常常不做區分——不管對方是自愿為希特勒帝國效力的拉脫維亞人，還是猶太人，他們都是“外國人”。有時德國人不得不找上門來，以極其高昂的價格從這些“外國人”手里購買商品。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大部分投機分子，特別是那些最有勢力的“倒爺”，既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別的外國人，而是德國人自己。

歐文·海門特（Irving Heymont）少校時任巴伐利亞某地區的美軍司令官。當地有幾個大型猶太難民營，比如蘭德斯堡（Landsberg），這個希特勒曾經服過刑、并在獄中寫下《我的奮斗》的地方。海門特寫道：“跟許多身在德國的人一樣，收容站里的難民是黑市積極分子……概而言之，他們的活動不外乎基本的以物換物，換取生活用品和新鮮食品。”[39]他同時還指出，黑市里“幾個大交易商”過去是商人或罪犯。他們只是在做自己得心應手的事，這是他們的老本行。

猶太人、第三方國籍人員和其他外國人會被看成是一肚子壞水的罪犯，其中一大原因是純粹的偏見。這是一種人類共有的脾性，在惡劣條件下會更趨強化，另外，普遍的看法也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偏見。許多人認為，盟軍優待和偏袒外國人，駐日美國憲兵對朝鮮人的行為聽之任之，而盟軍官方為了確保猶太人生活優渥，不惜犧牲無辜的德國人。這些說法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但是，鮮有猶太人能過上優渥的日子，甚至連舒服也談不上，更別提那些在收容站里度日如年的猶太人了。說這話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事實情況是，盟軍官兵自身也無法對反猶主義或種族主義免疫。巴頓將軍在瞧不起猶太人這點上也許比大多數人都要更極端，或者說更口無遮攔一點。他在解放達豪集中營后，曾頗為鄙夷地形容猶太幸存者“比畜生都要低賤”。[40]縱然艾森豪威爾將軍曾訓示駐德美軍要給猶太難民比德國人更多的優先待遇，他的話經常被當成耳邊風。多數美國人似乎覺得德國人、通敵分子和來自波羅的海的難民比深受創傷的猶太人更好相處。[41]

最重要的是，遷怒外國人是否定思想的一種表征，其本質是拒絕承認德國人和日本人對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人更容易對自己的遭遇顧影自憐。8月的一天，《揚基人》雜志的一名記者在柏林散步途中目睹了這么一出：一個德國女人，穿著破破爛爛的裙子，腳上蹬著寬大的男鞋，正朝一個俄國女兵破口大罵：“你們吃香的喝辣的，我們德國人卻只能餓肚子。”罵完她朝地上啐了口唾沫。[42]但即使在當時，也能聽到意見不一的聲音。《柏林每日鏡報》（Berliner Tagesspiegel）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譴責了“這種豎起一道墻，企圖將自己和對波蘭人、猶太人以及俘虜犯下的駭人暴行隔絕起來的做法；對美國和英國恩賜的食品毫無感激之意，反而覺得理所應得，這種思想太過愚蠢……”[43]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黑市經濟逐漸被更有秩序的市場所取代。但這段無法無天的歲月對后世有著深遠的長期影響，尤其是在德國和日本。因為戰后經濟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黑市一舉打碎了舊的階級分層。名門望族的女眷們不得不邁著緩慢的步子來到鄉下，拿出祖傳的寶貝去換食物。貧窮的農民突然手握大把現金，因此當時不難見到身著漂亮古董和服的日本村姑穿行在泥濘稻田之間的景象。換在過去，置辦這套行頭要花上一大筆錢。昔日貴族的千金小姐，在家道中落后，迫于生計只能委身下嫁給腰纏萬貫但通常品行不端的暴發戶。不過，戰后的亂世也帶來了自由，由于沒有了老牌競爭對手的打壓，建立公司成為可能。1945年，井深大在東京一家被轟炸過的百貨商店里開了間修理無線電的鋪子，這就是后來索尼公司的雛形。

在此，有必要一字不漏地引述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一段文字。這位在戰前著有《柏林亞歷山大廣場》（1929）這部鴻篇巨制的作家曾流亡加利福尼亞，躲避戰禍。戰后，德布林回到德國，卻自感再度成了流亡者。這里有一段他在溫泉勝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寫下的話：

回到德國，我的一大印象是德國人就像一群螞蟻，在一個業已被摧毀的蟻穴間鉆來鉆去，他們高度亢奮，迫不及待地忙這忙那，連巢穴被人端了、自己將無處安身立命都不自知。他們唯一擔心的是如果沒有必需的工具，沒人給他們下命令，就沒法立刻開展工作。對國殤，他們并不感到太難過，反而充滿了想發憤圖強的干勁。今天的他們沒辦法，但要是有，他們定會為明天歡欣鼓舞，欣喜于陳舊不堪、胡亂堆建的巢穴已被推倒，擺在眼前的是建立一流和現代新家園的大好契機。[44]

[[1]嗎哪（manna），圣經故事中古以色列人經過荒野時所得的天賜食物。](#_1_2)

[[2]即以色列前總理梅納赫姆·貝京，1977——1983年任職。](#_2_2)

## 第三章 復仇

1945年夏，捷克斯洛伐克國內以出產優質啤酒聞名的百威小鎮（捷克語里叫布杰約維采）附近有一座集中營，大門上釘著塊牌子，上面寫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集中營現在落入了捷克人之手，里面擠滿了德國俘虜，多數是平民。捷克指揮官年紀很輕，但卻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逼迫德國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而且只提供極少量的食物；夜半時分，他叫醒德國人，把他們趕到每天例行點名的地方，勒令他們唱歌、爬行、互毆、跳舞，或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折磨，給看守找樂子。[1]

人類復仇的欲望就跟“食色性也”一樣自然。對這點的表述，很少有人比波蘭作家塔德烏什·博羅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做得更為細膩也更讓人不寒而栗了。戰時的華沙，地下文化活動龐雜且活躍，形式包括辦學、辦報、排演戲劇和出版詩歌雜志，所有這一切都讓參與者面臨被關進集中營甚至立即處決的危險。因為在秘密刊物上發表自己的詩歌，博羅夫斯基于1943年被捕，先后被關進蓋世太保的監獄、奧斯維辛和達豪集中營，但每次他都能大難不死。達豪解放后，他作為流離人員在慕尼黑附近一座原黨衛隊軍營里被關了一段時間。他對當年置身骯臟環境、前途未卜的這段經歷的回憶，被收錄進《去毒氣室請這邊走，女士們先生們》這部以白描手法記述集中營生生死死的經典作品中。[2]

其中一則故事名叫《寂靜》。一名納粹狗腿子試圖越窗逃跑時恰好被一伙難民發現，他們協力把他逮住，然后開始“用貪婪的手撕扯他”。這時人群聽到有人走近，來者是管理難民營的美國軍人，便立馬把德國人推到一床草甸子上，還在他身上蓋了幾層厚厚的被子。難民營的最高長官是一名年輕的美軍軍官，為人很和善，制服燙得筆挺。他通過翻譯告訴眾人，自己十分理解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有多么痛恨德國人，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務必堅持依法辦事。即使被判有罪，犯人也必須在經過合理的程序后才能接受處罰，美國人會確保這點的實現。難民紛紛點頭示意，給這個美國老好人送上歡呼。祝他們晚安后，軍官伴隨著“一片友好的聲音”出門去巡視別的營房了。他剛走，德國人就被拖下床，在一頓踢打之后，死在了混凝土地板上。

解放后不多久出現這種事不足為奇，對于處于半解放狀態的難民而言亦是如此。據另一則資料顯示，盟軍解放者震驚于德國人的卑劣行徑，并不太堅持程序正義的原則。在達豪，黨衛隊看守被幸存者處以私刑，不是被淹死，就是被肢解、掐死或用鏟子砸死。與此同時，美國兵則站在一旁袖手旁觀。起碼有一次，某個囚徒在表明用意后，還從美國大兵那兒借來了刺刀，割掉了一個看守的頭顱。有時，美國兵會親自槍斃德國看守。還是在達豪，一名美國中尉用機槍處決了300多名守衛。他的憤怒可以理解；他方才在集中營焚尸爐前看到了堆積如山的囚犯尸體。[3]

1945年4月，一群德國護士首次進入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有名英國護士目睹了接下來發生的事。在受命照顧病情危重的幸存者后，她們走進一間醫院病房。一瞬間，“一群囚徒厲聲尖叫著向她們撲來，當中還不乏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們手拿刀叉，或從敷料車上一把抓起某樣工具，對著護士就是一通亂劃亂刺”。[4]

出了這樣的事，英國人就得出面保護這些德國平民，因為她們的存在對囚犯能否活下來至關重要。但要平息受害者正常的復仇欲望，抑制這種以牙還牙的野蠻正義，無論是盟軍軍人、流亡歸來的政府官員、福利組織成員，還是任何想要在這片備受摧殘的大陸上恢復些許秩序和常態的人，都感到十分棘手。然而，正如博羅夫斯基筆下那個無奈的美國大兵一樣，人們常常無力制止進一步的暴力行為，尤其是在那些因內戰四分五裂的國家。許多時候，他們決定放手不管，還有時候，他們甚至積極地協助復仇，而且助紂為虐的程度要遠遠超過達豪集中營里借給囚犯刺刀的那個美國兵。不過分地說，大部分有組織報復事件如果不是因為官方慫恿，根本不會發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會直接導致淫亂，大規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個體單槍匹馬的行為；相反，這需要有人領導和組織。

此外還需要恰到好處的時機。戰后比較讓人意外的一件事是，大部分德國人并沒有攻擊自己的同胞。柏林有個女記者曾是少數幾個積極抵抗納粹的德國人之一，戰后她在日記里寫道，人們已經“為報復準備就緒”。戰爭結束前最后幾個月里，許多德國人絕望無助，“即使是最蠢的蠢貨也明白自己被納粹騙得有多慘……”于是，她接著寫道：“如果在潰敗和盟軍攻占德國之間有三天時間的空隙，成千上萬對納粹失望透頂或被納粹欺侮過的人，一定會對他們的敵人展開報復，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施暴者。‘以眼還眼’，人們那時信誓旦旦。‘潰敗后第一個小時要長刀見血！’[[1]](#_1_Zhe_Li_De_long_knives_An_Zhi)但命運最后卻發生了轉折。”[5]

她說得沒錯，在外國占領下，德國人都過著苦日子，是這點阻止了他們自相殘殺。報復德國人的是其他人。

漢斯·格拉夫·馮·倫多夫（Hans Graf von Lehndorff）曾經是位于東普魯士城市柯尼斯堡、也就是如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一所醫院的院長，這座城市于1945年4月被蘇聯軍隊攻占。他在日記里用既十分清醒又帶著濃重宗教色彩的筆觸寫道：蘇聯軍人突襲了醫院附近一家酒廠，喝得爛醉如泥后，搖搖晃晃地闖進醫院病房，見到女人就強奸，而且不分老幼，不管是護士還是病人，致使一些受害者身受重傷，幾乎喪失知覺。一些女人不堪其辱，央求當兵的開槍打死她們，但一般只有在遭到屢次強奸后，蘇聯人才會成全她們，而多數時候這么做已經純屬多余了。

倫多夫不是納粹。事實上，他出身貴族世家，同許多親屬一樣，他對納粹也恨之入骨。他母親就被蓋世太保抓走了，有個堂兄因為參與1944年7月20日刺殺希特勒的行動而被處決。看著自己生活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女人被強暴，男人被殺戮，彈痕累累的房屋被洗劫一空，倫多夫博士不禁思忖著這一切的意義：“這更多的是源自人類原始的野蠻本性，還是報復心理？大概是報復心吧……他們四處搞破壞給人看，真是煞費苦心啊！……看看這些發了瘋似的孩子，也就十五六歲出頭，卻像餓狼一樣撲在我們的婦女身上，他們都不知道這么做究竟是為了什么。這跟俄國無關，跟任何國籍和種族無關——這是人類目無神明的結果，是對人性令人發指的展現。要不是這樣的話，這一切就不會如此刺痛人心——好比某人自己的罪孽。”[6]

這里流露出的情感十分虔誠，倫多夫說得一點也不錯，無論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權他們對別人恣意妄為，很容易甚至也很樂意做出喪盡天良的事來。但那些犯下傷天害理罪行的人，通常還自以為上帝或什么世俗圣人跟他們是一條戰線的。報復心很少是沒來由的，背后通常深藏著一段歷史淵源、個人恩怨或者集體仇恨。除了猶太人外，蘇聯人是德國野蠻暴行下最苦難深重的民族。死難人數之多難以想象——800多萬蘇聯軍人戰死，其中330萬是被故意餓死的。在炎炎夏日或冰雪寒冬，他們的尸首被扔在露天戰俘營里，任其腐爛發臭。另有1600萬蘇聯平民死亡。唯一接近這一數字的是，1000多萬中國平民在日軍占領下喪生。但這些只是統計數據，并未反映出歷史的全貌。跟謀殺和饑荒相伴相隨的是從不間斷的道德淪喪和羞辱。同其他斯拉夫人一樣，俄國人在納粹德國眼里屬于不完整的人，是德語里所說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像奴隸一樣給德國主子干活。而那些身子骨太弱、無法當奴隸使用的人則不值得給他們飯吃。納粹德國奉行一項名為“饑餓計劃”的政策，意在餓死蘇聯人，為德國人騰出更多的“生存空間”和糧食。如果這項恐怖的經濟計劃得到充分實施的話，將會造成幾千萬人死亡。

但復仇并不僅僅是因為憤怒或軍紀敗壞。被上峰粗暴對待的下級時而會拿平民撒氣。這從一個角度解釋了日軍在中國為何極其兇殘，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比如他們認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眾所周知，蘇聯軍人要忍受長官、政委和秘密警察的百般虐待。但這種情形后來大為不同了。德軍被迫從蘇聯境內撤出后，蘇聯紅軍一踏上德國領土，就被明確告知要無惡不作。蘇德邊境上的路牌用俄語寫道：“士兵，你現在到德國了：狠狠報復希特勒的那群狗崽子們。”[7]諸如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這樣的宣傳家，天天在他們耳邊鼓吹：“如果你一天下來連一個德國人都沒殺，你這天就算白過了……如果你殺了一個德國人，那就再殺一個——因為沒有什么比德國人的尸體堆積如山更讓我們開心的事了。”格奧爾吉·朱可夫元帥在1945年1月公然下令稱：“殺人犯的國家要倒霉了。我們要為自己經歷的一切狠狠地還以顏色。”[8]

蘇聯兵多年來頂著“劣等人”這一帽子，可謂受盡了侮辱。況且他們多數都在可怕的戰爭環境下失去了親友，因此做壞事根本不需要有人鼓勵。此外還有另一層因素。蘇聯人早先接受了資本主義吃人本性的宣傳，現在有機會訴諸暴力，革資本家的命了。讓蘇聯兵訝異的是，即便在遭受轟炸的城市和戰時缺衣少食的艱難局面下，德國百姓的生活相對也要富足多了；相形之下，他們有人甚至還沒見過電是個什么玩意，怎么用的，更別提諸如手表這樣的奢侈品了。貪婪、民族仇恨、階級嫉妒、政治宣傳、歷歷在目的德國暴行，所有這些都加劇了對復仇的渴望。正如某位蘇聯軍官所言：“我軍越是深入德國境內，就越是對隨處可見的富足景象感到憤慨……我真想一記老拳狠狠砸爛那一排排整齊的瓶瓶罐罐。”[9]

即使這種情緒并非源自復仇的欲望，也可能誘發強烈的攻擊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一周，蘇聯紅軍揮師南下，入侵中國東北，之后蘇聯軍人便在諸如哈爾濱、奉天（沈陽）、新京（長春）等東北的主要城市大肆燒殺搶掠。本來，蘇軍沒有理由對這些城市里的大量日僑展開報復，更別說針對中國人了。日本從未入侵蘇聯一寸領土。盡管在1905——1906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曾讓俄國人恥辱性地吃了敗仗，但當時的戰場正是日后的偽滿洲國領土。日本僅有一次犯渾，愚蠢地主動進攻蘇聯，那是在1939年，但在蘇蒙邊境上被打得潰不成軍。[[2]](#_2_Ji_Nuo_Men_Han_Zhan_Yi)然而，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的行徑，卻如同15世紀的西班牙征服者。

和東歐的日耳曼族一樣，日本平民完全無依無靠，原因也一樣：如同大部分逃往西方的德國黨衛隊軍人、國防軍軍官和高級納粹官員，日軍將領和政府官員霸占了最后幾班開往碼頭的列車，然后乘上船逃回日本了，棄大批平民于不顧。這意味著大約200萬日本人被困在東北，無人保護。許多人是1932年東北建立了偽滿政權后陸續移民到這片新大陸來的；日本政府積極地鼓勵國人外遷，為國內農村人口謀求“生存空間”。在奉天、新京、吉林和哈爾濱這些城市，出現了成片的日本社區，銀行、鐵路、百貨商店、學校、美院、電影院、餐館等設施，全部由日本人經營，也只服務日本人。在農村，為了給日本定居者騰地方，中國人被趕出家園。所有這一切在日本官方的宣傳中都得到了美化，這是大東亞共榮的需要，為的是建立一個美麗的新東方，它更加現代，更加高效，而且在日本主子的統治下，比西方帝國主義舊秩序更加公平。

有些中國人眼看日本戰敗了，趁火打劫去搶日本平民。他們有理由感到憤憤不平。因為在日本關東軍扶植和控制的偽滿洲國，中國人被當做三等公民，地位比朝鮮人還低，幾乎只要是個日本人就可以隨意擺布他們。然而在許多日本人的記憶里，蘇聯人遠比中國人要壞。比如有人回憶：“他們開著槍，闖進日本人家中，看到什么新奇玩意就搶，見到瞧得上眼的女人就強奸。”[10]

南下逃難、躲避蘇軍的日本人通常只能徒步，他們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食物很快吃光了，長滿虱子的軀體爆發了斑疹傷寒。嬰兒被活活悶死，以防哭聲引來一心尋仇的中國人、朝鮮人和蘇聯兵。父母把年幼的孩子出讓給中國農民，希望這樣他們至少能活下來。總的算來，11000多名日本殖民者在這段苦難歲月中丟掉了性命，其中差不多1/3的人選擇了自殺。

有關蘇聯人殘暴成性的小道消息不脛而走，逼著日本人祭出老法子來巴結蘇聯紅軍。在毗鄰中國東北和朝鮮邊境的安東市[[3]](#_3_Ji_Jin_Ri_De_Liao_Ning_Sheng)，日本僑民決定成立歡迎委員會，迎接蘇軍的到來。日本孩子發到了小紅旗，火車站豎起一座拱門，上面掛滿了紅旗和表達與蘇聯誠摯友誼的標語。當地的日本名流還準備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致辭。他們等啊等，等啊等。孩子們等得都睡著了，手里還捏著紅旗。直到夜深了，日本人才得知，紅軍決定改道，所以暫時還不會來安東。

對于中國人在蘇聯人手里遭的罪，日本人的回憶錄傾向于避而不談，不過事實上的確是日本平民的下場更慘一些。他們有錢，或被認為有錢，這點顯然成了慫恿別人對他們下手的理由。之前引述過的目擊者回憶道：“蘇聯兵在城里耀武揚威，好像地方是他們的一樣，他們兩條手臂上都戴著手表，肩上挎著照相機，軍裝口袋里還插著一排自來水筆。”[11]跟在德國的蘇聯人一樣，許多來到東北的蘇聯兵對現代社會的標志物十分陌生。手表不走了，是因為新主人沒有上發條，但蘇聯兵會憤憤地把表扔了——結果被中國頑童撿到，拿到黑市上去賣。一些當兵的看到天花板上吊著的電風扇害怕得不得了，端起槍就打。

退一萬步說，如果不是受到官方鼓勵，或當官的率先帶頭，蘇聯軍人搶劫平民的行為還不至于到達這種空前的規模。跟大肆洗劫日本工廠、礦場、鐵路和銀行相比，偷幾塊手表又算得了什么呢？蘇聯人唯一能為他們強盜行徑正名的說辭——他們倒并不十分致力于為自己開脫——是將其定義為反法西斯人民戰爭的固有權利。而在共產主義宣傳里，法西斯就是資本主義的延伸。盜竊是革命計劃的一部分。總而言之，除非是窮當兵的一下子掉到富人堆里后油然而生的恥辱感，否則羞恥心并不太能解釋蘇軍在中國東北的所作所為。德國的情況不太一樣，在那里，蘇聯人的暴力惡行更加肆無忌憚。

對于德國人的侮辱，最好的回擊方式就是還以顏色，強奸女人，而且還得是在公開場合強奸，當著束手無策的男人的面強奸。這是人類沖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種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國人特有的做派。在這點上，漢斯·格拉夫·馮·倫多夫醫生說得沒錯。但作惡的人為他們行為的辯護總是不盡相同的。兩國人民的貧富差距，以及納粹的種族主義，導致了一種互相敵視的惡性循環，這才使得蘇軍在德國尤其殘暴。德國人被號召寧可戰死，也不能讓他們的女人落到“亞洲”或“蒙古”蠻夷的手里受辱。德國人越是頑強抵抗，“蠻夷們”就越是想要把他們遭受的暴行加倍奉還，這種暴行的惡劣性要遠勝于他們對德國人所做的任何事。但在這里，報復依然同對抗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德國女人在蘇聯宣傳里不僅被描繪成跟男人一樣壞的納粹，而且還都是腦滿腸肥、養尊處優、富得流油的納粹。在一部俄國漫畫里，一個有錢的德國女人同她的女兒和傭人一起被包圍在一堆從俄國搶來的戰利品中間，慌忙之中，她們四下尋找能用作投降白旗的東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軍雜志里出現的臉譜化的德國女人（維羅妮卡·唐克肖恩[[4]](#_4_Veronika_Dankeschon_Dankescho)小姐），則清一色體態豐腴，金發碧眼，裙子上繡著納粹黨徽。唯一的區別在于美國大兵受過警告，要他們離維羅妮卡小姐遠點，免得患上性病。反觀蘇聯人，則是受到慫恿，把德國女人當成他們的自用品，想用就用。正如一幅蘇聯漫畫描繪的那樣，一位俄國奴仆告訴她曾經的女主人：“等著瞧啊，太太，輪到我來收拾你了。”[12]

他們的確收拾了。《柏林女人》一書的佚名作者用具體到讓人頭皮發麻的筆觸，敘述了女人們所遭受的侮辱。施暴者對她們的厭惡之情，在先前那個想要一拳砸爛德國小資產階級家庭里擺放整齊的便宜貨的蘇聯兵身上也流露過。作者曾屢次遭到強奸，有一次，一個蘇聯兵正對她施暴，其余的則在一旁等著輪到他們。她注意到這個施暴者瞧都不瞧她一眼,不僅如此，她還成了他的泄憤對象，“他把我突然扔到床上時，特別嚇人……我感到有手指在扯我的嘴角，這時我聞到了一股馬匹和煙草的臭氣。我睜開眼。那人的手指老練地掰開我的下巴。我們目光交匯，接著這個壓在我身上的男人吐下一口唾沫，吐進我嘴里……”[13]

強奸德國女人，特別是那些看似腰纏萬貫的富戶，讓飽受歧視的“劣等人”覺得自己又像男人了，而且最好還要當著雄風不再的昔日“主宰者民族”斗士的面這么干。拿柏林一名蘇軍高級軍官的話來講：“在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最初時刻，我軍的小伙子們毫無疑問從凌辱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的女人當中獲得了些許滿足。”[14]然而，在勝利之初的喜悅退去后，奸淫之風依舊在延續。發展到最肆無忌憚的時候，官方對此根本不加約束，針對德國婦女的奸淫一直持續到1945年夏天。在這之后，蘇聯的軍職和文職干部嘗試過進行打擊，多少算是有一搭沒一搭地管過。強奸犯有時面臨包括死刑在內的嚴厲懲處。事實上，被蘇聯兵強奸的風險只有等到1947年蘇聯軍人被關進軍營后才真正宣告消失。

\* \* \* \* \*

如果說洗刷屈辱、恢復男性驕傲的想法，是驅使蘇聯軍人在德國四處施暴的一種說得通的解釋，那么這一說法或許同樣能夠解釋，為什么那些遠沒有蘇聯人苦大仇深的人也圖謀報復。1944年，戰爭尚未結束，法國就爆發了所謂的“狂野清洗”（l’épuration sauvage）運動。在此期間，多達6000人因為在德占期通敵賣國被殺，處決他們的武裝力量形形色色，都和抵抗組織有聯系，而且常常能看到共產黨的身影。另外，還有兩倍于這一人數的女人被扒光衣服游街示眾，她們的頭發被剃得精光，身上涂滿了納粹標志。人們譏笑她們，朝她們吐口水，有的還橫加折磨。有些女人被關在臨時設立的監獄里，結果遭到獄頭強暴。共有2000多名女性被害。類似的情景還發生在比利時、荷蘭、挪威等從德國占領下獲得解放的國家，雖然規模完全不可相提并論。有時，一心復仇的暴民會用老法子，在這些赤條條的女人身上澆上瀝青，插上羽毛。

女性通敵的形式大多涉及出賣肉體。跟叛國罪不同，這種罪行之前在任何法典里都不存在。人們可以斥責其有失體統、自私自利、傷風敗俗，但充其量就是行為不檢點，構不成犯罪。所以，1944年法國訂立了一部新法，專門用于處置這類情況。那些有不愛國行為——譬如和占領軍上床——有辱國威的人，被判犯有“喪失國格罪”（indignité nationale），并剝奪其公民權。

1945年5月后，法國國內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男女，均遭到秋后算賬，而且手段通常極端暴力。許多人被判賣國罪；其他的除了因個人恩怨挨整外，也有政治原因，比如當事人曾跟共產黨作對的話，也會遭到整肅。但公眾的一腔怒火卻主要撒在了被控犯有“橫向通敵”罪的女人身上，這不僅有失偏頗，而且經常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同樣，這點也可以通過普遍的恥辱感得到部分解釋。對于法國臣服于強大德軍這一事實，人們的描繪常常具有性意味。不可一世的德軍象征著一個強大、陽剛的民族，把孱弱、墮落和陰柔的法國打得甘拜下風，俯首稱臣。笑嘻嘻的法國女郎（française）坐在德國鬼子（Boche）的膝蓋上，呷著上好的法國香檳，這一畫面就是橫向通敵的寫照，是最刺痛人心的屈服外敵的象征。所以女人就成了極盡羞辱和懲罰的對象。

確切來講，早在1944年4月，也就是光復和“狂野清洗”前夕，法國女人就已破天荒地被賦予了投票權。下面幾句話，摘自抵抗組織報紙《厄爾河愛國者》（Le Patriote de l’Eure）發表于1945年2月的一篇文章，其內容很能反映當時的人們對向敵人投懷送抱的女人的態度：

不久之后，我們就會看到這些女人跟我們勇敢的法國女同胞、忠誠的母親和戰俘的妻子肩并肩，一起投票了。但對于那些曾經嘲笑過我們、威脅過我們、在德國鬼子的懷抱里神魂顛倒的人，我們絕不容許她們來決定涅槃重生的法國的命運。[15]

將縱聲浪笑、神魂顛倒的蕩婦和深明大義的母親和戰俘的妻子一對比，人們不僅感到了恥辱，強烈的清教徒傾向也被喚醒了。“橫向通敵者”不僅不愛國，而且還威脅到資產階級家庭的傳統道德觀。再加上紅眼病這層素來加劇怨氣的因素，義憤填膺就真的變得一觸即發了。從這些惡女人受到的控告來看，有一點總是不甚清楚，到底哪項罪狀更重？是性生活不檢點，還是跟德國人睡覺換來物質好處？上錯床已經夠可恥的了，但過著比所有人都好的日子，更加重了這一罪名。波爾熱夫人（Madame Polge）是尼姆（Nimes）當地一個著名足球運動員的太太，從她的凄慘下場中就可見一斑。

占領期間，波爾熱夫人成了當地一位德軍指揮官的情婦，他有一個典型的法國姓氏，叫圣·保羅（Saint Paul）。她用身體換取各種各樣的物質好處。據當時一份報紙《大眾報》（Le Populaire）報道，波爾熱夫人“承認每天都讓人送來兩到三升牛奶，另外，每周還能吃到兩三次新鮮野味。她把家打理得漂亮而溫暖，還有條件做頭發，卻從來不必付一分錢……與此同時，工薪階層的居民和他們的孩子卻都快要餓死了……”[16]波爾熱夫人后來被判死刑。她被剃光了頭，扒光衣服綁在車上游街，車子開往刑場。行刑后，她的尸體被公開示眾，尼姆的正義之士朝她吐口水，用掃帚柄戳她。死后還被人這般侮辱簡直如同現代女巫。

那些最熱衷于迫害“德國鬼子的娘們”（filles de Boches）的人在戰時一般并沒有什么特別的英勇之舉。曾經淪陷的國家一旦光復，所有人都試圖標榜自己是抵抗組織成員，戴著新弄到的臂章，端著斯登式沖鋒槍，一副趾高氣揚的派頭。他們四處追捕叛徒和站錯隊的女人，在扮演英雄的戲碼中樂此不疲。過去，因為懾于危險，沒有挺身而出，如今報復便成了掩飾良心不安的一種做法。這種現象具有普遍性，而且穿越時空。正如具有真正英雄氣概的波蘭異見分子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1989年后抗議迫害前共產黨員時所寫的那樣，他過去沒做過什么虧心事，所以現在也沒必要靠手指別人來證明自己是個英雄。這種人性化的立場一直都很少見，1945年時就更少了。

貪婪、偏見和良心不安也許能為我們解釋1945年最喪心病狂的一種報復——針對波蘭猶太人的迫害。在波蘭，歷史悠久的猶太社區幾乎被趕盡殺絕。300萬波蘭猶太人在納粹占領期間遇害，不是被槍決就是被送進毒氣室，而且這些罪行大都發生在波蘭領土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靠著波蘭義士的藏匿，或流亡到蘇聯的邊遠地區，才幸免于難。這些身心受到雙重傷害的幸存者在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親友后，步履蹣跚地回到老家，回到他們生活過的村莊，卻常常發現他們成了不受待見的人。更糟的是，他們常遭人威脅，被轟出家鄉。他們的房子被人鳩占鵲巢。猶太教堂被毀。很久以前留下的財產業已遭竊，多半是昔日鄰居所為。很少有人愿意退回贓物。

這些事也發生在歐洲其他地區。相當一部分猶太人在返回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和巴黎后發現他們已經無以為家。但在波蘭，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猶太人還面臨著人身威脅。曾經發生過猶太家庭被人拽下火車，財物被一搶而光，然后人被當場殺害的事件。在1945年夏到1946年之間，1000多名猶太人在波蘭遇害。即使在城市，他們也并不總是安全的。

1945年8月11日，一則猶太人在猶太教堂里殺害基督徒兒童的謠言開始在克拉科夫傳播開來。這是由來已久的反猶主義流言的升級版本。人們陰惻惻地說猶太幸存者在用基督徒的血來讓他們元氣大傷的身體恢復健康。很快，一群暴民便聚集起來，在警察和民兵的帶領下，襲擊猶太教堂，洗劫猶太人的家。男男女女和孩子在街上遭到毆打。一些人（具體人數不詳）還丟了性命。對于剛從種族滅絕中撿回條命的人來講，這不啻一次血腥的排猶暴動（pogrom）。受了重傷的猶太人被送進醫院，有些在等著動手術的時候又遭到暴打。一位女性生還者回憶道：“有兩個負責護送我們的士兵和護士說我們是猶太人渣，說我們是殺害孩子的劊子手，要不是迫不得已，他們才不會救我們，相反，我們都應該被槍斃。”另一個護士發誓手術一做完就要把猶太人都碎尸萬段。醫院里還有個鐵道工人揚言：“作為一個波蘭公民，如果連揍一個毫無還手之力的人的勇氣都沒有，那可真是太可恥了。”[17]此君說到做到，后來真的痛揍了一個受傷的猶太人。

波蘭人同樣在德國占領下飽受煎熬。他們跟俄國人一樣被視為“劣等民族”，因而遭到了奴役，首都被夷為平地，另外還有一百多萬非猶太裔的波蘭人被殺。決定在波蘭領土上建造滅絕營的是德國人，為此我們不應譴責波蘭人。然而，波蘭人的所作所為似乎是在拿一個更加多災多難的民族開刀，發泄自己所受的冤屈。

一種普遍的說法是，波蘭人的報復源于猶太人要為共產主義壓迫負責這一看法。當蘇軍占領波蘭各地的時候，一些猶太人希望他們可以保護自己免受波蘭反猶分子或者殺心更重的德國人的傷害。對于一個弱小的少數民族來講，作為民族主義對立面的共產主義，長久以來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所以，因所謂的“猶太共產主義”而報復猶太人，客氣地來講，也是不分是非。事實上，政治分歧可能根本不是報復的主要根源。因為大多數猶太人戰后遭到襲擊并不因為他們是共產黨，而僅僅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何況，在盛行的反猶主義傳說里，猶太人不光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有關系，和資本主義也有牽連。人們認為他們很有錢，比別人富有，甚至握有特權。共產黨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排猶，這就是為什么多數波蘭猶太生還者最后都離開了這個他們出生的國家。

雖然大部分波蘭猶太人實際上生活得清貧，但他們財富過人這一印象依舊揮之不去。這和良心不安有一定關聯，奇怪的是，抹黑猶太資本家的共產主義宣傳有時卻能緩解良心上的不安。波蘭人自然無須對德國的屠猶計劃承擔罪責，但他們當中的確有不少人駕著馬車候在猶太隔離區邊上，就等猶太人被屠戮殆盡后，瞅準機會進去撈上一筆。另一些波蘭人和許多歐洲人一樣，在房子和公寓的合法主人被帶走并殺害后，興高采烈地搬了進去。

在一些地方，特別是波蘭東北比亞韋斯托克（Białystok）周圍的村落，波蘭人自己也參與了屠猶。1941年7月，拉齊羅夫村（Radzilow）的猶太人被關在一間大谷倉里活活燒死，他們的波蘭同胞卻在外四處奔忙，在包里塞滿搶來的贓物。一名目擊者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這樣說道：“當波蘭人開始圍捕和追趕猶太人時，洗劫猶太家庭的行動也同時開始了……人們瘋了，他們破門而入，撕碎被褥；空氣里盡是羽毛，他們只顧裝滿麻袋跑回家，再返回時袋子又空了。”芬基爾施泰因（Finkielstejn）一家設法逃脫了。重返家園后，他們請求牧師為他們改宗，也許這樣活命幾率更高。這家的女兒哈亞（Chaja）回憶起村民的談話：“他們總會談論一件事：誰搶了多少東西，還有就是猶太人如何如何有錢。”[18]

我們也不能忘記，一些波蘭義士有著截然不同的壯舉。藏匿或協助猶太人活命要冒巨大風險，不光會威脅施救者自己，而且還會連累家人。如果一個人在西歐國家因為幫助猶太人被捕，等待他的將是被送往集中營。在波蘭，被捕意味著絞刑。然而，仍然有猶太人得益于波蘭義士的非凡勇氣而保住了性命。猶太孩子被人收養，多戶人家被藏匿起來。在一起著名的事例中，有個名叫利奧波德·索哈（Leopold Socha）的蟊賊帶領幾戶猶太家庭在利沃夫市（Lvov）的下水道里躲藏了一年之多。20多個人在暗無天日的地下，靠吃索哈提供的面包皮活了下來。在一片漆黑中，他們驅趕老鼠，且不止一次因為暴風雨倒灌下水道差點被淹死。當他們最終從窨井蓋下鉆出來時，臉色蒼白，形同枯槁，身上沾滿了糞便和虱子。地上的人們驚訝地發現居然有猶太人還活著。幾個月后，索哈死于一起事故。一個喝醉酒的蘇軍卡車司機軋死了他。鄰居們竊竊私語，說這是因為他幫助猶太人，遭了天譴。[19]

這也許是戰后波蘭社會最讓人震驚的一點。救過猶太人的人被苦口婆心地勸告不要談論索哈的義舉。這不光是因為上帝會懲罰那些幫助“殺害基督的兇手”的人，而且也是出于會遭人算計的擔心。鑒于猶太人在公眾眼里都是闊佬，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救命恩人定會得到大筆酬謝。所以任何承認窩藏過猶太人的人都極易遭到搶劫。

就算他們早已長眠地下，還是有人惦記猶太人身上可能還藏著什么值錢的東西。1945年秋天，當年奪去80多萬猶太人生命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成了一片泥濘的萬人坑。當地的農民開始挖掘死人頭骨，盤算著還能從上面拔下幾顆被納粹忽略的金牙。數以千計的人或是拿著鐵锨刨土挖坑，或是在成堆骨灰間翻來找去，愣是把亂葬崗變成了一片滿是深坑和碎骨頭的巨大泥淖。

需要強調的是，波蘭人并不是唯一這么做的。貪欲是野蠻占領的普遍結果，不計其數的歐洲人都染上了這種毛病。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就曾寫道：“納粹對于生命和軀體的漠視臭名昭著，無可辯駁；但他們處置財產的做法倒可能算得上是對重塑戰后世界最重要的遺產。”[20]誰都可以搶猶太人的財產，這點是引發暴行的重要推手。波蘭的特殊之處在于掠奪的規模之大。戰爭中涌現出一批全新的階級，他們發跡靠的完全是侵占那些被殺害或被趕出家園的業主的財產。持久的負罪感可能導致他們變本加厲。

當時一份波蘭周刊《復興報》（Odrodzenie）在1945年9月就一針見血地表示：“我們知道，在這個國家，一個全新的社會階層——新生的波蘭資產階級——業已形成，不夸張地說，其往往占據了被害猶太人的位置。而且大概因為手上能聞到一股血腥味，這個階層的仇猶情緒比以往更為強烈。”[21]

這一觀點比任何其他說法都更好地解釋了，為什么希特勒帝國的主要受害者有時還會遭到血腥報復。搶劫猶太人從某種方面來看是宏大社會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同蘇聯人一樣，如果不是因為波蘭官僚和警察隊伍里位高權重的機會主義者時而心照不宣的縱容——更多時候是積極的慫恿——這類報復就不會發生。共產黨主導的波蘭政府在1945年并未出臺把猶太人趕盡殺絕的官方政策，但只要有中間派的鼓勵通常就夠了。

\* \* \* \* \*

渴望復仇的波蘭人如果希望把矛頭對準德國人就更容易理解了。但這么做部分也是緣于階級斗爭的需要。幾個世紀以來，德國人在西里西亞（Silesia）和東普魯士這些如今已被劃為波蘭國土的地區扎下了根。像布雷斯勞（Breslau，今天的弗羅茨瓦夫，Wrocaw）和但澤（Danzig，今天的格但斯克，Gdansk）等大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德國人。城市精英階層，比如醫生、銀行家、教授和商人等都講德語。1945年，在蘇軍入侵的原德國領土上依舊住著400多萬德國人。另外有差不多400萬人在聽聞俄國人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后，已經逃往西方。早在1945年5月之前，驅逐剩余德國人的方案就已成型。1941年，身在倫敦的波蘭流亡總理西科爾斯基（Sikorski）將軍就曾宣稱：“德國人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往東部遷徙和滲透。他們理應被摧毀，并且被迫遠遠后撤（至西方）。”[22]

這一政策得到了盟軍首腦們的許可。更惡劣的還在后頭，斯大林建議波蘭共產黨“創造一些條件，讓德國人自己想要逃命”。丘吉爾也在1944年12月告訴英國下院：“驅逐這一辦法在我們現在看來，最令人滿意，也最一勞永逸。”[23]

只要蘇聯紅軍能控制局面，波蘭人多少還不會急著沖鋒陷陣。麗布薩·弗里茨——克羅科（Libussa Fritz-Krockow）是波美拉尼亞地區（Pomerania）一戶顯赫的地主人家的小姐。據她回憶，有時在俄國人手下，全家人反而感覺受到了保護，即便還是同一伙俄國人，“要為大部分強奸和搶劫行為負責”。但是，她認為：“他們對我們施暴，無論將其解釋為以眼還眼的法則，得意忘形，還是征服者的權利，多少還能讓人理解。相反，波蘭人純粹就是群跟風之徒。他們奪權后是另一幅嘴臉，行事陰沉，偷偷摸摸的，甚至還有點見不得人，比赤裸裸的武力壞得多了。”[24]

克羅科一家不是納粹。作為他姐姐麗布薩回憶錄的作者，克里斯蒂安·馮·克羅科（Christian von Krockow）屬于自由派人士，他很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家的苦難是“我們德國人自己瘋狂的結果”。[25]但麗布薩的話里也許還帶有一絲瞧不起波蘭的偏見或挖苦之意，甚至還可能讀出一種遭人背叛的感覺。她的這種情緒并不罕見。一位德裔新教牧師赫爾穆特·里希特（Helmut Richter）也曾表達過同樣的看法。他一直認為波蘭人老實巴交，本性純良。畢竟，德國人過去對他們難道不好么？但事到如今他總算認出了“這些東歐人的頑劣本質”。長久以來，波蘭人只要“頭頂上有只拳頭”，就會表現得規規矩矩，但“有朝一日他們有機會爬到別人頭上作威作福了”，就變得“野蠻了”。[25]這是殖民者談論原住民的一貫口吻。然而，與大部分歐洲列強在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不同的是，這一事例中，許多曾經的殖民者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原住民，只是他們屬于特權階層。

總之，波蘭人可不希望蘇聯軍隊在征服地區多待哪怕一會兒，這些地方如今已經是波蘭國土了。大舉驅逐德國人和由此而來的人口遷徙固然殘酷，但這是幾個大國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的決定，所以不能統統歸結為波蘭人的報復。有200多萬屬于“議會波蘭”的波蘭人（Congress Poles）[[5]](#_5_Na_Po_Lun_Zhan_Zheng_Hou__Sha)從波蘇邊界以東——也就是今天的烏克蘭——遷移到西里西亞等地，那里的德國人基本上已經被清除殆盡了。于是他們就占據了德國人的房子，頂替了德國人的工作，接收了德國人的資產，這一過程很少是和風細雨的。

當然了，種族清洗并不是1945年才出現的，希特勒為了給德國移民騰地方，在西里西亞等邊陲地區驅逐并屠戮猶太人。但圍繞爭議領土的矛盾其實要久遠得多。與多數血腥的族群報復相似，在希特勒排波排猶之前，當地歷史上還爆發過內戰。1918年，德國和奧匈帝國戰敗后，兩國在西里西亞的領土面臨著重新劃定的命運。其中一部分后來被判給奧地利，一部分劃給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德國也各分到了一部分。然而，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到底歸誰依舊懸而未決。當時上西里西亞存在著一股強大的獨立運動浪潮，獲得了當地波蘭人和德國人的支持。但協約國在1919年決定，有必要進行全民表決，裁定這片領土到底歸波蘭還是歸德國。這一決定導致了嚴重的流血沖突。全副武裝的波蘭民族主義者到處攻擊德國人，在離奧斯維辛（波蘭語里叫Oswiecim）不遠的卡托維茨（波蘭語里叫Katowice）周圍的工業區，這一現象尤為嚴重。這些襲擊招致了兇殘的德國冒險分子更為血腥的報復，他們隸屬于自由軍團（Freikorps）這一極端民族主義的準軍事組織，其成立于德國戰敗后的1918年末，是醞釀日后納粹運動的溫床。他們的口號蠱惑人心，其中有一句叫“黑紅金飄揚！粉碎波蘭幫！”[[6]](#_6_Hei___Hong___Jin_San_Se_Shi_D)上西里西亞的大多數人投票支持德國管轄，這一決定引發了更多的流血事件。最后，上西里西亞的一部分終究還是劃歸給了波蘭。但即使時過境遷，世界已經來到了1945年，波蘭人對當初依舊記憶猶新，而且在經歷了納粹占領期的種種對待后，記憶只會更加刻骨銘心。

約瑟夫·赫尼施（Josef Hoenisch）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上西里西亞。由于他從未加入過納粹黨，他滿以為1945年留下來應該很安全。他錯了，蘇聯人走后，波蘭民兵取而代之，逮捕了他。民兵審訊赫尼施時，問他是不是納粹，他回答不是，結果被人踢臉。他被踢打了好一會兒，渾身是血，然后被拖進一個寬6英尺、長9英尺的牢房，牢里還有其他九個德國囚犯，擠得都快沒地兒站了，更別說找地方坐了。據赫尼施回憶，波蘭民兵威逼被俘的男男女女脫光衣服，看他們互毆，以此為樂。過了八天，赫尼施竟在獄中見到了昔日同窗、波蘭人格奧爾格·皮薩切克（Georg Pissarczik）。他是個輪轂匠，1919年參加過爭奪上西里西亞的內戰，和德國人打過仗。現在皮薩切克終于有機會報復了。現在這個德國佬可總算要遭報應了。但是，這一故事后來的轉折頗具西里西亞的意味。兩人重逢后，老同學告訴皮薩切克，1920年代早期赫尼施的父親曾幫助他父親謀得了一份工作，那時沒有一個德國人愿意雇傭波蘭人。都這么說了，皮薩切克難道還能不知恩圖報么？四周后，赫尼施獲釋了。

不幸的是，赫尼施的故事跟不少德國受害者的回憶一樣，都對別人的苦難表現出一種讓人費解的麻木不仁。他感嘆自己真是幸運，沒在獲釋后被送去奧斯維辛、這個“出了名的波蘭死亡營（戰后歸波蘭人管轄）”，“沒有德國人能從那兒活著出來”。[27]同樣的措辭在德國保守主義者的文字里也不難見到。1945年，軍人作家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在日記里就提到了俄國的“滅絕營”，并將“反日耳曼主義”和反猶主義相提并論。他寫道，報紙正在“縱容”反德情緒，“像淫亂一樣亢奮”。[28]

但是，即使是在最顧影自憐的德國人的陳述里，也鮮有波蘭人沉湎于自發性集體報復的證據。但很顯然，許多無辜的德國平民被莫須有地定性為納粹，或因曾加入過黨衛軍，遭受了非人的對待。通常，設在原納粹集中營拘禁所里的景象最為慘烈。西里西亞的德國人，如果拒絕成為波蘭公民，將會失去公民權。但他們又不會講波蘭語，所以本來就無從選擇。失去權利的人在任何民兵或低級官員面前都只能任人宰割。在集中營里，只要聽不懂波蘭語，或者點名時跟不上就可能招致一頓暴風驟雨般的拳頭和亂棍，或者更糟。

麗布薩·弗里茨——克羅科把家里的地毯拿出來賣，買家是波蘭市長的太太，這個女人過去好幾次從她手里買過東西，都是貴重物品，但只給一丁點兒錢。這次，麗布薩被民兵逮了個正著。法律禁止德國人出售財產。犯了法的麗布薩被上了枷鎖，這樣人們就可以朝她臉上吐唾沫。但是，據她回憶，“德國人過馬路的時候，波蘭人基本上只是清清嗓子，或朝地上吐口水”。[29]

針對德國人的暴力事件中最惡劣的一些毫無疑問都是民兵干的。他們掌管著集中營，對囚犯用刑，想殺就殺，還給人上枷鎖，有時這么做毫無理由。民兵組建得很倉促，成員中不乏惡貫滿盈的波蘭人，常常有一些年紀很小的罪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劊子手當屬切薩羅·金博爾斯基（Cesaro Gimborski），他是蘭姆斯多夫（Lamsdorf）集中營的司令官，年僅18歲。他曾下令處死過6000人，包括800名兒童。金博爾斯基就像一個撕掉蒼蠅翅膀并樂在其中的小毛孩，從各種記載來看，他十分享受大權在握的感覺。

一些最心狠手辣的民兵過去是德國集中營的幸存者，報復心必然會驅使他們痛下殺手。但需要重申的是，嗜血心理其實受到了物質和階級嫉妒的激化。教師、教授、商人和其他上流社會的成員成為眾矢之的。波蘭看守在得到德國叛徒的大力協助后，特別熱衷于拷打有地位有身份的囚犯。一位關押在蘭姆斯多夫的教授就這樣被活活打死，原因僅僅是他戴了副“知識分子的眼鏡”。這些年輕守衛和他們偏愛的施暴對象，讓人不禁聯想起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或者中國的紅衛兵。讓小青年把老師和其他權威人物樹為標靶、加以圍攻從來就不是一件難事。在這一事例中，族群沖突的歷史加劇了人們施暴的欲望。

在舊奧匈帝國的其他地區，也發生過差不多一樣的事情。1919年，德語區的居民先是被置于非日耳曼人主導的政府掌控下，而后成為了希特勒帝國里的特權公民，最后又被昔日的鄰居、員工，有時甚至是朋友趕出了家園。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夠了各種報復的德國人一致認為，對他們最兇的莫過于尚未成年的小孩，他們受了成年人的蠱惑，其中一些的確是苦大仇深。不少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希特勒1938年吞并蘇臺德地區（Sudetenland）后吃了不少苦頭；有些在經歷了達豪、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等德國集中營后大難不死。同上西里西亞的情況相似，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仇恨是其來有自的，最早可以追溯至17世紀，當時篤信新教的波希米亞貴族曾被天主教神圣羅馬帝國一網打盡。自此，德國人就爬到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頭上。非德國人則只能做奴仆，或者農民。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的夏天同樣也是追求階級和族群報復的好時候，而且上層也鼓勵下面這么做。

戰時的捷克流亡總統、民族主義者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曾想建立一個各民族和諧相處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他認定必須一勞永逸地解決德國問題。1945年，他在電臺廣播里宣布：“災難，災難，災難，德國人要領受三倍的災難！我們要讓你們完蛋！”[30]自4月起，政府在之后的三個月里接連頒布了數條法令，剝奪德國人的財產權，還建立了“特別人民法庭”，用以審判納粹戰犯、叛徒和為虎作倀的人。到了10月，所有行為有損“國家榮譽”的人——這也包括所有德國人——都將接受處罰。

如果官員授意讓捷克人對手無寸鐵的人下手，他們也會和別人一樣無惡不作。在布拉格等城市，人們設立審訊室，對犯人大刑伺候。有黨衛軍嫌疑的人被吊在路燈燈柱上。1萬多名德國平民被塞進斯特拉霍夫足球場，接著機槍對準他們掃射，為的只是尋開心。捷克也組建了同波蘭民兵相同性質的革命衛隊，年輕的流氓阿飛在得到官方許可后，盡情地將他們的暴力幻想付諸實踐。他們帶領暴民，不是在街上用石頭砸德國人，就是騷擾曾經屬于特權階級、戴著“知識分子眼鏡”的德國公民。他們有軍方撐腰，而且剛獲釋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也站在他們這邊。

那年夏天，暴力浪潮如同歐洲各地的性放縱一樣如火如荼，后來才漸漸退去，新秩序得以建立。在這之前，要想知道那狂野的幾個月里都發生了些什么，光從一個故事中就可見一斑，而且這還算不上是最可怕的故事。這是發生在德國女演員瑪格麗特·舍爾（Margarete Schell）身上的真人真事。舍爾出生在布拉格，戰前在劇院和電臺的表演讓她出了名。5月9日，4名革命衛隊士兵逮捕了她，其中一人是她家附近的肉鋪老板。她同別的德國女人一道被帶到火車站，負責清掃空襲后留下的碎磚瓦礫。看守逼著她搬沉重的鋪路石，拿槍托砸她，還用厚底軍靴踹她。暴民們高呼：“你們這些德國豬玀！這些年養肥了自己！好吧，落到現在這步田地，應該好好謝謝你們的元首！”

接著，局面迅速升級：“我沒什么東西可以用來遮頭，而我的頭發似乎惹怒了人群……一些人認出了我，厲聲尖叫：‘她是個戲子！’不幸的是，我的指甲修過，還涂了指甲油，我戴的銀手鐲則讓人們更加瘋狂。”[31]

人們逼著德國女人吃下希特勒的照片，還把從她們頭上剪下來的頭發塞進她們嘴里。舍爾被送進一個勞工營，那里的革命衛隊動輒拿鞭子抽她，她都想不通是為了什么。然而，她不像中東歐一些德國人那般麻木不仁。并非所有捷克看守都是惡人，有個守衛看到她穿著破爛的鞋子，幾乎沒法走路，更別說干活了，就主動給她找了雙拖鞋。舍爾回憶道：“當我聽到這個革命衛隊士兵說他在德國集中營里待了七個月后，我們會受到粗暴對待就真的不足為奇了。”[32]

此外，舍爾也理解捷克人恨意的真正來源。盡管還是弄不明白為什么某一天唯獨她被選中，結結實實挨了一頓毒打，但她回想起來，有人告訴過自己，勞工營的司令官覺得她“太過高雅”。在8月8日這天寫下的日記里，她提到了勞工營廚房里的一個女看守，人特別兇。“女的，”她寫道，“不管在哪兒都是最壞的。很顯然，這和她們心存怒氣有關。因為她們看得很清楚，就算我們現在的身份是干苦力的奴仆，但并沒有丟掉過去的氣質。”[33]

愛德華·貝奈斯不是共產黨。但他試圖向斯大林示好，況且，祖國過去被西方民主國家出賣的事實還歷歷在目，于是他很不明智地選擇和蘇聯結盟。這份魔鬼盟約后來導致捷克斯洛伐克于1948年落入共產黨之手。但是，革命的種子已經播下，其形態就是瑪格麗特·舍爾在勞工營廚房里深刻體會到的那種憤怒。194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那些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為德國人主導的地區，仿佛處于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其區別在于，兩個世紀前的法國是先革命后恐怖，但在1945年，是先有恐怖，再有革命。

\* \* \* \* \*

舍爾的日記里還有件事值得一提。她講到自己被人帶進一間屋子，過去這里是蓋世太保的老巢。她和同組的囚犯被勒令在房子油漆完畢后，進去打掃干凈，然后把新家具搬進場。她們的監工碰巧是個猶太人，但他對舍爾和其他德國犯人卻很客氣。“他說自己在集中營里待了5年，失去了雙親和姐妹，他無意欺負任何人，因為他知道當囚犯是什么滋味。雖然他完全有理由仇視所有德國人，卻沒有拿我們當出氣筒。”[34]

這則故事也許不太具有典型性，畢竟在人類被授權昧著良心胡作非為時，這種同情心十分罕見。但事實上，盡管全歐洲的人都在忙于報復，報復德國人、叛徒、辱沒國家榮譽的女人、階級敵人和法西斯分子，那些苦難最深重的人卻展現出了驚人的克制。這不是因為別人身上有驅使他們報仇雪恨的卑鄙本能而猶太人沒有，更不可能是因為1945年時猶太人對一個曾妄圖致他們于死地的民族還懷有好感。當然，集中營的大多數生還者體弱多病，反應遲鈍，根本無力做出任何報復行為。但部分集中營里還是出現了原始正義的案例。在調查有納粹嫌疑的人員時，某些猶太裔美國審訊者展現出了超出職業熱情的積極性。斯圖加特附近的一所監獄里關押著部分德國黨衛隊軍官，他們遭到了極其粗暴的對待，事后的調查報告顯示，其中137人的“睪丸被美國戰爭罪調查團隊的辦案人員踢壞，永久喪失功能”。[35]大部分審訊者都有猶太名字。

但這些只是個案。猶太人并未有組織地實施以眼還眼、血債血償的報復。同之前提到的一樣，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而是因為政治因素的掣肘。報復的欲念在1945年曾十分高漲。1944年，英國陸軍成立了一支猶太旅。德國戰敗后，該旅駐扎在意大利和奧地利邊境上的塔爾維西奧（Tarvisio），后來被編入駐德占領軍。對在大屠殺中家破人亡的猶太人來講，報仇雪恨有著天然的吸引力，但為了防止出現報復德國人的個體行為，該旅發布了一條誡令：“記住，我們每個人都背負深仇大恨，任何不負責任的行為將使所有人都受損……”另一條誡令提醒官兵，在德國打出猶太復國主義旗幟就算得上是一種很過癮的復仇了。[36]

雖然該旅不準官兵自己主持公道，快意恩仇，但其組織了復仇隊，起名叫“親我的屁股”，希伯來語發音是Tilhaz Tizi Gesheften（TTG）。領頭的叫伊斯雷爾·卡爾米（Israel Carmi）。靠著從囚犯和軍中熟人那里搞來的情報，TTG的成員在夜幕下離開塔爾維西奧，前去執行暗殺任務，暗殺對象是惡貫滿盈的黨衛隊軍官等被認為應對屠猶負責的人。這些行動一經英國軍方察覺，猶太旅就被調離德國，派往比利時和荷蘭的非熱點地區。我們不知道這支部隊到底殺了多少納粹，但具體數字恐怕也就幾百人。

有個人拒絕放棄報仇的念頭，他叫阿巴·科夫納（Abba Kovner），是立陶宛猶太人。科夫納有一雙憂郁的眼睛，留著卷曲的長發，這些特征讓他看起來不像殺手，倒更像浪漫派詩人。此言不虛，他還真就是個詩人。時至今日，讓他在以色列大名遠揚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他的詩作。科夫納出生在塞瓦斯托波爾（Sebastopol）[[7]](#_7_Wu_Ke_Lan_Gang_Kou_Cheng_Shi)，在維爾納（Vilna，今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長大。戰前他加入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社會主義派別。1941年，他設法逃出維爾納的猶太隔離區，藏身于一所女修道院，后來跑進森林，加入了游擊隊。德國投降后，科夫納和一些幸存者——主要是波蘭和立陶宛猶太人——認為戰爭其實并未結束，而且也不應該結束。他們成立了一個組織，名叫Dam Yehudi Nakam，意為“猶太人的血不會白流”，簡稱Nakam。組織的章程是由科夫納訂立的，其中一條這樣寫道：“猶太人的血可以白流、不必擔心報復這一想法必須從人類記憶中清除出去。”科夫納堅信，如果不進行適當的報復，還會有人企圖滅亡猶太人。“這不僅僅是報復，”他寫道，“而務必成為屢遭殘害的猶太民族的律法！名字就叫DIN（希伯來語“以色列流淌著復仇之血”的首字母縮寫）。只有這樣，后人才會知道，就算在這個慘無人道、毫無憐憫的世界上，也還是會有法官和審判。”[37]

1945年的科夫納，看問題的角度有如《圣經·舊約》，很是陰暗，他的想法遠不止搞些秘密暗殺，除掉幾個黨衛隊軍人。相反，這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清算，只有殺死600萬德國人[[8]](#_8_Er_Zhan_Zhong_De_Guo_Tu_Sha_L)，才能完全抵消德國人對猶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若干年后，家住基布茲[[9]](#_9_Kibbutz_Yi_Se_Lie_Ji_Ti_Nong)的科夫納坦言，自己當時的方案有喪失理智之嫌。他說：“任何理智的人都能看出，這種想法太過瘋狂，但在當時，人們真的就快瘋了……也許比發瘋還要糟糕。這種一命抵一命的觀點很可怕，既源于內心的絕望，還帶有殺身成仁的味道……”[38]科夫納“有組織、獨一無二的報復計劃”最終擱淺，其經過和原因頗為耐人尋味。

他的計劃是往幾座德國大城市的水源里投放致命化學藥品。為了搞到毒藥，科夫納去了趟巴勒斯坦。人們對他的想法表示同情，但沒多少人支持大規模屠殺，就算殺的是納粹余孽。本——古里安（Ben-Gurion）[[10]](#_10_Ben_____Gu_Li_An__1886__1973)等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個嶄新的猶太國家，為此他們需要博取盟國的好感。拯救歐洲剩余的猶太人，把他們變成自豪的以色列公民，這才是目標所在。在歐洲，再也不可能回歸正常生活了。歐洲代表過去。糾纏于屠殺德國人的計劃，說得好聽點，也是浪費時間。正因如此，盡管科夫納從未將他的計劃和盤托出，猶太復國運動的軍事組織哈加納（Haganah）也無意出手相助。

故事講到這兒，接下來的發展就近乎搞笑了。盡管得不到官方協助，科夫納還是想方設法從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化學實驗室里買到了毒藥。實驗室的助手是一對叫卡齊爾（Katzir）的兄弟，其中，哥哥伊弗雷姆（Ephraim）[[11]](#_11_Yi_Fu_Lei_Mu__Qia_Qi_Er__191)后來成為以色列第四任總統。兄弟倆以為科夫納拿毒藥只是為了毒殺黨衛隊軍官——沒人會反駁說這些人不該殺——于是就給了他一種毒性極強的藥物；僅一毫克的劑量就能致大量人員死亡。

1945年12月，科夫納背著一個筒狀旅行袋，登上一艘開往法國的輪船，袋里塞滿了一罐罐貼著奶粉標簽的毒藥，跟他同行的是個叫羅森克蘭茨（Rosenkranz）的同伙。他們倆拿著偽造的身份證件，佯裝成英國軍人，盡管科夫納一句英語也不會講。旅途中，科夫納大半時間都在暈船。快到土倫的時候，船上的廣播呼叫了科夫納的名字。科夫納以為自己的身份被戳穿、計劃敗露，把一半“奶粉”罐頭全丟到了海里，并指示羅森克蘭茨一旦發現苗頭不對，就把剩下的一半也銷毀掉。

實際上，科夫納根本沒有暴露，任務也沒被人察覺。他遭到逮捕的原因是被人猜中了使用的是偽造證件。總之，毒藥沒運到歐洲。慌亂之中，羅森克蘭茨把剩下的罐頭也扔到了水里。紐倫堡等地的水源因此安然無恙，幾十萬德國人逃過一劫。科夫納的朋友曾想在集中營里給納粹吃的飯菜里下毒，但他們的態度不夠堅決。所以就連這個計劃最終也不了了之，除了一些人中毒生病外，并未有人死亡。

由于得不到政治支持，猶太人從未真正實施過復仇。猶太復國主義的領袖希望建立一種區別于既往的正常狀態，這種狀態下，英雄的以色列人將降服荒漠，耕種作物；驕傲的以色列公民兼士兵將與敵作戰，保家衛國。歐洲那片土地浸透著戰爭鮮血，還是離得遠些為妙。領袖很有覺悟，他們面向未來。未來一樣會充斥流血、族群和宗教沖突，但要流的不是德國人的血。然而，阿巴·科夫納無法適應這種面向未來的生活。過去的陰影一直縈繞在心頭，揮之不去，催使他寫下悲情的詩篇，而且經常在夜半驚醒，仰天長嘯。

他寫過一首給妹妹的詩：

我在應許之地呼喚你，

四處找尋你的蹤跡，

翻遍了成堆的小鞋子。

每逢佳節臨近，我都找尋你。

還有一首寫給他父親的：

上帝保佑，我們的父親四十年里，

一直從同一個爐子取出烤好的面包。

他從未想象過，

整個民族能從焚尸爐里涅槃重生，

而全世界，在上帝的幫助下，卻一切照舊。[39]

\* \* \* \* \*

托尼·朱特談到戰時的法國，曾這樣寫道：不管對于積極的抵抗者還是通敵分子，“他們的主要敵人，通常情況下就是彼此：德國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40]同樣的話也適用于不少處于外國占領下的國家：南斯拉夫、希臘、比利時、中國、越南、印尼。占領軍會效仿殖民當局，利用早已存在的敵我矛盾。沒有德國人，維希政權的反動派獨裁者也不可能走上權力前臺，克羅地亞殺人如麻的安特·帕韋利奇（Ante Pavelic）和他手下的法西斯派別“烏斯塔沙”（Ustaša）也不會有機會問鼎權力寶座。在佛蘭德斯，弗萊芒國民聯盟（Flemish National Union）勾結納粹占領軍，希望借德國主導歐洲這一契機，擺脫講法語的瓦隆人（Walloons）的壓制。在意大利和希臘，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右派同德國人沆瀣一氣，這么做既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是為了打壓左派的勢力。

那么在中國情況如何呢？1972年，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因為日本對中國人犯下的戰爭罪行向毛澤東主席道歉。毛這個人講話很有黑色幽默。他讓客人別背負心理包袱：說謝謝的應該是我們。他說道，沒有你們日本人，我們中共不可能奪權。毛說的沒錯，當時的歷史發展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句話最具戲劇性的例證。日本人和蔣介石的國民黨一樣害怕共產主義，雙方甚至還有過聯手剿共的想法；國民黨里汪精衛這一支也的確同日本人大搞綏靖。但是由于戰爭嚴重挫傷了國民黨的元氣，日本人實際上助了共產黨一臂之力，幫著后者打贏了國共內戰。1945年，內戰的苗頭就已初露端倪，之后很快全面爆發。

同希臘一樣，中國在外敵入侵前就早已深陷內戰。在法國和意大利，內戰也已是箭在弦上。而歐洲人在亞洲殖民地“分而治之”的做法造成了很深的積怨，使得所有社會沖突呈現出一點即燃的狀態。在被德國人和日本人操縱后，這層積怨變得更加致命。

共產黨和左派在反納粹、反法西斯斗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德國和日本為了建立帝國，誘使許多知名右派人士“落水”，名譽掃地。法國共產黨自豪于其抗爭歷史，管自己叫“血肉筑成的黨”（le Parti des Fusillés）。即使是左翼同志，如果膽敢同共產黨唱反調，對斯大林主義路線叫板，也會被共產黨譴責不愛國，甚至惹來“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這一針對通敵賣國者的罵名。鑒于左翼的武裝抵抗史，他們要求發動革命、建立新秩序的呼聲也情有可原。戰后，蘇聯至少在其勢力范圍內的國家利用了這些呼聲，反觀西方盟國，卻解除了一些與他們并肩作戰、對抗德日法西斯的部隊的武裝，或者參與鎮壓了他們。不僅如此，某些原敵偽政權的統治精英在得到盟軍的幫助后，重回權力舞臺。這些事件為日后的冷戰播下了種子。

然而，勾結外敵并不總是涇渭分明的。在1943年的南斯拉夫，鐵托（Tito）的共產黨游擊隊就同德國人進行過談判，因為鐵托希望可以“騰出一只手”，去攻打塞爾維亞保皇黨的切特尼克部隊（塞爾維亞語里叫Cetniks）。同年秋天，切特尼克部隊又同德國人合作，一同打擊鐵托的游擊隊。而波斯尼亞穆斯林則愿意同任何能保護他們的一方合作：克羅地亞法西斯，塞族游擊隊，甚至是納粹。所有這些暫時性的結盟針對的都是內部敵人，并非外敵。

在法國，多數通敵者并不是直接勾結德國占領軍，而是通過為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領銜的法國政府效勞。有了德國幫忙，維希派認為復國有望，他們將復原一個真正的法國，一個由教堂、家庭和愛國主義構成的法國，沒有自由派，沒有猶太佬，沒有共濟會，也沒有其他玷污“地道法國”（La France profonde）的人或事。意大利法西斯真正意義上的通敵發生在1943年，當年，意大利被德軍占領后，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權力輻射范圍僅限于加爾達湖上隸屬納粹偽政權的一片彈丸之地。然而，過去二十年的法西斯統治已經在左派心中埋下了巨大的仇恨，只等德國人一走，他們就準備展開瘋狂的報復。

后來當選英國首相的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受丘吉爾委派，時任負責地中海國家事務的全權大使。1945年4月，他坐上一輛軍用吉普車，前往博洛尼亞（Bologna）同盟軍的軍事主管會晤，后者剛剛在富麗堂皇、完好無損的市政廳里落腳。路上，他看到兩具當地著名自由派人士的尸體，莊嚴肅穆地躺著，旁邊不時有路人經過，眼含熱淚地向遺體致以最后的敬意。黑衫黨這個法西斯組織一天前倉皇出逃，臨走之前槍殺了這兩位自由派。“棺材蓋開著，”麥克米倫在日記里寫道，“這樣，生前友人和仰慕者就能最后一次瞻仰領袖的遺容。兩人被殺害于市政廳墻壁前——墻上血跡斑斑，很是顯眼。他們曾經站立的位置已經擺滿了鮮花，還有年齡不一的男男女女的照片，看著讓人揪心。這些人是最近幾個月里被法西斯黑衫黨殺害的。”

在日記里援引了這段話后，麥克米倫接著寫道：“地方行政長官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他沒能及時逃脫，被游擊隊員擊斃，倒在了自己最后一個受害者身旁。你能看到他的腦漿濺到了磚塊上，血流了一地。”[41]然后，麥克米倫就去吃午飯了。他注意到過去給德國軍官烹制意式菜肴的意大利廚子，現在改為給盟軍將領燒美國菜了。“這里面蘊含著一則道理。”他寫道，卻沒有透露到底是什么道理。

1946年4月，死于尋仇的游擊隊之手的人還包括墨索里尼自己，以及他的情婦克拉拉·佩塔奇（Clara Petacci）。他們在試圖逃往奧地利時被人逮住，同行的人里還有一些德軍防空部隊的士兵。游擊隊在一個路障前攔下了他們。德國人被放行了，游擊隊對他們不再感興趣。但意大利人不準走。盡管在紅褲縫的意大利將官馬褲外套了件綠色的德國軍大衣，但墨索里尼還是被人認出來了。4月28日，他、克拉拉，還有15名隨機挑選的法西斯分子，在加爾達湖上的一間鄉間別墅前，被人用機槍處決。翌日，他們的尸首出現在米蘭一座破破爛爛的廣場上，像獵物一樣被倒吊在埃索（Esso）加油站的懸梁下，供暴民發泄怨氣。很快，尸體的臉就變得血肉模糊，難以辨認。

一個月后，埃德蒙·威爾遜被帶到事發地參觀。埃索加油站現已廢棄，但懸梁上用黑字寫下的死刑犯名字依舊清晰可見。威爾遜寫道：“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隨者被虐殺，死后暴尸街頭，被人辱尸泄憤，這件事的臭氣依然飄散在整個城市上空。意大利人會在酒吧里攔住你，給你看他們拍的照片。”[42]

事實上，在4月至7月期間，意大利北方可能發生過不下2萬起處決法西斯和他們狗腿子的事件，這只是其中一起罷了。在這當中，有8000起發生在皮埃蒙特，4000起發生在倫巴第，3000起發生在艾米利亞，另有3000起發生在米蘭省。[43]許多人是被共產黨主導的游擊隊草草處決。其余的在臨時設立的人民法院——即所謂的廣場（Piazza）正義——里接受了簡單審判。處決來得很快，有時還存在濫殺無辜的現象。驗明身份的法西斯分子連同老婆孩子一起被槍斃。死于這種粗暴正義屠刀之下的既有警官，也有法西斯政府官員。就算有些人已經身陷囹圄，也并非絕對安全。7月17日，維琴察附近的斯基奧監獄遭到了蒙面游擊隊的襲擊，牢里關著的55名法西斯被殺。有些復仇者是久經戰陣的抵抗組織戰士，有些則是待到真正的戰斗一結束，最后時刻才搖身一變成了英雄，這類人壯大了各地的抵抗組織。還有些則是身背前科的罪犯，利用他們新晉的“愛國者”身份，敲詐富商、地主，或盤剝他們的財產。

話說回來，在意大利，報復的背后時常也有政治目的；這是一種反攻倒算的革命行為。共產黨游擊隊將清洗看成是和資本主義的必要斗爭。由于大企業，譬如都靈的菲亞特公司，都與墨索里尼政權合作過，它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目標。盡管都靈和米蘭城里最有錢有勢的生意人往往都能設法跨越瑞士邊境，或者用黑市商品買通前來索命的人，以此保全性命，但對于地位較低的人，他們被害后常被人拋尸當地公墓門口。

由于對意大利可能爆發共產主義革命憂心忡忡，盟軍軍事當局罔顧許多游擊隊員曾英勇抗擊德軍這一事實，急不可耐地想解除他們的武裝。保守派意大利政客對這項舉措表示支持，這點并不讓人奇怪，因為他們中間一些人曾經同法西斯蛇鼠一窩。的確，正是因為羅馬的意大利過渡政府在懲辦法西斯分子一事上磨磨蹭蹭，才有了后來的“廣場正義”。

為了討好和安撫原游擊隊員的自尊心，意大利多個城市舉行了游行。盟軍指揮官在左右兩側意大利達官顯貴的陪同下，接受了游擊隊的致敬。隊員分別戴著不同顏色的圍巾，象征著他們各自效忠的對象：紅色代表左派，藍色代表基督徒，綠色代表多由意軍逃兵組成的獨立派（autonomi）。不少人放下了武器，但也有人拒絕繳械。激進的左翼依舊勢力強大，有時還掌握武裝力量。不過，后來的事態發展證明，保守派是多慮了。意大利不會出現革命。斯大林被允許將他的帝國擴展至中歐，作為回報，他同意把地中海留給西方盟友。但是殺氣騰騰的報復行動依舊在上演，意大利被赤化的擔憂也依然揮之不去，左派仍舊痛感遭人背叛，這種感覺有時甚至綿延至21世紀。

埃德蒙·威爾遜素來同情左翼，他對這些事態表達了不齒。他提到，美國對戰后意大利民主體制建設的主要貢獻是，“管我們的一條電話線路叫自由線；另外，當初游擊隊為我所用時，我們提供武器，鼓舞他們，但現在卻在沒收他們的武器，禁止他們發表政治演說，如果他們制造事端，還會被扔進監獄”。盡管知道左派手上也沾滿了鮮血，但他認為，“全新的意大利革命不只是一場野蠻仇殺，我相信，這一運動的勢頭此刻很難被扼殺”。[44]

然而，左派的勢頭的確被扼殺了，一如南朝鮮、法國、南越、日本和1945年夏威爾遜造訪的希臘。他下榻在雅典憲法廣場上的大不列顛酒店，酒店服務很差，甚至有幾分敵意，威爾遜留意到他的房間墻壁上還有彈痕。他受到怠慢是有原因的，因為雅典也像意大利一樣被籠罩在一團臭氣之中——一團因同樣背叛而生的臭氣。

這里有必要對墻上的彈孔作出解釋。一年前的12月，國民解放陣線（希臘語里簡稱EAM）的支持者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EAM是受共產黨控制的游擊隊組織。英軍正式接管了光復后的希臘。那時，控制雅典的是一個由民族團結黨主導的希臘過渡政府，政府成員多為保守派和保皇黨，此外也有一些左翼人士。但大半個希臘依舊在EAM及其下屬武裝力量ELAS手里。趕走了德國人后，EAM和ELAS本以為可以接管政府，在希臘上下推動革命。但是有英國人撐腰的保守派不惜一切代價想要加以制止，于是就有了1944年12月3日的示威抗議。在哈羅德·麥克米倫看來，這一天“拉開了內戰的序幕”。[45]

事實上，麥克米倫一定清楚，內戰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希臘在一戰期間嚴重分裂，當時的總理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打算支持協約國，而國王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和其軍事統帥揚尼斯·梅塔克薩斯（Ioannis Metaxas）則支持同盟國。于是，后來一段時間里，保皇派和“韋尼澤洛斯派”一直嚴重對立。1936年，梅塔克薩斯獨攬大權，表面上看他是個銀行家，但心地卻如同法西斯元首（caudillo）般歹毒。他崇拜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作為國父“統一”了希臘——取締所有政黨，把共產黨和政權的其他反對者關進監獄。梅塔克薩斯死于1941年，他的死讓多數希臘人松了一口氣。

后來，德國人舉兵來犯。過去梅塔克薩斯政權的支持者大都勾結入侵者，而從梅塔克薩斯的監獄里放出來的共產黨人則帶領人們抵御外敵。在德國人的鼓動下，希臘法西斯兵團和一開始得到盟軍幫助的左翼游擊隊展開激戰。雙方都窮兇極惡，不少受害者都是不幸身處戰火夾擊之下的無辜民眾。

但麥克米倫說得沒錯：在英國人看來，真正的戰斗是1944年才正式打響的。英軍在得到意軍的增援后，把槍口對準了幾個月前還在打德國人的左翼游擊隊。埃德蒙·威爾遜對這種背信棄義、過河拆橋做法的不齒得到了廣泛響應，特別是在美國。英國出兵希臘被看成是又一次典型的英帝國主義干預戰爭。不過，在英國，許多人對此也抱有同感。丘吉爾因為對德作戰的領導才能備受尊崇，卻因為敵視共產黨游擊隊收獲了不信任。

哈羅德·麥克米倫寫道，在希臘等地，“抵抗運動在我們的宣傳里被描繪成一幫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理想主義者，以拜倫式的熱情獻身戰斗，為的是爭取國家的自由”。[46]最有拜倫風范的一位英雄莫過于阿里斯·維盧奇奧蒂斯（Aris Velouchiotis）。阿里斯率領他的游擊隊，騎著戰馬翻越崇山峻嶺，他們清一色的一襲黑衣——頭戴黑色貝雷帽，身穿黑夾克，留著黑胡須。這位英雄人物在1945年和共產黨一刀兩斷。他不僅散發著浪漫主義氣息，同時還是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人們后來在他經常出沒的地區挖出了萬人坑，里面七零八落地埋葬著他政敵的骸骨。

希臘解放后的真正問題是，在動用武力這點上到底誰說了算。這在意大利、中國等地也是一樣的。經過漫長的談判后，希臘國民解放陣線（EAM/ELAS）同意放下武器，前提條件是右翼武裝民兵，譬如納粹占領下組建的臭名遠揚的警備營，也放下武器。政府想的是把雙方最出色的士兵吸納進政府軍。據EAM/ELAS稱，政府方面沒能遵守約定；即便左派遣散了部分部隊，右派還是獲準保留了武裝力量。不難理解，不少原ELAS的戰士將此視為恬不知恥的背叛。一名游擊隊員回憶道，1944年他們曾包圍了一幫通敵者，但最后放了對方一條生路，把他們移交給了警方。游擊隊失策了，因為后來警方給這些人配槍后，放他們走了。1945年，戰敗的游擊隊員明白了一個道理：“那些說‘殺了他們’的同志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地指出，如果我們當時槍斃了所有的法西斯，就不會再起戰火，打內戰了。”[47]

1945年的雅典就被籠罩在這樣一種躁動不安的氣氛中，對此，埃德蒙·威爾遜在酒店房間里看出了端倪。1944年12月3日，憲法廣場上人頭攢動，人群由婦女和孩子帶頭，朝大不列顛酒店行進，那里是臨時政府辦公所在地。據傳言，人們計劃沖擊酒店。而威爾遜從同情左派的人士那里聽來的說法是——也是當時大部分希臘人的看法——這是一場和平示威。大部分群眾在保皇黨的警察朝他們開槍后依然毫不退卻，鎮壓共導致100多人死傷。翌日，示威者再次途經酒店，這次是為死難者送葬，但就在這時，保皇黨從酒店窗口向外射擊，打死了將近200名手無寸鐵的市民。

可以預料，麥克米倫的看法會有些不同。“這群所謂的平民，”他回憶道，“里面有許多全副武裝的ELAS游擊隊員。”而且打出致命槍彈的恐怕是有心煽動暴亂的共產黨特務。[48]

盡管這起慘案的真相依然撲朔迷離，有兩件事當無爭議。首先，1944年10月德國人被趕出希臘前，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行事冷酷無情，處決了大批名副其實和莫須有的通敵者，還有“階級敵人”，而且在1944年之后一段時間里，清洗和殺戮依舊在上演。其次，希臘人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他們被人背叛了。

在許多國家，共產黨和左派是反納粹和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中流砥柱。在希臘，他們通過殘酷地清除異己，壟斷了抵抗組織。在鄉村，EAM/ELAS建立了某種游擊政權，人民法院負責處置所有革命的敵人。1944年9月，一位被派駐到希臘的英國軍官寫道：共產黨在阿提卡（Attica）和維奧蒂亞（Boeotia）施行“恐怖統治”。“過去幾周內有500多人被處決。由于尸體腐爛，臭氣熏天，我營地附近的一個地方根本沒法走近。赤身裸體的尸體被人砍掉腦袋，就這么躺在地上，無人掩埋。這片地區有很多死硬的反動派，ELAS就來整肅了。”[49]

鑒于此，人們有理由擔心希臘一旦爆發革命將會出現的后果。丘吉爾曾一心想把國王喬治二世送回希臘，復辟王權，但他的那套忠君尊王的訓誡就連一些希臘保守派都十分反感；此路不通。1930年代末期，喬治二世曾短暫執政，碰巧趕上揚尼斯·梅塔克薩斯的右派暴政，因此公眾可不會懷念那個時代。

但出于對共產主義的畏懼，英國人覺得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協助雅典政府同左翼游擊隊作戰。1945年初爆發的內戰持續了五個星期，多達2萬名“階級敵人”被ELAS驅逐，而且經常在被強行趕進深山后屠殺殆盡。另一方面，許多有左派嫌疑的人被英國人流放到非洲勞改營。交戰各方無所不用其極，戰爭空前殘酷，以至于2月份達成停火協議時，公眾無不感到寬慰。當時，丘吉爾出現在大不列顛酒店的陽臺上，在東正教大主教的陪同下，對著人山人海、歡呼雀躍的群眾講道：“希臘永世長存！希臘屬于所有人民！”[50]

后來證明，這不過是戰事重啟前的短暫停歇。翌年，希臘再次陷入內戰，一打就是三年。但其實早在這之前，丘吉爾振奮人心的演講一結束，另一種形式的報復，或者說反報復就開始了，這回矛頭指向的是左派。右翼軍事組織和憲兵發了瘋似的到處抓人。大批共產黨或有左派嫌疑的人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被捕，遭到毆打，羈押或被殺害。國民解放陣線發出呼吁，號召全世界關注“一個甚至比梅塔克薩斯獨裁專政還要駭人聽聞的恐怖政權”。[51]1945年末，大約6000名EAM的支持者都被關進大牢，其中不乏婦孺之輩。由于人數眾多，不得不專門興建關押女囚的拘留所。犯人受到的普遍指控是他們在德占期間犯有戰爭罪行。然而，曾經勾結納粹的人以及右翼保安團的罪行卻大都逃脫了制裁。

哈羅德·麥克米倫和埃德蒙·威爾遜來到希臘的原因大相徑庭，各自的看法也勢如水火。前者是作為英國的常駐公使，后者是服務于美國的報告文學作家，但兩人在一件事上意見一致：有必要加大努力，把民主左派從共產黨革命分子中分裂出來。麥克米倫認為，“一種溫和、合理、進步的政策”本來能撕下“共產主義冷酷本質外包裹的那層模糊、激進的外衣”。[52]在威爾遜看來，英國本應“協助EAM的領導人，幫他們擺脫蘇聯的束縛，另外，他們手下有些成員行事野蠻粗暴，抵抗時期，英國人對他們的驍勇善戰求之不得，但如今有必要管教管教他們”。[53]遺憾的是，即使存在這樣的愿望，相應的努力很快就被復仇的渴望所湮沒。各路政治力量為了一己之私，激化矛盾，挑唆人們報仇雪恨。

\* \* \* \* \*

用解放來形容殖民社會的戰爭結束也許并不合適。多數亞洲人對日本人被趕跑都打心底里感到高興，因為日本所謂的“解放亞洲”后來證實殘酷性比其短暫取代的西方帝國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1945年，荷蘭人可不想讓荷屬東印度獲得解放。同樣，法國人也不希望印度支那解放，英國人不希望馬來亞解放。

相形之下，美國人對菲律賓的處置方案要遷就多了，東南亞盟軍最高指揮官路易斯·蒙巴頓勛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對渴望民族獨立的志士抱有些許同情。荷蘭人和法國人則不同，他們急于盡快恢復戰前的殖民秩序。即使是對渴望獨立的印尼人心存同情的荷蘭社會主義者，也擔心一旦失去亞洲殖民地，遭受德國占領重創的荷蘭經濟將走向崩潰。當時流行這么一句口號：“如果丟了東印度，我們就要完蛋了。”對于印尼民族主義者，較為進步的荷蘭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讓步，不過就是在歸順荷蘭王室的前提下，賦予一定的自治權。另外，對那些和日本人合作過的印尼人，肯定要秋后算賬，絕不姑息。

這讓通敵和清算這一問題變得頗為復雜，因為至少在戰爭初期，東南亞人民十分支持日本人“亞洲是亞洲人的”宣傳。對于蘇加諾這樣的印尼激進派，和日本人合作是擺脫荷蘭殖民主子的最好辦法。但在荷蘭人眼里，蘇加諾這就成了通敵分子。因此戰后不可能跟他就印尼的獨立問題進行談判；相反，荷蘭人認定，他因為賣國求榮理應受到懲處。

1945年，亞洲人胸中同樣燃燒著一腔復仇的怒火，但矛頭并不總是指向歐洲殖民主義者。復仇的形式通常比較間接，瞄準的是日本占領前的通敵行為。同歐洲一些地方的情況如出一轍，亞洲人復仇的受害者常常是不受待見的少數民族，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權、經濟上更富裕、和西方殖民列強結盟的少數派。

華人常被叫做“亞洲的猶太人”，他們是日本人在東南亞野蠻行徑首當其沖的受害者。舉例而言，在馬來亞，日本人不信任華人，更看得起馬來人。有種看法是，華商從西方殖民主義中獲益，所以華人理應被打倒。與此同時，馬來族精英卻在公務員和警察隊伍里得到了晉升。這倒不是說日本人對馬來或印尼工人農民有多好；相反，許多印尼人因為被迫為日本軍工項目干活而喪命，死時的狀況比多數西方戰俘還要凄慘。鄉村常常受到戰火蹂躪，上百萬的農民生活困窘；城市遭打砸搶，喪失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黑幫成了街頭老大。

日本在南洋的統治盡管殘暴，但卻給過去傾向于對殖民之恥逆來順受的人灌輸了一套全新的叛逆思想。西方列強被日本羞辱得體無完膚，他們外強中干的特點暴露無遺。幾十萬馬來族和印尼年輕人接受了日本人的訓練，效力于“皇協軍”、民兵和各個激進青年團體。這讓他們感到了一種少有的自豪。日本人利用在被殖民人群當中十分普遍的羞恥感和低人一等的心理，有意煽動反西方和反華情緒。

戰時，馬來亞的抗日運動大都有華人背景。馬來亞共產黨是抵抗力量的領導者，他們一方面以中共為榜樣，另一方面也許受到了國際主義的鼓舞，這種情懷讓共產主義對世界各地的少數民族都很有吸引力。盡管馬來亞共產黨的綱領并不太反對馬來族，但所有成員幾乎清一色都是華人。其麾下有支軍事力量，叫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PAJA），到1945年8月時，抗日軍已經有大約一萬名武裝人員，控制了大半個鄉村，形成了國中國，有自己的法律和法規，并熱衷于大面積整肅不同情他們的官員。這方面很像希臘的共產黨游擊隊。

戰后，抗日軍的成員旋即對勾結日本人的當地人——多數是印度人和馬來人——進行了報復；市長、警察、記者、告密者、日本官員的情婦，以及其他“賣國賊和走狗”被人在大街上拖著游街，關進牢籠，再由“人民法院”草草審判后公開處決。這讓許多馬來人心生恐懼。另外，同年10月，曾和馬來亞抗日軍有過密切合作的英國殖民政府宣布華人應被賦予同等公民權，于是，馬來人自然而然擔心會失去對自己國家的控制權。時至今日，馬來亞的政客依舊在利用這種畏懼心理。

馬來人決定對華人予以反擊。領頭的是個戴著頭巾、兇神惡煞的原黑幫頭子，叫基亞伊·薩雷（Kiyai Salleh），他在戰后一躍成為“圣戰紅軍”團體的頭目。該團體的宗旨是防止華人異教徒威脅穆斯林的信仰，并為那些在日本戰敗后遭華人羞辱和處決的馬來人報仇。盡管排華的圣戰表面上符合伊斯蘭教義——薩雷誦讀古蘭經文，引用蘇菲派圣人的教誨——但他更多地借力馬來神秘主義，對外宣稱自己刀槍不入：“子彈打不死他；他能不濕腳穿越河流；能撐破任何綁在身上的繩索；他的嗓音能讓攻擊者癱瘓。”[54]薩雷的追隨者相信，在用金針刺扎身體、并喝下神圣勇士頭領“開光”的湯藥后，他們也被賜予了類似的神力。

“圣戰紅軍”最喜歡用大砍刀或馬來族的“克里斯”（kris）短劍殺人。據傳說，這種武器跟戰士們一樣被賦予了神奇的力量。在11月6日發生的一起典型的襲擊事件中，一伙馬來族圣戰主義者襲擊了巴當里峇（Padong Lebar）的一個華人村莊，用短劍和砍刀殺死了40人，其中男性5人，其余為女人和孩子，孩子的尸體被扔進一口水井。馬來政客并不支持這種殺戮，但他們也未采取行動加以制止。據一份英國軍事情報顯示：“在受過教育的馬來人中間，似乎能察覺到他們對馬來人在未來馬來亞的地位很是擔憂。此外，人們普遍相信，華人正在掌控這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如果對這種勢頭不加遏制，他們終將獲得政治主導權。”[55]

同樣的擔心還困擾著印尼人。正因如此，馬來族頭領薩雷手下三員大將都是來自荷屬東印度的印尼民族主義者，就絕非偶然了。1945年秋的東印度，時局要比馬來亞動蕩得多。

雅各布斯（G. F. Jacobs）是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的一名少校，南非人，是1945年8月第一批被空投到蘇門答臘的盟軍士兵之一。他的任務是同日本軍方建立聯系，準備接受他們投降，并為盟軍登陸打前站。雅各布斯得以率先一睹日軍戰俘營究竟，他發現里面關押了數以千計疾病纏身、形銷骨立、遍體鱗傷和饑腸轆轆的平民。荷蘭囚犯不能理解雅各布斯為何不準他們血債血償：“為什么制止我們……你難道看不出我們有多想收拾這群黃皮膚的矮個兒王八蛋么？”[56]

雅各布斯少校禁止戰俘對看守動用私刑的原因是他擔心一種更可怕的威脅。印尼人拿著槍、匕首和長矛在鄉間游蕩，叫囂要“bunuh Belanda!”，即“殺死白種人！”。現在還需要日本人來保護昔日的囚犯。

8月17日早上，也就是日本投降后兩天，蘇加諾在巴達維亞（即雅加達）對著不大一群人宣讀了一篇短小精悍、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宣言：“我們印尼人民在此宣布印尼獨立。諸如權力交接等工作將會正大光明地展開，而且會盡快落實。”

蘇加諾任命自己為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國總統。這份獨立宣言是他和副總統穆罕默德·哈塔（Mohammed Hatta）一同起草的。在這之前，他們和日本陸海軍司令官就此事進行過密切的磋商。1945年夏，戰敗看來已經在所難免，日本人因此斷定，締造一個自由的、反西方的印尼將會是他們最好的一步棋。畢竟，多數日本人把“亞洲是亞洲人的”這句口號很當回事，盡管他們的真實想法是自己作為優等人種，應凌駕于其他亞洲人之上。不少印尼人都對暴力感到厭倦，他們受盡了日軍的欺壓，又吃不飽飯。那些被強行送去修建緬泰鐵路等煉獄般日本工事、最后大難不死的人，把外來疾病帶回了老家。當地人體質虛弱，完全無法抵御疾病。印尼人暫時還拿不定主意如何看待日本拋出的“自由印尼”設想。日本投降后最初的幾周里，印尼人對荷蘭平民還沒什么敵意。蘇加諾、哈塔和諸如蘇丹·沙里爾（Sutan Syahrir）——一位在荷蘭受過教育、從未同日本合作過的社會主義者——等領導人竭力遏制這個千島之國上潛在的暴力事件，但他們對國家暫時還沒有多少實際控制力。

大批年輕的強硬派受過日軍訓練，做過“皇協軍”，思想激進。對于他們，新一代印尼領導人的影響力十分微弱。這些青年好勇斗狠，一心想著要打仗。他們從同情印尼的日本軍官那里弄到了武器。有些是買來的，有些是從日本倉庫里偷來的。據估計，戰士們拿到了5萬支步槍，3 000挺輕重機槍，外加1億發子彈。[57]荷蘭人此時應該做的，而且也是西方盟友建議他們做的，是同蘇加諾等印尼領導人協商，因為后者無意訴諸革命暴力。蒙巴頓一廂情愿地說過：“我們唯一的想法是讓荷蘭人和印尼人相擁接吻，成為朋友，然后我們就好卷鋪蓋走人。”[58]然而，荷蘭人并未照辦。相反，在向英國外交部的請愿中，他們把“所謂的蘇加諾政府”比喻成親納粹的吉斯林政權（Quisling regime）[[12]](#_12_Ji_Si_Lin__1887__1945_Xi_Nuo)，把追求國家獨立的年輕印尼士兵比成是希特勒青年團和黨衛隊。蘇加諾的獨立宣言則被描繪為日本意圖在荷屬東印度維系法西斯政權的陰謀。[59]

關于蘇加諾勾結日本人這點沒什么疑問。19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他不是在荷蘭殖民監獄里度過，就是被流放到某個偏遠的島嶼上。日本人給了他荷蘭人不曾給過的禮遇。所以不管怎樣，蘇加諾把投靠日本視為民族解放最快捷徑的看法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1942年他曾說過：“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亞洲的鏡子里看到了自己。”[60]

但蘇加諾巴結日本人的行為，即便對不少印尼人來講都太露骨了。他曾支持日本強迫印尼勞工為其戰爭事業賣命，這點玷污了他的名聲。另外，激進的少壯派對他讓日本人參與起草獨立宣言十分憤怒。他們根本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瓜葛。但是，沒有人能夠質疑蘇加諾身為印尼民族主義者的氣節。

然而，荷蘭人沒有直接和蘇加諾打交道，而是作出十分模糊的承諾，許以印尼人在荷屬聯邦中的自治地位。與此同時，9月起，荷屬東印度軍隊的老兵開始在印尼村莊和社區周邊耀武揚威。他們肆意開槍，扯掉紅白兩色的印尼國旗，威脅恐嚇人們，這么做完全就是為了顯示這里還是他們說了算。最臭名昭著的治安部隊是一個叫X兵團的組織，長官分別由荷蘭人和歐亞混血兒擔任，手底下的士兵多是皮膚黝黑、信仰基督教的安汶人（Ambonese）、棉蘭人（Medanese）和其他少數民族，他們擔心被其余印尼人擺布，要勝過擔心被荷蘭人欺壓。況且他們也是殖民體系的忠實仆人。當消息傳來，說已經靠岸的荷蘭和英國戰艦搭載著盟軍部隊——多為印度兵——以及一心想要恢復舊秩序的荷屬東印度民事管委會（NICA）的特派員時，東南亞最血腥的暴力沖突就此拉開了序幕。這種暴力的本質，部分是革命，部分是復仇，部分是違法亂紀，幾種因素結合在一起，足以致命。同年早些時候，中歐也爆發了背景相似的流血沖突。

1945年10—11月出現了一波暴力恐怖浪潮，俗稱“bersiap”（意為“準備好！”）。發起這輪襲擊的是成群結隊的極端主義武裝分子，成員多數在日本人領導的民團里服過役，或者是從雅加達、泗水（Surabaya）等城市的黑幫中招募的街頭混混，說是混混，往往只是青少年。人稱pemuda的青年暴力團體還囊括了學生、工廠工人和村民。他們的首領有些是黑幫老大，這些人搶劫和殺害權貴階層的動機跟政治關系不大，更多是出于貪婪。有些頭領很有魅力，比如人稱“虎父”的土匪頭子，他把護身符賣給手下，說是能保他們刀槍不入。爪哇神秘主義和日本人灌輸的武士道精神兩相結合，讓年輕戰士充滿了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Merdeka atan mati！”（“不自由，毋寧死！”）曾經出現過熱血青年只拿砍刀和竹槍對抗坦克的事例。

革命復仇的主要受害者一是華人，他們大多從商，有通敵背叛的嫌疑；二是歐亞混血，亦稱“Indos”；另外還有其他常跟荷蘭人穿一條褲子的少數民族。除此之外，還要算上經常被憑空臆想出來的NICA間諜。對于NICA間諜的定性十分武斷：一個人所穿的紗籠（sarong）[[13]](#_13_Dong_Nan_Ya_Ren_Chuan_De_Bu)如果紅、白、藍三種顏色太多的話（荷蘭國旗的顏色），就可能被當成荷蘭當局的間諜揪出來。

雅加達的華人、混血兒和安汶人一旦聽到街上有人像擂響戰鼓一樣用竹槍敲打空心金屬路燈燈柱時，就知道麻煩來了。日本兵手里拿著槍，奉命在盟軍不在時保護平民，但一聽到敲擊聲響起后，經常會溜之大吉。暴徒襲擊商店，將住宅付之一炬。狂性大發的青年把屋里的一家人亂刀砍死，他們嗜血成性，樂此不疲地揮刀砍殺，有時甚至會喝受害者的血。在雅加達附近的一個地方，干凈的水源已無處可尋，因為水井被腐爛的華人尸體塞得嚴嚴實實。

在印尼式荷蘭語里，最常見的一類殺戮叫getjintjangd。Tjintjang的意思是用克里斯短劍或大砍刀殺人。荷蘭平民愚蠢地離開了尚有日本兵把守的集中營，結果往往是被人給tjintjanged。而日本兵如果拒絕幫助叛軍，或交出手里的武器，一樣也會被tjintjanged。盡管過去的集中營和充斥病怏怏的饑民的骯臟村落也是襲擊目標，但只要日本看守還堅守崗位，它們依然是最安全的棲身之所。

跟許多荷蘭平民一樣，有個名叫彼得·范·貝爾庫姆（Peter van Berkum）的年輕人生在印尼，長在印尼。一天晚上，他在泗水碰巧被一群少年暴徒盯上，他們手持削尖的竹槍。范·貝爾庫姆被推上一輛卡車，送到當地一座牢房。據他回憶：“卡車減速的時候，一群厲聲尖叫的人圍了上來。我隱隱約約地看到一堆棕褐色、汗涔涔的臉，人們嘴部扭曲，張得很大。他們晃著攥緊的拳頭，揮舞著各式各樣的武器。”在一片“殺死白種人！”的呼號聲中，囚犯們被推下卡車。“一瞬間，人群沖了上來，對他們拳打腳踢，用刀砍，用棍棒戳，用刺刀捅，還用上了斧頭、槍托和長矛。”[61]

印尼領導人不希望出現Bersiap，但事到如今，他們對局面已經完全失控了。爪哇和蘇門答臘島上爆發了全面戰斗。這不光是針對殖民者和他們所謂幫手的報復行動，而且還發生在叛軍和日軍之間，這樣的報復和反報復導致了一種血腥的惡性循環。在三寶壟（Semarang），一支由木戶新一郎（Kido Shinichiro）少佐率領的日軍部隊與pemuda發生了沖突，后者認為日本人蓄意破壞水源。為了以儆效尤，日軍殺死了一部分印尼民兵。這之后，印尼人虐殺了關押在三寶壟市內監獄的兩百多名日本平民。一份英國陸軍報告如此描繪當時的情景：“有些尸體吊在屋頂上，有些吊在窗口，其余的被竹槍捅了一遍又一遍……有些人臨死前試圖在墻上寫下血書，留下臨終遺言。”[62]被激怒的日軍繼而還以顏色，屠殺了兩千多名印尼人。

陷入最嚴重暴力的是泗水。這座工業城市到10月底已完全落入印尼人之手。監獄里都空了。一個留著滿頭長發、富有感召力、人稱“托莫老哥”的人，通過“叛亂電臺”散播古時爪哇人大無畏的傳說。在受到他的蠱惑后，成群結隊的pemuda自由戰士、小流氓和浪漫主義青年紛紛走上街頭興風作浪，用短刀和長矛攻擊華人、安汶人和被指控是NICA間諜的混血兒。日本人由于擔心自己性命不保，很樂意向暴民提供更多致命武器。

彼得·范·貝爾庫姆的姐姐卡拉（Carla）和附近某個集中營里的荷蘭難民一起來到泗水，但迎接他們的是下面的遭遇：“我們被一群土著暴民圍攻，他們氣勢洶洶地用竹槍刺我們。邊刺還邊叫：“merdeka! merdeka! merdeka!”（“自由”之意）他們衣衫襤褸，黑眼睛里透射出讓人膽寒的兇光。我好害怕。”[63]

盟軍決定采取行動。荷蘭海軍上尉胡耶（P.J.G.Huijer）奉命進入泗水，為盟軍登陸做前期準備。他的到來自然被視為進一步的挑釁。日本軍火庫里的槍械源源不斷地流入pemuda戰士手中。10月25日，大約4 000名英軍在泗水登陸，其中多半是印度兵和尼泊爾的廓爾喀兵（Gurkhas）。頓時謠言四起，說這些士兵其實是把臉涂黑的荷蘭人。于是，他們遭到了一群印尼烏合之眾的攻擊。因為擔心自己的軍隊遭到屠戮，英國人懇請蘇加諾和哈塔出面干預，約束暴徒。他們照辦了，也取得了些許成效。停火協議多少算是得到了遵守。直到10月31日英軍指揮官馬拉比（A. W. S. Mallaby）準將在試圖干預一場爭斗時被印尼人開槍打死，協議才又被撕毀。

這回輪到英國人報復了。自11月10日起，泗水市經歷了為期三周的轟炸、炮擊和掃射。一個目擊者如此描述市中心的景象：

地溝里遍布人、馬、貓、狗的尸體。路上橫七豎八地掉著碎玻璃、家具和纏在一起的電話線。戰斗的喧囂聲在辦公樓之間回響……印尼抵抗運動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狂熱的自我犧牲，標志是人們手持匕首攻擊謝爾曼坦克，后一個階段更有組織性，行事也更有效，一板一眼地遵照日軍編寫的戰爭手冊。[64]

到了11月底，泗水之亂終于得以平定，但代價慘重：這座城市經過轟炸，成了一片破敗的戰場，到處彌漫著印尼人、印度人、英國人、荷蘭人、混血兒和華人尸體的惡臭。在此之后，報復行動繼續發酵，荷蘭人在1946年派出由綽號“土耳其人”的雷蒙·韋斯特林（Raymond “Turk” Westerling）率領的敢死隊，深入數以千計荷蘭平民遇害的南蘇拉威西島（South Sulawesi）展開報復。當然，發動報復的不光有荷蘭人。直到1949年，印尼才贏得完全獨立。（因為在印尼的這段經歷，二戰期間曾在北非同德軍打過仗的韋斯特林成了虔誠的穆斯林。）

然而，流血只會換來更多流血。除了扣在蘇加諾頭上的變節罪名外，荷蘭人還將他看作共產黨的頭面人物。泗水之戰過去整整20年后，印尼軍隊里的一些軍官借口要杜絕共產黨接管印尼的隱患，發動政變，推翻了蘇加諾。這一政變標志著全國范圍內清洗共產黨的開始。穆斯林義警、武裝青年、兵團軍人、爪哇神秘論者和普通平民人人有份，總共屠殺了50萬人，其中多數為華人。領導政變的是蘇哈托少將，也就是日后的印尼總統。蘇哈托受過日軍訓練，而且被徹底灌輸了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思想。他在1945年曾同荷蘭人作戰。蘇哈托在位時間長達32年，在此期間，作為堅定的反共主義者，他獲得了所有西方大國熱情而毫不動搖的支持，其中當然也包括荷蘭。

\* \* \* \* \*

1945年，法國人和荷蘭人一樣害怕失去他們的殖民地，如果說兩者有區別的話，那就是他們的恥辱感更強，這不光是因為1940年的軍事失利，還因為法國人有官方通敵的歷史。在事實上的日本占領期間，法屬印度支那依舊處于維希派主導的殖民政府管轄之下。日本人把這塊殖民地當作軍事基地，而法國人則繼續在西貢的體育俱樂部（Cercle Sportif）里喝著他們的開胃酒，心無旁騖地過自己的日子。但在1945年3月，這種安逸的生活走到了盡頭。法國一光復，人們對法國和日本曾經沆瀣一氣這點無法再視若無睹了。于是乎，法國軍隊和官員隨即被關進西貢和河內的大牢里。

8月的第一周，隨著戰敗幾成定局，日本人將政治權力移交給越南王室政府，共產主義越盟（Vietminh，即獨立越南聯盟運動）則控制著北越。幾周后，中國軍隊浩浩蕩蕩從北方進入越南境內，而南越又即將迎來英軍，越南皇帝保大（Bao Dai）和共產黨領袖胡志明都明確表示，不論發生什么，法國恢復殖民統治都將是不可容忍的。在河內，法國殖民高官的雕像被人推倒。9月2日，30多萬越南人聚集在毗鄰昔日法國總督府的巴亭廣場（BaDinh Square）上，聽胡志明宣布國家獨立。樂隊奏響共產主義進行曲，其中不乏“豪飲法國佬的血”的刺耳歌詞。站在紅旗飄飄的講臺上，胡“大叔”頭頂上遮著一柄王室御用的陽傘，周圍有配備手槍的越盟士兵負責保衛工作。他細聲細語地對著麥克風說道：“同胞們，你們聽得到我說話么？”人群山呼海嘯般地回答聽得見。

一位目睹這一事件經過的美軍情報官向他在中國南方城市昆明的上峰報告說：“就我所見，這些人是動真格的，恐怕法國人真得跟他們打交道。同理，我們也應該跟他們打交道。”44他當時還不知道自己的話多有先見之明。

許多法國人還被關在日軍把守的監獄里，如果說越南人宣布獨立一事嚇到他們了的話，那么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者則是惶惶不可終日了。1945年早期，阿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都經歷了嚴重的災荒，這既是旱災的結果，也有將食品供給調撥給軍隊的原因。在印度支那，100多萬人死于饑餓。在阿爾及利亞，饑荒導致民怨沸騰，心存畏懼的法國人將之視為暴力革命的肇始。

實際上，除了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和激進民族主義者刻意煽動叛亂外，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只是想得到一視同仁的權利。但是每每有穆斯林朝法國殖民者扔石塊，法國人就認為“阿拉伯革命”已經近在咫尺。1945年，新一屆殖民當局上任，左派在其中占據領導地位，他們中不少人曾積極抗擊過德軍。許多殖民者都擁護維希政府，而且極端反猶。（通常，只有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才會站出來捍衛法國治下猶太人的權利。）然而，那些呼吁阿爾及利亞獨立或爭取平等權利的穆斯林很快被人貼上了“納粹”的標簽。這就好比把印尼和越南要求民族獨立的呼聲看成是日本法西斯的部分陰謀一樣，從而為左派殖民當局和原維希分子打壓阿爾及利亞人授以口實。

阿爾及利亞的暴力沖突不斷升級，在該國西北城鎮塞提夫（Sétif）的周邊地區，由于饑荒肆虐，暴力事件尤為高發。法國殖民者同牧民發生沖突，飛揚跋扈的警官被人轟出村莊，右翼歐洲青年高喊“貝當萬歲”甚至是“希特勒萬歲”的口號挑釁阿爾及爾的穆斯林。法國警察還朝打算參加5月1日游行的一群穆斯林開了槍。

作為煽動穆斯林造反和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策源地，塞提夫理所當然成了嚴重暴力沖突的重災區。盡管過去曾同德國人狼狽為奸，但法國人決定在5月8日當天慶祝盟軍戰勝德國，好好地弘揚下愛國熱情。當天清早，穆斯林聚集在主要清真寺前，他們多數是鄉下來的，有男人，也有婦孺。一些人在耶拉巴斗篷（jellabas）[[14]](#_14_Ye_La_Ba__Yi_Zhong_Dai_Mao_Z)下藏著傳統式樣的短刀，有些懷揣手槍。AML的領導人（AML的全稱是Amis du Manifeste et de la Liberté，即宣言和自由之友，是穆斯林要求平等權利的一個組織）向官方保證這不是一場政治示威，不會有人打出民族主義的標語。

到了8點，人群壯大至300來號人，沿著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5]](#_15_Ke_Lie_Meng_Suo__1841__1929)大街向戰爭紀念碑行進，目的是去那兒敬獻花圈。AML沒有兌現承諾，人群里的民族主義者攤開標語，上面寫著：“我們想要和你們一樣的權利”。一個路障旁，警察看見有人高舉“阿爾及利亞獨立萬歲”的標語，一把搶了過來，然后當場打死了這個可憐的阿爾及利亞人。接著，似乎是蓄謀已久的法國平民端著機關槍，從陽臺上和法蘭西咖啡館里向外頭的人群掃射，導致20至40人死亡。被槍擊嚇壞了的穆斯林逃進小巷里，用手槍和匕首攻擊歐洲人。法國共產黨領袖阿爾貝·德尼耶（Albert Denier）被嚴重砍傷，以至于雙手必須截肢。

一名法國教師當時正在學校對面的咖啡館里喝東西，她回憶道：“四面八方涌來一群高聲尖叫的當地人，他們手持匕首，沖向阿拉伯市場，犯下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我看到大約15個人拿棍棒圍毆瓦揚（Vaillant）先生，他可是阿拉伯人的老朋友了……回想起當時的情景，真是太可怕了。奇怪的是，大多數襲擊受害者都是親阿拉伯的人士。”[66]

法國人大開殺戒的消息很快傳到了村莊。雖然報復行動呈現出零星的狀態，但是手段十分殘忍：“我們帶著刀子和步槍，我父親殺了個面包師，只因為他是法國人。我們把門撞翻，用找到的汽油一把火把房子給燒了。”[67]法國殖民者只得逃到當地警察局避難。有些人被抓，然后被剁掉手足，女的被割掉乳房，男的生殖器被割掉塞進嘴里。三天里，共有大約100名歐洲人遇害。

社會黨總督伊夫·沙泰尼奧（Yves Chataigneau）沒有呼吁各方冷靜，而是向軍隊搬來了一萬人的救兵：其中有摩洛哥人、西非人和外籍兵團士兵。這次行動的目的不止是恢復秩序，還有必要教訓一下阿爾及利亞人。殺害法國人的兇手必須血債血償。

法國殖民者組建了民兵聯隊，并開始攻擊當地人。其中的一支虎狼之師——阿爾及利亞兵團——被一紙調令從德國調回北非，這支部隊曾為擊敗希特勒殊死戰斗。回到故鄉，他們卻被派往內陸，追殺阿爾及利亞同胞。到6月底，整個鄉村已經陷入一片死寂。村莊和城鎮連續幾個禮拜被飛機轟炸，又被停在海上的戰艦炮擊；數以千計的人遭到逮捕，并常在領受酷刑后被處決。阿爾及利亞人的具體死亡數字一直是個謎，有種說法是死者高達3萬人。與屠殺相伴而來的還有刻意的羞辱。法國人重新祭出了19世紀讓原住民畢恭畢敬臣服于外來征服者的做法。成千上萬的農民滿臉菜色，再也無法忍受無休無止的轟炸。法國人逼著他們跪在法國國旗前，懇求寬恕。其他人被推翻在地，在威逼之下高喊：“我們是猶太人，我們是狗，法國萬歲！”

在一部分法國人看來，似乎阿爾及利亞總算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更有遠見的人，包括戴高樂將軍，清楚地認識到屠殺當地人是一個讓“永恒法國”（La France éternelle）蒙羞的污點。在官方吹噓的事跡里，法國可是大義凜然地抵御了納粹的威脅。因此，發生在塞提夫和周邊地區的事情許多年來一直被官方掩蓋。

然而，西貢的法國人將塞提夫事件視作一則警告：如果不盡快扼殺越南人渴望獨立的念頭，同樣的事就會輪到他們頭上。到了8月，時局看似對法國人不利。他們中不少人仍被關押在日本人的監牢里。越盟從日軍那里接收了越來越多的武器彈藥，有時甚至想拿就拿。部分日本軍官還加入了越盟，不管是出于信念驅使（“亞洲是亞洲人的”），還是因為他們需要一個藏身之所，避免被追究罄竹難書的戰爭罪行。雖然當時仍處于蔣介石國民黨治下的中國并不反對法國統治印度支那，但是法國的帝國主義計劃并不討美國人的喜歡。全心全意站在法國人這邊的只有英國人，這點倒不足為奇。

暴民的暴力活動往往因謠言而起。比如9月20日，河內民眾相傳法國人正在密謀，計劃通過殖民警察里越南人的協助，重新獲得對局面的控制。據說，有人發現了大量藏匿的武器，還有人說法國人要動用毒氣。法國兵不僅被日本人從牢里放了出來，甚至手上又有了槍。為了挫敗法國佬的陰謀，成千上萬的越南人拿著刀子、長矛和砍刀，沖進法國人家里打家劫舍，在街上見到法國人就尋釁滋擾。日本兵多數時候只是袖手旁觀。

河內最好的酒店大都會飯店（Metropole）里的招待也闖進客房，毆打客人，把他們堵在餐廳里。一個設法逃脫的法國人請求日本人釋放法國俘虜，以維持秩序。

弗朗索瓦絲·馬丁（Françoise Martin）是個法國女青年，她來河內“不是為了賺這個國家的錢，恰恰相反，自己渾身上下流淌著人道主義的理想”。她滿腦子只有“對中國——安南文化的崇敬”。然而，她對在街上抗議、要求獨立的越南人的看法恐怕頗能代表多數法國殖民者的心聲：“他們中間可能有真正的愛國者……但是，就這幫舉著旗子、滿大街亂竄的烏合之眾而言，里面盡是些罪犯和低能兒，只要一看到五六條槍，他們立馬就會龜縮進鼠洞里。不幸的是，我們連這么幾桿槍也沒有，而且一時半會也不會有。”[68]

8月，關于一棟法國人的別墅里藏有大量武器的流言更加甚囂塵上。示威人群譴責法國帝國主義。但是，除開鄉下出了些殺人案外，越南人針對法國人的暴力行動并未形成多大規模。但法國人還是怕，就算國內大放厥詞——戴高樂將軍宣稱要把印度支那當成“法國鳳凰涅槃、重振國威的幾大主要目標之一”[69]——法國人因為孤立無助，恐懼感反而加深了。

“每個人都武裝到了牙齒。”弗朗索瓦絲·馬丁回憶起河內的局勢時說道，“美國人、華人、安南人都是如此；只有法國人手里除了棍棒和空瓶子外，就沒有其他可以用來自衛的武器了……”[70]她對越南人爭取獨立的分析同她所處的大環境和時代背景十分吻合，也和她認為抗議者都是“低能兒”的看法一脈相承。這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陰謀：“表面上，日本人是放下了武器，但他們還在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著戰爭，阻礙印尼和馬來亞重新落入歐洲人之手；無論在哪兒，他們的伎倆都別無二致：制定背信棄義的計劃，處心積慮地準備，一絲不茍地實施……這可真是亞洲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又一個令人嘆服的例證啊，而白種人就是會不斷上當。”[71]

然而，流血事件最終卻并非發生在河內，而是在西貢。重大麻煩來臨前的最初跡象跟阿爾及利亞的情況有著驚人的相似。9月2日，幾十萬被西方媒體慣稱為“安南人”的越南人聚集到西貢，通過無線電收聽河內的胡志明發表獨立宣言，他們當中多數是鄉下趕來的農民。一大早，全副武裝的越南青年在一座軍營大門前舉行抗議，里面依舊關押著法國軍人。對于越南人的冷嘲熱諷，法國人用辱罵回敬，并高唱《馬賽曲》。由于技術故障，人群沒能聽到胡志明的廣播演講，他們懷疑是法國人從中作梗，更加群情激奮。游行的人剛抿達大教堂，就聽到了槍聲。人群頓時亂作一團，暴民懷疑是法國人開的槍，于是見到法國人就打。華人和歐洲人的店鋪遭到打砸搶，神甫遇害，一些女人被踢掉了牙。

法國人指責是挑事的越南人開的槍，導致了暴亂。兩周后，他們做通了英國將軍道格拉斯·格雷西（Douglas Gracey）的思想工作，說是時候把越南人從警察局和公職隊伍里開除出去了，是時候重新武裝法國人了。出于殖民主義者之間的同仇敵愾，英國人同意了。9月23日，西貢看似恢復了往日的秩序；法國人再度大權在握。幾個禮拜、幾個月乃至幾年來忍受的屈辱和無助，讓法國人的歡慶勝利演變為一場“武斗大會”：如今輪到越南人被法國暴徒處以私刑了。一位英國軍官在報告中描述：“槍聲大作，安南人在街上被人拖行，然后扔進監獄。”[72]

報復來得很快。第二天，越南人就闖進法國人家里，毆打住戶。法國人在河岸邊遭受嚴刑拷打。嫁給法國人的越南女人被捅傷致殘。據史料記載，一名懷有八個月身孕的孕婦還被人開膛破肚。西貢的戰斗持續了大約兩個月，英國人、法國人和日本人都同越南人展開激戰。有些日本人后來倒戈，投靠了越南人。法國的外籍兵團里也是魚龍混雜，不乏曾在北非和盟軍打過仗的德國人，甚至還可能有黨衛隊軍官。數以千計的越南人在監獄里受盡了酷刑，只經過5分鐘的“審判”，就被處以重刑，甚至是死刑。

到了11月中旬，法國人又能在體育俱樂部里享用他們的開胃酒了，并確信生活將一切照舊。這種假象維持了一段時間，直至1949年南越獨立、定都西貢時才宣告破滅；而在北越，隨著1954年胡志明的共產黨被承認為北越民主共和國的統治者，并且定都河內，這一幻想也化為了泡影。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比這個狹長的東南亞國家更能印證莎翁的話了。麥克白對他夫人說過，冤冤相報，血債血償。此言不虛，越南在歷史上曾分為法屬東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部分，后來呈現南、北越分庭抗禮的格局，最后才實現國家統一。

[[1]這里的long knives，暗指night of the long knives，長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和慕尼黑對其政敵、沖鋒隊頭子羅姆展開清洗行動，此次事件中，有數百名沖鋒隊軍官被處決。](#_1_3)

[[2]即諾門罕戰役。](#_2_3)

[[3]即今日的遼寧省丹東，舊時稱安東。](#_3_2)

[[4]Veronika Dankeschön，Dankeschön為德語里的“非常感謝”之意，這里是雙關。](#_4_2)

[[5]拿破侖戰爭后，沙俄成為贏家，根據1815年維也納會議（Congress in Vienna）的決議，進一步獲得了原為普奧吞并的那部分波蘭領土，并把立陶宛的一部分也并入波蘭，此后的俄屬波蘭就稱為Congress Poland，或譯議會波蘭，實為俄屬波蘭。](#_5_2)

[[6]黑、紅、金三色是德國國旗的顏色，也是傳統的日耳曼民族圖騰的顏色。](#_6_2)

[[7]烏克蘭港口城市，位于黑海旁邊的克里米亞地區，2014年俄烏危機后，克里米亞公投并入俄羅斯。](#_7_2)

[[8]二戰中德國屠殺了600萬猶太人，約為全球猶太人總數的1/3。](#_8)

[[9]Kibbutz，以色列集體農莊。](#_9)

[[10]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首位總理。](#_10)

[[11]伊弗雷姆·卡齊爾（1916—2009），從政前是以色列著名物理生物學家，以色列國防軍首席科學家。他的弟弟拉沙米也是享譽世界的化學家，后來死于1972年巴解組織策劃的盧德機場大屠殺。](#_11)

[[12]吉斯林（1887—1945）系挪威法西斯頭目，協助納粹占領挪威。](#_12)

[[13]東南亞人穿的布裙。](#_13)

[[14]耶拉巴，一種帶帽子的斗篷，常見于北非地區。](#_14)

[[15]克列孟梭（1841—1929），一戰期間任法國總理，主持了巴黎和會。](#_15)

# 第二部分 清理廢墟

## 第四章 回家

1945年5月，逾800萬“戰爭流離人員”被困在德國，等待被遣返回國，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在歐洲其他地方，這樣的人還有差不多300多萬，他們中一些人思鄉心切，有些除了不想回家，去哪兒都成。其余的人則再也回不去了，因為他們無家可歸：比如流落烏克蘭的波蘭人、奧地利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藏身南斯拉夫的白俄人、逃難到哈薩克斯坦的猶太人等等。在亞洲，流離人員的數量同樣龐大：650萬日本人被困在亞太各地，其中一半是平民。100多萬客居日本的朝鮮勞工依然寄人籬下。成千上萬的澳洲、歐洲和美國戰俘則散落在日本、中國大陸、臺灣和東南亞等地，印尼人和其他亞洲人則被迫為日本在該地區的軍事工程賣命。多達18萬亞洲人參與修建了泰緬鐵路，其中只有約一半人活了下來。

但凡是戰爭都會導致流離失所。2003年由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致使500萬人背井離鄉。二戰所引發的人員流散規模空前巨大，究其原因，可以發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為造成的：既出于冷酷的現實考慮，也有意識形態的驅動。比方說：奴隸工程、人口流動、“種族清洗”、國家邊界變更、德國和日本兩個“主宰者民族”外遷以尋求生存空間、內戰爆發，以及整個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歐洲，這些災難背后的主要元兇是德國人，但斯大林在蘇聯國內及其邊疆地區所施行的政策往往和希特勒一樣導致生靈涂炭。[1]

對我父親而言，回家的想法并不復雜。1944年，盟軍解放荷蘭部分國土、并切斷他老家和德國之間的聯系后，他和家里人的通信就中斷了。即便如此，他至少還有家可回。1945年夏天，他從馬格德堡（Magdeburg）一座英國收容站出發，先后乘坐英軍卡車，而后轉火車，再換公共汽車，被送至荷德邊境。邊境小鎮恩斯赫德（Enschede）的接收委員會對他和其他返鄉的荷蘭人進行了盤問，調查他們在德國做工是出于自愿還是被逼無奈。那些被懷疑自愿效勞的人不光失去了領取食品配給的權利，而且還面臨著麻煩。從這種麻煩上，可以管窺未來幾十年一直困擾荷蘭人的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像覆蓋在民族傷口上的舊瘡疤，一遍遍地被人揭開：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勇士，誰又是懦夫；誰賣國求榮，誰抗擊外敵；誰是英雄，誰又是惡棍。（當然，實際上很少有非此即彼的那類人。）想要在歡迎聲中回家，之前的路途可謂頗費周折。話說回來，盤問我父親的人倒是彬彬有禮，他對此印象深刻：在習慣了當官的朝他大吼大叫后，他對這種禮貌已經有些不適應了。

到達家鄉奈梅亨后，父親的心情變得更加復雜。他離開柏林時，這個城市已經滿目瘡痍，可以說他見慣了破壞。但即便如此，走過奈梅亨古老的市中心時，他一定沒有了方向感。原先許多氣派的建筑都不見了，有些可追溯至中世紀。1944年，美國人的一場空襲搞錯了目標，結果這些古跡遭了殃。父親多年來一直渴望回家，但突然間他卻心生怯意，以至于離家不遠了，他卻難以邁開步子。個中原因他已記不太清了，也許是因為無法確定雙親是否還健在，或者老房子還在不在。抑或者，他也許擔心魂牽夢縈的團聚會讓人尷尬；他不在的時候，可是發生了很多事情。

最后他還是回了家。全家人都安然無恙，團聚充滿了歡聲笑語，他也很快找回了屬于自己的地位，并重新融入社會。父親是幸運的。

反觀其他人，流離失所的狀態持續了更長一段時間，而且回家也只會收獲失望，甚至還有更糟的下場。曾經遭遇的極端經歷在人與人之間產生了一道理解上的鴻溝。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一個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活下來的人，怎么可能讓家鄉人理解他或她曾經歷過的事呢，更何況這些人甚至連滅絕營都沒聽說過？

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凱爾泰斯（Imre Kertész）在1992年的小說《無命運的人生》（Fateless）一書中就談到了這種理解鴻溝。[2]作者本人是歸化了的布達佩斯猶太人，曾被囚禁在奧斯維辛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被遣送時年僅14歲，所以是在集中營里長大成人的。作家在小說里塑造了捷爾吉（György）這個有他自己影子的人物。捷爾吉回到布達佩斯，身上還穿著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配發的破破爛爛的條紋囚服，他臉龐消瘦，滿是斑痕，像個老頭。老家的房子里住著一群陌生人，他們充滿敵意，形跡可疑，見到捷爾吉后便狠狠關上了門。對于集中營的生還者，特別是猶太人而言，這種經歷并不鮮見。因為人們不指望猶太人還會回來，如果真回來了，只會對他們冷眼相待。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同設法滯留在布達佩斯的昔日猶太鄰居重逢只會讓捷爾吉更加痛苦。他們告訴他：“國內日子也不好過。”得知他曾被關在哪里后，鄰居給了捷爾吉一條善意的忠告：他應該“忘了恐怖的經歷”，一心只想未來。這樣的話捷爾吉之前也聽到過。他在電車上遇到一位熱心人，一名“民主派”記者，后者告訴他：最重要的是“納粹的地獄火坑”總算完蛋了，一切都結束了。

捷爾吉沒法讓人們明白他并未去過什么地獄，他的經歷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成分，他待的地方是集中營。他怎么可能忘記過去，只想著未來呢，難道過去只是做了個噩夢？或看了部恐怖電影？集中營的生活既非出于自愿，也談不上舒適，但這終究是生活，是他的生活。你無法忽視這一延續性。問題在于，沒有經歷過相似情景的人，難以想象當時的情況，他們也不愿去想象，于是就遁入了抽象的話語，一會兒“地獄”，一會兒“恐怖”，而這些東西應該盡快被拋之腦后。

凱爾泰斯在小說結尾描寫的那些人物——記者、捷爾吉的鄰居施泰納先生、弗萊施曼夫婦——都對捷爾吉抱有善意。但戰時留在國內的人，后來在面對集中營幸存者或其余歸國人員，譬如戰俘或第三帝國客籍工人時，并非都表現得如此友好和溫情。吃苦受難本來是件很個人化的事，但我們許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悲慘經歷得到別人的承認。如果別人也吃過苦，而且吃的苦明顯多過我們，就有可能惹人惱火，也許還能勾起罪惡感，因此才有了“國內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這樣的話。

猶太幸存者重返故鄉，不管是回到波蘭等經歷血雨腥風的中歐國家，還是回到荷蘭這樣的西歐國家，他們有時遇到了冷若冰霜的對待。這種情況同一種模糊的、未完全泯滅的良心負罪感有一定關聯，此外也源于反猶主義偏見。在經過了若干年德國占領軍宣傳大棒的教化后，這種偏見其實更可能是不減反增了。

這一點不止在通敵者和納粹同情者身上得到了印證。1944年，荷蘭南部光復后，一個名叫內蒂·羅森菲爾德（Netty Rosenfeld）的女青年終于可以告別躲躲藏藏的日子了。她來到一家荷蘭抵抗運動管理的廣播電臺求職，卻被告知羅森菲爾德這個姓氏不適合干廣播這行。畢竟，她要理解，已經有足夠多的猶太人為“重生荷蘭”廣播公司（Radio Herrijzend Nederland）工作了，這家電臺甚至被起了個綽號，叫“重生耶路撒冷”。猶太人經歷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他們肯定吸取了一個教訓：就是別想再排到隊伍的最前面，期待還能主宰社會——這可是好言相勸。

1945年9月，一個名叫齊格弗里德·古德斯密特（Siegfried Goudsmit）的人在《準備報》（Paraat）這份荷蘭抵抗運動創辦的左翼報紙上講述了下面這則故事：

一個公交車站。乘客們正在等候開往阿姆斯特丹的公交車。人群中有兩個猶太人。其中一個坐在凳子上……某位非猶太“女士”對此不能接受，她告訴猶太人他應該站著。“其他人才有權坐這個位子”。您說得對，太太，要是我身體健康的話一定站著，但我從德國集中營逃出來后，十分虛弱，最近剛出院。您也看得出來，我身子骨依然很弱。“他們真該把你留在集中營，你這樣的人我們這兒已經夠多的了……”[3]

納粹集中營的其他生還者被告知，不是只有他們才吃過苦；荷蘭人也在挨餓，或丟了自行車[[1]](#_1_Er_Zhan_Shi__Hen_Duo_De_Guo_R)，或如何如何不幸云云。猶太人被奉勸不要老是提要求，也不要太得理不饒人。他們應該認清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

曾經隸屬于抵抗運動的報紙《愛國者》（De Patriot）發表過一封討論戰后荷蘭反猶主義問題的讀者來信。這封信刊登于1945年7月2日：

毫無疑問，猶太人正是由于遭受過德國迫害，博得了荷蘭人民的巨大同情。現在猶太人有必要見好就收，別太過分；他們應該時時刻刻牢記感恩的義務，而表達這種感激之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盡他們所能，為那些代猶太人受苦受難的荷蘭人提供補償。猶太人應該感謝上蒼，他們從集中營里活著走了出來。這份（來自荷蘭人的）同情也可能被人棄如敝屣……他們（猶太人）真的不是唯一吃過苦的人……[4]

如此看來，多數猶太幸存者選擇保持緘默就不足為奇了。對于1940年大約15萬荷蘭猶太人有四分之三未能活下來，他們保持緘默；對于只有區區5000人從集中營返回家鄉，他們保持緘默；對于荷蘭官僚、警察和法官積極協助納粹劊子手屠猶，他們保持緘默；對于猶太人被一火車皮一火車皮往外遣送時荷蘭人的噤若寒蟬，他們一樣保持緘默。

戰后最初幾年里，荷蘭一口氣興建了大批戰爭紀念碑，有為抵抗運動戰士立的，有為陣亡軍人立的，有為民族苦難立的，也有為英雄烈士立的。第一塊猶太大屠殺紀念碑立于1950年，位于阿姆斯特丹，靠近昔日猶太市場、17世紀葡萄牙猶太教堂和猶太人住宅區的交界處。這些宅子的主人曾經被人拖出家門，房子自此空置，里面的東西繼而被瓜分，什么也沒剩下。紀念碑由白色石料雕琢而成，頂端有一顆大衛星，表面刻著五幅浮雕，分別描繪愛、抵抗、堅韌，以及荷蘭人的悲慟這幾個主題。這座紀念碑名叫“猶太感恩紀念碑”。

事實上，猶太生還者的存在讓人尷尬。因為在戰后廢墟上匆匆構建起來的英雄事跡根本和他們無關。不管在荷蘭、法國或任何其他國家，人們都想忘記一些不太光彩和叫人難過的往事。經歷了戰時國土淪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別人大難臨頭時，選擇低下頭，當做什么也沒看見，他們靠這種明哲保身之舉，竭盡所能地在國恥中委曲求全。完了卻跳出來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1950年代，那時我還在讀小學，從小到大，老師自豪地給我們講荷蘭人民抵抗外敵的故事——大多是些小題大做的段子，比如德國兵跟人問路時，故意給他們指錯方向，等等。

我年幼時最喜歡的兒童作家是諾雷爾（K. Norel），他的書講的都是抵抗運動小戰士的英勇行為，標題個個起得慷慨激昂，譬如《趕走暴政》，《待命，兒童團》，《抵抗和勝利》。然而，不管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英雄名單里都沒有猶太人的位置。陳舊的偏見并未消逝。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諾雷爾的《趕走暴政》：“猶太人也許不是英雄，但他們真的很精明。只有在納粹開始搜刮猶太人的財富和資產時，他們方才覺醒并發動報復。他們精到骨子里了，所以才沒讓敵人卷走上百萬的錢財。”

\* \* \* \* \*

在法國，經過一段時期的狂野報復后，戴高樂政府決意彌合法國社會的深刻裂痕，做法是營造一種多數公民都曾英勇抗擊德國人的假象。然而，盡管這一功利性的自我麻醉也許有其必要性，但回鄉的戰俘卻同猶太人一樣，與其基調格格不入。這些邋里邋遢的男人，穿著磨破了的老式軍裝。作為1940年恥辱戰敗的責任人，法國自然不會轟轟烈烈慶祝他們回國。在“戰斗的法國，唯一的法國，真正的法國，永恒的法國”中（這是巴黎解放后第二天戴高樂的原話），沒有這些人的位置。他們唯一的希望是還能領到食品配給券，拿到一些現金，讓醫生給他們做一次體檢，最后還能光臨幾個放《馬賽曲》的酒吧（前提是他們人數夠多，值得奏樂歡迎）。

維希政府曾把戰俘描繪為一群勇士，他們忍受牢獄之災，為的是保全法國的榮耀，這些宣傳在戰后給回鄉的戰俘幫了倒忙。日后成為著名作家的羅杰·伊科爾（Roger Ikor）于1940年5月被俘，雖然他有猶太血統，但還是和其他法國戰俘一樣被關押在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大牢里。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我們被人噤聲，無法抗議，成了貝當和他黨羽最好的支持者。他把我們比作法蘭西最純凈的血液，難道不是再正常不過了？出于恰恰相反的理由，戴高樂主義者鄙視我們。兩百萬戰俘，兩百萬沾上貝當主義污點的戰俘，讓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佬和他們對法蘭西的看法蒙羞了。我們沒像他們那樣頑強抵抗，而是甘愿束手就擒了吧？所以我們必須得是懦夫，流的不是最純凈的而是最骯臟的血。”[5]

于是，戰俘回國后，人們對他們常常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冷臉，嘴上雖然不說，但舉止悄無聲息地透射出蔑視。戰俘們能夠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視。在遣返中心，接待他們的都是穿制服的官員，態度蠻橫，而且常常是女人。她們的官銜有時高過這些在鐵絲網后度過戰爭的男人，而且并不羞于拿官階壓人。

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曾參加抵抗運動，她在《戰爭》這部回憶錄里描寫了這種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做派：

不斷有人抵達。一卡車接著一卡車……戰俘被分成五十人一組，扔在遣返中心……這些可憐的小伙子看著大廳，臉上都掛著笑容。他們周圍站著遣返中心的軍官。“來，小伙子們，排好隊！”他們于是排好隊，依舊面帶笑容……最近這幾天我一直在火車東站，有個女人對著外籍兵團一名士兵一通臭罵，然后指了指她的肩章。“不知道要敬禮么，小子？你沒看到我是上尉？”[6]

杜拉斯本人很左，而且對她描述的這些愛擺官架子的官員甚為鄙夷。拿她的情人和左派抵抗運動同志迪奧尼·馬斯科洛（Dionys Mascolo）的話來講（馬斯科洛在回憶錄里簡稱“D”）：這些人是反動派，他們“反對任何不直接歸屬戴高樂派的抵抗運動，他們會占領法國，他們自以為代表了有思想的法國、有權威的法國”。[7]他們口中“永恒法蘭西”的英勇事跡一定是對自己的謳歌。

杜拉斯的回憶錄里還有一段讓人為之心碎的文字。她的丈夫羅貝爾·安泰爾姆（Robert Antelme）也是左翼抵抗運動戰士，他被德國人逮捕后送往布痕瓦爾德。盡管在戰時已經和“D”好上了，但杜拉斯依舊渴望見到丈夫活著回來。這也是她為什么來來回回往返于遣返中心和火車東站之間的原因。她迫切想要得到他還活著的消息。后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日后的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德國人的集中營里巧遇了安泰爾姆，后者已經無力說話，更別說走路了。但是，日思夜想的團圓最后還是在巴黎上演了：

博尚（Beauchamp）和“D”用肩膀架著他。他們在一層樓停了下來，他抬頭往上看。

后來的事我記不太清了。但他肯定是在看我，然后綻放出笑容。我尖叫著說，不，我不想看到你這樣。我又開始狂奔，這次沿著臺階飛馳而上。我記得自己在撕心裂肺地尖叫。我的尖叫引發了戰爭，六年了，我從未哭過一次鼻子。我躲進了某個鄰居家里。他們逼我喝下一些朗姆酒，往我嘴里灌酒，對著尖叫的嗓門灌酒。

接著，過了一小會兒，她又見到了他，安泰爾姆的臉上依然掛著笑容：

正是這個微笑，才讓我認出了他，但我們之間隔著好長一段距離，就好像我是在隧道的另一頭與他相見。這是一絲帶著尷尬的笑。他在為自己以這種頹廢的狀態出現在我面前表示歉意。然后，笑容漸漸隱去，他再度成為一個陌生人。[8]

我父親沒去過布痕瓦爾德，他老婆也不是某個投身荷蘭抵抗運動、找了情人并很快同他離婚的女人。他的回家之路遠沒有安泰爾姆那樣富有戲劇性。但在杜拉斯回憶錄的這段文字之中，有些地方也暗示著我父親害怕回家的原因——擔心自己變成陌生人。

\* \* \* \* \*

如果說法國戰俘的回鄉之路已經夠艱辛了的話，那么對德國和日本戰俘就更是如此。他們肩上不僅承擔著吃敗仗的負擔——這已經夠沉重的了——還要面對來自同胞的鄙夷，甚至是仇視。在國人眼里，他們要為一場災難性的戰爭負責，他們還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曾幾何時，這群不可一世的戰士騎在整個民族頭上作威作福，但最后卻輸得一敗涂地，灰溜溜地回來了。這種說法當然有失公允。也有人，包括幾百萬女性，曾經夾道歡送他們奔赴戰場，手里揮舞旗幟，嘴上唱著愛國主義歌曲，還慶祝他們打了勝仗——有些是真打贏了，有些則是政府的虛假宣傳。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里，官方歇斯底里的蠱惑導致全民血脈賁張，對于其后果，普通士兵所承擔的責任，并不比那些曾高聲祝愿他武運長久的普通百姓要多。起碼在德國，什么樣的罪名都可以往納粹頭上扣。日本人沒有納粹黨，所以就把他們的軍事災難歸咎于“軍國主義者”，或者往大了說，歸咎于任何同軍隊有關聯的人。這同樣也是戰后美國宣傳機器所傳播的觀點，日本媒體對此也是亦步亦趨。

正如日本散文家坂口安吾所寫的那樣，神風特攻隊的飛行員（Tokkotai）“今天已經搖身一變成了黑市上的混混了”。[9]人們把這種云泥之別的落差，把這一掙脫國家妄想的全民覺醒，完全歸咎于那些被派去為天皇玉碎、最后卻不幸茍且偷生的人。戰后沒多久，日本曾流行過這樣一個詞，Tokkotai kuzure，即“墮落的神風隊員”，用來形容那些曾經滿懷病態理想主義、后來卻墮落到整天嫖妓買醉的年輕男子。

1945年日本戰敗前夕，人們就已經對日軍的耀武揚威頗有微詞，雖然公開抱怨要冒極高的風險。戰時軍人濫用暴力，到了和平時期又從事犯罪勾當。當人們見識了其轉變之快后，帝國軍人的高大形象就變得更為不堪了。戰爭末期，軍隊倉庫依舊塞滿了商品，要什么有什么，除了武器外，還有毛毯和衣服，這些對窮困潦倒的國民而言都是必需品。經過高級軍官和他們的平民親信——多為戰時劣跡斑斑的幫派成員——大規模且有組織的掠奪后，倉庫空空如也。漸漸地，這些商品流進了黑市，售價之高，使多數人無力消受。

讓幾百萬接受訓練、成為國家殺戮機器的年輕人重新做回老百姓，從來都不是一個順利的過程。吃了敗仗的恥辱感讓這一轉型更難實現。1946年夏天，一檔電臺節目開播，其在提供失蹤人員信息之余，還推出了一個特別板塊，目標聽眾是彷徨無措的老兵，每周播放兩次，欄目名字叫“我是誰？”。此舉顯得再合適不過了。[10]

垂頭喪氣的士兵因為軍事失利已經毫無血性。返鄉后，看到家園破敗，或者婚姻告急，他們面臨更為沉重的打擊。描寫戰后初期的德日兩國的電影和書籍都有一個相同的主題，即返鄉士兵和妻子之間的鴻溝。妻子因為寂寞難耐，或只是為了糊口活命而與人偷情。這一主題和戰爭本身一樣古老：從特洛伊征戰歸來后，阿伽門農被他的妻子，或是她妻子的情人殺死在自己家里，也有說法是兩個人協力謀害了他，這取決于讀者讀到的是哪個版本的故事。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拍攝于1979年的電影《瑪麗婭·布勞恩的婚姻》是將這一主題刻畫得最入木三分的德國電影之一：瑪麗婭的丈夫剛從慘烈的東線戰場退下來，發現自己的老婆幾乎赤身裸體躺在一個黑人美國兵的懷里。這一故事中，最后命喪黃泉的是奸夫。日本也拍過一部類似的影片：由小津安二郎執導的《風中的母雞》（1948年），雖然知名度較前者要低不少。跟小津一貫平如止水的風格不同，影片最后高潮迭起，丈夫因為妻子在他離家期間和其他男人上床，醋意大發，憤而將她推下樓梯。妻子受了傷，一瘸一拐卻仍央求他的原諒。最后，隨著兩人的淚水縱情流淌，影片在皆大歡喜中結束。

在跌宕起伏的大結局到來之前，影片的故事情節很能反映當時的時代背景。片中的妻子時子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努力用她做針線活賺來的微薄收入維持自己和年幼兒子的生計。兒子后來身患重病，時子無力支付醫藥費，于是只好在一天夜晚下決心向一個陌生人出賣自己的肉體。當丈夫修一最終從戰場上歸來后，時子向丈夫坦白自己曾賣淫失身。修一對妻子的不忠怒不可遏，狂性大發。但忠不忠其實不是重點：真正激起戰敗士兵怒火的是他為了重獲自尊所作的掙扎。影片高度現實主義，盡管在真實的生活中，婚姻也許不會因為催人淚下的和解而得到挽救。

報紙收到的讀者來信顯示出士兵返鄉的問題十分嚴重。1945年12月16日的《朝日新聞》曾刊登過知名的小說家志賀直哉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出政府有義務改造昔日的神風隊員。年輕人曾被教唆要為國家榮譽舍生取義，這叫他們在1945年后人吃人、冷漠的世界里有何資本重建生活呢？唯一能防止他們墜入絕望、被人喚作墮落者的辦法就是國家要啟動一項特殊教育計劃。在給志賀直哉的回信中，一位作者對他的建議表示贊同，但同時指出日本社會本身也亟須再教育。某封信的作者本人就是受訓進行自殺式襲擊的神風隊員，他表示Tokkotai在戰時的訓練和精神正是戰后日本墮落文化中所需要的元素。

《朝日新聞》收到的所有來信中，有一封言辭最為激烈，作者同樣也是退伍軍人。這封信刊登于12月13日：

同袍們！我們現在自由了。我們從暗無天日、慘無人道的軍旅生涯中解脫出來，從血淋淋的戰場上活著回來了。但在國內，等待我們的卻是老百姓犀利的眼神，他們懷著對好戰派的滿腔怒火。我們的家園在戰火中毀于一旦……血腥的戰斗是結束了，但是生活真正的戰斗才剛剛打響……[11]

事實上，他寫道，年輕時的一些幻想已經被軍旅生涯扼殺了。自私自利、欺軟怕硬的軍官們平日里總是惺惺作態，表現出一副效忠國家、或忠于其他浮夸理想的姿態，后來被證明完全就是矯揉造作，毫無真情。普通一兵被當成一臺機器。事到如今，他寫道：“老兵已經成了壞人的同義詞……”

“人們到底是如何看待我們這些老兵的？”同一天的報紙上，另一位作者這樣問道。“人們認為當兵的和好戰分子是一回事。當然，好戰派應當為我們戰敗承擔責任。但是普通士兵并不是這樣的人。他只是一個為自己國家而戰的愛國者。你們真的以為我們放棄自己的大好青春，在陸地戰場或太平洋上廝殺，為的只是滿足我們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么？我真心希望人們能對我們老兵多一些溫情。”[12]

類似的情緒一定能得到越戰美國老兵的共鳴。但即使是打贏了一場幾乎全世界人都認為師出有名的戰爭，勝利者回國后過回老百姓的生活時也會遇到問題。小名“比爾”的威廉·莫爾丁（William“Bill” Mauldin）是美軍里最有聲譽的漫畫家。他在《星條旗報》里用調侃的筆法塑造了威利和喬這兩個努力適應歐洲戰場軍旅生涯的美國大兵。他的作品讓他成為了美國大兵——亦稱“大頭兵”（dogfaces）——心目中的英雄。威利和喬說話風格及思維方式跟一般士兵沒什么兩樣。他們的想法常常都不討長官喜歡，這一點使莫爾丁招徠了巴頓將軍的抨擊，后者還威脅要讓這“兔崽子蹲班房”。1945年6月，威利的形象出現在《時代》雜志的封面上，他的模樣看起來很疲憊，胡子拉碴，蓬頭垢面，邋遢得很，左側嘴角叼著根香煙，這跟勇士的威猛形象相差十萬八千里。

在發表于1947年的作品《回家》中，莫爾丁圖文并茂，描繪了威利和喬的返鄉之路。從莫爾丁的畫來看，兩人面臨的麻煩，以及他們展現出的態度，很接近日本報紙編輯收到的老兵來信中流露出的情緒，只是立場更為溫和。比如拿反感上級這點來看：威利和喬兩人穿著寬松的平民服裝，站在酒店前臺前，等待登記入住。身旁，一個穿著條紋褲子、頭戴帽子、上衣縫有肩章和金黃色紐扣的搬運工正提著他倆的行李。這人臉色陰沉。喬搭話道：“是威爾遜少校啊，哦喲，你又穿上制服啦。”

比起日本兵對他們長官的仇恨，威利和喬的壞脾氣還沒有那么烈。要知道，日軍長官曾派手下幾萬人執行自殺式任務，在新幾內亞或菲律賓遭遇敵軍火力、食物短缺之際，還殺掉下屬，靠吃他們的肉果腹。但莫爾丁要表達的主旨，即一個不合格的士兵最多也就讓自己倒霉，而若“將帥無能”，則會“累死三軍”，說的同樣是這個道理。[13]

要跨越軍旅生涯和凡人生活之間的鴻溝，不管是對戰斗英雄，還是對沒立過什么重大戰功的人來講，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前者的適應過程甚至可能更為艱難。對于軍嫂和女朋友來講，返鄉的軍人并不總是英雄氣概十足。一幅漫畫里，威利就穿著一套臟兮兮的西裝，格外別扭地抱著自己戰時出生、從未見過的孩子。他那戴著考究的帽子和手套的太太如此評價：“我本來希望你能穿上軍裝，這樣我就能以你為榮。”莫爾丁介紹道：“威利太太認識威利時還在讀大學，那時處于戰爭初期，戰事還較為順利，和班上的女同學一樣，她崇拜穿漂亮軍裝的男人。她一直對威利有些失望，因為他沒有當上手握馬鞭、穿粉紅色馬褲的軍官”，甚至連勛章都沒得過。因此，莫爾丁接著說：“她不僅被剝奪了佩戴他的勛章、昂首闊步的樂趣，而且她突然意識到，自己之前從未見過他穿便裝的姿態，而且他看著真有些皮肉松弛，其貌不揚。”[14]

因此，一些老兵在理想幻滅后，由于無法適應平頭百姓的生活，或者受戰爭創傷太深，從而出手傷人，就不足為奇了。所有戰爭過后都有這種情況。但是在二戰結束后的第一年，媒體對這些案件給予了過高的關注。一則漫畫里，威利的太太在讀報，標題寫著“老兵腳踹嬸嬸”，她身旁的威利滿臉沮喪，坐在扶手椅里，喝著一杯威士忌。漫畫的文字介紹是這樣的：“第17版上有條兇殺案的短訊，兇手用斧子連殺三人，沒有老兵牽涉此案。”[15]莫爾丁一語道破了悲哀的事實，諸如此類聳人聽聞的標題“為戰后每個國家都存在的流言蜚語火上澆油——返鄉軍人所受的訓練就是殺戮和斗毆，他們將是社會潛在的威脅”。

跟德日兩國老兵相比，返鄉美國兵造成的問題盡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近似，但可能沒那么嚴重。他們畢竟是戰斗英雄，回到了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沐浴在勝利的光環之下，而且不久之后還將獲益于偉大的美國兵法案，由政府出資，接受教育。但即便在美國，身著戎裝的男人常常和英雄事跡對不上號。不過，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有一點重要區別，這種區別造成的影響比任何慘絕人寰的戰爭過后的苦日子都要長久得多。一方面，德國人和日本人對英雄理想喪失了興趣。他們再也不想和戰爭扯上關系。另一方面，英國人和美國人卻一直未能擺脫對以前崢嶸歲月的懷念，這就導致了一種很要命的傾向，誘使他們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發動軍事冒險，如此一來他們和他們的國家就能重溫一回當英雄的舊夢了。

\* \* \* \* \*

那么，那些不愿回家的人后來下場如何呢？

克恩滕州（Carinthia）是奧地利的農業區，那里的德拉瓦河谷（Drau Valley）因壯觀的阿爾卑斯山風光聞名于世，山澗湖水冰涼澄澈，牧場綠草茵茵，松林覆蓋，鮮花爛漫。這番美景，對于從南斯拉夫逃難至此的斯洛文尼亞難民而言，就像來到了人間仙境。他們之前藏身于深山中，躲在一條勞工為德軍所挖的隧道里，里面伸手不見五指，被水浸泡。此刻，他們終于走出隧道，重見天日。后來，也有別的人頂著嚴寒，走過崎嶇艱險的山路，來到這里。其中一個人回憶起當時情景時說道：“在這片風光旖旎的大地，在這方奇妙多姿的世界，四周各個角落似乎都閃著生命的光芒，發出生命的回響。”[16]

1945年的春天很美。然而，如果走近了看，除了能見到星羅棋布點綴其間、美不勝收的村落和鄉村教堂外，還能在這片神賜之地上看到一些奇怪且不太和諧的跡象。德拉瓦河谷遍布著難民營和棚戶區，這些臨時搭建的房子里住著上萬人，有退役軍人、婦孺，還有他們的馬匹、牛車，甚至還有駱駝。村子里能看見哥薩克人，他們戴著高高的羊皮帽子，神氣活現；除了斯洛文尼亞農民外，還有塞族的切特尼克黨人，部分是保皇黨，部分是法西斯，有些則兼具雙重身份。此外，這里還有克羅地亞法西斯，他們曾隸屬于令人談之色變的“烏斯塔沙”；剩下的人里有烏克蘭人、俄國人和諸多歐洲國家的戰俘。甚至有些納粹殺人狂也藏身在山間棚舍中，比如在同黨口中叫做“格洛博斯”（Globus）的奧迪路·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他是斯洛文尼亞籍德國人，曾下令在波蘭建造了幾座滅絕營，除此之外還犯下過其他罪行。這群難民大多是為了躲避鐵托的共產黨游擊隊或是蘇聯紅軍，才逃到這里，他們身心俱疲。倫敦《泰晤士報》的一名記者把這群人和“1500年前的東歌特人大遷移”相提并論。[17]奈格爾·尼克爾森（Nigel Nicolson）時任英軍情報官，日后成為著名的倫敦出版商，用他的話來講，克恩滕是“歐洲的污水池”。[18]

克恩滕被英軍所攻占。從某種方面來講，說克恩滕是民族遷移的痛苦淵藪，實在是恰如其分，因為該地區所見證的政治變遷很能夠代表以族群劃界的民族主義思潮。這股思潮曾在歐洲造成生靈涂炭和文化浩劫。克恩滕南部的人口中絕大多數都是斯洛文尼亞族。戰時，管轄該地的區長（Gauleiter，即納粹政權的地區總督）是克恩滕人弗里德里希·萊納（Friedrich Rainer），母語是德語的他試圖在南部地區推行“日耳曼化”，手段要么是逼迫人們講德語，要么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驅逐斯洛文尼亞人，讓有日耳曼血統的人取而代之。戰爭末期，鐵托的游擊隊曾入侵該地，并宣布克恩滕歸南斯拉夫所有，但后來被英軍打了回去。

但這僅僅只是“歐洲污水池”問題的冰山一角。那里人滿為患，既有平民，也有要么不想回國、要么已無家可歸的軍人。奈格爾·尼克爾森寫道：

似乎有源源不斷的各民族的人來向我們求助，希望我們能提供保護。德國人擔心鐵托加害他們，哥薩克人害怕保加利亞人，切特尼克黨人畏懼克族人，白俄人又忌憚俄國赤匪，奧地利人擔心斯洛文尼亞人來尋仇，而匈牙利人則人人都怕，反之，其他人也怕他們……（克恩滕）不僅是納粹戰犯最后的藏身之地，也是躲避俄國人和鐵托追殺的一些民族的棲身之所，他們相對來講與世無爭，卻沒人愿意收留他們，而且不論去哪兒，都會遭人迫害。[19]

很多時候，迫害還算是輕的。那些和鐵托的共產黨較量過的斯洛文尼亞人、克族人、塞族人，有時是幫著德國人一塊打鐵托，有時是孤軍奮戰。他們知道，自己如果落到南斯拉夫的死對頭手里，等待他們的將是酷刑和死亡。1917年后爆發的俄國內戰中，不少哥薩克人和共產黨打過仗，之后的歲月里，他們當起了服務生，開起了出租車，有些還成了作家，靠向散落在歐洲各國首都、沒什么名氣的流亡人士雜志賣文為生。哥薩克人知道，如果回到蘇聯，等待他們的要么是被處決，要么是在古拉格（gulag）里慢慢死亡。同樣擔心的還有烏克蘭人，他們愚蠢地——但不是毫無理由地——拉希特勒做靠山，希望借此擺脫斯大林。這些想想就讓人膽寒的揣測后來都成了現實。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本以為歐洲最俠肝義膽、最光明磊落、最慷慨大方的英國人，居然會逼他們走上絕路。

奧地利小鎮布萊堡（Bleiburg）位于克恩滕州南部，靠近南斯拉夫邊界。駐扎此地的英軍愛爾蘭38旅的指揮官斯科特（T. P. Scott）準將于5月14日收到一份報告，稱有20萬克羅地亞軍人和50萬平民正在靠近英國人的防線。斯科特前去會見了他們的代表。雖然他富有同情心這點人盡皆知，但斯科特還是硬著心腸告訴克羅地亞人，他們恐怕不太可能獲準進入奧地利境內，因為已經沒地方了。他們只能餓肚子了。好吧，一些克羅地亞人回答，餓就餓吧。其余的人則想知道能不能去非洲，或者美國。不行，這同樣也行不通。既然這樣，那他們“寧愿死在這里，戰斗到最后一個人，也不會向布爾什維克投降”。[20]

英國人費了不少口舌，最終，克羅地亞人被說服了，他們又渴又餓，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同意向鐵托主義者投降（英國人管他們叫“鐵頭幫”）。克羅地亞人得到承諾，男人會被當作戰俘好好對待，而女人則會被送回克羅地亞的老家。斯科特旅長大可放心。

也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后來到底發生了什么。活下來的克羅地亞人寥寥無幾，他們的回憶充滿了恨意，也許帶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從中我們還是能窺見他們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根據部分生還者的口述，5月15日和16日兩天，有兩千名士兵和軍官在南斯拉夫境內被槍斃，尸體被扔進事先挖好的壕溝。5月17日，一場沿著德拉瓦河、目的地為斯洛文尼亞馬里博爾（Maribor）的“死亡行軍”開始了。據一種說法來看：“幾萬名克羅地亞人被分為幾列，他們手上綁著繩索……然后，在又渴又餓、虛弱無力、缺胳膊少腿、痛苦不堪的情況下，被逼著和騎著馬或坐著馬車的‘解放者’一齊長途奔襲。受不了這種奔跑‘行軍’的人不是被捅死、打死，就是被槍斃，尸體被留在路邊，或被扔進土坑。”[21]另有資料估計“約12 000名克羅地亞人”葬身壕溝。“由于血水漸漸滲出地面，腫脹的死尸使地表上浮，游擊隊在地上澆了某種堿性溶液，再蓋上一層土，最后開著坦克把地面軋平。”[22]

就算這些故事因為憤怒而失真，無可置疑的是鐵托的游擊隊的確殺害了一大批人，受害者不僅有死在“死亡行軍”過程中的克族人，也有塞族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他們被人用機槍處決在科切夫耶（Kocevje）茂密而美麗的森林里，那里至今還有野豬、猞猁和馬鹿出沒。他們之所以會作為共產黨的俘虜出現在當地，是因為英國人把他們送上了開往南斯拉夫的火車，但騙說目的地是意大利。如果說出真正的目的地，會造成極大的恐慌，英軍可是不惜一切代價要防止其發生。

英國人把俄國人和其他共產黨的反對派交給他們的死對頭，必要時靠的是花言巧語、虛與委蛇，有時則是強制執行。對這種政策，英國人為自己開脫的說辭不外乎是這些克族人、塞族人、斯洛文尼亞人、白俄人和烏克蘭人反正都是叛國者，他們曾經和德國人并肩作戰。簡言之，他們不僅是蘇聯的敵人，也是英國的敵人。但婦女和孩子很難被歸為敵方戰斗人員，況且，實際情況遠沒有那么簡單。

的確，諾曼底登陸后，盟軍在法國境內俘虜的德軍士兵中有十分之一其實是穿德國軍裝的俄國人。這些俄國人大多一句德語都講不來，他們很樂意向英軍投降，甚至如釋重負。他們從來就對希特勒的計劃不抱任何熱情。其中不少人過去是東線戰場上被俘虜的戰俘。1943年，那些在德國蓄意餓死蘇聯囚犯政策下僥幸生還的俄國人面臨著一個殘酷的抉擇：當時德軍兵員嚴重不足，他們要么就加入德軍特別成立的外籍兵團，要么就坐等餓死。

哥薩克人的情況更為復雜。他們的高級軍官都是參加過俄國內戰的老兵，如今已經年逾花甲。他們將納粹入侵蘇聯看成是奪回哥薩克人傳統領地的最后機會，回到故土，他們就能像祖輩那樣生活，延續類似18世紀時的武士等級制。德國人承諾，如果他們愿意和德國人并肩作戰，就會幫助他們實現這一夙愿。哥薩克人同意了，他們作戰異常驍勇，佩戴著鑲嵌珠寶的祖傳短劍和彎刀。要恢復一種恐怕早已一去不復返的生活方式是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追求，但是并不明智，而且過程常常十分血腥。哥薩克人在蘇聯打仗，后來被迫撤退至南斯拉夫，身后還跟著數以千計的難民。這些人再也無法忍受在斯大林統治下的生活。戰爭末期，德國人效仿日本人在東南亞的做法，把侵占的領土分給同他們合作的政權，算是最后時刻買通對方接著打下去的籌碼。哥薩克人被告知可以在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區建立“哥薩克國”。可等英國人一到，哥薩克人便宣稱英國人不是他們的敵人，蘇共才是，并決定放棄建立哥薩克國，穿越國境，進入克恩滕世外桃源般的山谷中。

據傳說，克羅地亞法西斯在不茍言笑的首領安特·帕維里奇（Ante Pavelić）的帶領下，所作所為甚是駭人，就連德國人聞后都不寒而栗。意大利記者庫爾喬·馬拉帕爾泰的文筆常常充滿了生動的想象力，他寫到自己曾采訪過帕維里奇。采訪間隙，他看到這個獨裁者的寫字臺上有一只柳條籃，里面裝滿了又小又圓、滑膩膩的東西，看樣子像是鮮嫩多汁的牡蠣，或者生蠔一類的東西。馬拉帕爾泰就問帕維里奇，這些是不是大名鼎鼎的達爾馬提亞（Dalmatian）牡蠣，帕維里奇淡淡一笑，說這些重達四磅的小圓球其實是游擊隊員的眼睛，是忠誠的烏斯塔沙部下送給他的禮物。

烏斯塔沙跟鐵托的游擊隊、斯洛文尼亞的“家園衛隊”和塞族切特尼克黨一樣都是殺人不眨眼的主。然而，我們很難一分為二地將他們之間的混戰清楚界定為盟軍對陣德軍，民主派對陣法西斯，甚至是共產黨對陣反共分子的戰爭。這些派別被卷入同時發生的幾場內戰之中，圍繞著不同的族群、政治和宗教路線展開廝殺：克羅地亞天主教徒、塞爾維亞東正教徒、波斯尼亞穆斯林、塞爾維亞保皇黨、共產黨游擊隊、斯洛文尼亞“家園衛隊”、斯洛文尼亞共產黨，所有陣營都在互相打來打去。無論是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還是納粹主義，意識形態之爭只解釋了一部分原因。只要能滿足各自的國內目標，所有派別都會與外來勢力結盟，縱使是德國入侵者也不例外。昔日的切特尼克黨徒和游擊隊都在某一特定時期對抗過德國人，算是盟友。當他們同時站在面前時，叫一個英國兵如何區分誰是敵，誰是友呢？

到了最后，判斷敵友同樣只能借助武力了。英國的地中海事務全權大使哈羅德·麥克米倫這樣寫道：“到了1943年12月，對時局看得最清楚的英國人明白，南斯拉夫最終會是游擊隊的天下，王權沒有任何出路，而且再也無法起到團結各民族的作用了。與此同時，該地區有著舉足輕重的軍事價值；因為鐵托的部隊在得到充分援助后，有能力拖住好幾個師的德軍，這對意大利的戰事，乃至今后開辟法國戰場十分有利”。[23]切特尼克保皇黨很不幸，他們在內戰中屬于必然會輸的一方。

如果說1945年西方人還把鐵托看成是重要盟友的話，那么斯大林也一樣。那時許多英國人和美國人還親昵地管他叫“喬叔叔”[[2]](#_2_Si_Da_Lin_De_Quan_Ming_Jiao_J)。因此，1944年9月，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在莫斯科會晤蘇聯外交部長時，居然承諾會遣返所有蘇聯公民，“不管他們愿不愿意”，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24]這么做，不光是因為人們覺得有必要同戰時盟友保持友好關系，而且因為英國不想貿然行事，危及蘇占區幾千名英國戰俘的命運。

英國政府的其他成員，包括溫斯頓·丘吉爾，對這項綏靖政策都有著良心上的顧慮，因為他們很清楚其后果如何。經濟作戰大臣賽爾伯恩伯爵（Lord Selbourne）在給丘吉爾的信里寫道：把這些俄國難民送回俄國，“意味著他們只有死路一條”。然而，艾登卻寫信給首相，告訴他“我們不能太感情用事了”。畢竟，他說，這些人被俘的時候，“是在德軍陣中服役，他們在法國的所作所為常常叫人惡心”。他又列舉了一些原因，進一步切中問題要害：“我們當然不希望永遠被這些人拖累”。[25]就這樣，在1945年2月舉行的雅爾塔會議上，所有蘇聯人都會被遣返歸國這點得到了正式確定。

許多俄國人是被逼無奈才穿上德軍軍裝的；而在德國從事苦力、地位卑賤的蘇聯婦孺也從未穿過這身皮；另外，大部分哥薩克人從來就不是蘇聯公民，因此也不存在遣返他們的法律依據。然而，盡管如此，這些事實卻未能左右艾登和蘇聯領導層。對于后者，遣返這批人牽涉到要歌頌的英雄事跡，盡管這同法國和荷蘭的情況不太一樣。想想看，曾經有如此之多的俄國人和其他蘇聯公民跟蘇聯作對，而且還是心甘情愿的，其余的人選擇在德國干活，僅僅是為了能茍且偷生，這簡直是一種恥辱。在官方正史里，所有生活在蘇維埃工人樂園里的公民都抗擊過法西斯敵人。投降是一種罪行，那些落入德國人之手的蘇聯人只能是叛徒，并被當成叛徒處置。

還有另一種復雜的后果。鐵托的游擊隊也許是共同抵抗納粹的盟友，在英國人的想象中，他們是一群被高度浪漫化、神圣的農民英雄。但他們對于意大利和奧地利南部的部分領土主張愈發讓人生厭。西方盟友無意同昔日戰友動武。但為了確保挫敗鐵托的非分要求，已經因為手下100萬戰俘而煩惱的哈羅德·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元帥要求上級授權他先在奧地利“清場”。這就意味著要將南斯拉夫人送回南斯拉夫，俄國人送回蘇聯，而且是盡快。

這種“清場”的直接后果是慘烈的場面。如果單靠花言巧語還不能讓人乖乖聽話，久經沙場的英軍士兵有時不得不流著淚，把這些戰俘趕上牛車和卡車，其間連哄帶騙，拳打腳踢，有時還用上了刺刀。女人撲倒在他們腳邊號啕大哭，孩子被恐慌的人群踩踏，混亂之中，一些人中槍，另一些人與其坐等被遣返，寧可拿刀捅自己的脖子，或跳進德拉瓦河自盡。

哥薩克人也許是最悲慘的。他們幻想著被大英帝國納入帳下，送到非洲當兵，或者派到亞洲和日本人作戰。英國人有意識地鼓勵他們做夢。在不可避免的命運到來之前，只要能讓他們保持平靜，隨便怎樣都行。哥薩克人表演精湛的馬術，既自娛自樂，也給看守他們的英國人助興。甚至連解除他們武裝靠的都是陰謀詭計；英國人向哥薩克軍人承諾，如果他們繳械，就能拿到性能更好的新式武器。英國人意識到，如果沒了帶頭的軍官，哥薩克人就不太會違抗命令。5月底，1 500名軍官被英國人叫去“開會”，說是要商討他們的未來，晚上就能回家。但事實上，后來就再沒人見過他們。被移送給蘇軍后，那些沒有被當即處決的軍官被送往古拉格，活下來的寥寥無幾。

剩下的哥薩克人看到長官遲遲沒有返回，心急如焚，對英國人的疑心越來越重。是時候采取更為強硬的手段了。威逼手無寸鐵的人把自己交給不共戴天的仇敵并不好辦，這一差事落到了皇家愛爾蘭明火槍團肩上。原因是羅伯特·阿布斯諾特（Robert Arbuthnot）少將認為該軍抗命的可能性比英軍要低。但實際上，士兵們良心上很不安，甚至差點因此嘩變。該團指揮官大衛·肖（David Shaw）回憶道：“士兵們一個勁地唉聲嘆氣，但最終還是執行了命令。那場面太可怕了。我記得有些女人躺在地上打滾，大聲尖叫，有些還是孕婦。我的手下把槍放在地上，把這些女的抱上車，然后鎖上門，站著目送火車離開，車窗里還傳來女人們凄厲的哭喊。”[26]

6月1日，德拉瓦河畔另一個哥薩克難民營里的幾千人在得到登車命令后，被他們的牧師召集到一起，彼此緊緊相依。牧師們一身東正教裝束，嘴里一邊祈禱，一邊唱著贊美詩。一大群人跪著，手挽著手，最里面是婦女和孩子，外面圍著青壯年男子。他們四周是宗教偶像的畫像，黑旗，還有一個帶著巨大十字架的祭壇。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軍人不會對禱告者動粗。這樣一來，就有必要采取行動了。人稱“拉斯蒂”的戴維斯少校（“Rusty” Davies）和許多哥薩克人私交甚篤，他回憶道：“隨著外圍的人被拉開，剩下的人擠得更緊了，因為害怕，他們開始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拼命想離士兵遠點。結果人群像疊羅漢一樣，尖叫不斷，歇斯底里，有些人被壓在這座人肉金字塔下，動彈不得。”[27]

因為擁擠，一扇車窗被擠破了，一位年輕姑娘整個人被擠了進去，她的腿在此過程中被碎玻璃嚴重劃傷。她這樣描述人墻一面坍塌后的景象：

人們奔來跑去……嚇得六神無主。眼前的一切亂作一團：歌聲、祈禱聲、咆哮、尖叫、這些可憐人被當兵的逮住時的哭喊聲、孩子們的啜泣聲、當兵的嘴里的罵娘聲。所有人都挨了打，甚至連牧師也概莫能外，他們把十字架舉過頭頂，依舊在祈禱。[28]

最終，任務完成了。一些哥薩克人帶著孩子投河自盡，一些人在營地外的松樹上上吊自殺。其余的哥薩克人里大部分被裝進運牲口的車，車身密不透風，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戶，里面放著一個木桶，供所有人如廁用。旅長斯科特向上峰報告，整件事“就是一出該死的丑劇”。“拉斯蒂”戴維斯少校說道：“回想當時，我至今仍然心存恐懼。”[29]

哥薩克人只是許多孤苦伶仃、備受打擊、最后被歷史滅亡的群體之一。實際上，說“歷史”太過抽象了。他們是被活生生的人推向毀滅的，背后既有革命思想助推，也緣于清除異己、建立單一種族國家的想法。除了哥薩克人，還有其他人也成了這一思想的犧牲品，有些沒準還曾是其信徒。

\* \* \* \* \*

1945年的夏天，酷暑難耐，英、美、蘇三個戰勝國的領導人在波茨坦會晤，會上宣布的決定聽起來就像是正確的大白話，甚至有些索然無味。在驅逐中、東歐的德裔居民一事上，盟國首腦達成以下共識：“三國政府在全方位考慮了這個問題后，確信把留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裔人群以及相關人員遷至德國一事勢在必行。各方同意，屆時出現的任何人口流動都應以有序而人道的方式進行。”

聽上去很公道。兩年前的德黑蘭會議上，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已經同意把波蘭東部大片領土割讓給蘇聯。這項遣返德國人的協議，倒是和領導人之間令人意外的友好氛圍頗為協調。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和斯大林顯得尤為投緣。（杜魯門不太喜歡丘吉爾；英國首相曾試圖拍杜魯門馬屁，結果熱臉貼了冷屁股。）在位于波茨坦的總統官邸“小白宮”內，杜魯門為斯大林和丘吉爾彈奏了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3]](#_3_Pa_De_Lei_Fu_Si_Ji__1860__194)的G大調小步舞曲。斯大林叫道：“啊，真好，音樂真是個好東西，它驅走了人類內心的獸性。”[30]

杜魯門對斯大林的熱乎勁兒似乎為當時許多美國軍人所共享。美軍軍報《揚基人》在有關波茨坦會議的報道中，寫到斯大林“很輕松地成為這場高朋滿座的盛會吸引士兵關注的一塊最佳招牌。而且這還是在流言四起、說他事先已得知日本人會投降之前的事。來自紐約州長島市的約翰·圖沃希（John Tuohy）下士在參軍前是派拉蒙電影公司的訂票員，如今在大腕云集的小白宮前站崗放哨。他形容斯大林‘比預想中的要矮小些，但身上一塵不染，穿著漂亮的軍裝’”。[31]《紐約時報》把三個戰勝國首腦在廢墟中磋商的畫面形容為“三個走進墓地的人；他們手上握有全世界大部分權力”。[32]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決定1 100多萬德裔移民命運的生殺大權。他們中不少人在后來屬于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地區擁有很深的根基。

波茨坦會議上的言論蒼白乏味，但潛藏在背后的思潮則顯得冷酷無情得多。蘇臺德區、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的幾百萬德國人已經被趕出家園。就在波茨坦會議召開前，斯大林還讓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茲德涅克·費林格（Zdeněk Fierlinger）放寬心：“我們不會妨礙你們。把他們都趕出去”。[33]

在雅爾塔，丘吉爾告訴斯大林，他“對用武力驅逐幾百萬人的想法并不感到驚訝”。斯大林也向英國首相拍胸脯保證：“（波蘭）再也不會有德國人，因為我們大軍殺到的時候，德國人將聞風而逃，一個都不剩。”丘吉爾接著他的話說道：“那么就有一個問題，如何在德國安頓這批人。我們殺了六七百萬德國人，戰爭結束前估計還得再殺個100萬。”斯大林喜歡精確的數字，他想問個清楚：“究竟是100萬還是200萬？”丘吉爾答：“哦，我可沒打算設什么上限。這樣的話，就能在德國騰出空間，那些有用的人就能填補這一空間。”[34]

一些遭到驅逐的德國人曾是納粹的熱情擁護者，甚至還是戰犯。生活在德意志帝國邊陲的德國平民中，有不少——甚至可能是絕大多數——都對納粹黨和其當地部屬懷有好感，特別是在蘇臺德區。雖然富甲一方，但那里的日耳曼人早在1938年之前就深感捷克人把他們當成二等公民。即使這樣，許多人還是跟納粹撇清關系，有些還積極反抗過納粹。但無論是丘吉爾，還是斯大林，都無意作這種細化區分。所有德國人都得卷鋪蓋走人：罪犯、納粹、納粹反對者、男人、女人和兒童，無一例外。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政策里，人口遷移、大規模驅逐和邊界變動都是司空見慣的事。但丘吉爾腦子里想的是另一起先例：根據1923年的《洛桑條約》，希臘同意讓國內的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土耳其則讓信奉希臘東正教的土耳其人遷往希臘。實際上，由于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戰爭，早在1923年前就已經有很多這樣的人口流動，而且都是自發形成的。官方主導下的人員交換相對而言較少出現流血。但在1945和1946兩年里，中、東歐出現的人口流動在規模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當然了，人員交換多少還是有的：波蘭東部并入烏克蘭，那里的波蘭人就搬到了西里西亞。這片曾經的德國領土，現在已經一個德國人也不剩了。說是交換，但真實情況是，差不多1100萬人被迫背井離鄉，而且其過程很少是有序而人道的。

柯尼斯堡的漢斯·格拉夫·馮·倫多夫醫生相信人類之所以表現得像野蠻人，是因為他們背離了上帝。他曾一度試圖徒步離開被炸彈和大火毀壞殆盡且被劫掠一空的故鄉。他估摸著，如果擠上一班開往西方的火車——通常是煤車或牛車——實在太過危險，于是，他就在凄風冷雨中走過一片“荒無人煙的大地”：

（經過）一片片無人收割的農田……彈坑、被連根拔起的樹木、翻進壕溝的軍車，以及被燒毀的村莊。我在一間破敗的屋子里躲避風雨，突然感到有什么東西在動。磚頭地面傳來一陣響聲。一些衣衫襤褸的人這兒那兒地站著，凝望天空。他們中間有三個孩子瞪著我，眼神中帶有敵意。很明顯，他們也想逃離柯尼斯堡，但是被困在了這里。被俄國人抓住后，他們被命令哪也不準去，因此進退維谷。他們的最后一頓飯，是從稍作停留的俄國卡車上拿來的幾個土豆。我沒問這是以什么代價換來的。但從他們說話的口氣來看，很明顯，姑娘們為此又吃了一次苦頭。老天爺，誰還能從這些可怕的記憶里獲得些許慰藉呢？[35]

還有比這糟得多的事情。但比起許多施虐狂濫用暴力、大開殺戒和饑荒的傳言，這則故事更能反映出那些突然失去家園的人內心的無助和無奈。他們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在一片人口衰減、落入他人之手的土地上，被困在了僵局中。

倫多夫排斥坐火車是有道理的。因為這不僅會連著幾天被困在超載貨物的車廂里，緊挨著別人，不吃不喝，想解手也沒地方，還要忍受日曬雨淋。另外，中途還很可能被人帶走，送進強制勞工營，或者最起碼也會遭遇攔路搶劫。保羅·羅貝（Paul Löbe）是一名記者，因為加入社民黨曾被納粹政權逮捕。他描述過乘火車橫穿西里西亞的一次經歷：

俄國人把火車頭和車身分開后，扣留了我們22小時。類似的中途停車還發生過幾次……列車共被人打劫了四次，兩次是波蘭人干的，兩次是俄國人干的。過程很干脆。鐵軌被人扒掉，列車一減速，劫匪們就爬上車廂，搶走我們的行李箱和背包，扔在路堤上。半小時后，他們跳下車，收集戰利品。[36]

在這段無法無天的時期，警察等官員常常跟劫匪是一路貨色，因此火車站就成了最危險的地方。那些不得不在車站過夜的倒霉蛋常被成群結隊的劫匪盯上。婦女不分老幼，都有可能被喝醉后撒酒瘋的士兵強暴。失去家園、孑然一身的一種可怕之處就在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別人可以對你恣意妄為。

從某些方面來看，西里西亞、普魯士和蘇臺德區的德國人所遭受的暴行，其實是德國人對其他人——特別是猶太人——所作所為的恐怖翻版。許多公共場所禁止德國人入內；他們必須戴上印有字母N的袖章（N代表Niemiec，即波蘭語里的德國人）；德國人不準購買雞蛋、水果、牛奶或奶酪；此外，德國人還被禁止同波蘭人通婚。

當然，這種類比還是存在局限性。保守派日記作家恩斯特·榮格的朋友曾從捷克斯洛伐克的獄中給他寫信：“就眼下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德語區和匈牙利語區的悲劇而言，唯一能與之相提并論的只有猶太人大屠殺”。[37]這純屬胡扯。對于遣返過程中到底有多少德國人喪生目前依舊存在巨大爭議。一些德國歷史學家稱死了100多萬，反對者則表示實際死亡人數只有差不多一半。[38]但就算50萬也已經夠慘的了。話雖如此，當時并不存在系統性滅絕所有德國人的計劃。而且西里西亞和蘇臺德區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有時得到過加入波蘭或捷克國籍的選擇權。納粹魔爪下的猶太人可沒有這樣的權利。

德國女人時而會遭到蘇軍、波蘭人或捷克人的性侵，她們管自己叫Freiwild，也就是平等獵物的意思。所有無家可歸、喪失權利的人基本上都會淪為這種獵物。1945年之夏，西里西亞是人們口中的“狂野西部”。波蘭人把過去的德國城市但澤更名為格但斯克，在那里建立了新政府，過渡政府領導人宣布一場“掘金潮”已拉開序幕：“條條馬路上都能見到來自波蘭各地的人，只要有交通工具，他們都在風風火火地趕往格但斯克這條‘克朗代克河’[[4]](#_4_Klondike_Jia_Na_Da_Xi_Bei_Bu)，他們只有一個目標：不是勞動致富，而是強取豪奪。”[39]德國人的房子，德國人的公司，德國人的一切資產，包括德國人自己，都如囊中取物，唾手可得。

然而，1945年發生的種族清洗遠不止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國人的層面上。赫伯特·胡普卡（Herbert Hupka）具有一半猶太血統，家住上西里西亞的拉蒂博市（Ratibor，今波蘭的拉齊布日，Racibórz）。他記得曾被人在雨中趕著走，途經自己就讀過的學校。過去他的父親在此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胡普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爛爛、濕漉漉的書，有托馬斯·曼（Thomas Mann）[[5]](#_5_Tuo_Ma_Si__Man__1875__1955__Z)的，有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有弗朗茨·韋爾弗（Franz Werfel）[[6]](#_6_Fu_Lang_Ci__Wei_Er_Fu__1890)的，還有其他被納粹封殺的作家的作品。這些書在被納粹政府沒收后扔進猶太公墓，現在不知怎么的出現在大街上，拿胡普卡的話來講，“無人認領，就這么堆在體育館前”。[40]

1945年，德國文化遭遇滅頂之災，連同其被一鍋端的還有那些傳承德國文化的人。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的一些地區歷史悠久，其中部分名城——布雷斯勞（Breslau，今波蘭的弗羅茨瓦夫）、但澤、柯尼斯堡、倫伯格（Lemberg，今烏克蘭的利沃夫）、布魯恩（Brünn，今捷克的布爾諾）、切爾諾維茨（Czernowitz，羅馬尼亞城市）、布拉格——都是上流德國文化的中心，傳承這一文化的常常是講德語的猶太人。如今，這些城市必須經歷“去德國化”。路名和商鋪的標牌被重新粉刷，地址更改，德國人的圖書館被一搶而空，紀念碑被毀，刻在教堂等公共建筑上的銘文——有些歷史十分久遠——被一一抹去；德語本身必須取締。《揚基人》刊載了一篇發自布拉格的報道，文章這樣寫道：

如果你用德語問路（除非你不會講捷克語），別人只會對你投來異樣的眼光……不是說捷克人聽不懂德語。多年來，德語幾乎算得上是他們的第二語言。一名被迫在布拉格一間工廠為德國人干活的捷克人……這樣說道：“請別在這兒講德語。這是畜生的語言。”[41]

中、東歐人從生活中剔除德國人和德國文化的做法有諸多動機。不僅如此，甚至連存在過的記憶也要一并抹去。對于共產黨人來講，這么做是革命需要，旨在擺脫一個令人憎惡的資產階級。對于黨外的民族主義者，比如捷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而言，這么做是對叛國行為的報復：“我們國內的日耳曼人……背叛了國家，背叛了民主，背叛了同胞，背叛了人性，背叛了人類”。[42]一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會任職的位高權重的神甫大聲呼吁：“千年等一回，跟德國人清算的時候到了，他們壞透了，所以‘愛吾鄰居’的訓誡對他們絲毫不起作用。”[43]所有人都有仇德情緒，但將這點表達得最鏗鏘有力的是波蘭首任總統瓦迪斯拉夫·哥穆爾卡（Wladislaw Gomulka）。他在波蘭工人黨的黨中央大會上表示：“我們必須驅逐所有德國人，因為國家是建立在單一民族的基礎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礎上。”[44]

就這樣，希特勒的“宏圖偉業”最終卻由那些仇恨德國的人代為完成了。他的計劃建立在種族純潔和單一民族國家的想法之上，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世紀第一個十年，甚至比這還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們充分考慮到戰后發生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等國令人毛骨悚然的種族清洗，我們也不應忘記，摧毀中歐地區德國文化的罪魁禍首其實是德國人自己。中歐的猶太人中間有相當一批都是德國上流文化堅定不移的守護者，德國人將他們趕盡殺絕，等于是咎由自取地開啟了埋葬德國文化的進程。而在戰后，通過把德國人趕出去，波蘭人和捷克人以最快的方式為這項工作收了尾。

\* \* \* \* \*

1945年的夏秋之交，數量眾多的猶太生還者置身德國的流離人員收容站，這不是因為他們愛德國。就在不久前，這個國家還竭盡全力想將他們滅族，但猶太人還是感到這里更安全——反正比某些人的出生地要安全，比如立陶宛和波蘭。至少，在美英兩國守衛把守的難民營里，他們不太可能遭受迫害。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在波蘭集中營撿回一條命后要么加入了游擊隊，要么結束了在蘇聯的流亡，返回故土。他們一窩蜂地在夏天涌入德國。很顯然，雖然德國難民營提供了暫時的庇護，但他們還是離家十萬八千里。而過去的“家”如今安在？多數幸存者已經無家可歸，家僅僅存在于想象中，且已毀于戰火。正如一些難民所言：“我們不在巴伐利亞……我們哪也不在。”[45]

殘存的歐洲猶太人中不少受到嚴重創傷，生活無法自理，而且惶恐不安，心中又有怨氣，不愿接受別人的幫助，如果伸出援手的不是猶太人則更是如此。難民營里，猶太人剛開始一般都和其他猶太人共處一室。有時候，由于官員馬馬虎虎，敷衍了事到了不像話的程度，他們甚至還會和昔日納粹關在一起。難民營里環境之骯臟簡直難以想象。所受待遇連最卑賤的畜生都不如的人何以突然恢復自尊呢？巴頓將軍對猶太人的歧視是出了名的，他的一句猶太幸存者“比畜生都低賤”也許只是一面之詞，但就連堅強的巴勒斯坦猶太人來到德國幫助同胞時，也難掩驚訝之情。在哈努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的自傳體小說《特種部隊》中，一名猶太旅團的士兵稱：“我一遍遍告訴自己，眼前這些就是我們談論多年的人——隔著通電鐵絲網，我感到我們之間好遙遠。”[46]一名美國兵寄了封信回家，信中寫到他邂逅了一名波蘭猶太人。這人“剛從達豪放出來”，“哭得像個孩子”，蜷縮在慕尼黑公共廁所一角。“我不用問他為什么哭，答案肯定都是一樣的，大致有以下幾種：雙親被折磨致死；老婆被送進毒氣室；孩子餓死；或者以上各種情況兼而有之。”[47]

如果說有哪個民族迫切需要英雄事跡，那就是猶太人。他們是眾多受害者中最不幸的——順便提一句，這點當時尚未得到廣泛承認。1945年12月，在就波蘭猶太幸存者狀況做匯報的時候，英國正統派猶太教首席拉比所羅門·舒恩菲爾德博士居然還能說出下面這句話：“波蘭猶太人都同意，死在奧斯維辛（那兒有浴室、煤氣和紅十字會提供的部分服務）比死在其他地方要來得更人道”。[48]居然還談什么人道！

戰時，巴勒斯坦的猶太新聞媒體就曾嘗試將1943年發生在華沙猶太區大暴動的壯舉跟馬薩達之戰（Masada）等同起來。公元前73年，猶太信徒退守到這里，雖以卵擊石，但和羅馬人展開背水一戰，馬薩達因此成為圣地。1943年5月16日刊發的以色列《新消息報》（Yediot Ahronot）的頭條是這樣寫的：“華沙的馬薩達陷落了——納粹放火燒毀了華沙猶太區的殘留部分。”事實上，華沙暴動真正成為以色列建國神話并獲得承認是在1970年代。然而，戰后沒多久，就有人嘗試用英雄之舉來提振猶太人的士氣。而且這些舉動同猶太復國主義緊密相連，倡導對家園的夢想，借此鼓舞一個受苦受難的民族。有人提到，猶太旅團乘著卡車，從意大利浩浩蕩蕩進入德國，嘴里喊著“注意，猶太人來了！”（Achtung! Die Juden kommen!）的口號。7月25日，西德所有難民營委員會的猶太代表發表了一篇宣言，要求允許他們進入巴勒斯坦。他們選在希特勒1923年發動未遂政變的同一家慕尼黑啤酒館見證這一振奮人心的時刻。

身在圣地的猶太人同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之間的聯系當時仍很脆弱，因此有必要把華沙起義和馬薩達之戰放在一起看，好像在猶太區起義的摩爾德察·阿涅萊維奇（Mordechai Anielewicz）[[7]](#_7_Mo_Er_De_Cha__A_Nie_Lai_Wei_Q)等人是為了以色列國（Eretz Yisrael）的福祉而獻身的。但在戰時，猶太復國主義青年團體積極地打造這層聯系，戰后也不例外。難民營里，猶太幸存者很快被按照基布茲（kibbutzim）的架構組織起來。掌管蘭德斯堡難民營的美國軍官歐文·海門特少校自己也是猶太人，即使如此，他也吃不準該拿難民營里的基布茲黨徒怎么辦：“我今天得知，營地內最出色的年輕人都加入了基布茲，這可真是給我添堵。基布茲看起來是一種聯系緊密、奉行自律的團體，成員強烈渴望移民巴勒斯坦。到了那兒……他們計劃按照理想化的集體主義原則來構建自己的生活。每個基布茲都很抱團，對難民營的日子毫無興趣。”[49]

實際上，相當一部分幸存者還夢想過去美國建立新家園。在巴伐利亞州最大猶太難民營之一的弗倫瓦爾德（Föhrenwald），人們給那兒的街道起了很多令人向往的名字，比如“紐約”、“密歇根”、或“威斯康辛大街”。[50]但不管美國有多令人心馳神往，其并未對活下來的歐洲猶太人敞開懷抱。而且戰爭才剛結束，這斷然不可能。來自中歐的年輕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幸存者中間擁有很好的口碑，因為他們身上洋溢著青春活力，體格較為健壯，而且十分自律，士氣高昂，充滿理想主義情懷，同時樂于鍛煉，勤于農耕，精于自衛。德國戰敗后十天，英國隨軍牧師列維拉比（Rabbi Levy）給倫敦的《猶太紀事報》（Jewish Chronicle）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他高度贊揚了貝爾森集中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叫我怎能忘記……我們坐在木屋里、一起高唱希伯來語歌曲時的場景？世人會相信有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存在么？兩天前，我結識了一群來自波蘭的年輕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住在一間最骯臟的營房里，但他們棲身的角落卻一塵不染。”[51]

貝爾森集中營里最鐵骨錚錚的硬漢是個矮小清瘦的人，名叫約瑟夫·羅森薩夫特，他很符合猶太英雄的形象。1911年，羅森薩夫特出生于波蘭的一個哈西德（Hasidic）[[8]](#_8_Ha_Xi_De__You_Tai_Jiao_De_Yi)猶太家庭，年輕時很叛逆，背離了家里信奉的宗教準則，成為一名左翼猶太復國運動人士。1943年7月，他同老婆和繼子在貝津市（Bedzin）的猶太區被捕，然后被推上一輛開往奧斯維辛的火車。他不知哪來的本事，居然設法半途脫逃，在機槍火力下跳進維斯瓦河（Vistula）。后來，他在猶太區再次被捕，之后成功脫逃，結果又被人逮住，送往附屬奧斯維辛的比克瑙（Birkenau）滅絕營。在一家采石場被強制勞役兩個月后，他被送往另一座集中營，并于1944年3月逃脫，可只過了一個月又被人抓住了。在比克瑙，羅森薩夫特被嚴刑拷打了幾個月，但始終沒交代是誰幫助他逃跑的。因為在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集中營短暫待過——那兒的囚犯在陰冷潮濕的地道里為德軍制造V-2火箭，直至精疲力竭而亡——他最后來到了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羅森薩夫特算不上是受過教育的城市猶太精英。他只會講意第緒語，但這點并非他同盟軍談判時堅持只講意第緒語的唯一理由——這一決定讓英國方面很是惱火。這么做更多是出于自豪感。作為貝爾森集中營獲釋猶太人成立的中央委員會的領袖，他希望猶太人被看成一個特殊的民族，擁有共同的家園。在他看來，這個家只能是巴勒斯坦。有必要把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囚犯分隔開，猶太人應該被允許自治，并做好動身前往猶太人屬地的準備。[52]

其他難民營也流露過類似情緒。歐文·海門特少校經常被蘭德斯堡猶太委員會提出的要求所激怒。但在一封家書中，他援引了一位難民營代表、立陶宛農業經濟學家J. 奧雷斯基博士（Dr. J. Oleiski）的演說詞。海門特認為他的演講“非常具有啟發性”。奧雷斯基博士回顧了他在猶太區的那段日子，那時，猶太人“隔著維爾納（Vilna）的圍欄，望向科夫諾（Kovno）[[9]](#_9_Ke_Fu_Nuo__Ji_Jin_Tian_De_Li)等立陶宛城鎮的方向”，嘴里唱著“我想再看一眼家鄉”。然而，今時今日，奧雷斯基接著說道：

經歷了這一切，從德國集中營死里逃生后，我們確信無疑地表示，昔日的家園已經變成了萬人坑。我們只能用指尖摸索，抓住我們最深切也最痛苦的呼喊的影子：我再也無法見到自己的家鄉了。20世紀在歐洲鏟除黑死病的戰勝國必須一勞永逸地理解猶太人問題。不，我們出生在波蘭，但我們不是波蘭人；我們曾在立陶宛落腳，但我們不是立陶宛人；雖然我們在羅馬尼亞見到了生平第一縷曙光，但我們也不是羅馬尼亞人。我們是猶太人！！！

海門特既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也不像是虔誠的教徒。事實上，他從未透露過自己的家庭背景，原因是擔心這會讓他在德國本來就難辦的差事變得更加棘手。盡管心里有諸多不滿，但他還是對奧雷斯基的抱負表示同情，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聯邦”的目標（演講原文中“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聯邦”均為大寫）。的確，海門特寫道：“我越是想到這點，就越是沒法生委員會的氣。作為一個團體，委員會無比關心對人權的保護，以及把人們送出德國。我所謂的人權，指的是他們作為一個自由民族應享有的待遇，而不是作為被監護人，或者施舍的對象。”[53]

作為寄人籬下的少數派，猶太人受盡了迫害，處境艱險，迫切想要巴結討好多數派。他們滿心期待能融入當地社會，卻永遠都提心吊膽。改造猶太人，把他們從“施舍對象”變成一個驍勇善戰的自豪民族，在屬于自己的神圣土地上耕作——這一理想早在納粹實施種族滅絕之前就已存在。這種理想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既有社會主義思潮，也有宗教觀點，甚至是種族主義。不同派系之間不斷對抗，有時格外激烈。人們一恢復健康，有力氣投票了，貝爾森等集中營就興起了組建政黨之風。和羅森薩夫特一樣，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導人大衛·本——古里安也是位波蘭硬漢，他很早就看出，猶太人所受的苦難能夠協助他實現一直以來堅信不疑的計劃。1942年10月，他告訴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執委會：“如果加以正面引導，我們能化災難為動力；猶太復國主義的秘訣，說白了，就是它不像大流散那樣，只會讓我們的災難催生絕望或墮落，而是一門從災難中汲取創造力和利用價值的學問。”[54]

這種說法聽起來很冷血，算是“工具化利用”猶太人大屠殺的最早例證。當然，絕不容忍軟弱是本——古里安的一貫作風，也許這么做對譜寫猶太人的英雄史詩很有必要。本——古里安看問題很實際，他認為光表達情感一點用也沒有。但在1942年，連他自己也對歐洲猶太人經歷的劫難之深重沒有充分認識。當時知情者很少。最早對情況似乎有所了解的人是阿波利那利·哈特格拉斯（Apolinari Hartglass），一位歐洲猶太人救援委員會的成員。早在1940年，他就發出過警告，稱納粹“正在滅絕波蘭（猶太）人”。然而，在波蘭難民1942年證實他的最壞猜測時，就連哈特格拉斯也是輕描淡寫地回答道：“如果你們說什么我都信，那我不如自殺算了。”[55]本——古里安掌握了一些情況，但和大部分人一樣，他也想象不出事情的真相。

即使如此，哈特格拉斯和本——古里安利用他人苦難以服務自己政治目的的做法還是情有可原。1943年，哈特格拉斯給救援委員會寄去了一份備忘錄。他在里面寫到，700萬歐洲猶太人很可能將慘遭屠戮，而（被稱為Yishuv的）巴勒斯坦猶太人對此無能為力。不過，他寫道，如果一小撮猶太人幸而得救，“我們怎么的也得從他們身上撈些政治好處。從猶太復國主義的角度來看，在以下情況中能撈到這種好處——即全世界都認識到，唯一愿意接收幸存猶太人的國家是巴勒斯坦，而且也只有巴勒斯坦猶太人才愿意接納他們”。[56]

1945年10月，本——古里安決心一睹昔日德國集中營究竟。他在日記里以干巴巴、敘述性的筆觸簡短記錄了集中營之行。在達豪，“我參觀了焚尸爐、毒氣室、狗舍、絞架、囚犯營房和黨衛軍營房”。在貝爾森，他寫道：“截至今年4月15日，這里尚有48000名猶太人……之后，31000人死亡……（死于傷寒和肺結核）。”[57]據為本——古里安作傳的作者沙布泰·特維斯（Shabtai Teveth）表示，本——古里安此行目的更多是為了弘揚英雄主義。他曾設想過“從滅絕營死里逃生的人們突破英軍設在灘頭的障礙，奮力踏上巴勒斯坦土地”這幕景象。特維斯干巴巴地寫道：“幸存者骨瘦如柴。他審視他們的姿態，就像是一個司令官在戰前檢閱自己的部隊。”[58]

本——古里安來訪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無論他去哪兒，身旁總有離散人員前呼后擁。只有在“注意到人們傾巢而出，列隊恭候在通往慕尼黑城外的馬路兩旁時”，海門特才知道本——古里安來到了蘭德斯堡。“人們手捧鮮花，舉著匆忙寫就的橫幅和標語。難民營也裝點得像模像樣，花團錦簇。我們還從沒見過營地里如此熱情高漲。我覺得就算杜魯門總統來了，也不至于造成這么大的轟動。”[59]海門特稱，對于難民營里的人而言，本——古里安“就是上帝”。

本——古里安在德國之行中做過幾次演講，其中最有名的一場，是在慕尼黑附近圣奧迪林（St. Ottilien）市古老的本篤會修道院里面對集中營幸存者的講話。該地離達豪不遠。看著猶太孤兒們，本——古里安一度因為動情而眼眶濕潤，但他很快便恢復了平靜：“我不會試圖表達內心的情緒……這樣的事是不可能發生的。”聽眾中有些還穿著條紋囚服，本——古里安對他們說道：

我要告訴諸位，一個屬于猶太人的巴勒斯坦不僅存在，而且欣欣向榮。就算大門緊鎖，巴勒斯坦猶太人還是會用強壯有力的大手砸開大門……今天，我們是巴勒斯坦的決定性力量……我們有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工廠、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步槍……希特勒離巴勒斯坦不遠，他本有機會在那里也大肆破壞，但發生在波蘭的事絕不會在巴勒斯坦重演。德國人休想在猶太教堂里屠殺我們，因為每個猶太男孩和女孩都能射殺任何德國兵。[60]

強壯，力量，我們自己的步槍……從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嘴里說出的這番英雄主義話語，恰恰是英國人最不想聽到的，縱然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在1917年曾承諾要將巴勒斯坦變成“猶太民族的家園”。英國人進退兩難，因為在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里，政府曾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做過保證，“不會做任何有損巴勒斯坦現存非猶太群體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的事情”。巴勒斯坦大約70萬人口中有91%都是阿拉伯人，鑒于此，同意猶太人移民就會產生問題。于是在1939年，英國政府發布了一份白皮書，將1940至1944年之間移民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數量限制在每年1萬人。如果出現緊急情況，可臨時再增加25000人。緊急情況遂而出現了；由于人數上限設得太低，能去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只有那么一點。本——古里安現在堅持要把至少100萬死里逃生的猶太人遷到巴勒斯坦，而且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管合不合法。杜魯門總統在讀到一篇關于德國猶太難民生存狀態的報道后大為震驚[61]，他在給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的一封信中建議，英方應該允許至少10萬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接著又補充說：“正如我在波茨坦跟您提到的，所有美國人民都堅定地認為，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大門不應被關上，猶太人在歐洲各地遭受迫害，應該遵循他們自身的意愿，允許其中一定數量的人遷往那里”。[62]

杜魯門在信里沒說的，是他不希望這幾十萬猶太人赴美定居。英國人積極阻止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時而還對剛從納粹死亡營里僥幸逃生的人動粗，個中原因十分現實。巴勒斯坦依舊歸英國人托管。即使在工黨執政時期，英國也希望保留其在中東的影響力，作為連接印度的一塊跳板。況且，阿拉伯人獲得了英國外交部更多的同情，如果數量過多的猶太人被允許在阿拉伯人占多數的土地上定居，后者一定會拿起武器造反。從英國人的角度來看，這種情況自然是不合時宜的。因此，那些試圖非法入境的猶太人很容易遭到英國士兵的一頓亂棍，完后再被扔回破破爛爛的筏子上。有時甚至還會挨槍子兒。

但英國人的看法并非一直很現實，相反，其經常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說炮制猶太復國主義是為猶太人的身份認同而戰，那么英國人又拋出了另一套身份認同的說法。美國駐政府間難民委員會特使厄爾·G. 哈里森（Earl G. Harrison）曾提交過一份關于德國流散人員的美方特別報告，英國外交部對此針鋒相對，指出報告中將猶太人和其他難民分隔開的建議是錯誤的。另外，猶太人留在歐洲沒有前途的說法也不正確。畢竟，“這么做等于間接承認納粹認為歐洲沒有猶太人的容身之處是正確的”。盟軍有義務“創造條件，讓猶太人自行選擇要不要回家，而不是在現階段就認定這些條件是無法創造的”。[63]

英國外交部在計劃如何在波蘭、立陶宛或烏克蘭這些國家創造合適條件一點上閉口不談。猶太人并非意見一致，都同意通往錫安之路才是康莊大道。當時，在囊括巴勒斯坦所有猶太復國組織的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和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簡稱JDC，或者“聯合會”）之間，爆發了激烈的路線之爭。聯合會的官員盡其所能地幫助猶太難民和流散人員，發放錢、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們很反感猶太復國主義的方針和宗旨，認為其專制霸道，而且只會適得其反。有時，猶太事務局甚至還從中作梗，不讓兒童在歐洲或美國安家，因為這樣可能會抑制猶太人返回故土的“上升之旅”。

雖然輪到他們得勢還要再過個幾年，但最終猶太復國主義者還是得償所愿了。以色列國于1948年成立，幾百萬猶太人在那里找到了庇護所。絕大部分歐洲國家，以及美蘇兩國，對此紛紛表示同情，這也許是出于愧疚，也許是緣自20世紀以降揮之不去的觀念——即每個民族都應有自己的國家——也許還因為認識到以色列對多數猶太人來講是唯一靠譜的去處。艾登關于哥薩克人的說法同樣也適用于歐洲猶太人：“我們不想讓他們留在這兒”。[64]

[[1]二戰時，很多德國人在荷蘭偷自行車，因此荷蘭人開玩笑常說德國人是“偷自行車的賊”。](#_1_4)

[[2]斯大林的全名叫Joseph Stalin，Joe是Joseph的昵稱。](#_2_4)

[[3]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蘭作曲家，鋼琴家，政治家。](#_3_3)

[[4]Klondike，加拿大西北部的一條河，因為勘探出金礦而引來人們挖金的熱潮。](#_4_3)

[[5]托馬斯·曼（1875—1955），在排猶狂潮中曾頂著壓力，歌頌猶太人的善良性格，作品因此被列為禁書。](#_5_3)

[[6]弗朗茨·韋爾弗（1890—1945），奧地利著名作家，猶太人。](#_6_3)

[[7]摩爾德察·阿涅萊維奇（1919—1943）是華沙猶太人區起義事件中猶太戰斗組織之司令。](#_7_3)

[[8]哈西德，猶太教的一個虔修派和神秘運動，18世紀起源于波蘭猶太人。](#_8_1)

[[9]科夫諾，即今天的立陶宛城市考納斯。](#_9_1)

## 第五章 瀝干毒藥

戰爭、軍事占領和獨裁專制不僅讓國家山河破碎，而且在精神上也禮崩樂壞，政治合法性更是蕩然無存。人們的冷漠腐蝕了公民意識。那些擅長獨斷專權的人通常都是最令人不齒、也最易受到腐化的群體。而時局扭轉時，掌握最大合法性的往往是專政時期最邊緣化的人物。二戰期間，這些邊緣人物包括一群積極投身抵抗運動的男男女女。在淪陷的國家，這么做很危險，但如果在倫敦，則相對要安全些，這里匯集了諸多流亡“自由”政府，維系著形式上的存在。

戰后，人們刻意美化抵抗運動，但其在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的軍事敗北中僅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暴力反叛招致了惡狠狠的報復，遭殃的是無辜百姓，而且這些行動通常得不償失。因此，明哲保身的民眾中間普遍存在對英雄人物的反感，因為后者的行為招致了更加野蠻的彈壓。當然，抵抗運動還是有象征意義的，顯示局面并非大勢已去，暴政也并非堅不可摧。但是，抵抗運動的真正重要性要待到戰火平息后才變得清晰起來。一些人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然抗擊外敵的事跡，為那些曾通敵賣國或對殺人不眨眼的政權姑息養奸的社會提供了一種英雄敘事。民主的恢復取決于這些故事，因為它們不僅有助于提振公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政府在戰后重塑執政合法性，是戰后歐洲民族復興的依托。

在中東歐的部分地區，抵抗運動扮演的角色更為復雜，因為它們要對抗兩大暴政。那些視斯大林為頭號死對頭的人有時勾結德國人。烏克蘭最著名的抵抗英雄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頭目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最終贏得獨立，班杰拉被人奉為國父，地位就仿佛烏克蘭的喬治·華盛頓。班杰拉的塑像隨處可見，此外還有班杰拉紀念碑、班杰拉紀念堂、班杰拉博物館。然而，班杰拉很難算得上是統一國家的英雄，因為他來自烏克蘭西部，那里曾隸屬于奧匈帝國。而在篤信俄國東正教的東部，班杰拉至今仍然被視作1941年和納粹沆瀣一氣的法西斯分子。另外，1944年時，班杰拉手下的民族主義者還殺害了大約4萬名波蘭人。這樁慘案發生時，大英雄本人還被關在納粹集中營里，原因是他宣布烏克蘭獨立，脫離德國和蘇聯管轄。1959年，他在慕尼黑流亡期間被蘇聯克格勃派出的特工暗殺。

在西歐，事情可就沒那么復雜了。英雄事跡在諸如法國這樣的國家特別重要，因為法國的官僚機構、警察部隊、司法部門、實業界領袖，乃至許多藝術家和作家都跟通敵的維希政權有密切牽連，可以說都“落水了”。1940年6月18日，身在倫敦的戴高樂將軍通過廣播，發表了豪情萬丈的講話。那時他的大名還不為多數法國人所知，法蘭西祖國（patrie）的偉大國父仍舊是貝當元帥。甚至沒多少人聽過戴高樂的講話。電臺里，他斷斷續續，但又異常感人地宣讀：“無論發生什么，法國抵抗運動的火焰都不能被撲滅，也不會被撲滅。”

事實上，在戰爭最初幾年里，法國并不存在什么抵抗勢力。但到了1944年，盟軍在諾曼底大敗德軍后，戴高樂殺回法國。作為民族氣節無可挑剔的象征，他一身制服，昂首闊步走在“光復”巴黎的法軍隊列之首。實際上，在行進途中曾有親納粹的狙擊手朝他開槍，但他依舊邁步前進，好像啥事都沒有。就這樣，這個似乎如有神助的人建立了過渡政府，一直執政到1945年10月戰后第一次選舉。過渡政府中不乏維希派人士，而且同抵抗組織分歧重重。這些組織大多由共產黨領導，有理由對戴高樂的政治目標不信任，反之，戴高樂對他們也一樣。不過，戴高樂將軍作為抵抗力量引以為豪的頭面人物，他的執政合法性得到了公認。他是把國家從道德困境中解救出來的不二人選。

德國和日本沒有什么英雄象征或領袖可以拿來做文章（盡管在共產主義東德，人們編造了所謂“反法西斯”的英雄事跡）。1944年7月，曾有軍官試圖暗殺希特勒，最后殺身成仁。那時，多數德國人還未將他們視為英雄。而且由于他們當中不少人出身普魯士將門世家，德國以外的人，連同許多德國人，一談起這些軍人，就聯想到軍國主義傳統（又名“普魯士主義”，Prussianism）這一被廣泛歸結為戰爭導火索的因素。戰時也有部分日本人與國家對立，但他們多半是共產黨，或者激進的左派，在大牢里度過了戰爭歲月。總的來說，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政府的反對者并未吐露心聲，或者以德國為例，他們選擇遠走他鄉。

但在德國國內，還是有一些積極抵抗的團體，規模雖小，但成員不顧個人安危，幾乎完全與世隔絕。其中一個人是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她是一名記者，加入了柏林一個名叫“埃米爾叔叔”（Uncle Emil）的抵抗組織。她和她勇氣可嘉的朋友一同藏匿猶太人等遭受納粹迫害的人，并秘密散發反納粹的傳單。做這種事的很少能保住性命。像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這樣的人還太少，肯定不足以塑造一段全民抵抗的佳話。然而，戰事一結束，危險一過去，人們還是感到有必要開展道德救贖。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在柏林俄占區的廢墟里艱難度日，1945年5月15日，她在日記里寫下這段文字：

無論在哪兒，政治運動都如火如荼，人們好像急著要追回逝去的12年時光。各種“反法西斯”團體像蘑菇一樣冒了出來。到處是橫幅和大字報，遍地是告示和標語。隨便哪個街角都成立了某某政治組織……這些反希特勒組織并非都經歷過一段漫長的斗爭，有些只是在希特勒時代結束后才開始了所謂的反抗。[1]

類似的虛偽之舉也發生在其他擺脫德國占領的國家中，盡管性質沒那么惡劣。但即使在這些國家——遑論德國或日本——英雄事跡也并不足以解決道德崩潰的問題。戰后新秩序要獲得合法性，就得先開展一場清洗納粹、日本軍國主義者和通敵分子的運動。那些發動戰爭的人、那些應該對專制獨裁、迫害異己、奴役他人和大屠殺負責的人必須被清理出戶。但這項工作該從哪著手呢？如何推進？又怎么定義罪行？幫兇應不應該也受到清算？到哪兒去找有罪的人？要不要適可而止？如果每一個曾做過納粹或和納粹合作過的德國官員都要被清洗，已經風雨飄搖的德國社會很可能就此分崩離析。因為這樣的官員實在太多了。在瀕臨饑荒邊緣的日本，如果徹底肅清戰時的官僚和政治體制，就很難剩下有知識和能力維持國家運轉的人才。但是，總要做點什么，好讓人們覺得正義得到了伸張。

對于一個出問題的社會，除了處決作奸犯科者，最古老且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流放。在比利時，一位保守派基督教民主黨參議員在思考如何處置原通敵分子時就建言：“如果我們國家真的沒地方吸納這些人，難道就不能把他們送到別處去么？……比方說，在拉美就有一些合適的國家，他們沒準能在那開始新生活”。[2]雖然這一選項私底下的確為部分納粹劊子手所采納，但很難算得上是一項切實可行的政府決策。況且，驅逐歐洲所有通敵賣國者、把他們送去拉美，本身就純屬異想天開，更別提把德國納粹也悉數往那兒送了。



作者父親S·L·布魯瑪（左一）和同學在烏得勒支



蘇聯軍人在柏林載歌載舞



荷蘭姑娘和加拿大士兵一同慶祝解放



倫敦，英國水兵和女友慶祝歐戰勝利日



美國大兵在東京的公園里和日本女孩談情說愛



1945年5月，荷蘭人為轟炸機空投食品歡呼雀躍



荷蘭暴民戲弄“橫向通敵者”



希臘人接受盟軍援助



阿姆斯特丹，一名女性通敵者被人澆瀝青



為貝爾森集中營的囚犯除虱



馬來亞日軍戰俘營，戰俘餓得皮包骨頭



英軍放火燒毀貝爾森集中營最后一間牢房



柏林，趁清理廢墟的間隙，人們稍作休息



柏林的難民兒童



橫濱，家園被毀的日本人



希臘婦女為死者哀悼



意大利，一名德國將軍被綁在柱子上，等候行刑



諾曼底的奧馬哈海灘附近，兩名德國戰俘在打理陣亡美軍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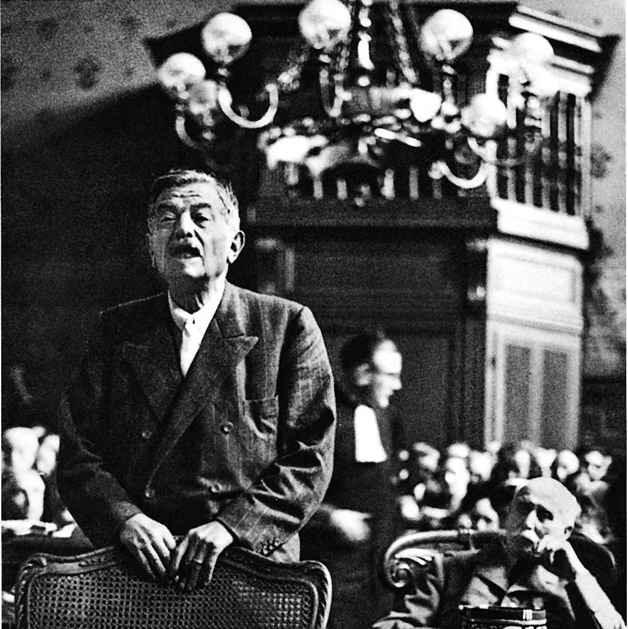
德國孩子走進位于亞琛的學校



山下奉文將軍在接受審判時宣誓



戴高樂將軍在法國洛里昂，原納粹海軍U型潛艇基地。基地遭盟軍空襲，面目全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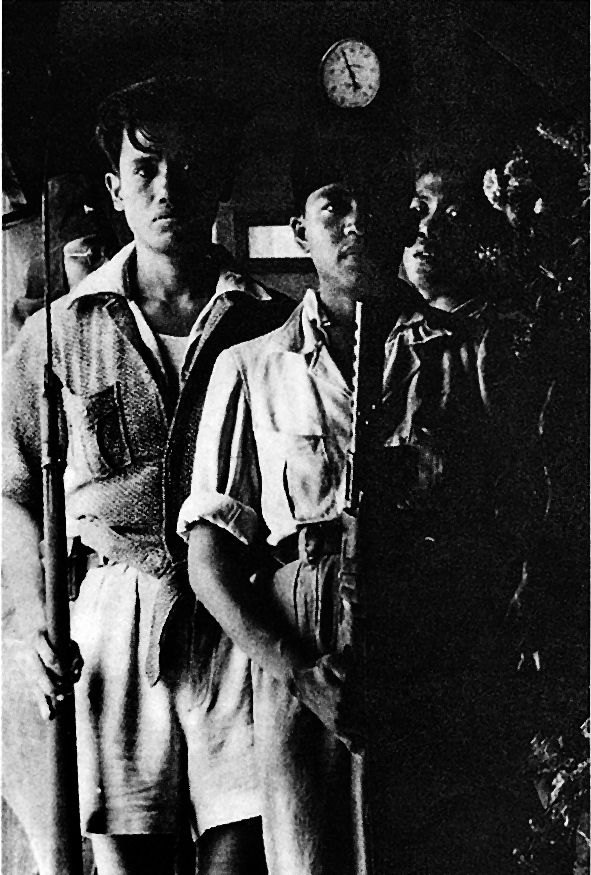
巴黎，拉瓦爾在審判貝當元帥時作證（右后方為貝當）



海牙，荷蘭抵抗主義者逮捕荷蘭國家社會黨領袖安東·米塞特



日軍向西貢的英國皇家空軍投降



印尼自由戰士



溫斯頓·丘吉爾尋求連任



克萊門特·艾德禮勝選后

然而，在1945年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上，蘇、美、英三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有必要采取激進手段，將戰敗國的余毒滌蕩干凈，并把它們重建為永不再戰的民主國家。德國和日本都要經歷“去軍事化”，接著再是“民主化”。取締納粹組織和警察部隊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不過，“所有旨在維系德國尚武傳統的軍事組織、社團、協會”也在取締之列。另外，作為德國民主化的一個環節，“所有不止在名義上參與過納粹黨活動的黨員，以及所有對盟軍目標懷有敵意的人員，都將被開除公職或準公職，也不得留任重要私營部門的負責人”。

當然，蘇聯人和西方盟友在一點上存在分歧，即到底什么才算民主。另一件懸而未決的事是如何區分前納粹分子、“軍國主義者”和“對盟軍目標懷有敵意的人員”——前提是可以區分的話。畢竟，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人過去是納粹，但現在十分樂意為盟軍效勞，或者一個人過去反對納粹，但對盟軍的政策強烈反對——比方說，西占區里的共產黨，或蘇占區里的自由民主派。而且，開展清洗的方式也取決于人們如何看待德國經歷的浩劫。在這點上，大國之間多了幾分求同存異。普魯士軍國主義，或稱普魯士主義，被看成是有待鏟除的主要問題。當時這一看似頗有些偏題的討論直到日后才為世人所共知。

波茨坦會議上，有關日本的決議在措辭上稍有不同：“對于那些欺騙和誤導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人，必須一勞永逸地消除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因為我們堅信，只有當不負責任的軍國主義在世界上不復存在，和平、安全和正義的新秩序才有可能實現。”

這種措辭同樣有些模棱兩可，而且很有誤導性。真的有所謂的“負責任的軍國主義”么？還有，到底是誰誤導了誰？掌握日本最高權力的盟軍最高司令官（SCAP）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SCAP成了他廣為人知的別名——并未同意裕仁天皇主動承擔戰爭責任的請求，因為他確信，有必要保全天皇，避免發生騷亂，因此裕仁未被追究任何過錯。

作為全日本最有勢力的人，麥克阿瑟頭上還閃耀著人們有意賦予他的偉大白人慈父的光環。他收到過不少日本人的來信，一些人對他表現出了不可思議的尊崇。司令官大人本意是想扮演權傾一時的將軍這一角色，輔佐只具象征意義的天皇。結果，從某些方面來看，似乎他本人倒成了圣人。“尊敬的閣下，”一封信這樣寫道，“當我想到閣下對吾民以德報怨，而不是血債血償時，我的心便為敬畏之情所震動，仿佛我面對的是一尊真神。”[3]

對于多數日本人而言，戰時天皇擁有神圣的地位。但對于自由派或左傾的日本人來講則完全不是這回事。一位或許是基督徒的作者給司令官寫信，質疑他為什么不以戰犯罪名逮捕天皇：“為了在全世界和上帝面前實現名副其實且不受玷污的法律正義和人類公理，我們懇請您將現任天皇作為戰犯嚴加處置。如果您放天皇一馬的目的只是為了操縱人民，那么我相信，盟軍一切用意良好的政策在您離任后都將竹籃打水一場空。”[4]

不過也有一些信件警告不得擅動天皇，否則會出現可怕的后果：“顯而易見，這么做會引發全世界最大的悲劇。而且要想得逞的話，首先得徹底滅絕八千萬大和民族。”[5]這里的“大和”一詞顯示寫信人是個未經改造的民族主義者。麥克阿瑟最后決定他應該聽取這類意見。因此，盡管所有戰爭行為，包括那些最令人發指的暴行，都是以“為天皇效忠”的名義而犯下的，但天皇本人最后也成了所謂的“被誤導者”。公開背離這一論述可能會惹上大麻煩，而且有時依然如此。[[1]](#_1_Zuo_Zhe_Zhu__1988Nian__Xin_Ya)

由于日本沒有納粹黨，更沒有希特勒，也從未發生過1933年德國的那種政變，“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甚至“封建主義”就成了有待連根鏟除的毒草。鑒于此，美軍某份指令寫道：“曾經積極鼓吹軍國主義和激進民族主義的人將被清除出公職人員隊伍，也不準在任何公立或私立部門擔當要職。”[6]如果打擊對象是宣傳家、戰犯、軍事領袖的話，執行起來十分明確，但清算官僚、商人和實業家則要困難得多，因為官僚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很久就已任職，而商人和實業家必然同戰時日本政府有過合作，并從中獲利。但在許多情況下，叫他們軍國主義者或極端民族主義者并不恰當。

有一種觀點認為“軍國主義”、“封建主義”或“普魯士主義”好像人體內的癌細胞，能夠被切除。這一觀點在左傾的盟軍官員中比在保守派當中更有市場。對于德國人、日本人和昔日淪陷國家的國民來講，情況也是一樣的。由于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左派在許多國家抵抗外敵入侵的斗爭中扮演了主導者的角色，抵抗力量的左翼成員堅持戰后社會的組建應遵從他們的意愿。在他們看來，1945年可是個絕佳的機會，終于可以跟那些勾結法西斯的軍事、金融和政治體制派進行清算了。

盡管麥克阿瑟將軍本人是保守派共和黨人，但在盟軍占領日本初期，他的身邊卻圍著一群滿懷理想主義的律師和提倡新政的改革家，他們把大力推動整肅當成民主改造日本的一部分。這些人既不是專家，在戰前和日本精英也沒什么聯系。在他們眼里，通曉日本文化沒多大必要。所有國家都能進行民主化改造，前提條件是得有部正確的憲法，其間還要配合成立獨立行業工會等進步舉措。在日本，早期的清算行動都由查爾斯·凱茲中校（Charles Kades）等人負責督辦。凱茲支持羅斯福的新政，在麥克阿瑟手下的政府管理部門任職。他的頂頭上司是科特尼·惠特尼準將（Courtney Whitney），此人曾在馬尼拉干過律師，跟他備受尊敬的上司一樣喜歡夸夸其談：“麥克阿瑟的治國方略，在過去的軍事占領史中可謂史無前例，它將會成為一種標準，對未來的軍事占領構成挑戰。”[7]麥克阿瑟位于東京的“宮廷”內部勾心斗角，改革派有一位對手：麥克阿瑟的情報主管查爾斯·威洛比少將（Charles Willoughby）。

麥克阿瑟喜歡管出生在德國、本名“卡爾·馮·切普和魏登巴赫”（Karl von Tscheppe und Weidenbach）的威洛比叫“我的法西斯寵物”。這么叫的理由很充分。威洛比愛好狩獵，說話輕聲細語，舉止風度翩翩，但脾氣十分火爆。他老是覺得世界各地都有猶太人和共產黨在搞陰謀，美軍高層內部亦是如此。就連法國大使也遭到過他的懷疑，只因為對方有個俄國姓氏。比起司令官手下的新政干將們，威洛比同裕仁天皇周圍的一干保守派廷臣走得更近。1950年代退休后，他輾轉來到馬德里。因為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Francisco Franco）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擔任了后者的顧問。不過，由于正式掌管占領區的警務，威洛比就要負責開除自己私底下欣賞的公眾人物。威洛比對整肅一事總是抨擊不斷，曾見過他大放厥詞的惠特尼準將這樣評價：“我算服了，這么反對某項計劃的人，任命他當執行者并不合適。”[8]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惠特尼此言不虛，至少當時被他言中了。

在德國，清算昔日納粹的主要幕后推手是弗朗茨·諾伊曼（Franz Neumann），他是馬克思主義者，后來為美國戰略情報局（OSS），也就是中情局的前身效力。諾伊曼是德裔猶太難民，戰前作為政治理論家和勞工律師就已蜚聲德國。在美流亡期間，他和同樣是難民的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學者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一起為美國政府準備了一份“去納粹化”指導手冊。根據他倆的觀點，第三帝國是“極權和壟斷資本主義”的典型例證。[9]納粹運動背后站著的是實業家。而迫害猶太人的真正目的是轉移大眾對壟斷資本主義的不滿情緒。

諾伊曼在得到美占區最高軍事長官盧修斯·克萊將軍（Lucius Clay）的支持后，協助起草了臭名昭著的“審查問卷”（Fragebogen）。該問卷滿分131分，所有德國成年人必須填寫。問卷的作者希望，通過一系列考查受訪者過去政治面貌和政治同情的具體問題，美軍能對至少2 300萬德國人清白與否搞個清楚。一個典型的問題是：“你或你的家人是否曾基于信仰或種族原因，霸占他人的被盜財物？”另一個問題牽涉大學聯誼會會籍，搞得這些團體好像是納粹黨的組成機構，但其實它們在1935年后就被取締了。當然，人們在答卷里很少會講真話。交卷時也是拖拖拉拉，有的遲遲未交。呼吁取消這種問卷調查的聲音從未間斷過。盟軍人手不夠，也不具備相應的智識分析這些文件。甚至很少有美國人會講德語，更別提能看懂了。軍事當局的正式使命是重建德國的民主體制，為此已經忙得不可開交，新頒布的“八號法律”（Law No.8）則讓他們益發疲于奔命。這部法律于12月1日生效。

柏林原抵抗主義戰士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曾在日記里以贊許的口吻評價這部律法：

三周前，當局對納粹黨員第一次采取了行動。工商界清除了所有地位顯赫的納粹分子。文化事業也不允許納粹分子再染指。過去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員只能受雇成為工人。[10]

對于讓昔日納粹接受勞改、干些清理廢墟這種卑微體力活的建議，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表示支持。但她的出發點似乎不同尋常。她記錄下了從身邊人口中聽到的話：“不可思議，這是白色恐怖！最近的事太不公平，叫人義憤填膺。他們不能把這部特別法律強加在20%的德國人頭上。”對于這些流言，她在日記里暗暗回應：“但他們就是能！他們（德國人）難道忘了這么做有多容易么？他們難道忘了這些特別法律和八年前針對猶太人的法律幾乎如出一轍么？”[11]

對于抗議的德國人，她沒有表示半點同情。但她所作的類比有些欠妥。人們固然可以將納粹當權時期的一些人掃地出門，但要是為了重建民主體制這么做，則是一種相當成問題的想法。另外，就算承認加入過納粹黨也不能說明什么。有14萬德國人因此丟了工作，其中不少人只是低級官員和機會主義者，因為懾于納粹淫威或出于個人野心而入黨。與此同時，地位更高、罪孽更深重的“大魚”卻安然無恙：有些商人不屑于入黨，但靠從猶太人那里搶來的資產發家致富；有些銀行家從被殺害的猶太人嘴里拔掉金牙，囤積黃金；有些教授大肆宣揚令人厭惡的種族主義理論；有些律師和法官對希特勒第三帝國的政令亦步亦趨，指控愛上“劣等民族”的男男女女犯有顛覆納粹政權罪，或者“有辱種族名譽罪”。

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在戰前是自由派記者和政治家，盡管他并未積極投身抵抗運動，但十分痛恨納粹。盟軍感到豪斯是他們可以信任的那類德國人。1945年，美國人任命他為巴登——符騰堡州（Baden-Württemberg）的文化部長。豪斯面臨的一大難題是學校里有能力的老師人數不足，無法為接受了十二年納粹宣傳的年輕人洗腦。整肅運動讓他的任務變得更加艱巨。在一封寄給軍部的信中，他言辭迫切地寫道，在他看來，整肅中被撤職的人里只有10%——15%最后被定性為納粹。但開除這么多老師后，孩子們已無書可讀。他認為，對于第三帝國崛起前接受教育的老一輩教師，“剝去他們的褐色外衣”并“喚醒他們身上善的力量”并非難事。他懇請官方給予他信任：“我們承諾幫老師清除納粹思想，把他們改造成新觀念和進步思想的傳播者，本著正確的精神教育青年。”[12]他的意見未被采納。

負責為美國戰爭部撰寫報告的卡爾·楚克邁爾結束他在美國的流亡生涯，回到德國。在他看來，美國人的清洗太過拙劣，而且經常偏離真正目標，以至于去納粹化運動有導致納粹復辟的危險。德國保守派視去納粹化為社會主義者的陰謀。他們相信，盟軍官方有意偏袒德國激進派，后者巴不得對每個城鎮進行清洗，揪出其中任何可能沾上法西斯污點的人。楚克邁爾講了個他在奧地利時聽來的笑話，大致意思是一個人去警察局登記姓名，警察問他，你登記名字做什么？這人回答，我是納粹。警官說，那你一年前就該找我們登記了。對方答曰：一年前我還不是納粹。[13]

等到這則笑話傳得滿天飛的時候，分辨忠奸、篩查昔日納粹的工作迫于無奈，已經被交到德國委員會手里。這一做法在“擺脫國家社會主義和軍國主義法律”中得到了正式確定，但效果卻讓人哭笑不得。德國政客無意再搞清洗。掌管整肅委員會的人說是激進革命派，但實際上常常是原納粹分子。天主教牧師發出警告，說德國人要是提供罪證指控同胞將是不道德的。第三帝國期間，地方上的一些大佬發了橫財，他們花錢消災，通常的做法是找個把被納粹迫害過的可憐幸存者，獲取有利于他們的證詞。1946年后一段時期的主題詞是“漂洗運動”（Persilschein），Persil是一種漂白衣物的消毒劑。不計其數的原納粹分子拿到的“漂白”文件把他們不久前的歷史污點洗得一干二凈。就連證明一個人曾在納粹集中營蹲過大牢的文件都能在黑市上買到；每份售價25000德國馬克，可謂價格不菲，但對多數原黨衛隊軍官來講，這點錢他們還出得起。

在東德，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盡管共產黨聲稱“民主蘇占區”的清洗行動取得了巨大成功。1945年春末，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介紹過的那類德國“反法西斯”委員會接管了整肅工作。到了初夏，德國共產黨（KPD）上臺后，這些委員會被解散。從理論上講，東德的整肅比西占區確實要嚴格。畢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_2_Ji_Dong_De__Xi_De_De_Quan_Min)成立的基礎就是其令人驕傲的“反法西斯”斗爭史；這是“更好的德國”，反抗過的德國。然而，這一說法因為德國人犯有集體罪行這一前提——條頓人（Teuton）[[3]](#_3_Tiao_Dun_Ren__Ji_De_Guo_Ren)的痼疾——而變得不那么清晰了。共產黨對此很執著。他們的部分論調似乎也受到了這種德國式病毒的感染。德共要求徹底“消滅”希特勒政權的余孽。[14]在勃蘭登堡州（Brandenburg）的一個小鎮，昔日納粹被勒令在衣服上佩戴“卍”標志。人們議論紛紛，說是會有嚴厲的懲罰。另一個地方的區長也發出警告：“對付納粹，我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說：會下狠手收拾他們。那些干活偷懶的，我們要逼他們干活，如果有必要，還要把他們關進勞改營……到了明年年底，我們希望見到一個消滅了納粹（Nazirein）的德國”。[15]

退一步講，盡管這些措施不可謂不強硬，但東德的整肅幾乎和“資本主義占領區”里一樣不徹底。按理說，對“積極”納粹和“名義”納粹的甄別還是在做，但這一工作經常形同虛設。蘇聯人很快對此產生了厭倦，下令開除所有前納粹黨員的政府公職，并限期幾個月完成——這當然是辦不到的。歸根到底，他們對讓德國人負責整肅并不放心，而且也從未給過后者什么恰當的方針政策。在這件事上，蘇聯人還真是有理由不信任德國人。許多德國人拒絕合作，因為事實證明，大規模的清洗將導致教育和社會服務走向崩潰，或者讓任何經濟復蘇的表象都化為泡影。于是，萊比錫和德累斯頓的德國人同在慕尼黑或科隆的德國人一樣，想盡各種借口讓前納粹分子官復原職，或保護他們免于指控。在有跡象顯示清洗行動將對蘇聯控制下的工廠完成生產指標造成影響時，甚至連蘇聯方面也都對此睜只眼閉只眼。許多納粹“小人物”輕而易舉地被吸納進共產黨，對新主子的專政作風，他們不會感到陌生。對于那些地位更顯赫的納粹則采取保留檔案的辦法，以免他們將來惹麻煩。

所有外國占領區都存在這對矛盾。盡管德國精英過去惡貫滿盈，但你還真不能把他們一網打盡，同時還指望能重建這個國家——不管其將來姓“共”還是姓“資”。沒過多久，盟軍便把經濟復蘇看成比伸張正義更重要的目標，盡管動機和蘇聯人截然相反。蘇聯人想的是重建“反法西斯”德國，作為橫亙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中間的緩沖；英美兩國和盟友想的則是讓“他們的”德國成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民主堡壘。

在當時看來，巴頓將軍于1945年發表的對去納粹化和原納粹分子的看法固然粗俗不堪，而且考慮到他的仕途，這席話也說早了——他說“加入納粹黨和民主、共和兩黨打選戰沒什么兩樣”，“我們需要這些納粹”——艾森豪威爾不得不將這位巴伐利亞軍事統帥撤職。但巴頓只是口無遮攔罷了，觀點本身談不上有多離經叛道。德國戰敗和早期清洗過后一年，多數美國官員都認同巴頓的看法。尤其是英國人，他們一開始就覺得美國人那股子教訓德國人的熱忱勁兒很是可笑，而且只會適得其反。英國外交部官員康·奧尼爾（Con O’Neill）對他嘴里的“低級狂熱分子”充滿鄙夷之情。八號法律規定所有納粹黨員只能從事低賤的工作，在這點上，他評價道：“作為典型的既系統又按部就班的愚蠢之舉，這部法律還真是難以擊破”。[16]

發生在赫爾曼·約瑟夫·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身上的事很能說明問題。在第三帝國時期，他是一名銀行家。同其他商人和實業家相比，他的罪行似乎很輕，不像阿爾弗雷德·克虜伯（Alfried Krupp）[[4]](#_4_Ke_Lu_Bo__De_Guo_Gang_Tie_Da)，曾經雇傭婦孺，讓他們像奴隸一樣干活，直到累死。他也不同于和希姆萊（Himmler）[[5]](#_5_Xi_Mu_Lai__1900__1945__Na_Cui)有私交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克（Friedrich Flick），后者的煤鋼帝國極其殘忍地剝削集中營里的勞工。和杜塞爾多夫市（Düsseldorff）曼內斯曼公司的總裁威廉·贊根（Wilhelm Zangen）或經濟官僚兼烏克蘭劊子手頭頭奧托·奧倫道夫（Otto Ohlendorff）也不同，阿布斯甚至都不是納粹黨員，也不是黨衛隊軍官。

阿布斯從未親手實施暴行。作為土生土長的萊茵河地區的人，他對普魯士尚武精神只有厭惡。他文質彬彬，信奉天主教，對英國懷有好感，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戰前在猶太人開的銀行里供職，還是西格蒙德·瓦爾伯格（Sigmund Warburg）[[6]](#_6_Xi_Ge_Meng_De__Wa_Er_Bo_Ge__1)的好友。要不是阿布斯碰巧是個雄心勃勃的德國技術官僚的話，他在1930年代幾乎和納粹扯不上半點關系。然而，阿布斯曾任德意志銀行主管，通過對猶太人的公司進行“雅利安化”（Aryanizing）養肥了自己的康采恩[[7]](#_7_Kang_Cai_En__Concern__Long_Du)。除開為希特勒打理私人賬戶外，阿布斯還為諸如西門子、克虜伯和法本公司（I. G. Farben）等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這些公司都曾在奧斯維辛附近建造過大型奴隸營。阿布斯做事也許并非出于粗鄙的意識形態狂熱。實際上，他幾乎鐵定不是狂熱分子。但沒有阿布斯這樣的人，希特勒罪惡事業的效率就會大打折扣。

1945年6月，阿布斯藏身一個貴族朋友家里時被人發現，隨后被塞進一輛英軍吉普，這時他心想完了，只有死路一條。結果，他沒坐牢，而是被帶到漢堡的某家賓館，像這樣仍然屹立不倒的賓館已所剩無幾。在那里，一位來自倫敦的老朋友、銀行家查爾斯·鄧斯東（Charles Dunston）熱情地接見了他。鄧斯東戰前在德國做過生意，而且對納粹運動整齊劃一、昂首闊步的精神面貌頗為欣賞。“就像回到了過去，”回想起老友相見時，鄧斯東這么說道，“我沒有問他戰爭的事，這無關緊要。”阿布斯對他的不修邊幅表示歉意，解釋說自己沒有像樣的刮胡刀。但在鄧斯東眼里，他看著沒啥變化：“頭發一絲不亂。我當即問他，愿不愿意幫助我們重建德國銀行體系，他欣然接受了。”[17]

事情的發展有些偏離計劃。縱然英國人屢次表達抗議，但美國人依舊我行我素，堅稱阿布斯作為戰爭罪嫌犯，理應逮捕。一入獄，阿布斯就拒絕再為英國人提供金融咨詢，除非自己獲釋。英國人花了三個月時間，總算說服美方放人。

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在他位于埃森（Essen）的鄉村莊園大廳里被捕時，跟前來抓他的美軍說了句“這是我家，你們干嗎？”。他和實業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一同接受了紐倫堡審判。法本公司老板格奧爾格·馮·施尼茨勒男爵（Baron Georg von Schnitzler）犯有奴役奧斯維辛囚犯等罪行，英國人上門抓他時，他身穿一件用上好蘇格蘭粗花呢布剪裁而成的高爾夫球外套，彬彬有禮地接待了來客。他表示，能重獲自由，和X勛爵、Y勛爵和德拉華州威明頓的杜邦家族等老朋友再續前緣，真是太讓人高興了。這群朋友真的很交心，但過去幾年里跟他們斷了聯系，很是讓人痛心。[18]馮·施尼茨勒因“掠奪和侵占罪”被判入獄五年。但一年后，他就回歸商界，重新融入社會。克虜伯因為雇傭奴工被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最后只服了三年的刑。弗里克獲刑七年，但在蘭德斯堡監獄舒舒服服地待了三年后也獲釋了。服刑期間，弗里克曾向赫爾曼·阿布斯咨詢過金融業務，也獲得過后者的提點。阿布斯后來成為德意志銀行、戴姆勒——奔馳、漢莎航空等公司的董事，在西德重建過程中發揮了主要作用。1960年代，克虜伯公司的控制權被轉讓給一家基金會，這樁交易的主要操辦人之一就是赫爾曼·阿布斯。

\* \* \* \* \*

希特勒的工業精英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蹲過大牢，雖然都是好吃好喝地被人伺候著。他們的日本同行甚至連這種罪都沒受過。在日本，除了逮捕有戰犯嫌疑的人之外，整肅行動側重于“預防”，而非“懲罰”。需要防范的是“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但問題在于，美國人吃不準要收拾誰，而且太過傾向于將日本看成東方版的第三帝國。

究竟是誰“誤導了日本人民”？不是天皇，因為最高司令官已經認定他無罪。最接近納粹軍事組織的機構是軍警，即憲兵隊（Kempeitai）。由于其刑訊和殺人手法十分老辣，所以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外國人，一提到憲兵隊便談虎色變。大約4萬名憲兵隊軍官在清洗中丟掉了飯碗；極少有日本人會為他們的遭遇落淚。其他一些愛國組織和神道教、天皇崇拜、武術社團或戰時經濟規劃多少有些關聯，表面上看像納粹組織，但其實兩者之間有很大區別。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贊會（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是一個奉行改良主義的綜合政治團體，宗旨是動員政客、官僚和知識分子為戰爭出力。該組織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創始者中甚至還有社會主義者。日本的戰爭規劃委員會也有部分左派經濟學家。美國人甚至在如何處置部隊軍官這點上都拿不出明確的政策。剛開始，美軍決定，所有少佐及少佐以上的軍官都要被清算。顯然，軍銜低于少佐的人是沒機會誤導任何人的。這件事傳到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理查德·馬歇爾少將（Richard Marshall）耳朵里，他火冒三丈。從他的親身經歷來看，日軍上尉和中尉是一群最殘暴的瘋子。他說，如果這些人的名字不在列，就會再次誤導日本人民。于是，這些軍官也被納入了名單。[19]簡言之，最高司令部的美國人對到底要打擊誰沒個準繩。

如果有什么機構在日本對外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話，那一定是官僚組織：具體而言是負責查禁異見的內務省，以及負責戰時工業規劃的通商產業省（戰爭期間被并入軍需省）。甚至連大藏省也應算在內，因為其曾經大舉搜刮亞洲被征服國家的資源。掌管工業的官僚曾在偽滿、中國各地乃至日本本土大規模強征勞工從事勞動，數量眾多的人在工廠和礦井里干活，多數條件惡劣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然而，美國占領軍對處理這些歷史舊案的指導方針十分模糊。雖然高級官員被撤了職，但低級官員還是保住了烏紗帽。理論上，被清洗的官員將不得再發揮影響力。但對于如何防止他們私會老部下、進行非正式密謀這點，則從來就沒有拿出過辦法，于是這種事就變得屢見不鮮。

在如何處置工商業精英這點上，美方內部出現了最嚴重的分歧。喜歡賣弄文采的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宣稱：“正是這些人，這些出生于封建世家、成長為一方梟雄的人，幾乎將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控制于枷鎖之中，他們厲兵秣馬，煽動人心，帶領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他因此堅持必須將這些人從“影響未來日本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剔除出去”。[20]

麥克阿瑟說這話其實是在1947年，那時距離效仿紐倫堡審判的東京戰爭罪審判（正式稱法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大審判）已經過去了一年。其他美國人的看法大相徑庭。曾在美國司法部任主管的東京法庭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基南（Joseph B. Keenan）在同年說過：“我們從未收到，也未曾發現有證據表明地位顯赫的工商業領袖曾和他人密謀，策劃或發動了戰爭。”[21]

日本人自己對清算的看法取決于各自的政治立場。在一封寫給最高司令官的信里，作者希望麥克阿瑟能明白，“99%的日本人，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是徹頭徹尾的戰爭狂和軍國主義者”。[22]一位立場更溫和的記者稱：“官僚們無組織無紀律的程度，居然發展到了允許像……前內務大臣這樣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和戰犯都得到留用的地步。就算他們中間有自由派，也是膽小怕事、畏首畏尾之輩。”[23]

所幸同盟國中只有美國負責主導“去軍事化”和“民主化”，這使得盟軍的在日使命變得略微簡化了些。反觀在德國，并沒有類似最高司令官一職。盧修斯·克萊將軍也算不上司令，他肯定不會收到下面這封來信：“我們將麥克阿瑟看作耶穌基督再世。”[24]但是由于在官僚職權劃分和政治信仰的問題上存在內部分裂，美國人也從未真正拿出過一份一以貫之的清洗方案。實際管理日本的工作被交給日本人自己的內閣，由他們來指揮官僚系統落實改革措施。盡管這些舉措充其量只能說是敷衍了事，美國新政派對另一個目標倒是遠為重視，雖然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基南的意見與之相左。那些“不肯讓未來日本經濟建設僅僅服務于和平目標”的人會被開除，而“控制了日本貿易和工業半壁江山的工業與銀行業聯合體”必須被解散。[25]這些聯合體，即財閥（zaibatsu），被定性為策動戰爭的主要經濟推手。

這一決定對實業家們不啻當頭一擊。同赫爾曼·阿布斯和他的德國同行一樣，他們在戰前跟倫敦和紐約大公司董事會里的董事有很深的交情。甚至在戰爭結束前，一名畢業于哈佛大學并在一家大型鋼鐵企業擔任總裁的日本企業家，在一次實業家參加的秘密會議上用英語興奮地大叫：“我們的朋友要來了。”[26]不少具有國際經驗的日本商界領袖曾在歐美留過學，他們期待能得到意氣相投的美國人的賞識，被安排主管日本經濟的重建。結果，等待他們的卻是被掃地出門，他們的財團也隨之分崩離析。

對于麥克阿瑟軍政府里的新政派，這是他們最引以為豪的成就：一是解散財閥，二是土地改革，后面一條可以說壓垮了日本農村“封建主義”的脊梁。許多日本左派因為美國的政策而歡欣鼓舞，在軍事占領最初幾年里，華府被看成左派最好的朋友。女性投票權、罷工權、勞資雙方集體談判，革故鼎新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在分工上，美國人負責推動革新，心存感激的日本人具體落實。由此，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開始在工會和高教領域享有巨大權力。

但即使是一些秉持左傾觀點、對實業家并無好感的日本人，對財閥遭受格外嚴厲的責難一事也有些看不懂。在寫給朋友唐納德·金的一封信里，當時還是海軍軍官的西奧多·德巴利（即狄百瑞）提到他和一位名叫宮內的東京商人的談話。宮內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信奉民主。德巴利請他談談對戰時財閥的看法。宮內回答，他們的所作所為和軍部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沒錯，有些新興財閥，比如日產（Nissan），從戰爭中獲益巨大，但傳統的“四大”財閥家族——三菱（Mitsubishi）、三井（Mitsui）、安田（Yasuda）、住友（Sumimoto）——則跟所有人一樣，只是被招安和收編罷了：“它們很弱，財閥很弱。”[27]

對此說法，德巴利將信將疑。這句話他從日本人那里聽到得太頻繁了，以至于懷疑這是軍部宣傳影響的產物。他寫道：“30年代的軍隊，肯定先是鼓吹這一論調，然后通過買通或威脅財閥，為這一說法添加了注腳。”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美國人追究財閥的責任，卻基本放過官僚體系，等于是在昭告天下，他們對日本戰時體制如何運作一事其實并不清楚。但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并非無知或誤解；美國規劃者滿懷理想主義，一心想出力重建一個嶄新的日本，而日本“改革官僚”則期望維持他們在戰時對經濟的控制，但會服務于和平的目標。雙方于是想到了一塊兒。

倒也不是說什么都沒干。1948年底，90多萬人接受了職業背景審查，150多萬份問卷被拿去做分析。美國人撤銷了內務省，解散了日本軍隊，共計1800名官員遭到整肅。但其中大多數人（70%）過去是警察，剩下的是來自內務省的官員。主管經濟的官僚壓根就沒被找過麻煩。昔日的軍需省裁撤了42人，而大藏省只開除了9個人。[28]那位曾被派到滿洲負責勞工項目的軍需大臣，后來參與策劃了日本的帝國主義擴張事業，史稱“大東亞共榮圈”。他被捕過，卻從未被正式指控犯有戰爭罪行。他叫岸信介，在出獄后仕途蒸蒸日上，后來成為日本首相。

\* \* \* \* \*

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歷史上，菲律賓占據著一個很有意思的位置。1941年12月8日，就在珍珠港事件爆發10小時后，日本入侵菲律賓，攻占了該國。時任菲律賓陸軍元帥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于翌年3月撤退至澳大利亞，他發誓稱：“我會回來的。”菲律賓總統曼努埃爾·奎松（Manuel Quezon）也逃到了澳大利亞，繼而輾轉至華盛頓，并在那兒建立了流亡政府。這么做本身就很不尋常；當時印尼沒有流亡政府，緬甸也沒有流亡政府。泰國倒是有流亡政府，但泰國從沒被殖民過。日本人入侵時，菲律賓介于殖民地和獨立國家之間。其已獲得了英聯邦國家的地位，而且原定將于1946年完全獨立。雖然日本人承諾過——用本間雅晴將軍的話來講——要把菲律賓人從美國的專制霸權中解放出來，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搖身一變，成了新的殖民主子，而且統治手段更為殘暴。盡管總統何塞·勞雷爾（José P. Laurel）在1943年正式宣布菲律賓共和國獨立，但日本人仍舊大權在握。每位菲律賓政府官員身后都站著一名日本“軍師”，而每位日本軍師背后都站著日本軍隊和令人聞之色變的憲兵隊。簡言之，所謂的共和國不過是個幌子。

即便如此，菲律賓國內還是有一股作風頑強的抗日力量。其中當屬一支抗日游擊隊最有成效，其綱領有別于奎松或勞雷爾，主要在第一大島呂宋島的鄉間活動。“虎克黨”（Hukbalahap）意為抗日人民軍，由赤腳的農民革命者組成，他們的敵人不光是日本人，也包括菲律賓的大地主。地主們坐享大片甘蔗和椰子種植園帶來的財富，表面上佯裝成民主派，實際卻用封建寡頭的方式統治這個國家。虎克黨最有名的領袖名叫路易斯·塔魯克（Luis Taruc），是個佃農的兒子。另一位有傳奇色彩的虎克黨女戰士叫費利珀·庫拉拉（Felipa Culala），她個頭高大，驍勇善戰，化名“達揚達揚”（Dayang Dayang），就連日本人聽到“達揚達揚”也是聞風喪膽。

日占期間，由于許多地主放棄種植園，逃往馬尼拉，虎克黨就效仿起了共產黨在其他國家的所作所為：他們沒收土地，建立了某種國中之國。該黨的作戰“小分隊”紀律嚴明，心狠手辣，死在他們屠刀下的不光有日本人，那些有通敵或目無法紀嫌疑的菲律賓人也難逃厄運。就連威名赫赫的“達揚達揚”觸犯規矩時也要受罰。她有句口頭禪：“那些不發戰爭財的人是腦子進水了。”她說到做到，大肆搶奪財物，從水牛到珠寶，什么都搶。被捕后，她受到審判，后來被槍決。[29]

何塞·勞雷爾和供職于偽政府的多數黨羽——比如曼努埃爾·羅哈斯（Manuel Roxas）和貝尼格諾·阿基諾（Benigno Aquino）——均出身上流社會的地主家庭。就算沒有日本占領者，虎克黨也一心想要推翻他們的權力。從效忠日本人、推動反美和泛亞事業這點來看，這些人毫無疑問是通敵分子。但正如原西方殖民地內其他勾結日本人的亞洲民族主義者，他們有著復雜的動機。勞雷爾的背景讓人刮目相看，他畢業于耶魯大學法學院，當過參議員，是馬尼拉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雖然貴為殖民精英階層的一分子，但他也許打心底里相信，如要幫助菲律賓人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有必要仰仗日本人激進的“亞細亞主義”。歐洲的一些賣國賊（quisling）也操持相似的論調，他們認為，納粹建立的新秩序可以為他們墮落腐朽的社會注入一絲生機。但這么做的時候，他們背叛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勞雷爾、蘇加諾等人在日本人登陸前后，一直在為外國統治者效力。

勞雷爾一直是菲律賓游擊隊的頭號目標。1943年6月，在同貝尼格諾·阿基諾在維克維克鄉村高爾夫俱樂部打球時，他遭到兩名刺客行刺，背部中彈。其中一人自稱“小喬”。當年晚些時候，結束養傷的勞雷爾赴東京出席了大東亞會議。會上，一干領導人喊著亞洲人皆兄弟的口號，承諾加強泛亞合作。翌年，應日本要求，他同意向美國宣戰。

與此同時，1944年10月，麥克阿瑟將軍兌現了他要重返菲律賓的承諾。為了增加這一幕的戲劇性，他蹚過了萊特島（Leyte）的淺灘，雖然戴著飛行員墨鏡，但他看起來還是愁眉不展。他其實不止一次地蹚過海水，為的是能拍下恰到好處的照片，留作新聞資料。登上呂宋島之前，他如法炮制。麥克阿瑟講話喜歡援引《圣經》，這一套對篤信天主教和神秘主義的菲律賓人想必很有吸引力。他吟誦著：“菲律賓人民，我回來了。感謝我主的恩澤，我們的部隊再次踏上了菲律賓的土地——這片土地，因為我們兩國人民灑下的熱血而變得神圣……到我這里來……神圣的主將為你們指明道路。”

在通往馬尼拉的漫長道路上，美軍艱難跋涉，經歷了血雨腥風。推進過程中，他們得到了虎克黨的積極幫助。菲律賓游擊隊將日本人趕出呂宋島中部各地后，升起星條旗和菲律賓國旗，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期待美國支持獨立的菲律賓社會主義共和國。然而，事與愿違，麥克阿瑟只是對虎克黨的戰斗精神表示了口頭贊賞。有人進諫，建議他請自己最熟悉的那批人出山，也就是過去的地主精英。雖然他曾揚言“挖地三尺，也要把所有叛變的菲律賓人揪出來”，麥克阿瑟卻將勞雷爾偽政府的忠實成員曼努埃爾·羅哈斯任命為美軍準將。[30]

虎克黨收到要他們繳械的命令，他們拒絕交出武器，隨即遭到逮捕。一部分人在沒有受到正式起訴的情況下就被判入獄，其中包括路易斯·塔魯克，他和幾個過去勾結日本人的通敵者被關在一間牢房里。后來，5萬農民來到馬尼拉的馬拉坎南宮[[8]](#_8_Malacanang_Palace_Fei_Lu_Bin)前舉行示威，塔魯克因此獲釋，但他大部分手下仍身陷囹圄。后來發生的事不甚光彩。有人在暗地里較勁，進行錢權交易。之后，馬尼拉的媒體發表文章，歌頌勞雷爾和他的同仁在戰時是不折不扣的愛國者，盡全力保護菲律賓人免受日本人的暴行侵害。麥克阿瑟贊揚羅哈斯是“游擊運動的幾大要素之一”。菲律賓人受到的訓誡是要他們拋開“小肚雞腸式的妒忌心理”和“毫無必要的誤解”，因為這樣只會“阻礙進步”。[31]

作為二戰結束后的首位菲律賓總統，曼努埃爾·羅哈斯宣布赦免戰時的通敵叛國者。成千上萬的人獲釋出獄。路易斯·塔魯克躲進了深山，虎克黨更名為解放人民軍，也就是毛派新人民軍的前身。昔日的地主家族在重新牢牢掌握住他們的財產后，繼續控制著菲律賓的政治。即使到了1986年，在“人民力量”運動（People Power）推翻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讓全世界都看到了亞洲民主化的曙光后，舊精英依舊把持著政壇。“人民力量”運動的明星人物是貝尼格諾·阿基諾的兒媳科拉松·“柯莉”·阿基諾（Corazon “Cory” Aquino），人稱阿基諾夫人。她在位時，副總統由何塞·勞雷爾的兒子“多伊”勞雷爾（“Doy” Laurel）擔任。在寫作本書時，菲律賓的現任總統換成了“柯莉”的長子，阿基諾三世。

\* \* \* \* \*

要想在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恢復合法性，一種辦法是找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并團結在其周圍。這既可以是一位備受愛戴的君王，也可以是抵抗外敵的義士，甚至是某位儼然一副救世主派頭的外國將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腔調也許有些做作，甚至在一些人眼里顯得妄自尊大，但他在日本和菲律賓卻將這一角色發揮到了極致。他保留天皇以體現延續性的做法，背后折射出的意圖是為了彰顯自己身為臨時將軍（shogun）[[9]](#_9_Ri_Ben_Li_Shi_Shang_De_Jiang)的功績。包括麥克阿瑟自己那套在內的英雄主義常常是一種作秀，有時則完全就是胡編亂造。舉例而言，朝鮮的“偉大領袖”金日成就是蘇聯紅軍一手扶植起來的。據稱，正是這位卓越的游擊戰英雄，單槍匹馬地把日本人趕出了朝鮮半島。但事實上，戰時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待在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伯力）附近的一座蘇軍訓練營中。

戰前一些傀儡政權的掛名首腦如今名譽掃地，合法性也受到挑戰，這為內戰埋下了伏筆。在希臘，內戰就呈現出不可阻擋之勢，而在中國，國共兩黨經歷了長達一年的試探對手和各種小沖突后，內戰也處于一觸即發的狀態。

美國人管蔣介石委員長叫司令（Gimo），在戰時美國駐華最高長官、綽號“酸醋喬”（Vinegar Joe）的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嘴里，老蔣的綽號是“花生米”。他名義上控制著整個中國，但實際上有大片疆土并不處于他的管轄之下。不管是自吹自擂，還是在美國的戰時宣傳里，司令大人都是以一副偉大民族領袖的面目出現：是他，英勇地抗擊了日寇。但盤踞在大西北的毛澤東和他的游擊隊則提出了不同意見——倒也并非一點沒有道理——說輕點蔣是消極抗日，說重點他是勾結日寇，聯手對付共產黨。共產黨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抗日者，毛澤東才是民族英雄。但事實上，雙方常把日本侵略看成是比較煩人的一出插曲，而美國人早晚都會出手收拾殘局。真正的敵人在國內。隨著兩支勢不兩立的武裝力量擺開架勢，準備決一雌雄，同時進行較量的還有兩種版本的英雄事跡。

其實，戰爭結束沒多久，兩位領導人就在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見過面，并進行了漫長的會談。雖然各自都看不慣對方，但對彼此的頑強氣節很是欽佩，就好像兩個敵對幫派的大佬一樣惺惺相惜。毛在官方招待會上向蔣敬酒，祝他萬歲。為了避免爆發全面內戰，雙方圍繞權力分享、劃分勢力范圍、建立國共聯合政府等問題進行了氣氛友好的磋商。會議并未達成有約束力的協定。毛告訴同志們，表達和平意愿的聲明（“民主”、“一支軍隊”、蔣的“領導”）只是“一張廢紙”。[32]但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帕特里克·杰伊·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仍然對撮合國共兩黨抱有希望，盡管他心智不太正常，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而且因為表演刺耳的巧克陶族印第安人打仗時的吶喊[[10]](#_10_He_Er_Li_Shi_Yin_Di_An_Ren)，讓主人很下不來臺。在頭腦發熱的赫爾利的想象中，包括熟悉中國問題的外交官在內，哪個美國人要是對國共牽手抱有疑慮，那他就是叛徒，恐怕還是赤匪。

《紐約時報》記者說得沒錯。在10月6日刊發的一篇報導里，他這樣寫道：“對那些不理解為什么討價還價如此嚴重的西方人而言，有必要向他們指出，軍隊在中國政治中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僅如此，武器的作用也是決定性的。這也就是為什么蔣介石堅持只有他有權命令日本人繳械，而毛又對此毫不理會的原因。

1945年夏，蔣的麾下有400萬國軍，遍布華中和華南地區。但他們訓練很差，軍紀渙散，而且帶隊的長官常常腐敗無能。日本人在東北的偽滿洲國和國民黨舊都南京建立了“偽軍”，人數有上百萬之多。偽軍的裝備比國軍精良，而且常常更能打仗。所以蔣并未解散他們，而是傾向于把這些部隊整編進自己的軍隊。另外，各省還有形形色色的一干軍閥，他們表面上效忠中央，但總是靠不住，都在打著自己的小算盤。

城鄉地區的中國平民都很害怕國軍的到來，因為這些部隊的做派更像土匪，而不像軍人，他們打家劫舍，搶吃的，奸淫婦女，還從農民里抽壯丁。偽軍和軍閥的部隊也好不到哪里去。共產黨的部隊大約有一百萬人，另外還有兩百萬民兵，他們本也可以成為專橫跋扈的主子，但至少他們懂得作風紀律的意義。共產黨的軍民關系搞得更好；他們意識到，要打贏戰爭，部分靠的是宣傳。被老百姓視為一支英雄的人民之師是他們的一筆寶貴財富。

大半個中國不僅山河破碎，而且還因為外國占領、軍閥割據、內戰中的清洗與反清洗而元氣大傷，經年的內戰在殘酷性上同抗日戰爭不相上下。研究日本的學者唐納德·金當時還是一位年輕的美國海軍軍官，被派駐在港口城市青島。青島毗鄰黃海，因其海軍基地、歐式建筑和德式啤酒屋而聞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時，日本帝國海軍尚未撤退，金很快就覺察“氣氛有些不對勁的地方”，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欺詐和腐敗的臭氣；“針對通敵者的指控跟這座城市本身的可疑氣質一樣無處不在”。[33]

他發現，管理青島的依舊是日本人當初任命的那批中國人，他們大多聲名狼藉，從外國占領中大撈了一筆。他還發現，日本海軍軍官可以公開吹噓他們的戰功，而通日的中國人則挨了其他中國人的整，然而，整肅者自己過去也有污點；他們只是想搜刮嫌疑人的財物。青島這個地方充斥著外來投機客、黑幫、見風使舵的間諜，還有依舊作威作福的日本人。所有這一切絕非青島特有。金聽說過一些中國各地傳來的小道消息，大致是國民黨請求全副武裝的日軍協助剿共。這些傳聞完全準確。蔣介石政府中的一些右翼派系想借助日本人之力，立即發動和共產黨的戰爭。但司令大人比較謹慎，他不想做得太過分。然而，確有大批日軍被調去守衛中國鐵路等許多設施，以防共產黨來犯。

各地都出現了針對日本人的報復行動，但總體而言，國共兩黨都在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敵人，而國民黨也需要日本的幫助。另外，中日之間存在太多的糾葛，剪不斷理還亂，找不到簡單的解決辦法。

戰爭結束后沒多久，南京就出現了觸目驚心的一幕。1937年的南京，在日軍鐵蹄的長期蹂躪下，有幾萬、或許是幾十萬中國人慘遭強奸和殺害。南京大屠殺至今仍是二戰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暴行之一。岡村寧次將軍并沒有直接參與屠殺，但他與同樣令人發指的戰爭罪行脫不了干系。1938年，他手下的部隊使用化學武器，殺害了不計其數的平民。他在1942年奉行焦土政策，即中國人口中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導致兩百多萬人死亡。所有年齡在15歲至60歲之間的男性都有可能因為反日嫌疑被殺。而系統性擄掠年輕女性——大多來自朝鮮——逼她們在日軍慰安所里充當性奴，同樣也發生在岡村寧次治下。

但在1945年9月9日，同樣是這個岡村，在向何應欽將軍投降時，何將軍竟然朝這位日本將軍鞠了一躬，并對羞辱性的受降儀式讓他丟臉表示歉意。何應欽曾在東京的陸軍士官學校就讀，和岡村寧次是師生關系，何尊稱他為“sensai”，即日語里的老師之意。[34]就這樣，岡村依舊身居南京的外交部大樓，就好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三年后，他被南京法庭起訴犯有戰爭罪，但之后蔣委員長親自出面，讓他免于再受屈辱，國民黨還聘請他做軍事顧問。岡村寧次于1966年死在病床上，死時很安詳。

中國內戰的關鍵其實在于東北。日本人在這里建立重工業，開發礦產，誰率先奪取這塊心臟地帶，誰就可以居于一種幾乎堅不可摧的地位。我們之前也看到了，蘇聯人搶先一步趕到了那兒，奪走所有的工業和金融資產后運往蘇聯。他們剛開始和中共打交道時并非一團和氣。蘇聯紅軍軍官看不起蓬頭垢面的中國軍人，由于缺少翻譯，溝通幾乎寸步難行。另外，斯大林出于穩定大國間關系的考慮，決定暫時承認蔣委員長為中國的合法領袖。

然而，越來越多的中共八路軍部隊一點點流入東北，在一些地區，得到蘇軍指揮官的同情和幫助后，他們接收了當地的日常政務。對這片在多數中國人眼里是牧民和蠻夷家園的北大荒，許多共產黨干部既陌生，又毫無根基，因此接收工作進展艱難。除開和蘇聯人關系緊張外，八路軍還要對付當地為非作歹、四處流竄的偽軍余孽，此外形形色色的潛伏特務也讓他們難以省心。這些游擊團體中，有些跟蘇聯人有關聯，有些隸屬于東三省的軍閥，有些來自國民黨陣營。正如國民黨希望日本和美國能幫忙剿共一樣，共產黨也請求蘇聯支持，鎮壓“反蘇匪徒”。[35]

與此同時，因為對共產黨挺進東北感到不安，蔣介石敦促美國人把國軍部隊投送到東北。美國方面雖然同意了，但有些敷衍了事，因為官方政策是不要卷入“同室操戈的沖突”。通常，國軍到達東北時已是姍姍來遲，而且兵力不足，有時還被送錯了地方。

東北的局勢后來嚴重惡化；1948年，長春一役中，共有30萬平民死于饑餓和疾病。這個地方可謂是龍潭虎穴，將這點刻畫得最淋漓盡致的是發生在中朝邊境安東市一所著名妓院里的故事。

1945年秋天的安東是個海納百川的地方，有點類似東北亞的卡薩布蘭卡，那里不光有關外的中國人，也不乏朝鮮人、俄國人和大約7萬日本僑民，這些日本人里既有駐扎當地的軍人和定居于此的平民，也有從昔日偽滿各地逃來的難民。因為擔心受到來犯蘇軍的侵害，特別是擔心婦女受到騷擾，日本僑民領袖決定成立一個“卡巴萊舞團”，名義上提供歌舞演出，實則為妓院。有了這個地方，就能讓蘇聯人轉移注意力，不再不懷好意地盯著日本良家婦女。管理這一機構（名為安寧飯店，Annei Hanten）的任務落到了一個四十出頭的女人肩上。她叫大町，過去在日本人開的溫泉度假村當過藝伎。通過喚起人們的愛國心，她雇傭了一批日本女性，這當中不少人從未有過從事性服務的經驗。大町要求她們為日本獻身；她們是安東的女子神風隊員。[36]

一些受過大町救命之恩的日本人心存感激，為她立了塊石頭紀念碑。這塊碑現今依舊屹立在她位于日本的老家。大町最引以為豪的是自己“不問政治”的立場，她對所有男人，不論他們地位高低貴賤，是俄國人、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均一視同仁。盡管大町成立“卡巴萊舞團”的初衷是為了供俄國人找樂子，但也吸引了其他類型的客人，包括日本退伍軍官、社團領袖，以及過去勾結日本人、現在又跟國民黨穿一條褲子的中國漢奸。除此之外，光顧的客人里甚至還有中共和日共。嫖客們在清酒、伏特加和中國白酒的作用下，酒酣耳熱，安寧飯店成了交換各種情報的場所。

大町把從蘇聯人那里聽來的有關部隊調遣和計劃抓人的消息透露給日本人。許多日本人因此提前得到風聲，瞅準時機，消失得無影無蹤。安寧飯店里既有間諜，又有雙重間諜；有所謂的“紅蘿卜”（冒充“赤黨”的反共分子），也有“藍蘿卜”（經營出一副反共面目，實為打入敵人內部的共黨）。他們在這里醞釀陰謀和對策。安寧飯店為一名日本職員和中共間諜（也許是根“紅蘿卜”）安排過一場婚禮，日本人借此可以搞清共產黨到底意欲何為。在安寧飯店，國民黨和日本退役軍官還曾密謀啟用先前藏在安東深山里的火炮，發動一場右派軍事政變，不過由于國軍部隊未能如期趕到，這起陰謀流產了。

這邊廂政變流產，沒過多久，那邊廂共產黨八路軍便浩浩蕩蕩地進了城，接替了蘇聯紅軍。剛開始，好像什么都沒變。安寧飯店準備了一桌中式宴席招待共產黨。不過因為共產黨干部對陪酒行為嗤之以鼻，所以席間沒有出現姑娘簇擁在一旁賣弄風騷的景象。也許日本人能幫上八路軍的忙？日本“滿洲國電氣株式會社”的原職工成立了一個“紅色劇團”，旨在演出社會主義“人民大眾劇”。

然而，這段蜜月期并未維持多久。共產黨認為，一所國際化的娼寮妓院與新秩序不太吻合。而且，由于懷疑日本人曾插手國民黨未遂政變，共產黨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逮捕了大町和幾位日本社團領袖。這些人下場如何，鮮有人知道。大町坐了一年牢，1946年9月，她在鴨綠江岸邊被處決。她到底是不是間諜，是的話又替誰效力，始終是個未解之謎。

\* \* \* \* \*

法國急需某種延續性和合法性。自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內戰的余燼就從未停止過燃燒。保皇黨和天主教反動派自共和國誕生之初便一直與其作對。德國占領和維希政權讓他們暫時占了上風。戴高樂將軍很難算得上是左派，但他對扯皮的多黨派民主也無甚好感。盡管反感共和國體制，但出于延續性的考慮，他也只好將自己確立為共和國理所當然的繼承者。雖然國民議會在1940年通過選舉賦予貝當元帥制憲權，但他的維希政府在戰爭一結束便被宣布為非法。戴高樂在1944—1945年期間的任務是將破碎的法國重新黏合起來。

人們對內戰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在抵抗力量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共產黨早在1941年就已準備了待清洗敵人的名單。他們的想法是既要追捕實業家，也不能放過親納粹的法國民兵（Milice）[[11]](#_11_Milice_francaise_1943Nian_We)中的小嘍啰。對曾經的抵抗者來講，重要的是懲罰精英和帶頭人，而不僅僅是“路燈吊死鬼”（Lampistes）——意指那些幕后老板逍遙法外、自己卻被吊死在路燈上的手下。[37]戴高樂意識到，一方面，正義只有看得見才算得到了伸張；另一方面，法國已經傷痕累累，禁不起大規模的清洗了，否則社會將面臨難以忍受的壓力。戴高樂希望盡快結束這一進程，最好幾個月里就結束。設定的最后期限是1945年2月，這當然是辦不到的。

不過，到了2月份，大部分快意恩仇的正義已經得到伸張。囚犯被處以私刑，4 000多人被草草處決，其中一些是被群情激奮的暴民絞死的。特別是在法國南部，某些地區幾乎陷入了無政府狀態。戴高樂并不支持這么做；只有國家才有權成為懲治主體。事實上，部分前抵抗者因為太過熱衷于處決通敵嫌犯而被捕。但戴高樂真能怪罪他們么？帕斯卡爾·科伯（Pascal Copeau）是南方的一位記者兼抵抗運動領導人，他在1945年1月寫道：

在可怕的四年里，最優秀的法國人學會了殺戮，暗殺，搞破壞，扒鐵軌，有時還打家劫舍，從不遵守他們所知曉的法律……是誰教會了法國人做這些？是誰下令讓他們搞暗殺？不是您，我的將軍閣下（mon général），還能是誰呢？[38]

要讓國家重新壟斷對武力的使用權，戴高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抵抗運動的武裝。由于法國抵抗運動地下黨游擊隊員在戰時曾冒著巨大的危險搞到武器，而戴高樂自己卻藏身英國首都，無人身安全之虞，這項工作于是變得很棘手。共產黨抵抗者依舊幻想會爆發第二次法國大革命，為此他們應保留武器。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單單是因為在法國，人們對這種激進運動并不支持，而且斯大林已表明他不會在美國人的勢力范圍內支持一場革命。斯大林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他勸法國共產黨退一步為妙。后來，戴高樂也跟法共達成了協議。該黨黨魁莫里斯·多列士在1939年從法軍開小差當了逃兵，逃到了莫斯科，如果法共想讓他獲準返鄉，且不以叛國投敵罪遭到審判，前提條件是必須同意遣散武裝作戰人員。但還是有人小心地把大量武器藏在偏遠的農莊里、地板下或倉庫中，共產黨最后決定放棄。漸漸地，國家重新獲得了控制權。

某些標志性人物，因為在德占期間罪大惡極，引人注目，被送上了被告席。貝當本人也接受了審判，并被判賣國罪，但鑒于他年事已高，功勛卓著，不適用死刑，因此被流放到大西洋沿岸的某個小島上。他死在那兒，葬在那兒，晚年時得了老年癡呆癥，還被剝奪了軍功。其晚景之凄涼，讓一些忠實追隨者憤憤難平。1973年，追隨者曾試圖為貝當洗刷屈辱，他們挖出他的骸骨，送回法國本土，打算將其風風光光地歸葬在陣亡將士公墓中。但當有人在貝當的律師雅克·伊索爾尼（Maître Jacques Isorni）的車庫里發現了元帥的遺骨后，遺骸旋即被送了回去。就已知的情況來看，目前依然還留在島上。

戰時，貝當最有權勢的部長當屬相貌平平但人見人恨的皮埃爾·拉瓦爾（Pierre Laval）。他就沒那么走運了，被判了死刑。他曾服毒自殺，但失敗了，原因是氰化物毒藥放置時間太久，已經失效。1945年10月，拉瓦爾被槍決。

還有人也因為戰爭罪遭到審判。為了使庭審能夠服眾，之前有必要整飭司法系統。由于戰時全法國只有一位法官拒絕在效忠貝當元帥的宣誓書上簽名，問題就來了。由裁判官和昔日抵抗者組成的整肅委員會必須判斷法官們的行為是否像個忠誠的法國人。基于這一籠統的定義，共有266人被認定為“不良分子”。同樣的標準也用在了公務員身上，制裁手段多種多樣，輕則暫扣一半薪水，重則炒魷魚，甚或完全喪失公民權利。大約100萬公務員中，有11343人受到了某種制裁，5000人丟掉了飯碗。同別國情況相似，法國工商業精英大體上沒有受到沖擊。那些臭名昭著的納粹同情者，比如香水生產商歐萊雅的創始人，全都安然無恙。

雷諾汽車廠的創始人路易·雷諾（Louis Renault）并不是什么出了名的納粹。據他自己回憶稱，德國人拋給他一個殘酷的選擇：要么讓戴姆勒——奔馳公司接管他的企業，眼看自己的工人被送去德國，要么就為德軍制造汽車。他選擇了后面一種。在共產黨抵抗者圈子里，雷諾被看成是最壞的那類賣國實業家，是一等一的階級敵人。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在1944年8月寫道：“雷諾汽車廠的老板們殷勤地給敵人提供裝備，致使盟軍士兵喪命，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39]由于鮮有其他實業家遭到清算，雷諾可能只是替罪羊，或者戴高樂主義者扔給左派的一根骨頭罷了。因為頭部傷勢過重，雷諾最后死在了監獄里，連出庭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都沒等到。

許多遭清算的法官和公務員很快便官復原職，有些在私營部門找到了體面的營生。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的例子很有代表性，除了結局比較意外。帕蓬是最后一個因戰爭罪受審的法國人。還在波爾多警局任高級警官時，他曾把上千名猶太人送去集中營，但在1945年卻并未受到審判。相反，他后來在多屆政府里都當上了大官：戴高樂時期任國務秘書，做過科西嘉和阿爾及利亞的行政長官，并協助粉碎了阿爾及利亞的反殖民主義暴動。還是在戴高樂時期，他當過巴黎警察局局長。為了表彰他對法國的杰出貢獻，戴高樂給他頒發了榮譽軍團勛章。帕蓬的最后一份公職是在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總統（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手下擔任預算部長。帕蓬的職業生涯堪稱輝煌，但有一點不同尋常：他活得很久，直到不光彩的過去找上門來。1995年，帕蓬開始受審，四年后鋃鐺入獄。2002年，他獲釋出獄，并因為非法佩戴榮譽軍團勛章被處以相當于3000美元左右的罰金。勛章也被沒收了。

戴高樂捏合法國社會的方式，和盟軍“修復”日本、意大利、比利時乃至德國的做法沒什么兩樣：把對戰前精英的打擊降到最低限度。無法坐視國家進一步兩極分化的他需要商人、金融家、律師、教授、醫生和官僚發揮才干。他們算找對了后臺。

抵抗運動的男男女女扮演了英勇的叛逆者角色，在別人明哲保身的時候，他們以命相搏。這么做有各種理由：宗教信仰、政治意識形態、百無聊賴、一腔怒火、渴望冒險，或者僅僅是正義感。但跟多數機會主義者和溜須拍馬之輩相比，他們的選擇可謂卓爾不群。

無論在法國還是在其他地方，對犯錯之人的責罰常常是象征性的，而且懲治力度很不公平。體制派相對而言毫發無損。一個叫馬爾特·李夏爾（Marthe Richard）的女人在1945年12月四處游說，建議關閉巴黎的煙花柳巷。李夏爾過去做過妓女，沒準還是個間諜。一年后，《馬爾特·李夏爾法案》（Loi Marthe Richard）生效，法國的妓院全部關門大吉。這股子關閉春樓的熱忱勁兒很不像法國人的風格，據悉，這么做的原因是德占期間，妓院成了“通敵行為”的重鎮。

## 第六章 法治

共產黨的八路軍于1945年深秋挺進東北，之后便步步為營，從替代日本人的中國國民黨手里奪取了部分城池，又從蘇聯紅軍手里接收了另一部分。這項工作甫一啟動，所謂的人民公審隨即來臨。正義來得很快，即使談不上原始，法律的程序也十分粗糙。

有時，中文報紙會刊登廣告，招募證人，呼吁過去所有跟偽滿官員有過節的人站出來舉證。中朝邊境的安東市，人們在一所小學設立了“人民法院”。許多罪狀都很雞毛蒜皮，有些人只是長期積怨難以抒發，想要借此出口惡氣。一個拉黃包車的車夫狀告一位日本商人，因為后者弄壞他的燈籠，卻不肯賠償。一個小伙子回憶道，他父親給一家日本公司做苦力，最后活活累死。遭到控告的人通常都記不太清他們做過什么壞事，要是只被罰一大筆錢就能走人，那還算是幸運的。

還有比這嚴重得多的罪狀。人民正義在這些案件中一樣高效。12月，安東的三名官員被處決在鴨綠江邊，他們中既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且都在偽滿洲國政府里任過職，其中一個是安東的前市長，是個姓曹的中國人，另一個是他的日籍副手渡邊。有人目擊了二人的下場。

他們頭上罩著黑頭套，胸前別著偽滿洲國的勛章——這在過去象征榮譽，現在則成了恥辱的標志。兩人被裝上馬車，沿著安東的主干道游街示眾。他們的頭被人按著，像是在懺悔，手里還舉著木牌，上面寫著鮮紅色的大字，好讓有所人都能看見。一塊牌子上寫著“反動派”，另一塊上寫著“傀儡”。人民法院設在戶外，大批群眾前來圍觀，想要看一眼兩個罪魁禍首。人民法官扯著嗓子喊：“我們怎么處置他倆？”“殺！殺！”暴民們高聲回應。于是就這么定了。兩人被帶到江邊，被逼著跪下，后腦中槍而亡。（據稱行刑前渡邊的耳朵被割了下來，但這點還存在爭議。）[1]

這段目擊者描述的有趣之處并不在于類似審判近乎鬧劇且草菅人命的本質，而是其存在的必要性。中共為什么堅持要舉行審判？干嗎不直接槍斃了流氓惡棍？很明顯，他們希望這些處決在人們眼里是合法的。建立某種形式的法制是獲取合法性的必要條件，甚至在專政體制內亦是如此，或者說在專政體制內尤其如此。但在擺樣子、走過場的公審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審判是一種儀式，為的是彰顯共產黨的權威。安東的被告們受到的指控不僅有為日偽政權當差這條，還有解放后同國民黨“反動派”勾結這條。后一種情況他們很難避免，畢竟國民黨先于共產黨接收了安東。由于共產黨名義上代表的是人民權力，所以人民在這一儀式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大聲喊出期待他們喊出的判決結果。

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既不特立獨行，也不異乎尋常。但凡在共產黨控制的地方，類似的人民法院就猶如雨后春筍，遍地都是。1945年，蘇聯紅軍任命的匈牙利“反法西斯主義者”上臺時，匈牙利作家馬勞伊·山多爾正好身在布達佩斯。當時匈牙利還不是共產黨國家。斯大林認為逐步奪權才是上策；他還不想過早嚇到西方盟友。在11月的大選中，共產黨的選情并不好。但是說到底，誰執政是蘇聯人說了算。拿匈牙利共產黨領袖拉克西·馬加什（Mátyás Rákosi）的話來講，共產黨會像“切香腸”那樣一點點蠶食對手，直到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最終成立。

由于經歷了蘇軍和羅馬尼亞軍隊長達幾個月的圍困，1945年的布達佩斯千瘡百孔。皇宮成了一片廢墟，整個城市斷電，電話打不通，坍塌的橋梁扎進多瑙河，活像受了傷的鋼鐵怪物。食物很短缺。陌生人時而會走進別人家里，要么希望討口飯吃，要么只是尋釁滋事（在馬勞伊筆下，他們是去表達“仇恨”的）。人們把憤怒的矛頭主要對準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昔日法西斯主義箭十字黨（Arrow Cross）的刑訊室被新的一套權威體系所取代，黑幫分子坐著進口美國車，在坑坑洼洼的大街上橫沖直撞。馬勞伊注意到城里一派繁忙景象，很是莫名，但不久后便歸于沉寂。他在回憶錄里寫道，“坑蒙拐騙就像鼠疫一樣四處擴散”，接著又說，法律與正義“無處可尋，盡管人民法院已經在辦案了。出于政治原因的處決給失業游民提供了每天生活的樂趣，就像羅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12]](#_12_Qia_Li_Gu_La__Luo_Ma_Di_Guo)執政時期那樣”。[2]

因為沒有了國王，匈牙利自從1920年代以來一直處于海軍上將霍爾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的統治下，他的正式頭銜是匈牙利王國攝政。在這一奇特的安排之前，共產黨于1919年曾在庫恩·貝拉（Béla Kun）的帶領下統治了匈牙利一年。紅色恐怖過去后，白色恐怖接踵而至。霍爾蒂是個大反動派，但算不上法西斯分子，他終其一生都對共產主義充滿恐懼，同許多人一樣習慣將其和猶太人聯系在一起。霍爾蒂不喜歡猶太人，但還沒到希望他們死絕的地步。1930年代末，他愚蠢地和納粹德國結盟，但在希特勒要求他為大屠殺提供幫助時又退縮了。匈牙利猶太人雖然遭到騷擾，但一直免于毒手。這種情況到1944年發生了改變。德國人決定掌控局面，出兵侵入了匈牙利。德軍在蘇聯正遭受重創，他們的補給線拖得太長，物資供給奇缺，運輸線也被敵軍切斷了。但為了突出納粹的真正要務所在，40多萬匈牙利猶太人被以驚人的效率驅逐出境，大部分死在了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霍爾蒂被迫下臺，讓位給極端反猶的箭十字黨黨首薩拉希·費倫茨（Ferenc Szálasi）。在他在位的163天里，費侖茨大行恐怖政治，并為正式負責在布達佩斯執行“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提供了一切所需的幫助。

1945年，反法西斯政權聲明，箭十字黨政府里里外外所有人都必須接受審判。一批人將被處決是意料之中的事。各地人民正義的一大共同點在于審判的結果很少存在爭議。這不僅是人民法院的職責，媒體同樣需要發揮作用。伊姆雷迪·貝洛（Béla Imrédy）過去做過銀行經理，后來成了迫害猶太人的一員干將，1938年，他當上了總理。審判貝洛的時候，一位知名記者這樣形容他：“一個干瘦的小矮子，他害怕極了，到處瞎摸”，“雖然惡貫滿盈，但也是條可憐蟲”，“在鐵證如山面前，像只灰色的蜥蜴那樣扭動著”。[3]有一點需要提到的是，西方媒體在控訴納粹罪行時，一樣也是聳人聽聞。

一位匈牙利法律專家一語道破了人民審判的真正目的。審判并懲罰戰犯不單單是因為他們“觸犯了法律”，而是“要為他們犯下的政治錯誤報復他們……”[4]法庭由黨員和工會成員構成，專業法官負責引導。有時候，專業法官，特別是國家人民法院理事會——即上訴法院——的法官被批評太過心慈手軟。共產黨的機關報《自由人民報》（Szabad Nép）大聲疾呼：“理事會里的專業法官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人民的法官。人民不會把案件卷宗當兒戲；他們不會在審判戰犯的案子里找從輕發落的理由，而是會要求狠狠報復那些讓他們受苦受難、嘗盡屈辱的罪人。”[5]

同樣，歷史也被牢牢地控制在新秩序的權威之下。需要重申的是，盡管為這一秩序撐腰的是蘇聯人，但其還不算是共產主義政權。法官判決一些被告——比如1941年任總理的巴爾多希·拉斯洛（László Bárdossy）——要為1919年粉碎“民主制”負責。事實上，真正被粉碎的是庫恩·貝拉率領的無產階級共產黨專政，他們在好勇斗狠和草菅人命上也是頗有一套。然而，被審判的不光是人，還有這些人所代表的體制。在箭十字黨政府內任司法部長的布丁斯基·拉斯洛（László Budinszky）被判處死刑，因為根據全國委員會的說法，“二十五年的專制統治”已經將“國家帶到了崩潰的邊緣”。[6]

從數據來看，匈牙利其實還不算是清算前政權力度最大的國家。在比利時，有57000多人因為通敵遭到起訴。[7]在荷蘭，50000名通敵者被判了刑。[8]在匈牙利，這一人數接近27000。在希臘，截至1945年底共有48956人在蹲監獄。但他們都是左派。

在個別國家，共產黨和反對派都出于政治目的操縱審判，偶爾還同時進行，在這一方面，希臘是最好的例證。早在1943年的希臘，左派人民解放軍已經在被解放的地區成立了人民法院，這支部隊隸屬于共產黨領導下的國民解放陣線。人民法院是在淪陷希臘建立社會主義國家計劃中的一環。人民法院的成員有國民解放陣線戰士和其他“同志”——農民、卡車司機等等，他們審判罪犯、戰犯和投敵分子。[9]判決普遍都很重。許多人在經過倉促審判后就被游擊隊處決，有時連審判都省略了。

希臘鄉下最常見的犯罪行為似乎是偷牛。然而在希臘中部村莊德斯卡提，游擊隊根本無暇顧及偷牛賊。他們只是告知村民，說不準再偷牛了，因為“我們沒有監獄或流放地來扣押盜賊。如果你們中間有人偷牛時被抓了，他只要說想讓我們砍他哪個部位就行，砍腦袋還是砍腳。自己定吧”。[10]很明顯，這法子奏效了。至少在德斯卡提，偷牛之風戛然而止。人民法院倒是處理了一起很有意思的案子，一個小伙子在跟姑娘表明愛意后，卻向另外一名女子求婚。法院給了他一個嚴峻的選擇，要么娶第一個姑娘，要么掉腦袋。他遲疑了很久，直到最后一刻決定還是活命要緊。

人民法院對通敵者可就一點都不心慈手軟了。通敵者包括為德國人效力的警察和憲兵、法西斯主義旗手、講斯拉夫語并勾結保加利亞人侵吞大片希臘領土的馬其頓人，或者阻礙革命的階級敵人。1944年春，希臘從德國鐵蹄下獲得解放，之后一段時期執政大權落到了民族團結黨組建的政府手里。但就算該政府建立了正式法院以起訴通敵者，人民法院在某些地區依然運行著，直至1945年才退出歷史舞臺。這樣，希臘國內就存在兩個獨立的司法體系，一個是官方的，但權力有限；另一個是非官方的，但管轄范圍更大。這一事實顯示，在觸及政治合法性時，各方很難達成什么共識。希臘沒有戴高樂將軍這樣的人物，可以在共產黨和保守派以及在保皇黨和自由派之間彌合分歧。戰爭的傷疤遠未愈合，隔閡依舊深如溝壑。

官方的法院嘗試過審判戰時最高通敵者，比如德占期間的數任希臘總理。但是審判進展緩慢，且時不時陷入僵局。趨炎附勢的總理們使出了賣國賊慣用的伎倆，口口聲聲說他們戀棧權力是出于愛國，他們也的確拿出了一些證據，證明是希臘流亡政府讓他們堅守崗位，在亂世中維持大局。流亡政府的首腦不是別人，正是希臘解放后首任總理喬治奧斯·帕潘德里歐（Georgios Papandreou），他的兒孫日后都成為了總理。

更歹毒的通敵者，比如兇狠的保安團，則壓根沒受到起訴。1945年2月，各方簽訂了所謂的《瓦爾基茨停戰協定》后，左派被敦促放下武器，期待通過全民公投產生未來政府。在這之后，希臘實際上亂成了一鍋粥。過去的右翼通敵分子拒絕繳械，并恐嚇任何有同情左派嫌疑的人。一些人僅僅因為參與過人民法院就被逮捕，時而被槍決。這一回，掌管國中之國的成了右派民兵，他們的行為凌駕于政府控制之上。鑒于警察大都和右派同屬于一個陣營，法庭無法仰仗他們逮捕昔日的通敵者。相反，過去為德國人賣命的武裝人員倒是明目張膽地毒打、拷問并囚禁游擊隊員和他們的支持者。1945年，監獄里關押的通敵者和國民解放陣線支持者的人數之比為1:10。

一個叫帕納約蒂斯（Panayiotis）的老游擊隊員在1945年2月交出了武器。幾個禮拜后，他被前保安團的人員逮住，他們把他帶到附近一所學校，把他倒吊起來，用槍托打他。接著還用鞭子抽他的腳底板，抽得他皮開肉綻，只能一路爬回家。即便如此，日后在澳大利亞的家中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他還是覺得自己是個幸運兒，因為“只淪為第一波法西斯報復行動的受害者”，并且“逃過了第二波報復。在此期間，成千上萬的人在法西斯的公堂里被判處死刑”。[11]那時希臘雖然解放了，但并不標志著內亂的結束，或看似永無止境、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已經偃旗息鼓。相反，更大的亂子還在后面。

\* \* \* \* \*

大約二千五百年前的雅典是悲劇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杰作《歐墨尼得斯》（Eumenides，又譯“復仇女神”）的故事發生地。這部作品講述的是一樁謀殺案。為報殺父之仇，俄瑞斯特斯憤而弒母。劣行觸發了報復狂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直到正義得到伸張。智慧女神、雅典的守護神帕拉斯·雅典娜說服俄瑞斯特斯接受審判。她告訴他，只有通過在法庭上的理性辯論，才能平息復仇之火。但即使是法庭上的理性辯論也并不總能得出清晰的結論；陪審團的票數一半對一半，于是就要由雅典娜作出神圣的裁決，她選擇放走俄瑞斯特斯。不過她的決定的確是平息了人們的怒氣：

心中的墻壁，

再也不能反射妖言惑眾的聒噪，

也得不到鮮血和犯罪的滋潤。

干渴的塵埃，

再也不能吸收流淌的黑色血流。

騷亂的公民因憤怒和復仇灑下熱血

大聲喊著殺人償命！[12]

自從雅典娜守護著以她命名的歷史名城以來，人世間有些事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結束血債血償的惡性循環依舊是舉行審判的最大理由。但在戰爭結束或專制政權倒臺后，審判存在一個問題，即潛在的被告人數龐大。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跟丘吉爾說應該立刻槍斃5萬名德國軍官，他開這個玩笑時也許只是沉浸在黑色幽默中。但很明顯，丘吉爾并沒有被逗樂，反而怒氣沖沖地跺著腳拂袖而去。但是斯大林的話也有一定道理。即使沒有所謂的集體罪行一說，有罪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審也審不過來。然而，正義必須看得見才行。有些罪行的主體成千上萬，而且背后還有上百萬人搖旗助威。這倒不是說代為受審的人就是替罪羊。但話說回來，部分案例中，一些人的確是因為象征意義而被推到臺前受審，原因是沒有條件審判其他人，他們或人數眾多，或逃之夭夭，或出于政治原因受到庇護。

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中有一名叫石井四郎的軍醫，他行事傲慢，為人孤僻，最早聲名鵲起是因為發明了一套凈水系統。他曾經在天皇面前展示其新發明，朝過濾水里撒尿，并邀請天皇喝上一口，把后者嚇得不輕。天皇禮貌地拒絕了。石井還是最早大力號召打細菌戰、化學戰的人。1936年，日軍批準他在偽滿洲國的哈爾濱附近建造一座體積龐大的秘密設施。在那里，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放手試驗。石井在731部隊里有諸多得力助手，包括一名叫北野政次的軍醫，他們不僅研究鼠疫、霍亂等疾病，而且還拿幾千名囚犯做活體實驗，實驗內容應有盡有，全看醫生們的興趣。用作人體小白鼠的多為中國人，但也有俄國人，甚至還有一小部分美國戰俘。在日本人口中，他們被叫做“圓木”或“猴子”。一些人被置于極寒環境下測試抗凍能力；一些人被倒吊起來，看用多久會窒息而亡；一些人沒打麻藥就被開膛破肚，摘走器官；還有一些人被注射了致命病菌。731部隊的另一項特長是讓大量老鼠感染上致命細菌，然后將它們空投到中國城市。一同被扔下的還有拴在小型降落傘下的陶瓷炸彈，里面是成千上萬只跳蚤。

1945年夏，就在蘇聯紅軍到來前，撤退在即的日本人摧毀了哈爾濱附近的“凈水設施”，殺光了里面剩下的囚犯。當年的廢墟上如今建起了一座“愛國主義博物館”，里面陳列著石井和手下一起做活體解剖的蠟像。實際上，石井、北野和一些部下逃回了日本。蘇聯人俘虜的大多是軍階較低的醫生，他們被起訴犯有戰爭罪。盡管麥克阿瑟將軍承諾會審判日本戰犯（他總是對天皇網開一面），但石井很快從視線中消失了。他設法說服了以查爾斯·威洛比少將——麥克阿瑟的“法西斯寵物”——領銜的審訊人員，聲稱他在華實驗所取得的數據對美軍有巨大價值。威洛比也相信，美國醫生沒條件做的人體試驗的確能夠提供重要信息。當時美國人很擔心，生怕蘇聯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走在了他們前面。另外，一名美軍醫學專家在寫給國務院官員的備忘錄里表示，人體試驗要比動物試驗好。而且，鑒于“任何戰爭罪審判都會將這類數據毫無保留地泄露給所有國家，為了美國的國防和國家安全利益，必須竭力防止這方面的信息公開”。[13]

1959年，石井四郎中將卒于東京，死時很安詳。督辦他葬禮的專員是過去的副官和日后731部隊的繼任者北野政次中將。北野是血液試驗領域的行家，后來成為日本第一家商業血庫“綠十字株式會社”的老板。這些劊子手沒留下什么罪證，唯一的例外是哈爾濱附近監獄實驗室的廢墟，以及中國某地廢棄地下室耗子窩里一根奇特的紀念碑。立碑的人是北野，為的是紀念那些因研究目的被他解剖的老鼠。

\* \* \* \* \*

在太平洋戰區，第一個接受戰爭罪審判的人是山下奉文將軍，他有個別名，叫“馬來亞之虎”，這一綽號威震日本，但外國人卻聞之色變。實際上，山下將軍在馬來亞沒待多久，他是在1942年2月以弱勝強、攻占新加坡一役后贏得了“馬來亞之虎”這一諢名的；是役，雙方兵力之比為3萬日軍對陣10萬英軍和英聯邦軍隊。山下奉文面對手下敗將白思華中將（Arthur Percival）時，要求后者直截了當回答他的問題：“到底投不投降？”時至今日，人們依舊能在新加坡圣淘沙島（Sentosa）上的游樂園里看到一組蠟像，描繪的就是當年這一羞辱性的場景。

日本的戰時首相東條英機將軍既不喜歡也不信任山下，或許是因為妒忌后者杰出的軍事才能，又或許是因為山下對日本同西方國家開戰一事持反對態度。總之，東條為了排擠山下，把他調離東南亞，派去偽滿洲國任職，這樣他就沒機會在戰場上建功立業。直到1944年東條大權旁落，山下才又被派回南洋。他接到的任務是守衛菲律賓，這是份苦差事，因為菲律賓已經無險可守了。

1945年秋，山下接受審判，罪名是他縱容二戰期間一起罄竹難書的暴行：馬尼拉大屠殺。

屠殺的史實無可爭辯。1945年2月，美軍兵臨城下，將2萬多名日軍圍困在馬尼拉，其中大部分是日本海軍。他們接到的命令是殊死抵抗，只要還占據菲律賓首都一天，就應盡可能地大肆搞破壞。在灌飽了啤酒和清酒后，日軍進行了屠城。婦女不分老幼，均被先奸后殺。嬰兒和小孩被扔在墻上摔死，或被刺刀肢解。日軍剁去男人的手腳，為的只是尋開心，完事后又將他們殺害。日軍還突襲了醫院，放火將病人活活燒死。民房和建筑也被付之一炬。此外，就在暴行上演的同時，美軍坦克和榴彈炮還不停地轟炸和炮擊馬尼拉，日軍則靠火焰噴射器和巴祖卡火箭筒打退了美國人的一波波進攻。經過一個月的蹂躪，馬尼拉成了一片火海，到處是殘磚碎瓦。其遭受破壞的程度堪比華沙起義。此外，在這一漫長的屠城過程中，共有10萬名菲律賓人被殺。

馬尼拉在戰前曾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心儀之地。因為日軍屠城，他位于馬尼拉飯店的客房嚴重損毀。隔著老遠的距離，他在飯店頂上目睹日軍進攻，心中充滿震驚。他寫道：“突然間，閣樓燃起熊熊大火，原來是被日本人擊中了。我懷著難以名狀的心情，眼睜睜地看著我漂亮的軍事圖書館、紀念品和收藏了大半輩子的私人物品毀于一旦……我嘗盡了酸楚和美麗家園被毀的苦澀。”[14]

對于麥克阿瑟而言，1945年發生在馬尼拉的屠殺，以及1942年被本間雅晴將軍率領的日軍趕出菲律賓這一事實，不啻一種人身侮辱。因此，針對本間和山下的審判就蒙上了個人恩怨的色彩。1945年6月，盟國就處置戰犯作出決定，隨即華盛頓方面就發來一紙命令，要求迅速舉行審判。但審判的主體是聽命于麥克阿瑟的軍事委員會。不光法官是由麥克阿瑟任命的，就連庭審程序也是麥克阿瑟安排的。這讓當時在場許多人明顯感受到，這些審判不是為了熄滅復仇的怒火；它們本身就是一種復仇。

有人必須要為發生在馬尼拉的駭人罪行付出代價，不僅如此，還要算上日本占領者犯下的其他暴行：比如1942年4月的巴丹死亡行（Bataan Death March）、對戰俘實施的饑餓政策、摧毀菲律賓城鎮和村莊，還有憲兵隊管理的刑訊室。由于菲律賓精英階層中的通敵分子大多得到了赦免，而最積極的菲律賓抵抗者以剿共之名被鎮壓，美國人迫切需要找出一個惡棍，給飽受摧殘的菲律賓人一個交代，看，正義還是能得到伸張的。需要有一張面目猙獰的臉，來代表那些無名無姓的劊子手。有人必須上絞架。

山下奉文看起來像極了這一角色：他身材矮小，頭頸粗短，小眼睛，還近視。他的形象儼然一副日本戰犯的漫畫像。美軍鼓勵菲律賓人前來旁聽審判。庭審在原高等專員的宅邸里進行。一位老嫗對她在戰時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懷，在皮夾里藏了石塊，為的就是在法庭上砸向這個人面獸心的日本將軍。一些美國記者在山下被定罪前竭力譴責他的行徑。一名參與庭審的《揚基人》記者一針見血地分析道：“從審判一開始，你就找不到哪怕愿意出兩個比索（peso），賭山下被判無罪的蠢蛋。”[15]

《揚基人》繼續寫道：“山下將軍曾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態統治菲律賓，但此刻，在布滿彈痕的高等專員辦公室里，他卻作為戰犯，站在一個五人法庭前。他依法受到了公正的審判——這種待遇，將軍是不屑于提供給他的受害者的。”

這一說法幾乎可以說是大錯特錯。山下從未進入過高等專員的辦公室，更不可能擺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態。他第一次踏足菲律賓，是在麥克阿瑟蹚過萊特灣（Leyte Gulf）前不久的事。那時，鎮守菲律賓已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山下對當地地形根本不熟悉，軍隊的指揮系統又亂作一團；他的部隊分散在菲律賓各個島嶼上，島嶼之間的聯系大都被切斷了；隱匿在山林里的許多士兵已經得不到食物補給；汽油幾乎無處可尋；部隊訓練很差，而且被饑餓、體力透支和熱帶氣候搞得士氣低落。在菲律賓游擊隊的襲擾和美軍優勢軍力的雙重夾擊下，山下甚至沒機會見到自己的部隊，更別提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態帶兵打仗了。

馬尼拉大屠殺至少部分是日本人自身混亂無序造成的結果。山下的指揮部位于距離馬尼拉約200英里開外的山林當中。他很清楚首都是守不住的，于是下令所有日軍后撤，包括名義上歸他指揮的海軍陸戰隊。馬尼拉將成為一座不設防的城市，只留1600名士兵駐守，保衛軍用補給。但是海軍司令官們猶豫不決。一些人想要戰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其他人主張撤退，不過在此之前要破壞港口設施。所以到底誰來指揮就成了個謎，軍令發出后收不到答復。正如日軍內部常有的情況，中級軍官擅作主張，他們中間最狂熱的好戰之徒占據了上風。等到山下氣得七竅生煙，再次嚴令他們撤退時，水陸兩軍已經被困在馬尼拉，只剩死路一條。

山下顯然沒有受到公正的審判。擔任法官的是軍隊里的文職官員，他們的法律知識同他們對戰場情況的了解一樣貧乏。其中一名法官實在太過無聊，大部分時間一直在打瞌睡，而且睡得很沉。麥克阿瑟把一切必要資源交由檢方使用，而辯護律師的遴選工作直到最后一分鐘才定下人選。對于山下面臨的六十多項指控，律師根本沒時間調查，甚至在庭審開始前，檢方又給他多加了幾條罪名。有關取證和其他法律程序的規則看起來就算不存在人為操縱，也是十分武斷的。在麥克阿瑟所作的一份“特別聲明”中，盟軍于6月確立的規則得到了重申：“軍事法庭不應被取證的技術性條例束縛住手腳。其應盡最大可能，迅速而高效地采納并運用非技術性程序，并且應承認任何被認為具有證明價值的證據。被告所作的一切所謂的認罪表述和聲明，都應得到法庭的采信。”[16]

可惜，對于山下，這一安排包含以下情形：一些從前勾結日軍的人，自己身不正行不端，在法庭上的宣誓和供述的真實性自然可疑，但為了把名聲洗白，他們不惜作出荒誕不經的指控，說這位日本將軍曾計劃滅絕全體菲律賓人。此外還冒出來一連串證人，他們身心遭受了巨大創傷，訴說在馬尼拉浩劫期間自己經歷的慘劇。《揚基人》的報道如是寫道：“年輕的女證人一邊啜泣，一邊說自己如何被鬼子兵輪奸。許多姑娘表示她們在刺刀下被逼就范……這里有一段摘錄的證詞：‘……一個12歲的小女孩躺在地上一張席子上。她渾身上下都是血，身下的席子也浸透了鮮血。’”

值得重申的是，很少有人會質疑這些故事的真實性。問題在于，山下是不是知道這些慘案，而且當時是不是有能力制止暴力。在同時進行的紐倫堡審判中，德國將軍只會因為他們下令、慫恿或親身參與其中的戰爭罪行受到指控。沒有證據表明山下曾有上述行為。實際情況是，他的命令內容截然相反。因此，他受到的指控是前所未有的，即未能制止部隊的暴行。而他對這支部隊根本沒有控制權，手下也故意抗命不從。《揚基人》充滿信心地表示，山下“依法”得到了公正的裁決。如果真如其所言，那么判處他有罪的這部法律，則是山下或任何其他軍事指揮官聞所未聞的。1945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四周年紀念日當天，山下奉文被判處絞刑。臨刑前，他向法官們鞠了一躬，感謝美國給了他“讓正直的美國軍官和紳士為他擔任辯護律師”的待遇。羅伯特·凱爾（Robert Kerr）少校接受報紙記者采訪時說，他來太平洋參戰，本想在海灘上射殺日本鬼子，而不是絞死他們，不過這兩種結果對他來講沒什么兩樣。[17]

麥克阿瑟拒絕了從輕發落的請求。盡管希望不大，但山下的律師團還是竭力想讓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審判是非法的。他們的理由是軍事委員會無權在和平時期審判過去的敵人，而且審判并不公平。最后，最高法院決定還是不挑戰軍事法庭的合法性。但還是有兩位大法官對審判結果持激烈批評的態度。拿其中一位小威利·拉特利奇（Wiley B. Rutledge Jr.）大法官的話來講：“在吾國的傳統中，從沒有當事人會因為事后追認的罪行遭到起訴……我們也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將集體罪責加諸個體頭上。對于既有能力又有義務制止犯罪的當事人，如果他未被起訴曾積極參與犯罪，或者我們無法證明他明明知情，卻未采取行動阻止他人為非作歹的話，我們也絕不會讓他一個人來扛。”[18]

山下口口聲聲說自己問心無愧。他表示馬尼拉慘案爆發時自己并不知情，但其證據深深觸動了他的靈魂。他告訴律師，在導致這么多子弟兵客死異鄉后，他已沒臉再回日本。聽到判決書后，他寫了一首短詩：

我過去所認識的世界如今成了一片恥辱之地，

此時我若不死，則更待何時？[19]

1946年2月23日，山下在位于馬尼拉以南風景如畫的溫泉勝地洛斯巴諾斯（Los Baños）被執行絞刑。

\* \* \* \* \*

對于為什么不依不饒地要將他的日本對手置于死地，麥克阿瑟將軍給出了一種奇特而又有趣的辯解。在他看來，山下讓軍人這個職業蒙羞了。

當兵打仗這個傳統源遠流長，充滿榮耀。其根植于人類最崇高的品質——也就是犧牲精神。這名軍官……辜負了這一不容改變的標準；他愧對自己的軍隊、國家，也有負于他的敵人和全人類；他徹徹底底違背了作為軍人的信仰。正如庭審所顯示的那樣，由此產生的過錯是軍人職業的污點，玷污了文明，并且留下了一段屈辱而可恥的回憶，永遠都無法磨滅。[20]

麥克阿瑟以他汪洋恣意的文采，道出了同時代人的普遍情緒：審判德國和日本戰犯以及他們的幫兇，不只是為了恢復法治，還為了重塑“文明”。在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上，檢察官也操持相同的論調。將文明和“軍人信仰”等同起來，是典型的麥克阿瑟式思路。另一方面，對于曾在外族占領下忍辱負重的國家，通過審判抹去“屈辱可恥的回憶”變得十分重要。也許麥克阿瑟說話時腦子里想的是菲律賓，但這段回憶好似無處不在的影子，投射在所有因勾結占領者而受審的國家領導人身上，縱使他們覺得自己這么做是基于光明正大的理由。

皮埃爾·拉瓦爾在兩屆維希政府中均擔任過最高部長職務，安東·米塞特（Anton Mussert）則是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NSB）“領袖”，兩人有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自認為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殫精竭慮為國家盡忠的愛國者。1945年秋冬，經過簡短的審判，他們被判犯有叛國罪，面對行刑者時，兩人大義凜然，認為自己死得像個烈士，有朝一日定會得到平反，沉冤昭雪，不僅如此，他們還會被追認為國家的救星。兩人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他們一命嗚呼時都是各自國家里最被唾棄的人。比他們兇殘和惡劣的人大有人在。拉瓦爾和米塞特都不崇尚暴力。相反，拉瓦爾在一戰期間還是個左派和平主義者，對軍事行動素來嗤之以鼻，據稱，哪怕是保家衛國的戰斗也不例外。他生來就是個綏靖主義者，對自己的談判能力十分自信，哪怕對手是魔鬼，他也一樣有信心打敗對方。正如他和自己律師所說的那樣：“通敵對我而言意味著談判。”[21]實際上，當需要捍衛部分同胞的利益時，兩人偶爾跟德國人唱過對臺戲，雖然經常無果而終。盡管如此，他們幾乎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這點解釋了他們的判決結果為何早在意料之中。

同山下奉文一樣，拉瓦爾和米塞特都是相貌平平之輩，這點顯然對他們不利。米塞特身材矮胖，圓臉，穿著自己法西斯政黨的黑制服和皮大衣，總是一副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相。拉瓦爾則不同，他從來就不是一個腳蹬皮靴、身穿制服的煽動家，而是職業政客，身上的行頭總是條紋西褲搭配白色領帶。他的氣質有點類似賣問題產品的無良商販：個子不高，膚色很深，頭發油膩，眼睛半開半閉，嘴里總是叼著根香煙，把畸形的牙齒和濃密的八字胡熏得焦黃。米塞特職業生涯起步時干的是工程師（他設計過高速公路等項目），拉瓦爾則是律師。相比較，拉瓦爾在仕途上終究略勝一籌。戰前，他兩次擔任過法國政府的總理，1931年還被評為《時代》雜志年度人物——上榜理由是“冷靜、威嚴、人氣高”，為法國平穩度過大蕭條保駕護航。[22]1930年代末，米塞特多少已經算是許多荷蘭人眼里的諧星了；他總是一襲黑衣神氣活現地招搖過市，這不太符合荷蘭人的做派。

兩個人都不希望看到德國入侵自己的祖國，他們畢竟都是民族主義者。其實，在有關拉瓦爾的年度人物特稿里，《時代》雜志還贊揚了他強硬的對德立場。1935年，他曾同英意兩國制定了一份制止德國重新武裝的協定，雖然協議很短命，但只要能避免重燃戰火，怎么做都行。然而，等到戰爭真的爆發了，米塞特和拉瓦爾卻都將德國占領看成是機遇，似乎他們的大好時光終于來臨了。米塞特對新歐洲有自己的設想，其應該由“日耳曼民族”主導，領袖自然是希特勒，不過國家社會主義黨統治的荷蘭應享有一定自主權，領導人是米塞特自己。拉瓦爾對法西斯主義理想并不感冒，但在經歷了1930年代末的政治動蕩后，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國在艱難時世中的救世主。只要把貝當元帥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推舉為名義首腦，拉瓦爾就能放開手腳，為法國爭取最好的局面。不止如此：他也相信建設新歐洲的可能性，在新秩序下，法國會成為德國的主要盟友，為清除歐洲大陸兩大當代毒瘤出力：盎格魯——猶太資本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對此，他曾于1942年作過電臺講話：“我渴望德國獲勝，因為不這樣的話，布爾什維克主義明天就會遍地開花”。[23]這些話三年后會讓他付出代價。

戰前，沒有證據顯示米塞特和拉瓦爾對猶太人有什么私仇。米塞特的知心朋友很少，而其中一個就是猶太人。1930年代時，他甚至還鼓勵猶太人加入他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他看來，既有“好的猶太人”，也有“壞的猶太人”。壞的那些拒絕追隨他，或批評過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這些猶太人“不算荷蘭人”。不幸的是，米塞特的德國同道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要嚴格得多，這也成了橫亙在他和德國黨衛隊之間的若干分歧之一。1940年，他被迫開除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里僅剩的幾位猶太成員。對此，米塞特曾表達過深切的悔意。到底多后悔則有待商榷，因為他在1938年時拿出過一份詳細的方案，計劃將歐洲猶太人遷往荷屬、法屬和英屬圭亞那。但希姆萊和希特勒對這份計劃都不感興趣。（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想法沒有檔案記載。）另外，米塞特對于用從猶太人那里搶來的財產養肥自己和親友這點也并未顯示出良心上的歉疚。[24]

拉瓦爾從不贊同法國極右翼強烈的反猶主義。他和米塞特一樣，也有猶太朋友，和猶太同事密切共事過。然而，1940年，維希法國在并未受到德國方面的壓力下，出臺了剝奪猶太人公民權的《猶太人法案》（statut des juifs），當時的國務部長正是拉瓦爾。他后來曾試圖搭救法國出生的猶太人，使他們免遭驅逐，但這么做的代價是把幾萬名出生在國外的猶太人送進了第三帝國的虎口。這其中就包括已經歸化、但在戰時被剝奪國籍的法國公民。

通過勾結外敵，將自己樹立為救世主，類似米塞特和拉瓦爾這樣愛慕虛榮的人就徑直走進了德國人為他們所設的陷阱。米塞特這么做是出于意識形態妄想和自負，拉瓦爾則是因為道德麻木，而且太過高估了自己的小聰明。兩人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民族主義幻想——法國和荷蘭成為新歐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德國人全面主導歐洲的計劃很不合拍。只要這些“愛國賊”為德國不得人心甚至是罪惡的行徑充當擋箭牌，他們對德國人就有利用價值。漸漸地，兩人屈從了，有時很不情愿，有時則滿不在乎。米塞特還把他的沖鋒隊并入德國黨衛隊，宣誓效忠希特勒。在他朦朧的想象中，希特勒不僅是德國的元首，更是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元首。拉瓦爾通敵的方式分兩種，為了換取部分法國戰俘獲釋，他把法國工人調撥給德國工業界供其差遣；他還建立了一支民兵部隊，用來對付法國游擊隊，并將人數眾多的猶太人推向死亡。1942年7月，還是拉瓦爾，而非德國人，堅持要把猶太兒童連同他們的家長一起驅逐至波蘭，此舉名義上是為了不拆散家庭。

由于他們的所作所為，兩人既得不到德國人的信任和青睞——他們被看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也被自己的同胞所仇視，因為他們象征著外族占領最可恥和陰暗的一面。就連各自國內最親德的納粹分子，那些興高采烈為希特勒帝國效勞的人，對他倆也是恨得牙癢癢。既然很少有人站在米塞特和拉瓦爾這邊，解放后他們就成了絕佳的審判和懲罰對象。抓兩個通敵賣國的代表人物樹立典型，這讓千百萬沒有勇氣挺身而出的人自我感覺良好了些。

貝當也接受了審判，并被處以死刑，但歲數和聲望救了他一命。戴高樂本不打算審判他，將軍更希望讓老頭兒繼續在瑞士流亡。但貝當自己要求受審。如果說這點已經讓人臉上掛不住的話，那么法國人肯定下不了手槍斃這位凡爾登戰役的英雄。于是，貝當改而被判流放。從一定意義上講，拉瓦爾是做了他的替死鬼。當時有一首流行的法國童謠這么唱來著：“貝當，去睡覺/拉瓦爾，上刑臺/戴高樂，干起來”。十多年前曾熱情洋溢地贊賞過拉瓦爾的《時代》雜志如今寫道：

上星期，皮埃爾·拉瓦爾接受了審判。在老元帥貝當受審、被判死刑，最后減刑至終身監禁的案子中，每個法國人心里都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但拉瓦爾卻沒有得到人們哪怕一丁點的憐憫。處死皮埃爾·拉瓦爾本是件不得不干的雜活，可也是一次讓人興奮的復仇。他把審判變成了可恥的鬧劇。[25]

這么說略微顯得有失公允。沒錯，審判是一場鬧劇，但拉瓦爾并非罪魁禍首。戴高樂并不熱衷清算和審判這檔子事，但正如童謠所唱的那樣，他是不得已而為之，也希望這項工作盡快結束。圍繞戰后憲法的全民公投定在10月21日，所以拉瓦爾案的判決結果必須在這之前下達。拉瓦爾坐在監獄牢房里，每天抽掉五包美國香煙，胸中憤憤不平，因為他拿不到為自己辯護而精心準備的材料。他曾在德國短暫避難，后被人用飛機送回法國。人們從他的行李箱里找到一張紙條，上面的內容很能反映出他內心的苦悶：“這可真是對奇怪的矛盾。我的施政和作為本應為我贏得祖國的認可，可如今，我卻不得不在法庭上自證清白。不論是在戰前，還是在德占期那段艱難歲月里，我很清楚自己履行了職責。”[26]

米塞特一直以來都是個妄想狂，被關在荷蘭北海沿岸的監獄里時，他又做起了黃粱美夢：他設計了一艘巨型潛艇。在他看來，美國人肯定會充分利用這一發明，他因此期待自己被送去美國。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周里，米塞特一直在學英語，但這一嘗試同樣以失敗告終。

拉瓦爾案的審判存在若干污點，其中一點被告本人也迅速指出過，即審判他的法官和檢察官自己也在維希政權里當過差，也宣誓過效忠貝當。總檢察長安德烈·莫爾奈（André Mornet）甚至還是撤銷猶太人國籍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陪審團中既有國會議員，也有抵抗運動戰士。

雅克·夏龐蒂埃（Jacques Charpentier）是巴黎律師協會主席，他從本案當中讀出了幾分西班牙斗牛儀式性殺戮的味道。他回憶道：“陪審團成員就像跳進斗牛場里的安達盧西亞頑童，他們用言語侮辱被告，攪亂庭審的進行。法庭未經聆訊，就對他進行判決……正像人們救活羅伯斯庇爾，就是為了把他送上斷頭臺一樣，死去的拉瓦爾被救活，就是為了讓他們把一個活生生的賣國賊扔給獅群一樣的人群。”[27]

審判在拉瓦爾抗議法官偏見的一刻達到了高潮：“你們無權判我有罪！”他一邊喊，一邊用刻有總統抬頭的公文包猛砸臺面：“你們可以整死我，但你們無權誹謗我！”這時，一名陪審員厲聲大喝：“閉嘴，賣國賊！”憤怒的拉瓦爾接著申辯自己是個愛國的法國人，但被陪審員們罵了回去，罵他是“畜生”（salaud），該讓行刑隊賞他“十二顆子彈”。[28]拉瓦爾最后說道，他寧愿保持沉默，也不做“司法罪行”的“幫兇”。當有陪審員叫到“他永遠也不會悔改！”時，拉瓦爾同樣坦蕩而堅定地回答：“沒錯，我永遠也不會悔改。”[29]

米塞特的審判在位于海牙的王宮內進行，他的下場要體面一些，但結果幾乎不存在任何疑問。檢察官扎耶爾（J. Zaaijer）在開庭后的第一句陳詞就是：“就算不進行審判，我們也已經知道了米塞特應被判什么罪。”以這樣一種有罪推定的方式拉開審判序幕，十分不合常理。米塞特請的辯護律師維克赫爾德·比斯登（Wijckerheld Bisdom）很有辯才，他日后回憶當時情景時說道，在戰后早期，社會輿論存在共識：“談到最壞的國家社會主義者，首當其沖的當屬米塞特，他被看作是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靈魂核心。這些人難逃一死。”[30]主導審判的是公眾情緒；法律只是在回應街談巷議。

對于針對他的賣國罪起訴，米塞特用一篇激情澎湃的演講加以駁斥。他激動地揮舞手臂，似乎自己仍在對著參加集會的黨員講話。他宣稱自己的目標從來就不是把國家的統治權拱手交給外國人。相反，他的理想一直就是借著高奏凱歌的德國改變歐洲秩序這一契機，建立一個能保障荷蘭人利益的荷蘭政府。協助德國人的千秋大業是“把亞洲人趕在歐洲大門外”的重中之重，他辯解道。沉浸在自己慷慨陳詞中的米塞特忘乎所以，居然管法庭叫“我忠實的追隨者們”，這句話在本來十分肅穆的庭審中激起了一陣哄堂大笑。[31]

處決這位原荷蘭納粹頭子的過程也比拉瓦爾更莊重些。他被人帶到海牙郊外的沙丘邊，這里曾是德國人槍斃許多荷蘭游擊隊員的地方。米塞特被綁在一根簡易行刑柱上，一位新教牧師為他作臨刑禱告，他對自己沒法和牧師握手表示歉意。12名行刑者舉起步槍，瞄準米塞特。他死了。

拉瓦爾擔心了好一陣子，生怕子彈打到臉上導致毀容。律師讓他放心，說現如今執行死刑都很干凈利落。這之后，他曾嘗試自殺，但是搞砸了，因為吞下的一粒氰化物膠囊放置時間太久，藥性不足，沒法讓人速死，他又被救了回來。就在走路還一瘸一拐時，拉瓦爾被帶到監獄大墻旁的刑場上。他穿著黑西裝，扎著慣常的白領帶，脖子里圍著象征法國的紅、白、藍三色圍巾。他堅持要律師到場，因為“想在臨死前再看一眼諸位”。他的臨終遺言是“法國萬歲！”（Vive la France!）緊接著，槍聲響了，他一頭倒向右側。接下來，一名中士做了件拉瓦爾最害怕的事。他朝尸體補了一槍，確保他已經死透了。但就是這一槍讓拉瓦爾的臉開了花。一位在場的年輕記者這樣描述當時的景象：“人們朝刑柱奔去，撿起被子彈打碎了的木頭。其中最有價值的當屬浸泡鮮血的木片。”[32]

管米塞特或拉瓦爾叫替罪羊并不準確。毫無疑問，他們曾為敵人提供幫助，選擇同納粹占領者合作，因此是有罪之人。而且對他們的審判滿足了這么做的主要目的。以米塞特為例，這是為了防止荷蘭出現“狂野”報復，類似的報復在法國導致許多人喪命。對他的草率審判——過于草率了——也成為荷蘭當局放過許多次要人物的口實，這些人讓本來就已擁擠不堪的監獄和牢房更加捉襟見肘。米塞特和拉瓦爾雖不得善終，但這弘揚了正義；顯示出戰后政府盡到了責任。同米塞特一樣，拉瓦爾的末日有助于抑制人們報仇雪恨的沖動，開啟國家重建的進程。

但如果說這些審判實現了《歐墨尼得斯》中雅典娜的目標，即遏制對復仇的渴望，那么審判的速度之快、意料之中的結局以及存在嚴重缺陷的程序——最后一點在拉瓦爾一案中尤其明顯——讓以正當法律進程為歸依的審判變得不那么讓人心悅誠服。拿一位觀察家也許言過其實的結論來看：“拉瓦爾案的審判不可饒恕，因為它讓法國人生出了對法國司法體系現狀的懷疑……如今危害已經造成。法國的司法正義喪失了公信力。拉瓦爾贏得了最后一輪對決，為這個國家道德淪喪的進程畫上了句號。”[33]

\* \* \* \* \*

1945年，有些人主張，如果徹底舍棄法律的細枝末節，索性一槍斃了罪大惡極之徒，有利于更好地實現法律的追求。時任美國外交官的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是制定歐洲政策的積極參與者，他在回憶錄里流露出了對審判戰犯的厭煩之情。他表示，以納粹領袖為例，他們的罪行令人發指，如果還讓他們活著，一點好處不會有。他寫道：“我個人認為，倘若盟軍指揮官下達過長效指令，規定任何戰犯若落到盟軍手里，在身份得到確認后，應毫不拖延地就地處決的話，這絕對是上上策。”[34]

持相同看法的還有別人。比如，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就告訴過他的英國和蘇聯同事，說他最好能“逮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和他們的幾個主要幫兇，把他們拖到臨時軍事法庭前。第二天早上太陽升起時，保證會發生歷史性大事件”。[35]這里順便說一句，赫爾是1945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戰爭期間，英國外交部曾散發過一份備忘錄，表達了對戰后審判諸如黨衛隊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等人的反對，理由是他們的“罪行太過黑暗”，已經“凌駕于司法程序的范疇之外”。[36]丘吉爾也抱有相同看法，覺得最好“把他們排成一行，然后槍斃”。這些話聽起來很刺耳，但是如果事先知道結局只可能有一種，那么再來審判嫌犯，特別是和雙手血債累累的蘇聯法官一起審，對法治只能是弊大于利。盡管丘吉爾對舉行審判很排斥，但蘇聯人堅持為之。甚至在紐倫堡審判尚未開始前，他們致祝酒詞時就說但愿德國領導人都被判死刑，著實把盟軍的法官嚇了一跳。

有意思的是，1945年的德國人也許更在意判不判死刑。在造訪漢堡期間，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被告知，多數德國人認為對犯下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暴行的男男女女進行審判只不過是政治宣傳罷了：“這些德國人說，如果被告真的有罪，而且如果我們確信他們有罪，干嗎不迅速給這事來個了斷，直截了當判他們死罪呢？”[37]

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指出了希姆萊所犯罪行的極端性，這引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當時的法律真的適用于性質遠比常規戰爭罪駭人的罪行么？對于納粹基于意識形態原因妄圖滅絕整個民族的計劃，世人也許尚未充分了解其規模和惡劣性。當時還沒人用“大屠殺”這個詞。但是盟軍見識得夠多了，知道他們處理的是過去聞所未聞的事件。紐倫堡審判的法律影響在其開庭前就已經十分清晰了。

只有蘇軍真正見過納粹留在波蘭的死亡營遺址。但是就算這樣，他們的西方盟友也對在譬如達豪、布痕瓦爾德和貝爾根——貝爾森等集中營見到的慘象震驚不已。1945年4月12日，艾森豪威爾將軍參觀了隸屬布痕瓦爾德的奧爾德魯夫（Ohrdruf）集中營。就在前不久，黨衛隊撤離了這座毗鄰魏瑪市的集中營。地上遍布尸體，就像摔壞的洋娃娃一樣。尸體中間還躺著沒咽氣的囚犯，他們虛弱得站不起來。由于時間緊張，黨衛隊沒能火化所有尸體。《揚基人》的記者寫道：“因為天冷，所以尸體沒腐爛，也就沒什么臭氣。這樣你才能走上前，湊近了進行檢查。”這個叫索爾·萊維特中士（Saul Levitt）的記者還寫道：“血液在尸體附近的地面上結了厚厚的一層，就像紅色泥巴糊成的煎餅。”[38]

艾森豪威爾給他太太瑪米寄了封信，信里寫道：“我從未想到，世界上還能有如此殘暴、野蠻和獸性的事情。”他想讓美國軍人都目睹這一幕幕慘象，這樣他們就會清楚自己為何而戰。他還想讓記者參觀集中營，這樣就不會有人再惺惺作態，說這些駭人聽聞的罪行是為了宣傳而虛構的。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和英國國會議員都被請去參觀集中營。艾森豪威爾之所以要讓一切都被記錄下來——成堆腐爛的尸體，焚尸爐和刑訊室——理由是這些事物“超出了美國人的理解能力”。[39]丘吉爾從艾森豪威爾那里收到過一封信，信里這樣寫道：“我們在德國各地，特別是在魏瑪的發現，遠遠超過了以往揭露過的任何暴行。”[40]

德國當地人被逼著穿過集中營，他們有的用手帕捏住鼻子，有的眼睛不敢斜視，還有的在填埋發黑尸體的土坑旁嘔吐不止。不光德國人如此，盟國城市里的人們也被要求了解德國人犯下的滔天罪行。這么做有時并不受歡迎。在倫敦，“無法忍受暴行紀錄片”的影院觀眾試圖逃離萊切斯特廣場劇院，但被把門的英國兵攔住了。據《每日鏡報》報道：“全英國的人都在逃離電影院。在許多地方，士兵命令他們退回去接著看。”一名軍人接受采訪時說道：“許多人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但電影提供了證據。所有人都有義務知道發生了什么。”[41]

或者，拿倫敦《泰晤士報》的話來說：“文明世界應該與堅持懷疑這些暴行，因而無動于衷的最后借口一刀兩斷。這種決裂對文明本身至關重要。”[42]這一看法深得艾森豪威爾的贊同。認識到人類作惡的能力能引導其余人向善；了解人性最壞的一面是一種文明教化的過程。這兩點認識是后來進行戰爭罪審判的主要動機之一。

發生在奧爾德魯夫的慘劇跟波蘭的死亡工廠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但當時這點并未得到世人的充分認識，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時一些新聞報道稱德國集中營為“死亡營”。對于許多類似集中營內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猶太人這點，彼時的新聞報道鮮有強調。但出于文明存續的考慮，艾森豪威爾希望全世界都能知道。要想記錄發生的慘劇，并給德國人以及全世界的人上一堂道德教育課，一種辦法就是拓寬戰爭罪審判的外延。6月2日，艾森豪威爾提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些暴行的責任人提起公訴。

事實上，第一起就集中營進行的審判就發生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內，經辦該案的是英國人，而非美國人。這起審判可以說是對1945至1946年紐倫堡審判的預先彩排，其顯示出對納粹罪行套用現行法律和司法程序是何其困難。幾名被告包括喪心病狂的貝爾森集中營指揮官約瑟夫·克拉默和集中營醫生弗里茨·克萊因（Fritz Klein），他們此前在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里也工作過。盟軍決定，審判他們的罪名還應該加上這條。如此一來，除了草菅人命，任憑集中營里人滿為患，并坐視饑腸轆轆的囚犯死于斑疹傷寒等疾病這條罪名外，還要算上積極參與種族滅絕的前科。各大報章的標題日復一日地刊登聳人聽聞的大標題，諸如“但丁詩文里才有的景象”、“毒氣室的目擊者”、“幾百萬人被人害死”、“小姑娘被絞死”、“女孩被毆打致死”，就連一向以嚴肅著稱的《泰晤士報》也加入了這一行列。有“貝爾森惡魔”之稱的克拉默和綽號“蛇蝎美人”或“奧斯維辛鬣狗”的22歲金發女看守伊爾瑪·格雷澤（Irma Grese）作為納粹恐怖之屋的代名詞，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這種大肆渲染的做法是否真的有助于人們理解納粹暴行有待商榷。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震驚于個別“禽獸”和“惡魔”的惡行，其實是沒有看到本質，即他們背后的罪惡體制讓他們的行為顯得近乎稀松平常。對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審判艾希曼（Eichmann）一案[[13]](#_13_A_Dao_Fu__Ai_Xi_Man_Wei_Na_C)，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著有一份報告，雖然其飽受批評，但在體制因素這點上的分析卻鞭辟入里。當基于意識形態實施的大屠殺成為一項政府政策后，上至帝國黨衛隊頭子，下至管理鐵路運行計劃的低級官僚，所有人都脫不了干系。那些“禽獸”只是比別人欠下了更多的血債而已。

跟許多審判一樣，貝爾森審判必須盡快完結；義憤填膺的公眾別無他求。但是英國人以能進行公平公正的審判為榮，他們不能容許出現類似拉瓦爾案中讓法律威嚴掃地的鬧劇。問題在于法律本身。任何一所英國軍事法庭——譬如有這么一所，設在呂訥堡（Lüneburg）一棟19世紀建造的漂亮教學樓內——只能對被定義為“違反戰爭法則和手段”的戰爭罪行提起訴訟。[43]

于是，律師們先是就法庭是否有權審判被告展開了漫長的司法較量，在這之后，幾個目擊證人講述了他們經歷過的可怕景象。來自波蘭盧布林（Lublin）的索菲亞·利特文斯卡（Sophia Litwinska）是奧斯維辛和貝爾森集中營的生還者。她描述了1941年圣誕夜里發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女囚被剝光身上的破衣服，被人從營房里趕了出來。在德國人的命令下，她們赤條條地站在刺骨的寒冷中，一直站到翌日圣誕節早上5點鐘。隨后，她們被一輛翻斗車載著，一股腦兒扔在了毒氣室門口。

9月21日，來自索斯諾維茨（Sosnowiec）、日后嫁給猶太復國主義舵手約瑟夫·羅森薩夫特的哈達薩·賓科博士，站到了一排3000瓦煤氣燈下的證人席上。她在奧斯維辛失去了雙親、兄弟、丈夫和年僅6歲的兒子。作為一名醫務勤雜工，她對集中營里發生的事了如指掌：挑選犯人，克拉默和克萊因醫生都參與其中；醫學實驗；還有毒氣室，在那里，囚犯分遣隊（Sonderkommando）里的猶太人被勒令從事最可怕的工作：剪頭發，搬運死尸，火化尸體；據《泰晤士報》報道，賓科告訴法庭，那些被選中送去毒氣室的人，“一絲不掛地被人帶走，在沒吃沒喝的情況下等了幾天，直到卡車開來，把他們帶去火葬場”。她接著說道，在毒氣室里被毒死后，“死人被裝上推車，沿著軌道離開毒氣室，來到更衣室對面。有時，囚犯分遣隊的人會被處決，然后找其他人來頂他們的位置。然而，大體上還是有可能留存一些記錄的”。她回憶，集中營里的朋友們估算出共有400萬名猶太人被“肉體消滅”。[44]

賓科博士的朋友高估了死亡人數，但是猶太人遭到種族滅絕的赤裸裸的事實被呈現在英國軍事法庭上。辯方律師試圖檢驗證人，看他們說話是不是前后一致，是不是有記憶缺陷。克拉默的律師溫伍德少校（Winwood）在形容貝爾森集中營的囚犯是“中歐猶太區渣滓”時，也許是在迎合當時仍很普遍的偏見，他后來為這一說法道歉，說自己“只是充當了被告的喉舌”。[45]但很少有人會對所述暴行確實發生過這點存疑。然而，這是一個軍事法庭，部分律師也只會用軍事思維來考慮問題。溫伍德少校把他的當事人比作一位“軍團司令，下轄地區是個監獄，命令都來自軍團司令部”。黨衛隊上尉克拉默不過是一名奉命行事的普通士兵，沒有證據顯示他曾“蓄意”要“虐待囚犯”。[46]

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A. Smith）上校在戰前是倫敦大學的國際法教授，他被被告選中作無罪辯護。發生在集中營內的事情“和戰爭毫無關系”，因此以暴行的發生地和時間點來看，根本不能被認為是犯罪。畢竟，據他稱，希姆萊作為警察頭子有資格下命令，“并因此具有法律效力”。[47]

這些辯詞沒能救克拉默、格雷澤或克萊因博士一命，三人最后都被判處絞刑。但我們至少能從貝爾森審判中總結出兩件事情。世人也許還未完全弄明白死亡營和集中營之間的區別，也不知道在毒氣室投入使用前，東歐已經歷了多少血雨腥風。但在1945年，只要一個人看報，就應該知道納粹的殺人機器具有系統性。這使得蓄意“虐待”這樣的辭令聽起來十分麻木不仁。喜歡掉書袋的史密斯教授也證明了另一件事：關于戰爭罪的現有法律和公約已經不足以處置納粹大屠殺這種性質和規模的罪行了。這為史上最轟動的戰爭罪審判奠定了基礎。11月20日，紐倫堡審判拉開了序幕。就在四天前，貝爾森的“禽獸們”被判處死刑。

\* \* \* \* \*

有一點需要說明，紐倫堡審判中的21名被告看著并不像衣冠禽獸。觀察家們評價說這些人看著非常普通，面色蒼白，神情疲倦，穿著破舊的西裝。他們中有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4]](#_14_A_Xi_Mu__Feng__Li_Bin_Te_Luo)，他下巴上揚，雙目緊閉，似乎尊嚴受到了傷害；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ering）[[15]](#_15_He_Er_Man__Ge_Lin__1893__194)癱坐在椅子上，不時用手帕擦去因傻笑從嘴唇上滲出來的口水；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16]](#_16_Han_Si__Fu_Lan_Ke__1900__194)戴著深色眼鏡，以遮蔽他的雙眼；勞工事務負責人弗里茨·紹克爾（Fritz Sauckel）神情看起來像是個膽怯的門房；雅爾瑪·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7]](#_17_Ya_Er_Ma__Sha_He_Te__1877__1)刻意轉過臉去，似乎害怕別人把罪惡傳染給他；尤里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18]](#_18_You_Li_Wu_Si__Shi_Te_Lai_Che)抽搐而煩躁；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19]](#_19_Lu_Dao_Fu__He_Si__1894__1987)不住地前后晃動，濃密的眉毛下，雙眼瘋了似的到處亂掃。他的神情舉止很是奇怪，很可能已經瘋了。

除開部分證人外，紐倫堡的正義殿堂里只有一個人充分感受過這些罪人一手釀造的驚天慘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會從在場幾百名律師、翻譯、法庭職員、法官、軍警和記者中留意到他的存在。恩斯特·米歇爾（Ernst Michel）是一家德國通訊社的小記者。在他文章的署名旁還有一串數字：104995，這是他在奧斯維辛時的編號。1939年，還是個學生的米歇爾在家鄉曼海姆（Mannheim）被捕，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

就在蘇軍來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前，米歇爾被迫踏上了一場死亡之旅，步行穿越冰天雪地的波蘭和德國邊境，目的地：布痕瓦爾德。美軍逼近布痕瓦爾德時，體重只剩80磅的他又被趕著上路了。也不知他哪兒來的力氣，半途上竟一路狂奔逃進了森林，然后在蘇占區躲了一陣子。他一直遮著集中營的囚服，生怕人們發現他是個猶太人。終于，歷盡艱險后，他回到曼海姆，發現雙親都被殺害了，親戚們也都不見了蹤影。由于讀中學時學過些英語，美國的戰爭罪調查人員給了他一份翻譯的工作。我和他在紐約見過面，他告訴我：“德國人總說自己幫助過猶太人，見他們的鬼去吧！我還認識某個說過這種話的德國人，可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納粹。”

米歇爾的第二份差事是作為記者采訪紐倫堡審判。他擔心自己專業上不夠過硬，但別人告訴他只需記下所見所聞即可。于是他去了，這位六個月前剛從布痕瓦爾德死亡行中逃脫、在奧斯維辛編號104995的囚犯，如今和戈林同處一室。六十年過后，身在紐約的他回憶道：“我認得出他們所有人的臉。我是自由之身，是唯一旁聽審判的生還者。他們談論的是我。”

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恩斯特·米歇爾給他所供職的德意志綜合新聞社撰寫的第一份報道：

在集中營的艱難歲月里，我經常為一種信念所支撐：有朝一日，那些現政權的責任人都會被送上法庭。這種信念給了我活下去的力量。現在，這一天來臨了。今天，坐在離我幾步開外的人，曾經是全體集中營囚犯心中毀滅的象征。但如今，他們因為自己的罪行正接受審判。[48]

無論盟軍的戰爭罪審判有多大缺陷——它們的確有缺陷，而且東京審判在這點上比紐倫堡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米歇爾的話可以成為審判依舊正義的一大論據。紐倫堡審判值得支持的另一點是審判大體上沉悶至極。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20]](#_20_Li_Bei_Qia__Wei_Si_Te__1892)在判決下達前幾周聆聽了審判，在她的描述中，“正義殿堂”是“一座無聊的堡壘”。她寫道，所有“在里面的人都身陷極端的無趣之中……這是一種有史以來空前的沉悶。一臺機器正在伸張正義，一臺龐大的機器，盡管其在動機上存在弱點，且時不時渴望制造死亡，全人類的生存卻都得依靠它”。[49]

在紐倫堡，起碼法律被真正當回事。這不是迫于公眾憤怒而舉行的潦草審判。所有事情都得一步一步來，于是審判一直在進行，過了很久都沒結束，原本的乏味成了剛正不阿的標志。后來在海牙國際刑事法院舉行的審判總體上就是照搬了紐倫堡的模式。冗長乏味的氣氛讓復仇的槍口啞了火，這正是紐倫堡的最大意義所在。早在1942年，九國流亡政府就已在倫敦成立了盟國間懲治戰犯委員會。各國代表在圣詹姆斯宮會晤，并以此為名簽署通過了《圣詹姆斯宮宣言》。外界都很擔心“公眾發動報復行為”的危險，這也就是為什么“文明世界的正義觀”要求各國自由政府，將“通過有組織的法律渠道，懲治犯下此類罪行的責任人作為他們的主要戰爭目標之一”。[50]

紐倫堡審判進行時，人們對納粹屠猶的知曉度也許依然不高，但也肯定不是一無所知。1942年12月，就在死亡營的毒氣室投入使用數月后，美國和歐洲盟國就指控德國政府在奉行一項“滅絕歐洲猶太人的野蠻政策”。這一聲明并未在公眾當中造成多大反響，原因如下：當時發生的事依然難以想象，英美兩國政府都覺得大張旗鼓地宣傳這點不太合適；另外，他們也不想讓國民覺得打仗是為了拯救猶太人。[51]

1942年，雖然蘇聯還未效仿西方盟友，加入譴責猶太人大屠殺的行列中——而且在戰爭過去很長時間后，蘇聯人依然選擇沿用法西斯受害者這一籠統的說法，并不點明猶太人——蘇聯檢察官在紐倫堡審判中也提到過這點。羅曼·魯堅科將軍（Roman A. Rudenko）是紐倫堡的五位主要檢察官之一。他曾裝模作樣地督辦過殘忍的審判，在紐倫堡也不過是在散播虛假的政治宣傳，比如他把1940年在卡廷森林（Katyn）殺害兩萬多名波蘭軍官一事算在德國人頭上，其實他很清楚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蘇聯秘密警察。但對于猶太人遭種族滅絕的本質，他倒一點也不含糊。恩斯特·米歇爾在一篇報導里引述了魯堅科的話：“法西斯陰謀家們策劃了滅猶計劃，企圖將全世界的猶太人趕盡殺絕，并且在1933年后的所有行動中一直貫徹這項計劃。滅絕猶太人的獸行發生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國家。”[52]

這種說法略微有些夸大其詞；滅絕計劃始于1941年，而非1933年。魯堅科把時間往前推，恐怕是為了強調納粹陰謀里不僅包括屠猶，還包括對蘇發動侵略戰爭。

正如在貝爾森審判中所見，由于現行的戰爭罪法律只適用于戰爭行為，因此有必要出臺新法律，以求對1939年前的第三帝國具有追溯力，并追究其系統性滅絕一個民族的罪行。納粹德國沒有出臺過禁止殺害猶太人或其他無辜平民的法律，但這點不能作為借口。上級命令也不是參與大屠殺的合理理由。1945年8月，一個新的法律條目，“反人類罪”，在《國際軍事法庭（倫敦）憲章》得到確立，豐富了戰爭罪的內涵。另一個法律新名詞是“破壞和平罪”，意思是策劃和發動侵略戰爭。策劃發生在實際戰爭之前，這就給陰謀入罪創造了空間。英美法體系中，法官是可以因存在犯罪預謀判人有罪的。這條法律被用在了納粹身上（后來也被用在日本軍隊和政府身上，盡管理由更加難以服眾）。

制定可溯及既往的法律、并在事后判人有罪這種做法在法律上是有待商榷的。把戰敗國的被告交給戰勝國審判也很容易招來批評。1946年，東京審判的舉行同樣引發了嚴重的歪曲，似乎戰時日本只是納粹德國的亞洲翻版。右翼民族主義作家恩斯特·榮格認為把惡棍變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存在很高的道德風險。他形容紐倫堡法庭“既有殺人犯，也有清教徒，屠夫的刀子安在了道德的握把上”。[53]

作為一個未經改造的德國民族主義者，榮格對美國人的鄙夷還要多于對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痛恨，因此他才會這么說。總的來講，即使當庭法官背負血債，或者食古不化，舉行審判依舊是上策，要比丘吉爾、赫爾和凱南建議的做法更好。草率的處決只會把盟軍戰勝者的道德水準拉低到和戰敗的納粹一樣的層面。盡管許多德國人只有在戰敗的苦澀淡去，生活更加安定后，才認識到紐倫堡審判的價值，但其為德國人自己公審納粹戰犯提供了一個模板。日本人沒有照葫蘆畫瓢的原因有很多：在東京審判中，勝利者正義的傾向更加明顯，出的紕漏更多，人們對戰爭本身的看法不一，而且日本沒有納粹政權，沒有實施過屠猶，也沒有希特勒。

那么正義是否得到了伸張？整肅和審判足以保障正義實現，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太多罪犯逍遙法外，有些事業飛黃騰達，蒸蒸日上，而罪行遠比他們輕的人則成了代人受過的替罪羔羊。但即使是在最具天時地利的情況下，全盤正義也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出于政治原因和實際操作困難，這點無法實現。法不責眾，你不可能審判上百萬人。在懲治有罪之人和考慮其他訴求之間必須求得平衡。過于意氣用事只會使社會重建裹足不前。而若不付諸全力，讓惡貫滿盈的戰犯伏法，則會使任何正義感都大打折扣。這是一種微妙的衡平，不可避免會有缺陷。戰后的德國人，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許多人——譬如老師、醫生、大學教授、外交官、實業家和政治家——過去都是納粹，這一經歷肯定叫人難堪。但這種情況不光德國和日本才有。在不少曾被德國占領的國家，老的一批精英雖然和第三帝國有過齷齪的勾當，但納粹離開后他們卻很少因此身敗名裂。

然而，機會主義精神有時也許是人類最有用的品質。1945年6月，柏林原抵抗主義戰士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跟同是英勇抵抗者的好友聊起過這一話題。她的朋友弗蘭克說道：

元首已經死了。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得吃飯。如果你想吃飯，而且吃得好，你最好別是納粹。所以他們不是納粹，既然不是，他們以前也不是。他們以各種神圣的名義起誓，自己從沒做過納粹……口誅筆伐不能使人變得更完美。他們摔倒時，應該把他們扶起來，給機會贖罪。然后就是再不能有報復，永遠也不能有。[54]

這番話出自一個甘冒生命危險抵抗納粹的人之口，使其平添了幾分道德分量。機會主義心理曾讓銀行家向一個殺人如麻的政權妥協，為在死亡營附近設廠、剝削奴隸的公司提供資金，但同樣也能讓他成為戰后德國民主體制的忠誠公民，成為其重建的有生力量。這也許有違正義，甚至在道德上讓人不齒。德國、日本乃至意大利最終都為此付出過代價。這三個國家在1970年代都深受革命極端主義者之害，他們暴力行為的一大根源就是狂熱地認為自己的國家從未改變過，法西斯主義仍舊以另一種面目存在著。而且一部分延續其薪火的人正是1940年代發動戰爭的這批人。“革命者們”堅信自己有責任抵抗，因為父母一輩沒能做到。

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H. Jackson）是紐倫堡審判的另一位主要公訴人（他還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極端主義革命派相差十萬八千里。但他相信，審判不止是定罪量刑和懲罰有罪之人的一場演練。他相信自己是在為文明代言。紐倫堡之后的世界會變得更美好。在他的開場白中，他自豪地陳述道：“四個大國因勝利而歡欣，為傷痛所感懷，他們收起了復仇之手，自愿把俘虜的敵人交給法律審判，這是權力有史以來致以理性的最重要的頌詞之一。”他又補了一句，這次著眼于未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審判這些被告的依據將被明日歷史用來評價我們。給這些被告一杯毒酒，等于向我們自己嘴里灌酒。”[55]

杰克遜是個理想主義者。審判是建設更美好世界努力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里，昔日種種慘絕人寰的事再也不會重演。審判總算結束后，杰克遜在英國大律師彼得·卡爾沃科雷西（Peter Calvocoressi）的陪同下，前往薩爾茨堡（Salzburg）參加1939年以來的首屆音樂節。兩人一起欣賞了《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21]](#_21_Li_Cha_De__Shi_Te_Lao_Si_De)這部劇，對有著天籟般嗓音的德國年輕女歌唱家伊麗莎白·施瓦茨科普夫（Elisabeth Schwarzkopf）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這位偉大的女高音歌唱家頭上其實飄著一小片烏云：她于1940年加入納粹黨，曾為東線戰場的黨衛隊軍官獻唱，還和在下奧地利州（Lower Austria）任納粹總督的某位黨衛隊將軍有過一段情史。也許她做這一切是出于信仰，也許她是個投機分子。但是她在戰后很快便恢復了名譽。對這一平反幫助最大的是1953年的一樁婚事，她嫁給了英國音樂經理人沃爾特·萊格（Walter Legge），一個猶太人。

[[1]作者注：1988年，信仰基督教的長崎縣知事本島等因為發表裕仁天皇負有戰爭責任的言論，成為了極右翼的目標。兩年后，他被殺手開槍擊中背部。](#_1_5)

[[2]即東德，西德的全名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_2_5)

[[3]條頓人，即德國人。](#_3_4)

[[4]克虜伯，德國鋼鐵大亨，軍火大王。](#_4_4)

[[5]希姆萊（1900—1945），納粹黨衛隊、蓋世太保頭目。](#_5_4)

[[6]西格蒙德·瓦爾伯格（1902—1982），猶太富商。](#_6_4)

[[7]康采恩（Concern），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的組織形式。](#_7_4)

[[8]Malacañang Palace，菲律賓總統府。](#_8_2)

[[9]日本歷史上的將軍，并非指軍事將領，而是指諸侯的首領。每一個地方的諸侯稱為大名，而其中最有勢力、凌駕于所有大名之上的大名，在得到天皇的冊封后，即為將軍，擁有極高的威望。](#_9_2)

[[10]赫爾利是印第安人。](#_10_1)

[[11]Milice française，1943年維希政府建立的右翼民兵組織。](#_11_1)

[[12]卡里古拉，羅馬帝國皇帝，出名的暴君，荒淫無度，禁片《羅馬帝國艷情史》便是以其為原型拍攝。](#_12_1)

[[13]阿道夫·艾希曼為納粹德國高官，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責任人之一，后逃亡阿根廷，但被以色列摩薩德特工逮捕。猶太裔政治學家阿倫特在旁聽了于耶路撒冷舉行的審判后，寫出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這份報告，報告中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的命題，強調了體制，而非個人，讓大屠殺成為一件高度理性和系統性的工程，而艾希曼則只是這個龐大機器上的一枚螺絲釘，他個人的道德、良知和仇猶傾向是次要原因。阿倫特的結論遭到許多人抨擊，認為她忽視了行為人自身的道德責任。](#_13_1)

[[14]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1893—1946），納粹德國外交部長。](#_14_1)

[[15]赫爾曼·戈林（1893—1946），納粹德國空軍司令。](#_15_1)

[[16]漢斯·弗蘭克（1900—1946），納粹德國占領的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的護國總督，首創了讓猶太人佩戴大衛星的識別標志。](#_16)

[[17]雅爾瑪·沙赫特（1877—1970），銀行家，納粹德國政府的經濟部長。](#_17)

[[18]尤里烏斯·施特萊徹（1885—1946），納粹頭目之一，反猶報紙《先鋒報》的發行人。](#_18)

[[19]魯道夫·赫斯（1894—1987），希特勒的親信，早年便追隨希特勒，被認為是《我的奮斗》作者之一，他曾任德國總理和納粹黨副元首等職。](#_19)

[[20]麗貝卡·韋斯特（1892—1983），英國著名記者，作家，女文豪。](#_20)

[[21]理查德·施特勞斯的第五部歌劇。](#_21)

# 第三部分 絕不讓歷史重演

##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945年4月8日，后來報道紐倫堡審判的記者恩斯特·米歇爾被迫離開布痕瓦爾德，踏上一段寒冷且往往致命的行程，同行的還有幾千人。沒走的人由剩下的黨衛隊守衛看管，囚犯們明白，如果美國人不盡早趕到，等待他們的肯定是被迫走上同一條不歸路，或者被就地處決。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建在風景秀麗的埃特斯貝格山（Ettersberg）山頂上，這是最恐怖的德國集中營之一。黨衛隊想出了不少酷刑，其中一種是把人反剪雙手吊在樹上，囚犯會因為疼痛難忍驚聲尖叫。從此，這個陰森的地方就多了個綽號：“會唱歌的森林”。歷史上，歌德曾在這里感嘆大自然的美妙，并和一位年輕的詩人朋友交談，后者記錄下了大作家的見解。

集中營里有一個小規模地下組織，領頭人是共產黨，他們在營房里藏匿了一些槍支，還有一位波蘭工程師制造的短波無線電臺。4月8日，營地里發出一份言辭急切的電報：“致盟軍，致巴頓將軍的部隊。這里是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救命。我們請求幫助。德國人想轉移我們。黨衛隊想殺了我們。”三分鐘后，囚犯們收到了回電：“致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堅持住。正火速前來支援。第三軍官兵。”[1]

囚犯里沒多少人還有力氣攻擊黨衛隊看守，甚至連美國人最終趕到時，也沒力氣慶祝了。但是，集中營抵抗組織里體格更健壯的一些人決定不再坐等第三軍的到來。知道馬上有人來救，光這點已經足夠鼓舞人心了。于是，囚犯們沖擊瞭望塔，用為了這一刻而藏匿的槍支干掉了剩下的守衛。

美國大兵在給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囚犯找水喝找東西吃時，抵抗組織里的共產黨領袖已經開始展望未來。幾乎就在布痕瓦爾德被解放的同時，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字樣的集中營鑄鐵大門就被涂上了一行大字：“絕不讓歷史重演！”

但凡在人類史上最慘烈沖突中受過罪的人，都抱有“決不讓歷史重演”這種情緒。但這對許多人來講不只是一種情緒；這是一種理想，也許是烏托邦，但這代表了一種信仰：在戰爭的灰燼中，人類可以建立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世界。雖然包括我父親在內的很多人都希望生活回歸常態，但是其他人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世界不會退回到戰前的樣子。戰爭摧毀了大半個歐洲和亞洲，舊政權——不光是殖民主義政權——陷入道德破產的境地，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壽終正寢，所有這些變化都鼓勵人們相信一切都將徹底推倒重來。1945年是白紙一張；不愉快的歷史將被忘卻，這點讓人欣慰；一些皆有可能。于是，諸如“德意志零年”（Deutschland, Stunde Null）這樣的說法就大行其道起來。羅伯托·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還將其作為自己一部電影的名字，影片描述了柏林廢墟間的生活。同樣流行的還有“新開始團體”（Gruppe Neubeginnen），一個由流亡倫敦的德國社民黨人建立的組織。

當然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人類社會沒有所謂的白紙一張之說，歷史更不是想忘就忘得了的。另外，盡管幾乎所有人都同意過去的慘劇不能重演，但是對于如何確保這點則形成不了多少共識。不單是烏托邦理想，哪怕退而求其次，只是希冀政治變革的企求，也都呈現出各種面貌。

我們如今都知道蘇共和中共那時想要發動怎樣的革命，也清楚歐洲殖民地的亞洲民族主義者想要什么。西歐國家共產黨的目標更加復雜，斯大林出于自己地緣政治方面的考慮，對他們加以鉗制。總而言之，就算法國或意大利游擊隊再英勇善戰，他們離掌握實質權力依舊相去甚遠。話雖如此，一種深刻的變革還是在西歐生根發芽，催生這一變革的是社民黨人，他們早在戰爭結束前很久就已經在為和平做打算了。出現最激烈變化的不是過去淪陷的國家，恰恰是一個傳統的堡壘。在最黑暗的戰爭歲月里，在納粹似乎戰無不勝的時候，正是這個堡壘可歌可泣的抗爭，讓歐洲人保存了希望：這就是英國。

\* \* \* \* \*

我外婆是英國人，作為典型移民家庭的女兒，她身上流淌著昂揚的愛國熱情。因此，1945年7月，在看到英國同胞竟然投票把溫斯頓·丘吉爾的保守黨趕下臺后，她胸中憤憤不平。這次選舉后，丘吉爾下野，綽號“小克萊米”的工黨黨魁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Little Clemmie” Attlee）以巨大的優勢贏得了執政權。我外公那時還在印度服役，正等著退伍復員。在寫給他的信中，我外婆對英國人“白眼狼”一樣的做法痛心疾首，他們是如此不懂得對“賜予我們一切的那位偉人”知恩圖報。同樣出身猶太移民家庭的外公則沒那么激動，那時他還在部隊服役，聽到的是不同的看法。

就連7月大選的勝利者也對他們以如此懸殊的優勢勝出感到驚訝，以至慶功會之前一切都靜悄悄的。行業工會的代表們擠在英國北部漏風的旅館中，鴉雀無聲地盯著大屏幕上不斷上升的數字。最終結果：工黨贏得393席，保守黨拿下213席。《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刊登的一篇報道寫道：“左派的雷鳴化成了閃電，大選結果照亮了工黨的勝利。今天唯一稱得上是慢動作的是，人們剛開始對這一結果還有些回不過神來……自始至終，艾德禮先生都保持著鎮定和謹慎，他看起來有些疲倦。”[2]

工黨表面上故作謙虛，但是隨之而來的計劃相當激進。直到一年后，才出現一段抒發勝利情緒的最有名的文字。哈特利·肖克羅斯（Hartley Shawcross）是參與紐倫堡審判的首席檢察官之一，他遠比自己黨派的黨魁富有人格魅力。他曾告訴國會：“我們現在是主宰者，將來很長一段時間也將是主宰者。”[3]直到肖克羅斯亡故，他一直都因為這段吹噓之詞遭到非議，可見新主人行事有多小心，生怕給人留下驕傲自滿的印象。

選舉結束后，《衛報》刊載了一篇美國人寫的評論：“美國擺脫新政派，回歸正道的時候，英國卻在轉向社會主義，這可真叫人不可思議。”[4]

國外對英國大選也有些耐人尋味的反應。巴勒斯坦猶太人歡欣鼓舞，因為他們覺得工黨會比保守黨更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希臘保皇黨大為震動，反觀四面楚歌的左派卻很興奮，徒勞地期盼命運將因此扭轉。蘇聯的新聞只是宣布工黨勝利，未作評論。佛朗哥將軍領導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府預計這將導致兩國斷絕外交關系。在印度，孟加拉地區的前總理、穆斯林大公卡瓦賈·納茲穆丁爵士（Khwaja Nazimuddin）說道：“看樣子，英國選民把將他們從滅頂之災中拯救出來的人給拋棄了，而且這還是戰爭結束前發生的事。”[5]

一位法國政客當時說過，不懂知恩圖報是一個強大民族的特點，也許這話說得沒錯。實際上，丘吉爾依舊深受人們愛戴。但對多數選民來說，期待看到一個由丘吉爾擔任首相的工黨政府是不可能的。正如《衛報》的政治記者所言：“這個國家寧愿讓丘吉爾先生走人，也不愿為了讓他留任而付出讓保守黨也當政的代價。”保守黨“不光因為其過去遭到譴責；還因為對這個時代沒有憧憬而被人們拋棄了。同歐洲大陸一樣，英國在新秩序建立后明顯面臨巨大的壓力”。

丘吉爾自己對發生的一切也有些不知所措，但還是能比較坦然地接受失利。也許是希望丈夫多待在家里陪她，太太克萊蒙蒂娜（Clementine）告訴他，沒準這是禍兮福之所倚呢。丘吉爾對此答道：“現在看來，是福是禍還真是看不清楚。”他本希望戰時全國聯合政府能夠維系下去，至少也要延續到打敗日本后吧。實際上，由于他從來就不熱衷政黨政治（他兩次更換黨籍），丘吉爾大概覺得全國聯合政府比單一政黨執政的政府更自在吧。日記作者、外交官哈羅德·尼克爾森（Harold Nicolson）在大選中也失去了議員席位，然而，在他看來，丘吉爾并未怨天尤人。他表現出一種“沉靜、堅毅和超脫——還摻雜一絲自嘲，命運居然這般捉弄他；但他同時卻又對選民頗有主見的立場表達了些許敬意”。[6]

丘吉爾在保守黨內的一些同僚要比我外婆更了解他們的對手。哈羅德·麥克米倫一定感受到了英軍中的普遍情緒，他在回憶錄里寫道：考慮到重建國家的巨大困難，“英國人很可能是出于清醒的直覺，認為還是讓左派政府執政比較好”。[7]不過，他繼而補充道：許多人在戰爭期間就被灌輸了這樣的觀點，即“沖突一結束，隨之而來的將是某種自動出現的烏托邦”。麥克米倫對此的解讀是，人們認為英國人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會為一片太平的世界帶來史無前例的繁華盛世”。[8]也許彌漫在當時空氣中的正是這樣一種天真的理想主義。然而，對于丘吉爾治下的英國已成歷史，是時候迎接更平等社會的看法，也不能說就是白日做夢。有一點麥克米倫也許不愿承認，那些干了大部分粗活重活的人們，對麥克米倫這個階層的人存在一種仇視心理。

這點沒能逃過哈羅德·尼克爾森的眼睛。5月27日，他懷著一種截然不同的階級憤慨，以明白無誤的筆調在日記里寫道：人們“朦朦朧朧地感到，他們所經歷的一切犧牲……都是‘他們’的錯……盡管思路完全不合邏輯，但卻堅信‘他們’代表上層階級，或者說保守黨。階級情緒和階級仇視異常強烈”。[9]

但如果感到事情再也無法回到過去，回到階級尊卑有別的“正常”狀態；再也無法對有無特權平靜接受；或再也無法忍受因為出身貧寒而無法享受良好教育、堅固住房或正當醫療的話，這又有多“不合邏輯”呢？戰后，描寫人們在共赴國難時萬眾一心的作品已經汗牛充棟，這是一種樂觀開朗、“倫敦挺得住”的英國斗牛犬精神，激勵所有人齊心協力，擰成一股繩。但是這些鏟平階級劃分的經歷同時也營造出一種嶄新的權利意識，使得過去的不平等再也無法維持下去。這是英國人認識到的“絕不讓歷史重演”。

美國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曾親臨工黨的一次會議。開會地點設在某個工業小鎮內，鎮上是一排排狹長的煤黑色平房。一個灰蒙蒙的下午，他旁聽了工黨主席、馬克思主義學者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講話。在場的男男女女無不神情肅穆，專心致志，他們有的穿著生產過剩的破舊軍裝，有的穿著不太合身的“復員軍人”常服。拉斯基提醒聽眾，溫斯頓·丘吉爾“青睞傳統英國，是出臺了一部分實質性建設舉措”，但是他要讓聽眾明白，在“傳統英國”，1%的人擁有50%的財富；此外，只有1%的軍官來自工薪階層家庭。

就在威爾遜聽拉斯基大談社會主義政府如何好的時候，他留意到一名老太（老太也許看著比實際年齡顯老）正用如饑似渴的目光盯著發言人。這種眼神，讓他聯想起自己見過的其他歐洲人：他們膚色蒼白，瘦骨嶙峋，但與和平時期的窮人不同，他們似乎屬于一種奇特的“物種，長著跟動物一樣貪婪的眼睛”，“只有在胃口大開時”才會放光。拉斯基就站在“這名老嫗和她沉默不語的同伴們面前”，“他身材干瘦，戴著眼鏡，額頭很高，向人們做著也許無法完全兌現的承諾”，“從某種程度上只是在講政治圈里的黑話”。然而，“他用力扶住講臺的神情很迷人，引得雞皮鶴發的老嫗伸長了脖子，瞇縫著眼盯著他看”。[10]

在希臘，威爾遜得到了走近英國軍人的機會。讓他有些驚訝的是，普通士兵不僅對他們的長官存在敵意，對丘吉爾也是如此。其中一個人“就丘吉爾抽雪茄這點表達了格外強烈的情緒”。英國軍人每每碰到美國盟友，都沒法不留意到美國大兵的上級對手下多么和顏悅色。威爾遜察覺到，在所有去過的地方中，“德爾菲（Delphi）的英軍官兵在看待丘吉爾政府這一問題上，有著幾乎涇渭分明的階級分野”。他發現，“沒有一名英國兵不把票投給工黨，但只有一名軍官投了工黨一票”。[11]

我們沒法不贊同這一見解，但其中也許夾雜了那么點個人好惡；對于英國人在美國人和“低他們一等”的人面前經意或不經意流露出來的傲氣，埃德蒙·威爾遜本人相當敏感。事實上，英國社會的變遷不是用階級斗爭一句話就能解釋清楚的。威爾遜看到的只是局部。諾埃爾·安南（Noel Annan）除了強烈的知識分子情結外，方方面面幾乎都很符合英國大資產階級（haute bourgeoisie）的氣質。他在1945年曾擔任軍事情報官，后來又升任其他顯赫的要職，包括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長。1945年的大選中，他和一些年輕軍官一樣把票投給了工黨。安南在回憶錄里解釋了個中原因。并不是因為他不崇拜丘吉爾；他只是“懷疑（丘吉爾）是不是明白這個國家在戰后到底需要什么”。[12]

除開階級情緒，另一個解釋戰爭為什么改變了人們社會政治態度的原因是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戰時的英國政府大力推進文化事業。“音樂和藝術促進理事會”在工廠、教堂和防空洞里舉辦古典音樂會和戲劇演出。此外，為了提高境外部隊的文化水平，還開辦了辯論和教育活動。在大批官兵駐守的開羅，左翼軍人于1943年設立了模擬國會，方便軍人議政，用一名空軍飛行員的話來講，“好像我們已經活在期待已久的和平中……”[13]

這一發展勢頭讓部分保守黨人極度不安。代表彭里恩（Penryn）和法爾茅斯（Falmouth）選區的議員給丘吉爾的國會秘書寫了封信，信里這樣說道：“我對這種給部隊授課、普及教育的混賬做法越來越感到懷疑……謝天謝地，做點什么吧，除非您希望這些人回來都變得娘里娘氣的。”[14]

西里爾·康納利（Cyril Connolly）是一位上了年紀的美學家，在伊頓公學任教。熱愛法國文化的他于1940年創辦了自己的文學刊物《地平線》（Horizon），立志要讓藝術和文化之火生生不息，就算他覺得“歐洲大陸上空的火光已經開始暗淡”。康納利鼓勵士兵和水兵給他投稿，稿費標準較一般刊物低很多。他也相信是時候走下陽春白雪的高臺，放下身段為人民送文化了。《地平線》就這樣進入了許多士兵的卡其布背囊，讀者數量之大，讓人嘖嘖稱奇。1945年6月，康納利在一篇文章里解釋了他投票支持工黨的理由。并不是說工黨的政客比保守黨更積極地支持文藝推廣，事實往往相反。但是他還是把票投給了工黨，因為每個人都有權過上文明的生活：“要讓英格蘭變成一片樂土，就必須鏟平階級秩序，只要有社會主義，這點就能實現。”[15]

戰時的英國拍過一些有趣的電影，其中一部《夜夜春宵》（A Canterbury Tale，直譯為《坎特伯雷的故事》）放在任何時代下來看都是部怪片。執導該片的邁克·鮑威爾（Michael Powell）和艾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一個是保守派英國電影鬼才，另一個是崇尚英國文化的匈牙利猶太人。1944年該片剛剛上映時，因為風格過于古怪，票房口碑并不好。《夜夜春宵》反映了當時社會人們的熱切期待，既包含精神追求，也有政治訴求。故事大致是講一個英國兵和美國兵因為機緣巧合認識了對方，連接他們的紐帶是生活在肯特郡鄉下的一個年輕英國姑娘。她來自倫敦，在商店當售貨員，夜幕降臨后，她被一個陌生人約出來，這個名為“膠水男”的神秘男子最喜歡做的事是偷偷往女人頭發上倒膠水。沒過多久，兩個阿兵哥就查出“膠水男”是當地一名十分有教養的鄉紳和父母官。原來，他這么做是為了不讓年輕姑娘外出跟當兵的廝混浪費時間，有這閑工夫還不如全身心去領略燦爛的英國歷史和英國鄉村。影片的四個主角最后都來到了坎特伯雷，這是一次當代的朝圣之旅，所有人都從中收獲了某種人生感悟。

“膠水男”或許很容易被看成變態神經病。然而，雖然他毫無疑問是個怪人，但他同時是個充滿理想主義、近乎圣人的角色。他企圖以自己古怪的方式表明為什么英國值得人們為之而戰。該片鏡頭下的英國，特別是英國鄉村，是一片高度愛國、洋溢浪漫情懷的熱土，是保守黨人眼中的“鮮血和祖國”（Blood and Soil，納粹口號）。當然，也許有一點要除外——這部電影消解了傳統的階級藩籬。年輕姑娘告訴“膠水男”，她的未婚夫家境良好，而她只是個售貨員，門不當戶不對，因此對方父母并不接納她。“膠水男”回答，這些等級劃分、尊卑秩序在“全新的英格蘭”再也沒有任何意義。影片里的“新英格蘭”是一個哲學思辨的國度，她的自然風光是孕育靈性的沃土。姑娘說，那可真是場地震了。“膠水男”答曰，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地震。對于“膠水男”而言，這場地震不只發生在社會和政治層面；更是發生在英國碧綠曠野上的一種宗教頓悟。

克萊門特·艾德禮主張的社會主義，同鮑威爾和普雷斯伯格鏡頭下的保守黨浪漫主義似乎相去甚遠。艾德禮的父親是個小律師，為人安靜，喜歡抽煙斗，他的兒子沒有一點和浪漫扯得上邊的。但是，他的政治主張同《夜夜春宵》的主題并非真的相隔十萬八千里。英國的社會主義有著強大的基督教根源，并且浸淫于維多利亞時期的改良主義傳統中，強調通過文化熏陶和藝術技藝打造一個純凈如畫、田園牧歌般的英格蘭。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詩作《耶路撒冷》（Jerusalem），就是對掩映在“黑暗撒旦作坊”之間的“英格蘭綠色樂土”的禮贊。該詩表達了一種宗教式的愛國熱忱，似乎基督妙手一揮，就把英格蘭變成了一個人間天堂。布萊克是個文學異見者，對于工人階級不畏強暴，反抗壓迫者的行為，他總是不吝獻上自己的溢美之詞。在他的筆下，社會主義英國時而被喚作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鮑威爾和普雷斯伯格的電影取景地選在肯特郡陽光斑駁的田野中，最后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走向尾聲，影片弘揚的精神和布萊克的愿景有著驚人的相似。

7月大選前的一個月，丘吉爾和艾德禮各自拋出了他們對英格蘭的愛國主義構想，內容大相徑庭。丘吉爾試圖先下手為強，指責工黨癡迷于舶來概念，“同英國人的自由觀勢如水火”。他咆哮道，這種“來自歐洲大陸、名叫社會主義的人類社會構成觀，有時以更暴力的面目示人，即共產主義”，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個警察國家的出現；社會主義政府“必須依賴某種形式的蓋世太保”。這種做法“在這兒，在傳統的英格蘭，在大不列顛，在這個光榮的島嶼上……在自由民主體制的搖籃和堡壘中”永遠也行不通。因為英國人“不喜歡被人管頭管腳，不喜歡被呼來喝去……”[16]丘吉爾以他戰時精彩演講的氣勢，鏗鏘有力地說出了這番話。

他接著說道：軍事化管理在國難當頭之際是很管用，“我們為了拯救自己的國家，都甘愿被呼來喝去”。但是一旦戰爭結束，驕傲的英國人就應該扔掉那些自愿承擔的鐐銬和包袱，“走出陰郁的戰爭黑洞，步入微風拂面、艷陽高照的田野。所有人都能快樂地沐浴在溫暖和煦的金色陽光下”。

在秉持自由放任理念的丘吉爾看來，綠色的樂土就應該是這樣。他的想法大錯特錯。如今和平近在咫尺，丘吉爾卻第一次對人民的想法置若罔聞。據《衛報》稱，海外的英軍官兵對此存在“極大的困惑”：“丘吉爾先生從一個民族領袖，搖身一變成了另一個人，居然在演講中說‘工黨是蓋世太保’。這種角色蛻變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都看傻了。”[17]

作為回擊，艾德禮也指責對手從并不可靠的外國人那里汲取思想。以丘吉爾為例，啟發他的是維也納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在1930年代離開祖國奧地利，他把歐洲大陸出現的極權主義歸咎于中央計劃這一愚蠢之舉。丘吉爾一直在閱讀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艾德禮對此嗤之以鼻，他在電臺廣播里說，“我可不會浪費時間去研究這么理論化的東西，這充其量不過是從一個奧地利教授那里批發來的二手學術觀點罷了……”

丘吉爾認為取消戰時計劃和管制是通向陽光燦爛的英國曠野的最快捷徑，艾德禮卻堅信要建設“新耶路撒冷”，戰時管制應得以延續。不能把公眾福祉交到自私自利的個體手中，后者都是些無利不起早之輩。他表示，“這場戰爭是舉全民之力才打贏的，除開極個別例外，人民都將國家放在第一位，把個人和團體利益遠遠放在次要位置……如果我們把私人利益放在首位，我們憑什么覺得自己能在和平年代實現目標，做到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有閑暇時間玩樂，有社會保險，還有活可干呢？”[18]

艾德禮和同時代的許多歐洲人一樣，對政府計劃很是信任。這絕非出于機會主義動機，想利用因戰爭導致的必要局面。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幾十年來都不信任自由經濟學，其被認為是導致周期性繁榮——蕭條和高失業率的元兇，這些問題在1930年代曾引發廣泛的政治動蕩。希特勒的首任經濟部長雅爾瑪·沙赫特是個規劃師，他和艾德禮一樣相信國家應該引導經濟發展。在東亞，日本“改革派官僚”也是這一原則的信徒。這些人與其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如說是國家社會主義者。他們聯手軍部一起消滅了西式資本主義。通過計劃創建完美社會是20世紀最宏大的信仰之一。

在戰爭最初幾年里，改造英國的計劃其實已經醞釀好了。1942年發表的《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就觸及了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等范疇，提出要建立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并提供全民就業。1943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勾勒出了全民中等教育制度的概貌。到了1944年，有了社會保險，翌年又出臺了有關住房政策的文件。但是推動這些計劃付諸實施的一個大快人心、勢不可擋的契機直到1945年7月才出現。當時，不只是英國，大半個歐洲都已精疲力竭，斷壁殘垣，幾乎處于崩潰邊緣，這成了夢想推倒一切重來的完美背景。

\* \* \* \* \*

在法國，“新耶路撒冷”對應的一個詞是“進步主義”（progressisme）。糅合了強烈愛國主義的左傾理想曾激勵過原抵抗主義成員，正如其當初激勵英國社會黨人一樣。共產黨人、社民黨人、甚至許多戴高樂主義者之所以同維希政府和德國人對抗，不只是出于對傳統、“優雅法蘭西”（douce France）的愛，還因為政治理想的驅使。為追求理想，許多人不惜獻出生命，期盼這些理想在戰后能被付諸實踐，而且最好由原抵抗者親自操刀。左派主導的抵抗組織全國委員會在設計之初，就是作為某種候任政府而存在。

斯蒂法尼·艾賽爾（Stéphane Hessel）曾是一名年輕的猶太抵抗運動成員，在經歷了蓋世太保的酷刑和布痕瓦爾德的考驗后撿回了一條命。回憶起六十年前的往事，他說道：“1945年，在恐怖的一幕過去后，抵抗組織全國委員會的成員開始致力于一項雄心勃勃的復興計劃。”這個委員會提議“理性發展經濟，以確保私人利益服從于公眾福祉”。這番話跟艾德禮的計劃如出一轍。有必要制定新計劃，保障普遍的社會保險。煤礦、燃氣、大銀行和電力這些部門將被國有化。艾賽爾回憶，這么做是為了“將公眾福祉從如同法西斯主義國家式的獨裁統治中解放出來”。[19]

艾賽爾不是共產黨。他在倫敦加入了戴高樂的部隊，并于1944年3月跳傘進入仍處于德國占領下的法國。這么做很勇敢，況且他還是個猶太人，拿的又是偽造的證件。（艾賽爾遭人出賣，于7月被捕。）然而，艾賽爾的政治理念必然同戴高樂對法國的構想相左，兩者之間的距離還不小。法國左派對戴高樂的看法和許多英國人對丘吉爾的看法相近。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各自時代的偉人，但也是阻礙進步的反動派。瑪格麗特·杜拉斯曾是左翼抵抗組織的一分子，她描繪戴高樂是“骨子里的右派領袖”。在她筆下，戴高樂“想要抽干人們的生氣。他希望人們既孱弱，又對他忠心耿耿；他希望人們跟資產階級一樣是戴高樂主義者；他希望人們成為資產階級”。[20]

她寫下這些話是在1945年4月。隨著北非和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戰局愈加吃緊，這種情緒只會揮之不去，甚至越發強烈。盡管戴高樂毋庸置疑是個保守派，而且在阻礙原抵抗運動奪權一事上毫不遲疑，但他也明白自己不得不向進步主義力量做出妥協。在戴高樂治下，雷諾汽車廠和五家大銀行在1945年實現國有化，其余被收歸國有的行業還有煤礦、燃氣和公交。還是在戴高樂當政的時候，1945年12月，來自干邑（Cognac）的技術官僚讓·莫奈（Jean Monnet）向前者展示了推動法國經濟現代化的計劃，盡管戰時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華盛頓。莫奈的方案是讓國家管理工業、礦業和金融業，這是很典型的計劃思想。一項接一項的計劃是通往美好未來之路，這不僅因為其保證了更廣泛的公平，而且還因為其可以防止歐洲再度陷入一場毀滅性戰爭。

就這樣，計劃之風吹遍了歐洲大陸。猶太人亞瑟·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逃生能力在歐洲人中堪稱登峰造極。過去是共產黨員的他曾經從西班牙一座法西斯監獄成功越獄。對計劃主義蔚然成風抱有極大疑慮的他寫道：“如果我們將步入一個超級國家管理一切的時代，知識分子必將成為公務員隊伍里的一個特殊部門。”[21]盡管抵抗組織未能成為自己所希望成為的那股政治力量，但他們的不少左傾理想倒真的被付諸實踐了。荷蘭和比利時的社民黨都從大選中脫穎而出，贏得了組閣權。西西里、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推行了土改，讓數百萬農民擁有了自己的一畝三分田，當然改革的代價通常是由不受歡迎的少數民族承擔的，比如東普魯士和蘇臺德地區的德國人。在德國的蘇占區，社民黨人竭力想同共產黨人一起共謀國事，但后來證明他們只會無功而返。

這些變化中實際上有一種強烈的泛歐主義元素；“新耶路撒冷”不只是單個國家的理想，而且是全歐洲的愿景。日后在數屆工黨政府內擔任內閣大臣這一要職的英軍少校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同部隊一起降落在西西里和安奇奧（Anzio）。他對戰友左傾主義傾向的解釋是“他們和抵抗運動有聯系，并且感到一場革命正在席卷歐洲”。[22]希利曾是共產黨員，但在1939年時憤而退黨，原因是蘇德兩國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也叫《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但是他的一顆共產主義赤子之心并未徹底冷卻。1945年，在工黨的黨代會上，他呼吁為歐洲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幫助。他強調道：“雖然偶爾有事實顯示我們在歐洲大陸的同志們做事有些走極端”，但工黨不應該“太偽善和自以為是”。[23]

以西里爾·康納利為例，他親法，熱愛歐洲文化，加上他的政治觀點，這些都促使他認為只有一個團結的歐洲才能筑起一道屏障，阻擋另一場自殺式沖突。1944年12月，他在《地平線》雜志里寫道：“所有歐洲人打過的戰爭都以歐洲人失敗而告終”，“而歐洲打敗仗，也就是英國打敗仗；英國打敗仗，全世界都會陷入貧困”。在他看來，“絕不讓歷史重演”意味著“一種歐洲聯邦，其并非名義上的聯邦，而是一個不需要護照的歐洲。是一個所有人想去哪兒就能去哪兒的文化實體……如果歐洲不能拋棄經濟民族主義，并代之以英特納雄耐爾的地區主義，那么其就會像希臘的城邦國家一樣，因為糾纏于互相仇恨和不信任，在侵略者的鐵蹄下一敗涂地，最后走向衰亡”。

不少人，包括丘吉爾自己，都同意康納利的看法，這證明了他并非只是一個親歐洲的怪人，但我們不得而知的是英國前首相是不是真心希望英國成為新歐洲重建計劃的一部分。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戰后第一年，他曾在蘇黎世發表演講，表達了對“歐羅巴合眾國”的熱情支持。但這個團結的歐洲必須是由“英國、英聯邦國家”和歐洲的“朋友和支持者”組成的。[24]然而，左派的角色依舊是爭議的焦點。康納利相信，只有左派才有能力建立歐洲聯邦，這將是一個“歐洲的人民陣線，一心要變得強大，并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提出類似暢想的還有蘇聯，這點在涉及德國時體現得尤為明顯。因為在莫斯科看來，德國的統一理應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實現。在倫敦的法國大使館用完午餐后，哈羅德·尼克爾森在日記里寫到共產主義宣傳的危險所在：“要對抗這種宣傳，我們必須提供另一種理想；唯一的可行性是在歐洲聯邦里成立一個聯邦德國。”[25]

另一種倡導歐洲聯合的觀點基于愛國主義，認為各國只有在歐洲聯合的條件下才能重振國威。這一觀點在法國叫得最響，倡導者不僅有維希政權的技術官僚，也包括他們的部分政敵。核心人物依然是讓·莫奈，他的統一夢并不局限于法國。根據莫奈的回憶錄，他終其一生都在嘗試抓住“非比尋常的時刻”，克服分散，鑄就統一。1940年5月，德國人的鐵蹄踏遍法國之際，正是這樣一個大好時機。再往前推一年，莫奈拋出英法聯盟的構想，想借此勾起時任英國首相的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的興趣。1940年，丘吉爾也準備支持這一倡議，但主要緣于法國人的疑心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國家計劃是莫奈對法國的愛國主義貢獻。他告訴戴高樂，這是法國唯一有可能再現輝煌的辦法。要實現這點，有必要利用所有法國人的團結一致。1945年是作出類似“集體努力”的最佳時刻，“因為光復后人們的愛國主義精神還在，而且尚未通過一項宏大工程得到展現”。[26]第一項宏大工程是將經濟國有化，把德國的煤礦交給法國工廠使用，從而實現法國的現代化。接下來一個項目事關整個歐洲，即煤鋼聯營，再接著是歐洲經濟共同體。按照莫奈的夢想，最終這將發展為聯合歐洲的宏圖偉業（grandeur）。

戴高樂喜歡管這位歐洲夢想家叫“美國佬”（L’Americain），言語中不乏欣賞之意。莫奈是那種少有的不論在華盛頓、倫敦，還是在巴黎都能隨遇而安的法國人。但是在莫奈統一歐洲的執著愿望中存在著某些元素，讓人覺得其歐陸色彩過于濃厚，且有幾分羅馬天主教的味道，此外它們和自由民主體制并不完全合拍。他的歐洲夢想之上，繚繞著一股神圣羅馬帝國的余煙。另外，他不適應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對官僚們鞭長莫及的自由市場經濟也不喜歡，這說明莫奈的技術官僚信仰從左派和右派思想中都汲取過養分。或者應該這么說，在技術官僚的烏托邦里，左右之分并沒有太大的意義。其更多的還是一種信念，認為要實現社會正義，最有效的途徑是得有個善意的威權主義政府。如此說來，1945年，在左派滿懷期待地認為制定計劃將惠及英國人這點上，丘吉爾持反對意見，他并沒有全然說錯。

\* \* \* \* \*

為第三帝國效力的德國技術官僚一樣也是出色的規劃師。有關二戰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是，德國規劃者曾同納粹占領國的歐洲同行開展過合作。建筑師、城市規劃者、水壩工程師、公路設計師之間不是納粹同僚的關系，而是志趣相投的同志，共同致力于締造歐洲新秩序。對他們來講，破壞往往也意味著“不同尋常的時刻”，將有大好契機出現。

鹿特丹于1939年9月遭到轟炸，這是西歐第一個被轟炸搞得支離破碎、傷及中樞的城市。雖然在破壞程度上沒有華沙嚴重——后者早在八個月前就經歷了一頓狂轟濫炸——但是鹿特丹的市中心幾乎被從地圖上抹掉了。重建鹿特丹的計劃幾乎馬上出爐。在沒有了民主程序或私人利益的羈絆后，一隊荷蘭城市規劃者和工程師開始著手清理廢墟，從私人手中征地，并根據合理的藍圖重建城市。他們不是納粹；事實上，大多數人對德國占領者半點同情都沒有。但是，這些實干家對自由民主體制的優柔寡斷、扯皮推諉和混亂無序早已失去了耐心。一如讓·莫奈，他們相信只有強力領導才能促成統一行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納粹政府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放手去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對于德國人，這么做在泛歐主義層面也有重大意義，盡管荷蘭技術官僚不一定這么覺得。鹿特丹將成為大日耳曼地區的重要樞紐之一。拿納粹占領者的種族主義論調來說，“荷蘭是歐洲生存空間的一部分。作為日耳曼族一分子，荷蘭人將遵循這一天然紐帶賦予的使命”。[27]在新秩序下，不會有“財閥主導”的戰前自由市場經濟的地位。所有經濟體，包括荷蘭，都必須進行自我改造，向歐洲大陸計劃經濟體制（Kontinentalwirtschaft）靠攏。集體利益應凌駕于任何私人利益之上，當然，如果是納粹領導人利益的話就要除外。

關于日耳曼族的高談闊論對像林格斯博士（J. A. Ringers）這樣的人沒什么蠱惑力。林格斯是負責1940年重建鹿特丹的工程師。實際上，他后來因為幫助荷蘭抵抗力量而被捕過。但他發自內心地認為城市規劃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在戰爭最初幾年里，德國人也很大方地同林格斯等荷蘭技術官僚分享了經驗。這并不是說他們之間總是意見一致。在德國人的計劃里，重建鹿特丹走的是一種宏大的法西斯主義路線，這和荷蘭人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另外，德國人不允許鹿特丹的現代化方案搶了漢堡和不來梅這些德國港口城市的風頭。于是，1943年，就在林格斯被捕后，重建計劃戛然而止。雖然在德國集中營歷經艱險，但林格斯活了下來。戰爭一結束，他就被任命為公共工程部長，主抓荷蘭的重建工作。林格斯后來成為荷蘭“新耶路撒冷”的幾位主要工程師之一，他的設計藍圖既得到過卡爾·馬克思的啟發，也從戰前社會主義規劃那里吸收過一些東西，另外也許還從納粹占領者那里借鑒過部分經驗，但是人們對此并不關心。

\* \* \* \* \*

最厲害的規劃者還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滿洲國”這一依附于日本的偽政權，是當時全世界規劃最完美的殖民地，有點像日本泛亞主義的夢想宮殿。當然，滿洲國在官方說法中可不是什么殖民地，畢竟從表面上來講，日本是把亞洲從西方帝國主義手中拯救出來的解放者。而且由于日本帝國所對抗的也是“自私自利”的西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滿洲國就不僅是一個半獨立的亞洲國家，還是社會集體正義和平均主義的典范。但真實情況根本不是這回事；日本人的礦井和工廠全賴中國勞工為其做牛做馬，在日本關東軍的高壓統治下，中國人和朝鮮人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和偽滿的其他事務一樣，軍政府嚴格控制著經濟的運行，在此過程中還得到了政府青睞的日本工商企業和銀行的大力協助。

偽滿洲國的首都在日語里叫新京（Shinkyo），即今天的長春。1932年日本建立偽滿政權時，其還只是一個規模很小的鐵路聯軌站。偽滿成立后，關東軍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的日本規劃者、工程師、建筑師和官僚幾乎立刻著手打造全亞洲最現代、最高效、最干凈、最有序、且具有“新亞洲”風范的城市。新京的設計藍圖帶有西方影響的烙印——比如奧斯曼男爵（Haussmann）的巴黎[[1]](#_1_Ao_Si_Man_Nan_Jue__1809__1891)、19世紀英國人的花園城概念（Garden City）、德國的包豪斯主義（Bauhaus）[[2]](#_2_Bao_Hao_Si__Yuan_Yu_De_Guo_De)——不過，體積龐大且風格現代的政府大樓還是要配以三角形的東方式屋頂。其原型來自諸多日本寺廟和中國宮殿。

在偽滿洲國國務院的主持下，一座嶄新的城市在歷經五年高速建設后拔地而起，矗立在地勢平坦、冬天白雪皚皚的東北平原上。如果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3]](#_3_A_Er_Bo_Te__Shi_Pei_Er__1905)是日本人，新京也會是他為極權主義規劃所立的一座豐碑：馬路兩旁的“新亞洲”風格官僚主義堡壘氣勢磅礡，夾在中間的林蔭大道寬闊而筆直，通向巨大的圓形廣場，就像巨型輪盤上的輻條。[[4]](#_4_Zuo_Zhe_Zhu__Zhe_Xie_Jian_Zhu)這一切設計都力求在數學上做到精確無誤。而且，無論是外觀漂亮、從不晚點、有“亞洲快車”美譽的南滿鐵路高速列車，還是公共住房里的抽水馬桶——這在日本都是許多家庭聞所未聞的創新之舉——所有這一切都運轉良好。

偽滿洲國的對外代表是中國人，最高可至滿清廢帝、人稱“末代皇帝”的溥儀（Henry Pu’yi）。在他的王座和每個中國官員背后都站著一個日本“副手”垂簾聽政。管日本統治者叫法西斯并不準確。他們清一色都是民族主義者，不少是軍國主義者，相當一部分人篤信官方宣傳的那套泛亞主義理想——在日本帶領下，將會誕生一個擺脫西式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嶄新亞洲。

所有軍政官員一心一意地撲在規劃上，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羈絆，也沒有私人利益的約束，更不會對占偽滿洲國多數的中國臣民的想法有所顧及。一群高度機敏的官僚、管理者和工程師仰仗著人面獸心的關東軍、殺人如麻的憲兵隊、三教九流的日本浪人和政治投機客的勢力，將偽滿看成一塊畫板，在上面可以繪制出完美規劃的經濟圖景。他們的計劃包裹在帝國主義崇拜論的外衣之下，圍繞著神圣的天皇和他同是皇族、身居新京“鹽宮”[[5]](#_5_Suo_Wei_Yan_Gong_Bing_Fei_Shi)的奴仆——稀里糊涂、可憐兮兮、顏面掃地的偽滿皇帝溥儀。

在致力于維護保守軍事秩序這點上，部分日本規劃者的右傾傾向十分明顯；其中一些人是社會主義者，同軍國主義者一樣很反感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但即便右翼官僚也是蘇聯五年計劃的信徒。對典型的偽滿洲國“改革派官僚”的最佳描述也許是這樣的：他是一個右傾激進分子，但和共產黨的共同點要比和自由派還多。岸信介正是這樣一個人。長著一張兔子臉、性格溫文爾雅的他是個精明圓滑的官僚，光從外表根本看不出是那種會鐵腕管理大批勞工的強力人物。然而，還沒滿40歲的岸信介卻是日本帝國最有權勢的人之一。他的想法概括而言就是要把偽滿洲國變成一個國家控制下的礦業、化工和重工業重鎮。

就這樣，偽滿出臺了產業政策，這么做不是為了給企業或公司創收——就算是也并非第一要義——更不是為了滿足日本消費者的需求。他們在戰時配給制下生活得越來越窘迫。產業政策的目標是擴大國家的權力。有些公司從中大撈一筆，比如日產。該公司于1937年把總部搬到偽滿洲國。在和政府簽訂合作協議后，日產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工商和金融業集團，亦稱財閥，然后開始制定五年計劃。其生產的產品從軍車到魚雷艇，不一而足；同是財閥的三菱株式會社負責生產戰斗機；三井則壟斷了在華鴉片貿易，從中漁利，同時也養肥了偽滿洲國當局。參與這項骯臟交易的兩位主要人物是日產株式會社的創始人鲇川義介和產業官僚岸信介，后者一直小心翼翼地經營著他同地下犯罪團伙間的聯系。但是，大企業和軍部的利益并不總是鐵板一塊的。就連鲇川也不贊成日本和納粹德國結盟。和英美開戰對做生意不見得有利，而且就算企業能從特別免稅條款和補助中獲益，他們對官僚的干預也并不總是持歡迎態度。

岸信介等人在偽滿洲國開創先河的一些嘗試日后在日本國內也被付諸實踐。從1937年中日戰爭正式爆發，到太平洋戰爭結束時，日本經濟在內閣企畫部、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機關的分管下，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一批管理戰時經濟的人士都是從改革派官僚、戰略規劃者和反自由化思想家組成的網絡里招募的，既有左派又有右派。他們憑著為了效率一切皆可無視的那股子專注勁兒，幫助偽滿洲國實現了工業化。商工省大臣不是別人，正是岸信介。1943年，商工省改名為軍需省，使其更符合日本戰時經濟的本質。岸信介表面上是軍需省次官，但實際依然掌管著戰時經濟，前后長達一年。就在天皇下達終戰詔書，宣布日本戰敗后不久的8月26日，軍需省被廢除，改頭換面后又一次叫上了商工省的名字。

美國占領日本的一大謎團是美國人何以能夠容許日本人玩弄這些障眼法。畢竟，勝利者對日本的構想同樣也是“決不讓歷史重演”。在日本，1945年也是“零年”，是在廢墟上建設新社會的完美時機。很顯然，一些人必須被掃地出門。岸信介作為甲級戰犯被捕，同樣落網的還有鲇川義介。但是他們在日本建立的機構基本上都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反觀在偽滿洲國，工業設備則遭到了蘇聯紅軍的全面洗劫。

關于日本如何重建這點，各方存在極大的爭議。在華盛頓有一股很強的輿論導向，認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業，而是應該專注于生產更符合東方民族古樸氣質的產品：玩具、陶瓷人像、絲綢、紙質品、瓷碗等等。有人給出個不錯的建議，讓日本生產出口美國的雞尾酒餐巾。[28]但日本人的想法不同。就在美軍到來之前，三菱財閥的掌門人給他手下一名高管寫了封信，信中談到一項“偉大的百年計劃。”[29]盡管這一源自中國古典文獻的表述不能從字面上加以理解，但是日本人腦子里盤算的就是怎么規劃的問題。一年后，日本外務省草擬了一份報告，解釋稱自由放任的時代已經結束，全世界“終于進入了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時代，或者說一種受控制、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時代”。[30]

這一想法和某些頗具影響力的美國新政派人士很接近，他們被派到日本，協助麥克阿瑟將軍對日本進行和平民主改造。這批人早期擬定的一些計劃草案，換成列寧主義者一樣能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的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是個研究中國問題的左派英國學者，他一度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拉鐵摩爾相信，比起“裹挾著無情帝國主義”的西方民主理論，亞洲人對“真正的民主舉措”更有興趣，“比如俄國那邊發生的事情，他們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他煞有介事地表示，中國國內真正的民主體制只有在“共產黨的地盤上”才有可能成立。[31]其他在美國國務院任職的“中國通”仔細地審視了日共領導人野坂參三關于如何建設戰后日本的倡議，野坂在戰時曾在中國從事教化日本戰俘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工廠委員會和工人組織要從“法西斯”官僚手里奪權，代為管理食品分配等重要工作。盡管這個點子后來夭折了，但新政派官員對土改和建立獨立工會這兩條還是很重視，并且也確信美國占領當局理應“贊同在經濟體系里推行所有權、經營權和控制權的更廣泛分配”。[32]

日本的“新政”和艾德禮對英國的改造計劃十分相似。當然，話說回來，艾德禮和新政派都不是共產黨。恰恰相反，他們和多數社民黨人一樣，都很反對共產主義。包括新政派在內的美國官員有一塊很大的心病，擔心日本人為極端經濟窘境所迫，難以招架共產主義的誘惑。應對辦法是通過重建日本的工業能力，確保日本人能夠盡快養活自己，防止讓軍事利益或大企業的貪婪擾亂這一進程。而要做到這點，最好的辦法就是把經濟政策交給經驗最豐富的日本人，交到能為未來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且具有愛國情懷和均貧富抱負的公務員手里；也就是說，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肅的大藏省和商工省官僚手里。

1948年，有案底在身的岸信介未經審判就從巢鴨監獄獲釋。服刑期間，他同右翼政界和有組織犯罪團伙的老朋友一直保持著聯絡，有些人還和他關在一間牢房里。1949年，商工省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通商和產業省，簡稱通產省（MITI），這個部門是1960—1970年代日本經濟奇跡背后最重要的政府推手。1957年，岸信介當選首相。

\* \* \* \* \*

1945年8月15日，在收音機里聽到日本投降后，許多朝鮮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戰時日本發配的制服——婦女配的是十分難看的農民褲子，男人則是羊毛卡其馬褲。成千上萬的人穿著白色的朝鮮傳統服飾，涌向大街小巷，手里揮動朝鮮旗幟，嘴里唱著愛國歌曲，喊著“朝鮮自由萬歲！”的口號。漢城的大街上一片狼藉，電力供應被切斷了，食物不夠吃，但是人們依然喜極而泣。這么多年來，他們第一次能夠公開地表現得像個朝鮮人，不會因為沒有向日本天皇照片鞠躬或拒絕使用日本名字而受到懲罰。

剛開始鬧過些誤會。朝鮮人以為蘇聯人要來了，因此派了一支歡迎隊伍到漢城的火車站迎接蘇聯解放者，可是遲遲沒有等到。南朝鮮的其他城市，比如大邱、光州和釜山也都派出了歡迎隊伍，在火車站徒勞地等待蘇聯人的到來。人們手里揮動著蘇聯和朝鮮旗幟，表達對蘇聯幫助朝鮮恢復獨立的感激之情。

另一些人來到離他們最近的日本神道教寺廟，拿著榔頭、棍棒，甚至揮舞著拳頭，試圖砸爛這一殖民壓迫的主要象征物，隨后一把火燒掉了寺廟。縱火事件起初發生在北方城市平壤，繼而有蔓延至全國之勢。這些備受憎惡的廟宇整夜燒啊燒，沖天的火光讓視神廟為圣地的日本人大驚失色。

不過，日本人總體上還是擺脫了朝鮮人的騷擾，但是在北方，無論老幼，婦女均被蘇軍當成戰利品加以凌辱。8月16日早晨，一位名叫呂運亨的朝鮮抗日義士在漢城和其他愛國志士一同成立了朝鮮建國籌備委員會，他們中間還有剛從日本監獄里釋放出來的共產黨員。呂運亨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立場左傾，很喜歡穿剪裁精美的英式粗花呢西裝。他在一所高中的操場上對著幾千人發表演講，演講十分轟動，原因有二。一是其體現了寬宏大量的精神：“既然日本人就要和朝鮮人分道揚鑣了，我們就不要再計較過去的得失了，友好地說再見吧。”另外一點就是強烈的烏托邦情懷：“讓我們忘記過去經歷的磨難。我們必須在這片屬于吾輩的土地上建立一個理想社會，一個理性的天堂。讓我們拋開個人英雄主義，牢牢地攜起手來一起向前邁進。”[33]

人們放聲歌唱朝鮮愛國歌曲，抒發他們對國家忠貞不渝的愛，但所選的曲調卻是“友誼地久天長”（Auld Lang Syne）。很顯然，這讓一些日本人誤以為朝鮮人在友好地跟他們的日本主子道別。

就在蘇軍抵達平壤前一周左右，一位同樣廣受愛戴的左傾基督教愛國者曹晚植來到位于漢城北部即后來“三八線”以北的地方。曹之所以出名，一是因為他溫文爾雅的行事風格，二是因為他總是穿著朝鮮民族服裝，人稱“朝鮮的甘地”。他也在為國家獨立做準備。同身在南方的呂運亨一樣，曹的隨從里有不少過去是政治犯，都有共產黨背景，但那時的曹尚未被他們左右。不管在南方還是在北方，朝鮮人民委員會迅速從日本官員手里接管了權力。委員會的多數成員不是共產黨，就是溫和的左傾民族主義者，而且常常是基督徒。

同東、西歐的情況一樣，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左派是最不折不扣的愛國者。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保守派精英時常同日本人合作，有時不太情愿，有時很是積極；有的打著現代化或進步的幌子，有的則出于私利。自1910年日本帝國吞并朝鮮以來，抗日運動就帶有強烈的左傾傾向。朝鮮人針對本國精英及日本人的造反，經常帶有一種救世論的色彩，這是朝鮮薩滿教和基督教共同影響下的產物。從許多方面來看，建筑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抗日運動是歷史上朝鮮農民反抗地主鄉紳起義的現代翻版。

然而，撇開呂運亨的豪言壯語不說，統一其實十分脆弱。縱觀朝鮮歷史，統一難得一見。這個國家因為地區間的差異——尤其是南北朝鮮之間的差異——和激烈的政治對抗，長期處于分裂狀態。到了1945年也沒有什么兩樣。即便呂運亨和曹晚植都胸懷統一朝鮮的理想，但是左派內部派系林立，而共產黨則蠢蠢欲動，一旦天時地利皆具，就要準備奪權。呂在漢城建立朝鮮人民共和國時，他還面臨著來自右派——由地主和其他舊時代精英領銜的朝鮮民主黨——的挑戰，他們當中許多人曾勾結日本人。除此之外，中國和美國還散落著流亡的朝鮮政客，他們之間也是四分五裂。

但是不管各自政治主張如何，幾乎所有朝鮮人都同意一點。在他們的理解中，“決不讓歷史重演”指的是再也不臣服于外國列強。9月14日，也就是宣布朝鮮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呂運亨發表了戰斗性十足的演說詞：

我們決心摧毀日本帝國主義、其殘留余孽、反民主幫派、反動分子和任何我國境內的外國惡勢力，然后建立屬于我們自己的全面獨立和自治，期待一個真正民主國家的產生。[34]

朝鮮語里有個詞，叫“sadae”，直譯是“效忠偉大君主”之意，這個詞用來形容一些邊緣王國——比如朝鮮——傳統上對中國帝王的朝貢。到了現代，“sadae”的外延擴大了，意指為了打壓國內對手，向任何外部強國卑躬屈膝。通日分子因此犯有“sadae”這一罪行。在呂想象中的“理性天堂”，“sadae”的恥辱感會被永遠抹去。

可惜朝鮮人根本沒有機會。

日本投降過后幾周，美軍在南部港口城市仁川登陸。那時，美國人對這個國家和其人民的抱負一無所知。約翰·霍奇（John R. Hodge）中將被推選為美軍統帥，僅僅因為他正好在該地區——日本的沖繩島。他的政治顧問團對朝鮮的了解不比他多多少，沒人會說朝鮮語。但是朝鮮方面還是釋放出了巨大的善意。根據《揚基人》雜志的報道來看，“土生土長的朝鮮人”“歡呼，傻笑，高舉雙臂，連連鞠躬，扯著嗓子叫著‘好啊！好啊！’”，以這種方式歡迎美軍吉普、卡車和偵察車的到來。[35]

盡管軍令嚴禁和平民套近乎，一位名叫沃倫·常石（Warren Tsuneishi）的日裔美籍軍事情報官還是和漢城的賓館經理金先生攀談起來。金先生說：“感謝你們解放了我們。我無比誠摯地感謝你們。你們為解放我們，讓我們獲得獨立做出了巨大犧牲。”說著說著，金先生的眼里泛起了淚光，這讓常石突然感到“很不自在”。[36]

至此，美國人的第一個大錯已經鑄成。還沒等霍奇中將下船，他就收到了朝鮮人發來的請求，邀請他見見呂運亨的弟弟呂運弘，后者是代表朝鮮過渡政府的溫和派人物。由于懷疑這是日本人或共產黨設的套，將軍拒絕同呂會面。第二天，霍奇在漢城宣布日本總督和所有拓殖當局官員留任，直至接到新的命令。朝鮮人猶如被當面抽了一個耳光，憤怒地涌上街頭，抗議美國此舉。朝鮮人的反應讓美國很丟臉，國務院隨即宣布，日本人再也不會掌權，掌權的是美國人。但由于美軍兵力不夠，因此只能下令讓日本人繼續擔任原職。

《揚基人》如此描述日本的投降儀式：“在位于漢城日本總督府外的旗桿旁舉行了一次簡短的撤退儀式。184師的官兵身穿軍裝，站成一個中空的方陣，第7師的官兵演奏了《我們美國人》這首曲子。日本鬼子的旗子被降了下來，然后被簡短地展示給必然到場的攝影師看。隨著樂隊奏響美國國歌，美國國旗冉冉升起。”接著，美軍“邁步走出總督府大門。這些受到朝鮮人熱烈歡迎的正義使者，開始在這個曾經三國鼎立的古老國度[[6]](#_6_Cong_Gong_Yuan_Qian_1Shi_Ji_D)履行他們作為占領者的職責”。[37]

盡管蘇聯紅軍占領了38線以北的朝鮮領土，但蘇聯并沒有像美國這樣粗魯地樹立權威。一名蘇聯官員告訴美國記者，俄國人對英國人和美國人有好感，因為“我們長得很像”。 他接著說道，但“我們不喜歡朝鮮人，等到一個合適的穩定政府建立起來，我們就會撤軍”。[38]順便提一句，霍奇將軍也不喜歡朝鮮人，他認為大多數朝鮮人是“沒受過什么教育的東方人，日本鬼子長達四十年的統治深深影響著他們……跟他們幾乎沒法講道理”。[39]

蘇聯人恪守了承諾，但是他們理解的“合適的穩定政府”同呂運亨和曹晚植等愛國者所希望的完全不同。最早管理北朝鮮的是朝鮮人民委員會，成立人民法院的目的是為了清算投敵分子和“反動分子”。在殖民當局當過差的官員被掃地出門，這一過程有時伴隨流血暴力。革命政治得到了蘇聯官員的支持，由于在其中撈不到半點好處，朝鮮地主等群體開始火速逃往南方。曹晚植依舊管理著人民政治委員會，但是這一中央機構對區域性委員會的控制力十分有限，對阻止蘇聯人拆分和搶劫日本人留下的工廠也無計可施。

不同于蘇聯人，坐鎮南方的美國軍事當局對政府實行直接管控，并發起了一項日后在許多場合被重復施行的政策——前提是美國人自認為這能給當地人帶來善治。部分源于無知，部分源于對共產黨意圖并不總是不合理的懷疑，美國軍事當局主要仰仗朝鮮精英中會講英語的保守派成員，最好還是在美國大學讀過書的人。為了領導未來的朝鮮政府，他們從美國帶回來一個人，此人是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但同時也是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他叫李承晚，是個基督徒，在哈佛和普林斯頓受過教育。李在朝鮮并非無名小卒，但他在這里沒有民意基礎。盡管在流亡海外期間被美國官員看成是個麻煩人物，但國務院護照部門的一位女士覺得李是個“和藹的愛國老紳士”。有了她的觀點背書，再加上李的反共資歷，這兩條理由夠有說服力了。10月11日，李回到祖國，得到了霍奇將軍的歡迎，霍奇稱贊他是一位“傾注畢生心血謀求朝鮮自由的偉人”。[40]

三天后，平壤出現了類似的一幕。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朝鮮游擊隊戰士以“民族英雄”和“杰出游擊隊領袖”的身份，受到了蘇聯最高指揮官的熱情接見。此君身材矮胖，三十出頭，頭發梳得像個倒扣的瓜皮。他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附近的一座蘇軍訓練營里度過了大部分戰爭時光。蘇聯組織了7萬人向“金日成將軍”致敬。金將軍以“感激涕零的朝鮮人民之代表”的身份，發表了一篇由蘇聯訓導員捉刀、歌頌蘇軍的演講。[41]

這件事過去整整一周后，平壤的一家報紙上出現了圍繞金日成搞個人崇拜的苗頭。報紙文章介紹了金的赫赫戰功，很快這就將成為一種準宗教儀式的組成部分，核心思想是歌頌朝鮮半島上一切形式的神圣干預。這種論調和朝鮮歷史上諸多具有救世論色彩的政治運動不謀而合。12月，金日成成為朝鮮共產黨領袖。但朝鮮政治中心仍舊偏向南部，當時也還不存在朝鮮分裂成兩大獨立國家的問題。

朝鮮人對他們國家臣服于他國的“sadae”歷史素來很敏感，到了眼下這一時刻更是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擔憂了。1945年11月，依然身居中國青島的唐納德·金同一些旅居當地的朝鮮人共進晚餐。他在信里回憶道，有史以來，朝鮮獨立第一次不存在任何爭議。“唯一引發爭議的討論話題是俄美關系。”金發現，要說服他的朝鮮朋友相信“美國和俄國沒有嫌隙，可以在和平世界里相安無事”這點“無比困難”。他解釋，這些朝鮮人“在戰時因為收聽美國短波電臺，遭到過（日本人的）嚴厲報復”，因此他們認為美國理應幫助他們的祖國對抗俄國人。金有些不耐煩地評論道：“一個基于合作的解決方案被認為不切實際。他們眼里只有朝鮮的兩大陣營，雙方都想贏得一切；在這種局面下，他們視合作為背叛。”[42]

他們說得沒錯：朝鮮人的命運還真是為外國列強所主宰。但派系遠不止兩個。首先，12月，美蘇在莫斯科舉行了外長會議，光看會議的氛圍，似乎金的樂觀情緒不無道理，美蘇兩國能夠達成某種協議。美蘇兩國將抽調各自軍事指揮人員，成立一個共管委員會，負責對朝鮮進行“托管”。美蘇官員將協助朝鮮人組建臨時過渡政府，并在英國和中國的支持下，引導該國走向全面獨立。這項任務可能要耗時五年之久。

蘇聯人沒費多少口舌便說服了北朝鮮盟友支持這項安排。反對者迅速被噤聲。在曹晚植看來，這種托管像是又要有殖民者干涉朝鮮內政了，于是他表達了抗議，但隨后就被軟禁。軟禁后來變成了監禁，到了朝鮮戰爭期間，他徹底消失了，再沒有人見過他。

在南方，局勢更加嚴峻。出于民族主義或政治理由，幾乎所有南朝鮮人都反對托管；保守派不想跟蘇聯干預扯上任何關系。他們無法理解全國政府怎么可能吸納朝鮮共產黨。不過，保守派缺乏民意支持。雖然美國極力想要粉碎左傾的朝鮮人民共和國，但其在愛國性上依舊更能服人。然而，托管的問題為其敲響了喪鐘。

左派和保守派嘗試過組建聯合政府，但是努力最終告吹。這之后，左派對托管這一想法逐漸熱心起來。混亂接踵而至：先是政變，發動者是號稱“刺客”的又一位流亡民族主義者，政變被挫敗了；接著是工人罷工，抗議美國軍事當局。隨后，李承晚麾下的保守派一躍成為真正的愛國者，他們指責朝鮮左派甘當蘇聯的走狗——換句話說，就是sadae，喪權辱國。很自然，美國人力挺李承晚，稱托管從一開始就是蘇聯的陰謀，并說南朝鮮應該在美國的循循善誘下組建屬于自己的保守政府——這一點在未來或許會被碩果僅存的左派描繪成另一種形式的喪權辱國，而且也的確成為了現實。

因此，朝鮮人民共和國注定會走向覆滅，后來發生的就是一場悲劇。這個國家實際上一分為二，北方處于金日成主導的共產黨過渡政府統治下，南方則歸李承晚控制。用不了多久，金在青島的朝鮮朋友就會發現他們比之前預言得還要準確。1950年，北朝鮮的入侵點燃了戰火，在導致兩百萬平民死亡后，慘烈的朝鮮戰爭在僵持中結束了。在二戰期間幾乎完好無損的漢城這時已是滿目瘡痍，北方的平壤也一樣。北朝鮮依舊處于一種準帝國王朝的統治下，南朝鮮（韓國）則還要經歷幾十年的軍人專政。

1961年正值冷戰高峰。當時，一名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發動政變，在韓國奪取了政權。通過借鑒戰時日本軍政府的計劃經濟模式，并讓韓國財閥（chaebol）同政府保持統一步調，韓國經濟一時間突飛猛進。這位強人總統于1942年以全班最優異的成績從新京的偽滿洲國軍官學校畢業，之后加入日本關東軍，官至中尉。1948年，在韓軍中服役的他被開除軍籍，理由是參與針對李承晚的陰謀政變。他在戰時的日文名字叫高木正雄，真名叫樸正熙。支持他的日本人包括岸信介，后者也是偽滿遺老。

\* \* \* \* \*

烏托邦夢想注定是南柯一夢，破滅后被人棄之如敝屣。但其破滅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常常留下痕跡。在當時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看來，英國的“新耶路撒冷”栽在了一場“財政敦刻爾克”上。凱恩斯本希望《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能讓英國從美國那里拿到援助——源源不斷的物資，且條件格外優惠——直到1945年底。這樣就能為政府爭取些時間，避免破產。可惜事與愿違。面對近乎災難的收支平衡，英國人不知道從哪兒撈錢來填平財政赤字，更別提為實現社會主義夢想買單了。凱恩斯為此祈禱：“希望日本人不會過早投降，讓我們失望。”[43]

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讓他的希望落空了。哈羅德·尼克爾森在日記里對此事也有論及，他描述了太太維塔·薩克維爾——威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反應：“原子彈讓維蒂（Viti，Vita的昵稱）嚇壞了。她覺得這意味著一個全新的時代已經來臨。她想得沒錯。”[44]

8月，日本投降，戰爭結束。

經濟通縮讓老百姓的日子過得苦不堪言；在英國，物資配給制延續的時間比其他國家都要長；為了少得可憐的那點公共服務，人們無休無止地排著長隊；生活沉悶，讓人頹廢；戰后的英國社會盡顯疲態，人們認識到，英國不僅國庫空虛，而且正迅速丟失世界大國的地位。所有這一切都抑制了樂觀主義情緒。盡管有關公共住房、教育、文化、衛生和全民就業的規劃依舊在進行中，但是國家的財政岌岌可危，1945年的熱情正迅速消散。在德、日戰敗兩年后，工黨財政大臣休·道爾頓（Hugh Dalton）在日記里寫道：“再也不會有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了。”[45]

1951年，溫斯頓·丘吉爾再度出山，當選首相。工黨得等上十三年才能迎來再度執政的機會。率領他們扭轉局面的是曾在艾德禮內閣中擔任貿易大臣的哈羅德·威爾遜。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西歐國家，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黨承諾的穩定和延續性——即某種常態——消解了左派的革命熱情。1956年，荷蘭社民黨下野。1958年，戴高樂將軍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1948年，得益于美國反共宣傳和財政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開始了其近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執政歲月。在西德，社民黨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贏得選舉。早在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前，東德的社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同舟共濟、建設反法西斯德國的美好夢想就已化為泡影。1945年，生活在蘇占區的德國人執拗地拒絕支持共產黨，而是大為看好社民黨。結果，翌年蘇聯當局便逼迫東德社民黨同共產黨合并，后者很快吞并了該黨。

在韓國和日本，社會主義政府從1947年到1948年維系了整整一年，但這些并不隸屬共產黨的左派最后都走向了滅亡。要理解這點，一個辦法是將其歸咎于冷戰。東亞的美國占領當局也許笨手笨腳，且往往過于保守，但蘇聯對于溫和左派的大潰敗一樣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凡是蘇維埃主義者當權的地方，無論是北朝鮮，還是中東歐，社會黨人都被鎮壓了。

斯大林的確同意過不在美國人的勢力范圍內挑起革命；他讓法共和意共忘了他們的奪權美夢。即使右派依舊受到墨索里尼“遺產”的拖累，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帕爾米羅·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還是秉持中間路線，避免和保守派發生激烈沖突。但是，美國和其在東西方的保守主義盟友對共產黨的意圖高度懷疑，所以使出渾身解數以防范任何左翼派別靠近權力。這在處于冷戰前線的國家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比如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自1940年代末以來，日本同西德一樣必須被打造成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1945年的新政熱情轉眼被拋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政策：重新武裝、發展工業、打擊工會、在公務員隊伍和教育領域“清除赤黨”、積極支持保守主義政客，哪怕其中一些人不久前還是等候審判的戰犯。在占領日本起初，美國當局對左派曾大力鼓勵，后來的所謂“改弦更張”一直被視為是對1945年理想主義的背叛。

話雖如此，但休·道爾頓在哀嘆英國“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不復存在時，還是有些過于悲觀了。解放帶來的欣喜也許已經退去，但在這一嶄新開端之際建立起來的諸多制度并未迅速消解；不管是好是壞，有些一直延續到今天。無論是英國的保守黨政府，還是歐洲大陸上的基督教民主黨，都未真正嘗試過推倒歐洲福利國家的基礎，雖然這是戰前規劃者和戰時抵抗運動內理想主義成員醞釀的產物。實際上，丘吉爾的保守黨比艾德禮的工黨建了更多公共住房。不少基督教民主黨人幾乎和社會主義者一樣對自由放任經濟學充滿質疑。直到1970年代，西歐福利體系的外沿才開始發生腐蝕。也就是十年后，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上臺，英國的福利主義才被嚴重削弱。時至今日，就算和歐洲大陸相比，日本和韓國經濟依然被政府規劃者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然而，戰后規劃的一座主要豐碑還是歐洲自己，或者說是歐盟。雖然其萎靡不振、千瘡百孔，但還是巋然不倒。1945年，歐洲統一這一崇高目標是大多數人的信仰。在對神圣羅馬帝國深感共鳴的天主教徒眼里，這個目標素來很有吸引力。法國人和親法者支持歐洲是西方文明中心的說法——而巴黎則是中心的中心——借此對抗美國粗鄙的物質主義。作為歐盟重要機構的總部和嶄新技術官僚之國的首都，布魯塞爾引得社會黨人和其他經濟規劃者紛至沓來。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個團結的歐洲將確保歐洲人再也不會同室操戈。至少從這點來看，1945年的理想主義到目前為止還算有所收獲。

[[1]奧斯曼男爵（1809—1891），法國城市規劃師，以主持巴黎重建而聞名，但也被認為是毀了老巴黎的人。](#_1_6)

[[2]包豪斯，源于德國的一種藝術風格，突出實用功能，以利用先進技術和追求經濟效益為特征。](#_2_6)

[[3]阿爾伯特·施佩爾（1905—1981），二戰時希特勒政府的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部長，杰出的建筑師。](#_3_5)

[[4]作者注：這些建筑今天還在。他們大而浮夸的風格很對中共的胃口。這種轉型顯得非常自然：昔日關東軍的大樓現在是中共等機構的總部。](#_4_5)

[[5]所謂鹽宮并非是鹽做的宮殿。偽皇宮曾是吉黑榷運局，過去從事鹽業貿易，也稱“鹽倉”。](#_5_5)

[[6]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7世紀，朝鮮半島有新羅、百濟和高句麗三個王國并立，史稱“三國時代”。](#_6_5)

## 第八章 教化野蠻人

1943年，諾埃爾·科沃德（Noël Coward）[[1]](#_1_Nuo_Ai_Er__Ke_Wo_De_Jue_Shi)創作了一首歌，名為《讓我們對德國人別太粗魯》，引起了一些誤解。英國廣播公司曾短暫禁播該曲，原因是其對敵人似乎過于同情：

讓我們對德國人別太粗魯，

畢竟我們最終打贏了戰爭。

說到底是那些齷齪的納粹，

慫恿德國人去打仗，

他們的貝多芬和巴赫，

其實比納粹的蠱惑力強得多！

實際上，在登臺獻唱之前，科沃德曾小心翼翼地指出，他諷刺的是“一小部分人道主義者，我覺得他們對敵人的看法太過寬容了”。

認為盟軍對德日兩國的占領完全遵循這些人道主義者的精神，這種說法未免言過其實，但也不算太夸張。至少在最初幾年里，占領者想盡辦法避免血債血償，盡全力改造、教化和改變人們的心智，在這點上的努力無出其右者。另外，他們還致力于將專制政權改造為和平的民主國家，如此一來它們就再也不會為世界帶來毀滅。

剛開始的時候的確如此。大部分由華盛頓制定的計劃旨在懲罰過去的敵人，并通過摧毀它們成為現代工業國家的手段，使之無法作惡。正如前文所述的以羅斯福政府財長摩根韜命名的摩根韜計劃，旨在瓦解德國工業，拆分其領土，把德國人變成一個男耕女織式的民族，連一根用以自衛的棍棒都沒有。針對日本也有不少類似的想法。

這些計劃無果而終，取而代之的是“三D政策”：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三個D牽涉到再教育的過程，這么做不只是為了改變尚武、專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為方式，而且還要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處，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國民性格”。美國戰爭部拍攝了一部名為《我們在日本的任務》的教育性影片，對這一問題抓得很準。當銀幕上出現一個日本骷髏頭時，電影旁白解釋說：“我們的難題存在于日本人的大腦中。”在電影結尾，旁白總結了當下任務：“我們來這兒，為的是讓日本人的腦瓜開竅：我們見慣了血雨腥風，所以從現在開始，不會撐不下去。”[1]

改造原住民這一策略也許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羅馬人的教化行為。一些人認為這一策略源自啟蒙主義觀念，即人生來理性，而且可以通過正確的教育加以引導。一些人回想起了殖民者的策略，比方說法國的“教化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還有兩個例子，一是基督教的傳教熱情，二是通過教育移民，把他們塑造成秉公守法的美國公民。英國人甚至還提出了信念在塑造性格中的作用，這點早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寄宿學校就已推行：培養既有運動員體魄、又飽讀經典的紳士。再教育還被視為心理戰的延伸，是軍隊進行政工宣傳的工具。

《噴趣》（Punch）雜志在1939年發表了赫伯特（A. P. Herbert）的一首詩，隱晦地提出有必要開展再教育工作：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爭論，

人不可能和毫無戒心的綿羊爭論。

但是一代接著一代，

他們推出的領袖攪了我們的好夢……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爭論，

他們國家的事我們當然管不著。

但是似乎某些大手術，

（修復心腦）也許是唯一的出路。

5月8日，就在街頭巷尾的人們慶祝歐戰勝利之際，倫敦的《泰晤士報》刊出了一封讀者來信，信的作者是著名私立寄宿學校查特豪斯（Charterhouse）的校長羅伯特·伯利（Robert Birley），他日后將對德國西占區的教育政策發揮深遠的影響。伯利在信中寫道：“編輯先生，有一點正變得越來越清晰，盟軍對德國的再教育不僅是一種虔誠的抱負，也是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德國人的問題在于，一個多世紀以來，他們“對任何替他們代勞做決定的政府都照單全收，這點很要命”。赫伯特的詩里也流露了這種情緒，而且當時大多數人也這么認為。在伯利眼里，德國人已經變得跟綿羊一樣，只會跟著領頭羊，沒有個性，就像受過軍訓的機器人。

伯利接著提出了一個更有趣的觀點，但是最終并未打動英國軍事占領當局。再教育想要獲得成功，就必須建立在民族傳統的基礎上。德國應該被當成白板一塊（tabula rasa）；應該讓德國人相信，“他們自己擁有這樣的傳統，在此之上可以誕生一個正直的社會。哪怕這種傳統現在已完全淡忘。曾幾何時，德國有歌德；年輕的梅瑞狄斯（Meredith）[[2]](#_2_Qiao_Zhi__Mei_Rui_Di_Si__1828)曾造訪該國，因為這是一個孕育了自由思想家的國度，它的大學影響了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3]](#_3_Zuo_Zhe_Zhu__Qiao_Zhi__Ban_Ke)這樣的美國人”。

對于那些渴望扔掉希特勒主義褐色外衣，披上印有歌德、康德和貝多芬大名的華美外套的德國人，伯利的觀點肯定大受歡迎。1945年，作為英國駐德軍事當局的教育顧問，伯利協助建立了多座圖書館，里面塞滿了適合人們閱讀的英德文學作品。此外他還創立了成人教育中心，取名為“橋梁”（Die Brücke），目的是增強英德兩國的知識文化交流。可惜的是，這一充滿希望的開端遭到了英國官員的反對。其中一些反對者的思路怪得離譜。有一派認為，只有“和其他國籍的人廣泛通婚”才能治愈德國人的頑疾。[2]另一位中等官階的狂熱分子建議把所有前納粹分子和他們家人都關在北海的一個小島上。伯利不無諷刺地回應道，那么他們在歐洲大陸上學念書的孩子也許會把納粹思想傳染給無辜的同學。同摩根韜的計劃一樣，這種想法很快告吹。

伯利復興德國文化精髓的計劃還受到了更為嚴苛的批評。批評者認為他在推廣英國文化精髓方面做得不夠。伯利的直接上司布萊恩·羅伯遜將軍（Brian Robertson）——這里順便提一句，他是在查特豪斯讀的小學——下令稱軍事當局在德國執行政策時應該得到更多保護，免于受到外界批評。拿另一位將軍的話來講，有必要進一步“弘揚英國文明”和推廣英國政策。[3]見此情形，伯利只好辭職回英國去了。

美占區當局一開始更傾向于懲罰，而不是教育德國人。他們把大半精力花在了清算有納粹嫌疑的老師身上，而不是重塑德國人的思維。一些在美流亡的德國人告誡美國官方，再教育是無濟于事的。小說家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就說過：“教育德國人幾乎是無望的，因為專業人士這一階層的大部分人都是納粹。”他的朋友、同樣大名鼎鼎的德國小說家利翁·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就確信：“三百萬納粹分子必須被逮捕，處決或流放去干苦力。”[4]更有甚者，說得好像教德國人向善跟向狒狒傳授文明一樣，無異癡人說夢。

盡管如此，《波茨坦公告》還是表明了盟軍的官方立場：“教育德國人的工作必須嚴格加以控制，這樣才能徹底消滅納粹和軍國主義方針，并使民主思想的成功發展成為可能。”[5]對于日本，波茨坦的舉措聽上去沒那么嚴苛，或者說至少沒那么高壓：“日本政府應當消除所有阻礙日本人民恢復和強化他們民主傾向的障礙。必須確立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及尊重基本人權等制度。”這兩段話在語氣上的差異很難解釋清楚，特別是考慮到占領期間所發生的事——日本所經歷的比德國要激烈得多。

然而，再教育德國人這一任務被認為比改造日本人簡單（順便說一句，伯利很討厭“再教育”這個說法，他傾向只說“教育”）。畢竟，德國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孕育了歌德和康德，德國人大多是基督徒。所以人們相信這個國家的底子還是好的，需要做的是摧毀納粹意識形態和“普魯士軍國主義”。去納粹化和去軍事化對解決德國問題將起到長遠的作用。為了實現這點，就必須播放諸如《納粹集中營》或者《死亡工廠》這樣的電影來強調德國人不久前所造的孽。前面一部是美軍委托拍攝的，后面一部在旁白中加入了下面一段話：

在加德雷根（Gardelegen）有一個典型的德國糧倉。1100人像趕牲口一樣被趕了進去，然后活活燒死。那些忍著劇痛逃出來的人剛一露頭就被亂槍打死。什么樣的畜生能干出這么喪盡天良的事來？[6]

這些電影在德國并不流行。德國人要么拒絕觀看，要么斥之為政治宣傳。1945年，17歲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黨衛隊裝甲師短暫服役后被美國人俘虜，關入戰俘營。一位“襯衫燙得筆挺”的美軍政工干部負責教育他和其余戰俘。他給德國人展示了攝于貝爾根——貝爾森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照片，照片里尸體堆積成山，一息尚存的囚犯皮包骨頭。德國人對此一概不信：“我們不斷重復同一句話：‘這是德國人干的？’‘不可能。’‘德國人干不出這種事情來。’我們中間有人說道：‘宣傳，這些不過都是宣傳。’”[7]

用意良好的美國官員還組織了小組討論，但通常一樣無果而終。傳授“我們美國人如何建設民主”的演講者雖然自己熱情高漲，但一來因為是用英語講的，并不總是能吸引足夠的聽眾，二來諸如“納粹國家”這種話題最后都因為德國人的逆反心理不了了之。德國人會說：我們并不知情，希特勒做過許多好事，等等。[8]每當君特·格拉斯所在戰俘營的教官給德國人講種族主義的危害時，戰俘們就會拋出美國國內“黑鬼”處境的問題，搞得他很尷尬。

隨著嚴冬日益臨近，饑民還要擔心其他問題。漢斯·哈貝（Hans Habe）是美籍匈牙利裔記者，美國人委托他在戰后的德國辦報。哈貝表示：“要求德國人往回看，質疑自己并作出懺悔的想法是征服者思想……讓德國人犯愁的只有如何填飽肚皮，如何讓爐子里有煤燒……”[9]哈貝是猶太人，在集中營呆過，他沒有理由對德國人抱有好感。

兩相比較，講授民主裨益并不一定更容易。《揚基人》刊登了一篇題為《再教育德國》的文章，作者在亞琛采訪了一位德國小學生，10歲的恩斯特。這是一次精彩的采訪。當被問及知不知道德軍戰敗了時，男孩回答：“美國人槍多，猶太人也多。”記者接著問：“有沒有人跟你說過民主是怎么回事？”男孩答道：“老師跟我們說過。”那么他對別人口中的民主一事有興趣么？男孩回答：“聽著沒唱歌有意思。”[10]

亞琛是查理曼帝國的舊都，地處歐洲的心臟地帶，這里也是德國再教育進程的發祥地。選擇亞琛并不是因為歷史感懷，而是其恰好是盟軍占領的第一座城市。轟炸過后，亞琛沒剩下幾座完好無損的學校。戰前這座城市有16萬人口，戰后只剩下1.4萬。該市85%的面積都被夷為平地。建于中世紀早期的大教堂十分漂亮，是查理曼大帝的陵寢所在地，令人稱奇的是，教堂竟然沒有毀于戰火。但是如今，按照《揚基人》的話來說：“扔炸彈的戰爭……變為了一場全新的思想戰爭。祛除德國年輕人身上的匪氣，將是一項吸引全世界矚目的實驗。”

作為美國軍事當局代表的少校約翰·布拉德福德（John P. Bradford）告訴亞琛市未被清算的德國官員，他們面前擺著一個大好機遇：“你們會被允許教育德國青年，改造他們，讓他們遠離卑劣的納粹主義。”[11]

再教育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是缺乏符合條件的老師；應征入伍的人要么已經戰死；要么還被困在前線，當了戰俘；要么因為他們的納粹身份而顏面掃地。詩人斯蒂芬·斯彭德詢問漢堡的一群小學生，他們在學校里都學些什么。孩子們回答，拉丁文和生物課。沒別的了？沒了，他們答道。“您看，歷史、地理、英語和數學老師都被趕走了。”[12]

另一個問題是教科書。大部分課本在轟炸中燒毀，剩下的通常非常不合適：有的贊美元首和他提出的“主宰者民族”，有的大談德國排猶在生物學上的必要性。就連納粹上臺前的教科書也包含推崇日耳曼尚武精神的故事，或者是歌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等名人的豐功偉績。但是由于實在沒什么教材，這些書也只好拿來充數。魏瑪時期的某本教科書還在倫敦重新刻了印刷版，送回德國亞琛一家古老報紙印刷廠里印刷成冊。

管理亞琛各所學校的主任卡爾·貝克博士（Karl Becker）滿懷信心地認為，向幼童灌輸他們的未來“和世界各地的人們休戚與共，而不是和一個‘強大德國’相關”這點認識十分容易。對于年齡較大的孩子，博士認為也許有必要“態度堅決”。然而，他申明即使“是在課堂里懲罰孩子，方式也應當民主。有時，個別小孩會在班里生事，我們會讓全班一起決定怎么處罰當事人最妥當”。貝克博士說他“除了極端情況外，反對體罰孩子”。[13]

博士很在意“用實實在在、勸人向善的事物取代納粹的誘惑”。作為天主教保守派的他認為復興基督教精神價值觀是解決問題的答案。許多德國人也相信這點，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未來西德大選里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總是一黨獨大。基民盟日后的黨魁、戰后首任德國總理（chancellor）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也是一位來自萊茵河畔的天主教徒。斯蒂芬·斯彭德曾在科隆市政廳內拜謁過后者。阿登納在希特勒上臺前曾擔任該市市長，1945年他再度當選。

透過阿登納辦公室的窗戶，斯彭德望向窗外，科隆的馬路上只剩下殘磚碎瓦。有些建筑的外墻依然屹立未倒，但這些只是“一層薄薄的面具，隱藏在后面的建筑物內部已經被掏空了，只留下潮濕、空洞和惡臭”。但是阿登納在采訪中強調了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破敗。“你不可能沒注意到，”他告訴斯彭德，“納粹把德國文化變得跟萊茵河和魯爾區的廢墟一樣平坦。十五年的納粹統治留給德國一片精神沙漠。”[14]所以眼下急需的不光是食物和燃料，還有更多的學校、書籍、電影、音樂和戲劇：“必須滿足人們的想象。”[15]

人們對文化饑渴這點千真萬確，但是背后的動機卻可能十分怪異。許多德國人不再讀書的一大原因是納粹的文學作品總體而言無聊透頂。現在，有些人說需要高雅文化，仿佛這是一種自我救贖。斯彭德在波恩邂逅了一位女士，“是人見人愛、盡心盡職的家庭婦女（hausfrau）中最裝腔作勢的那種”。她對人們追求大眾娛樂的浮夸品味很是不齒。她認為，在第三帝國的道德廢墟里，不應該有卡巴萊歌舞的位置，更別提爵士樂了。德國文化應該是嚴肅的，因為這是“德國人做盡壞事后，所能擁有的最小愿望”。德國人應該“被督促”只保留“好的”文化：“除了莫扎特、貝多芬、歌德的作品外，其他的應該一律被禁。”[16]阿登納不太可能像她這么苛刻。

也許，更好地詮釋人們文化饑渴的一件事是柏林戰后首次重新上演布萊希特（Brecht）的作品《三便士歌劇》（Three penny Opera）。這部劇在納粹時期自然在被禁之列。人們走上幾小時，來到美占區的赫貝爾劇院（Hebbel Theater），這是為數不多的幾座在戰爭期間幾乎毫發未傷的劇院之一。演出于下午4點開始，這么安排是為了讓觀眾在夜幕降臨、犯罪分子流竄街頭之前就能安全回家。該劇的首映式定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一天，但日期純屬巧合）。演員們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排練：滂沱大雨穿過屋頂傾瀉而下，演員餓著肚子，服裝失竊，道具損壞。

原抵抗主義戰士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坐在觀眾席里。“我感到奔涌的情感讓我無法喘息，”她在日記里寫道。“我們搞地下活動的日子里”聽到的歌，曾經在“許多絕望的時刻”提供了巨大的“慰藉和寬慰”。如今，人們能自由自在地聽這些歌了。但即使在這一溫暖人心的時刻，她依舊保留著對雜音和錯誤信念的敏感。布萊希特作品中的一段名言引得全場爆發出“暴風驟雨般的掌聲”：“先給我們吃的，然后再來談道德……”聽到這里，她一下子“從自我陶醉中”被震醒。這股自怨自艾的情緒讓她覺得受到了冒犯。“我們踐行言論自由的第一課難道是必須批評別人么？”[17]

\* \* \* \* \*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布萊希特高度政治化、充斥左翼道德主義的劇目是在蘇占區，而不是在美軍占領的柏林克洛伊茨貝格區（Kreuzberg）復演，也許會顯得更加合情合理。1949年后，布萊希特的確是在“民主”（共產主義）德國建起了自己的戲院，但他還是很審慎地保留著剛拿到手的奧地利護照。蘇聯也很熱衷于再教育德國人。事實上，比起他們的盎格魯——美利堅盟友，蘇聯人更重視文化。一位英國占領軍官員曾在電報上抱怨，說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自由和個人文化”沒法同蘇聯人的“政治化文化”相競爭。他表示，在蘇占區，“戲劇、圖書出版、藝術和音樂等活動一派繁榮，給人的印象是那里涌現出了一些富有新意而生機盎然的事情”。[18]

的確有事情發生。蘇聯官方開出特別俱樂部、額外食品配給和全面贊助藝術事業等條件，積極拉攏德國知識界的“民主”成員。“民主”文化的特點常常是德國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兩相結合的產物。作為德國文化主要旗手之一的約翰內斯·貝希爾（Johannes Becher），是馬克思主義詩人和蘇聯成立的文化聯盟（Kulturbund）主席。該機構全稱是德國民主復興文化協會。貝希爾跟英國教育家羅伯特·伯利見解相同，也認為只要“德國精神”是“進步的”，它就是復興的有利基礎。他和死在納粹監獄里的共產主義烈士不一樣，腦子里想的不是歌德。“反法西斯主義文藝”才是“真正的”德國文藝。

實際上，蘇軍政委眼里的進步文化范疇要狹窄和閉塞得多，所以貝希爾提出的藝術形式彈性太大了。蘇聯人很想在德國劇院里推廣俄國經典，比如契訶夫或果戈里的作品，以及現代蘇聯樣板劇。甚至連一些進步的德國劇作家，譬如弗里德里希·沃爾夫（Friedrich Wolf）——未來東德特務頭子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Wolf）的父親——的作品也行，前提條件是得按照蘇聯的套路編排。為此，蘇聯人傾向于把什么該有、什么該刪和怎么演等事宜明明白白地告訴德國作家和戲劇制作人。

蘇聯官方的一味堅持對于提升蘇占區里音樂、電影和戲劇表演的公眾吸引力也許只幫了倒忙。蘇聯人要求演出要配發宣傳冊，政治人物還要上臺長篇大論做一番介紹，解釋正確的政治路線。共產黨官員并未過多介紹《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等電影，但是即使娛樂方式極度匱乏，觀眾大都不信蘇聯人那套。甚至連德國統一社會黨（SED）黨員對蘇聯官方文化也提不起多大興趣。雖然約翰內斯·貝希爾是個無懈可擊的共產黨人，但蘇聯人從未真正信任過他。除了德國人的身份外，他也許過于“海納百川”了。而且從其過往經歷里能嗅出一絲危險的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4]](#_4_Tuo_Luo_Ci_Ji__1879__1940__Go)。1945年11月，波茨坦的一位蘇聯文化官員指責文化聯盟縱容“文學和藝術中的資產階級傾向；未來主義、印象主義等等”。[19]

東德社會生活和文化的另一面直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都是其一大特色：納粹官方論調咄咄逼人、夸大其詞的語氣幾乎是無縫對接地嫁接在了共產黨的辦事風格中——除此之外，還有踢正步、大會操和對閱兵式的癖好，與之相伴的常常是一大群人吼出震天響的口號，邊吼還邊向空中揮拳，以示對友誼與和平的贊美。除了觀看《三便士歌劇》的戰后首映外，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還參加了文化聯盟的成立儀式。她對沒完沒了的講話很是厭煩，并很快轉變為惡心。她在7月3日的日記里寫道：

八位在場的嘉賓都在大談坦誠面對過去、振興文化生活的意義，但幾乎沒有一位認識到，他們至今都沒怎么改變過自己的講話方式。還是那個老套路，動輒就是“最偉大的”、“最頂極的”、“最龐大的”、“最壯觀的”……前幾天，一位政客高呼‘我們正邁著堅定的步伐，投身為和平主義而戰的戰斗’，他也許絲毫沒意識到這么說話讓本來發自內心的熱情號召聽起來何其自相矛盾。學會少說些假、大、空的話也許不那么容易。[20]

\* \* \* \* \*

雖然總體而言美國文化比蘇聯人力推的文化娛樂性更強，但從西占區里最早發行的雜志上并不一定能得出這種印象。美國占領當局官員沒有把這項任務交給德國人，而是親力親為地為德國讀者辦起了自己的雜志。目標受眾為德國知識分子的月刊《美國觀察家》（The American Observer）在創刊號一期里收錄的文章既有關于人文精神和信仰的，也有關于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政治哲學的，此外還有一篇名為《田納西河谷之涅槃》的文章。《今日》（Heute）雜志則主要刊登記載納粹占領荷蘭的文章，還發表了《在集中營地獄的人們》和《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社區工作》這些特稿。[21]

借一位美國觀察家的話來說，德國讀者對這類刊物的接受度“十分有限”。[22]

另一方面，蘇聯人從一開始就批準信得過的“民主派”德國人發行自己的雜志，這一策略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第一份問世的刊物名為《重建》（Aufbau），摘錄了托馬斯·曼、保羅·瓦萊里（Paul Valéry）、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等大家的文章，此外還有檢討德國戰爭罪行的文章。雜志一經上市幾乎立刻售罄。

由于德國人已經有十多年沒看過好萊塢電影了，美國人特意挑選了32部故事片，借此推廣美式生活。撇開其寓意不談，影片上映后廣受歡迎。挑片子的人很注意避開美國社會的陰暗面，所以黑幫片并未在列。《亂世佳人》（1939）和《憤怒的葡萄》（1940）兩部作品也被認為太過負面。雖然片子稍有些過時，但德國人幾乎和同時期的許多西歐觀眾一樣看到了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的《淘金記》（1942），一睹《丹鳳還陽》（1937）里女主演狄安娜·德賓（Deanna Durbin）的芳容，欣賞了《伊利諾伊州的林肯》（1940）這部傳記電影，也觀摩了1944年的音樂劇《與我同行》。影片里，主演賓·克勞斯貝（Bing Crosby）飾演一名酷愛打高爾夫的牧師。

不過有些影片的入選引發了反彈，最后不得不下映，比如戰爭片《73艦隊潛艇戰》（1943）。主演漢弗萊·博加特（Humphrey Bogart）是一名海員，他所在的商船遭到了德國U型潛艇的攻擊。這部影片在不來梅的一座電影院上映時引發了嚴重的騷亂。片子講述的納粹暴行只是觀眾憤怒的一個原因；看到窮兇極惡的德國U型潛艇船員在海上用機槍掃射孤立無援的美國人，這種娛樂方式真叫人難以容忍。憤怒的德國海軍老兵試圖強迫別人跟他們一起離開電影院。

美國再教育德國人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英國人也有，只是程度略輕罷了——在于一對也許無法解決的矛盾，而且也的確未能解決；再教育的目的是教會德國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價值。然而，關于言論自由的訓誡卻是由幾乎擁有絕對權力的軍事當局給出的，其宣傳往往是心理戰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會毫不含糊地訴諸審查制度。當然了，文化和教育工作遠沒有納粹和日本戰時政權時期那般高壓，而且其內容很厚重，君特·格拉斯等過去效忠希特勒的小兵們沒有資格以此嘲笑美國人的種族主義。但是盟軍在被指責虛偽這點上確實存在軟肋。占領者甚至都不愿公映《亂世佳人》，或包容任何以負面眼光審視他們政策的看法和真實信息。因此，他們對民主的溢美之詞會顯得有些空洞。

8月31日，軍事占領德國被賦予了一種全新的正式地位。盡管德國仍被分割為不同的占領區，正式管理該國的則是美、蘇、英、法四國組成的盟國管制委員會。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對“不和諧的雜音”依舊聽得很清楚。她在日記里寫道：

現在我們至少知道是誰在管我們了。可為什么那么多報紙都在談論民主？民主的意思是人民當家做主。現在替我們做主的卻是管制委員會。我們應該提防濫用這個褒義詞（民主）。[23]

美國派出的圖書查禁團隊把美占區里所有書店和圖書館翻了個底朝天。他們帶走的不全是納粹的著作。如果膾炙人口的游記把美國人或德國人以外的歐洲人描繪成“沒有教養”或“退化墮落”的人，也會被算作禁書。除此之外，類似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的作者）和歷史學家海因里希·馮·特來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等作者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馮·特來切克倒的確是個十足的普魯士民族主義者，但是他早在1896年就去世了，那時希特勒還是無名小卒。斯賓格勒最初對納粹抱有同情，但在1936年去世前和該黨分道揚鑣。他的一部分作品不僅被納粹列為禁書，而且在美國人這里也被打入冷宮，這讓他很是特別。

在圖書、電影等娛樂形態中禁止納粹宣傳只是最基本的工作。信息管理部的官員還參與了新聞鉗制。1945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記者朱利安·巴赫都待在德國各地，觀察這些官員的舉止。他以十分犀利且不無荒謬的筆觸描繪了他們的態度。官員們推測，德國人在納粹時期被系統性地剝奪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聯想到集中營里解放的囚犯，他們雖然饑腸轆轆，但胃已經萎縮，不能喂太多吃的，同樣的道理，萎縮的心智也不能接受過于豐富的信息。拿巴赫的話來說：“據負責治療德國人心智的美國‘精神科醫生’稱，只能一點點地滿足德國人對新聞和新思想的胃口。”[24]但是大多數醫生對德國歷史、文化或社會知之寥寥，這對他們估算“用藥”劑量無疑沒有幫助。

剛開始，德國人唯一能讀到的報紙是由占領當局的軍官編寫的。即使只有這一點點，也是一時紙貴。這些新聞紙在黑市的售價比原價翻了20倍。當科隆街頭出現第一份報紙時，人們一擁而上瘋搶的場面讓就在附近的一位美軍上校很是緊張，覺得有必要拔槍自衛。跟納粹的新聞機構不同，就算是占領者辦的報紙，聞起來一定也洋溢著自由的氣息。在英美占領區，所謂的“美國之家”和“英國中心”遍地開花，陳列著美英兩國的圖書和期刊，供人閱讀。這在當時和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造福了許多人。

但對于西方盟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縱使笨手笨腳的軍隊審查官費盡全力想要扼殺批評，但宣揚民主和言論自由價值，以及鼓勵重組德國政黨的做法還是為盟軍招來了批評之聲，特別是對軍事占領及其政策的臧否。社民黨人對美國支持自由經濟、而非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政策很是惱火。但在艾德禮的社會黨政府代表管理下的英占區，情況則往往相反；德國保守派對占領者計劃的“布爾什維克式”經濟表示抗議。基督教民主黨的批評聲中有時隱藏著別有用心的弦外之音。在隸屬美占區的黑森州（Hessen），某位演講者在一次青年集會上警告說去納粹化會導致德國“走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穿著盟軍制服的移民”（換句話說，也就是猶太人）被認為是導致這一不幸趨勢的罪魁禍首。

\* \* \* \* \*

如果說美國是學習的楷模，美國文化——從賓·克勞斯貝的音樂劇到好彩香煙，從搖擺樂到口香糖——在戰后發揮了支配性影響力的話，那么不少德國人對此都抱有一種矛盾心理。在當時，美國文化領導論和基督教保守派廣泛接受的觀點相左，后者認為宗教和經典德國文化（Kultur）才是通向精神復興和救贖的唯一途徑。對美國文化的懷疑具有保守主義背景，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已存在。長久以來，美國文化因為其流行魅力似乎對知識分子定義和推廣的傳統價值觀構成了威脅。這也引起了部分左派知識分子的不安，比如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特奧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他在戰時流亡美國，曾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視角激烈抨擊過爵士樂和其他風靡的美國藝術形式。在他眼里，爵士樂是所謂“文化產業”的一環，是資本主義通過商業化娛樂給大眾灌迷魂湯，從而操縱他們的一種陰謀。

持類似觀點的不止德國人。1945年夏，在成為英國藝術委員會首任主席后，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言簡意賅地在一檔電臺節目里闡述了他的目標。他大聲疾呼：“打倒好萊塢！”說這話的時候，英國人正同德國人、荷蘭人等歐洲人一樣，不斷涌向電影院，觀看美國大片。在聯美影片公司（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表達抗議后，凱恩斯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懇請聯美公司原諒他的“一時糊涂”。他本來想說的其實是各國應該“發展擁有自己特色的東西……”他真正的意思是：“讓好萊塢的歸好萊塢。”[25]

凱恩斯有點言不由衷，他對“好萊塢”的鄙夷在許多歐洲知識分子身上都有，但他們也無法抑制對新大陸文化的興奮之情。1945年春的一期《地平線》雜志刊發了一篇文章，作者西里爾·康納利提出一個問題：歐洲文化復興將在何處發源？他認為，世界急需“一種積極而成熟的人文主義”。美國能提供么？經過全面考慮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美國“銅臭味太濃，是個干巴巴的機器社會”。不行，文化復興的發源地只能是他熱愛的法國。只有法國“有能力重現一場不流血的1789年大革命，并且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一條古老的真理，人應該要活得精彩，而自由是這一生活的自然溫度……”

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巴黎是對抗“好萊塢”流弊的一種象征。巴黎有著花神咖啡屋（Café de Flore），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曾在此進行哲學思辨；巴黎是抵抗運動文學刊物的誕生地，是青年男女實現性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樂園。人們對法國的這種期待一直蔓延至日本。比起德國，日本對美國文化的接受程度更大，也更深入。1946年，日本的十大暢銷書中有三本是外國作品的譯本：薩特的《惡心》（Nausée）、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的《架空會見記》（Intervues Imaginaires）和艾里克·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26]在柏林，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留意到年輕人在戰后流行起了戴法式貝雷帽：“凡是覺得自己有話要講的人都會戴一頂貝雷帽。”在日本，知識分子中間崇尚法國文化的這股熱潮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

當然，法國文化熱從來就是陽春白雪，無法普及。另外，許多法國人對美國的癡迷程度，也絲毫不亞于來自五湖四海、其他國家的人，甚至連薩特也算在內。1944年11月，一干法國記者受邀訪問美國，以深入了解美國的戰時運作情況，薩特也在受邀名單上。據西蒙娜·德·波伏娃回憶，她“從沒見過薩特如此亢奮”。波伏娃在回憶錄里對美國的魅力有所論及，她的話代表了全世界千千萬萬人的心聲：

美國，真是內涵萬千！先說說我們看不懂的東西吧；美國的爵士樂，電影和文學滋養了我們的青年，但美國對我們一直就是個巨大的謎……美國還給我們帶來解放，她是冉冉上升的未來；她物資豐饒、有著無限可能；她是盞瘋狂的神燈，能照映出傳奇般的畫面；只要一想到能親眼看到這些畫面，就讓人頭暈目眩。我興奮異常，不光是為薩特感到開心，也為我自己，因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定會追隨他，在這條康莊大道上走下去。[27]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文人鮑里斯·維昂（Boris Vian）和他的“薩蘇”（zazous）樂隊，他們裝出一副英美范兒，搞狂歡，辦派對，閱讀非法影印的海明威和福克納的作品，借此表達對戰時面目可憎的貝當主義的反叛。法國有“薩蘇”，德國則有自己的“搖擺青年”（Swingjugend），后者表達對納粹嗤之以鼻的做法是，在私人寓所里伴著被封殺的爵士樂翩翩起舞，這么做的風險要大得多。1944年春天過后，維昂和“薩蘇”樂隊穿著多出來的美國牛仔褲和格子襯衫，演奏和播放的曲目沒有別的，除了爵士還是爵士。

在見識過某物的真容后，伴隨而來的通常是幻滅。據波伏娃記錄，薩特從美國回來后，“對所見所聞有些回不過神來”。他挺喜歡美國人，對羅斯福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拿波伏娃的話來說，“除了經濟體制、種族主義和隔離政策，西半球的文明中還有許多讓他震驚的東西——美國人的隨大流，價值尺度，蒙昧觀念，樂觀主義精神，以及對任何悲慘事件唯恐避之不及的態度……”[28]

正因如此，許多人，特別是法國人自己，把法國看成是能在文化上和美國分庭抗禮的不二選擇，也就順理成章了。和美國一樣，法蘭西共和國也誕生于一場擁有普世主義抱負的革命；法國是經過啟蒙洗禮的文明，其果實不僅可以，也應當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美國人對自己國家和其在世界上的任務抱有類似看法。這點在1945年毋庸置疑，那時的美國比法國更有資格宣揚其價值觀，甚至時而強加給別人。19世紀早期則不同，拿破侖通過武力傳播法國的普世主義，在德國土地上尤其如此。德國人對此的回應是醞釀了浪漫民族主義，一種捍衛“鮮血和祖國”的意識。這一思潮后來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把第三帝國推向前臺。

雖然美國人起初一心只想進行懲罰，但1945年的美式再教育工作是一項較為溫和的進程。盡管德國人對此不能說一絲疑慮和恨意都沒有，但這也許是他們為什么比法國人更容易接受美國人主宰20世紀的原因之一。多數德國人清楚他們對斯拉夫國家的所作所為，遑論對猶太人的暴行，因此對美國人能如此善待他們由衷地感到欣慰。在英、美占區，日子當然要比在蘇占區舒服，甚至在剛開始的時候，比靠近德法邊境、位于萊茵河腹地、面積小得多的法占區也要好。法占區里的主要城市是風光秀麗的溫泉勝地巴登——巴登，如今客流斷了，沒人前來療養。法國是否該有屬于自己的占領區，這點起初并不明朗。美國表示反對，因為撇開戴高樂將軍和他的自由法國軍隊不談（羅斯福向來不信任戴高樂），法國在打敗納粹德國一事上幾乎沒有發揮過什么重要作用。盡管如此，戴高樂的意愿一如既往地占了上風。法國的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國人都渴望報復，能從德國搶多少東西，就搶多少東西。

在軍事占領的第一個年頭，這點體現得尤為明顯。在此期間，法國人表現得比美國人和英國人更像征服者。部隊有時軍紀渙散；煤礦等自然資源被運往法國。法國人還計劃吞并德國部分領土，具體而言是工業重鎮萊茵河地區、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以及盛產煤礦的薩爾州（Saarland），不過計劃最終流產。由于得不到其他盟國的支持，法國人只得放棄這些方案。一些法國將領也表示反對，擔心這么做會再度激起德國人的報復心理，正是這點燃了剛剛才熄滅的戰火。

但是素來懷有“教化文明使命”理想的法國人對文化很重視，特別是體現在輸出法國文化、教化德國人這點上。而且還不光是德國人。法國方面在其他盟國占領區里也大力推廣法國藝術展、法國作曲家作品的音樂會，乃至法國電影和文學。用法國文化部長勒內·蒂莫尼耶（René Thimonnier）的話說，這么做是為了顯示“在文化價值秩序中，法國依舊是一個大國，也許是最偉大的大國”。[29]

在去納粹化這項工作上，法國人和美國人的做法沒啥兩樣：把有納粹前科的教師等群體掃地出門，禁止圖書館收藏某些書籍，審查德國報紙和廣播節目內容，哪怕作者是法國人手下值得信賴的德國記者。在巴登——巴登，受托篩查當代德國文學作品的人里包括小說家阿爾弗雷德·德布林，他在1930年代加入了法國籍。在閱讀寫于戰后不久的德國散文時，他對字里行間的朦朧性、神秘主義傾向和知識分子的迷茫大為詫異。他據此推測，德國人“沒讀過什么書，也沒吸取啥教訓”。德國的土壤最初“只能長出青草和雜草來”。[30]

跟信息管理部的美國同行一樣，法國官員也認為1945年時的德國人還沒充分準備好接受政治思想。法國人的看法是媒體應該專注于報道日常生活和文化事務中出現的問題，關注類似“當代法國陶瓷”或“法國繪畫”這樣的話題。這么做是為了將對第三帝國以外現代藝術發展一無所知的德國人重新帶進文明世界。文明世界的中心當然是歐洲，而巴黎則是當仁不讓的文化首都。

除了恢復法國人的自尊心（amour propre）外，這么做還有一層政治意義。雖然法國無法兼并萊茵河沿岸的德法邊境領土，那里即將出現更為深刻的變化。該地區豐富的煤鋼儲備會被置于一個泛歐主義機構的管理下，并惠及德國、法國和歐洲煤鋼共同體其余成員國。該組織1951年成立于巴黎。法占區是未來歐盟的誕生地，分享主權這一倡議是由法國提出的，始作俑者是法國政治家羅貝爾·舒曼（Robert Schuman）。舒曼出生于盧森堡，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德國人。同意與法國共享德國最富裕地區主權的西德首相，正是原科隆市長，康拉德·阿登納。

德國在1945年幸運地被盟國分而治之這種說法，對不得不忍受四十年共產主義專制的人來講很殘忍。但是就德國的聯邦屬性而言，這一分裂狀態也許再合適不過了。盟軍占領者從未統一德國教育，或鏟平地區間的文化政治區別。德國人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再教育，這點存在疑問。盟軍最大的成就也許是在他們離開西德時，并沒有收獲仇恨。改造昔日敵人的想法或許有些居高臨下，但這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政策更能拉攏人心，也不那么危險。盟軍所做的是把過去的敵人攙扶起來，或許一部分德國人并不配享受這種待遇，但這總比把這個國家榨干要好。這一次，不會再有“背后捅別人一刀”的傳說，也不會有武裝亡命徒想要為他們戰敗的國家一雪前恥。不過，真正塑造德國未來的，不是文化、教育、司法，甚至也不是全民道德，而是政治局勢、冷戰、在歐洲建立強大民主國家的需要、德國精英的投機主義、美國的利益，以及羅貝爾·舒曼口中“讓戰爭（在歐洲）變得不可能”和“促進世界和平”的烏托邦計劃。

就提升法國的軍事和政治影響力而言，占領萊茵河沿岸也許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但這有助于彌合歐洲最血腥的一道裂痕。一個團結的歐洲不僅是德法兩國，而且是基督教民主黨的夢想。戴高樂雖然對此高度懷疑，但還是將其比作“重啟查理曼大帝的事業”。[31]德國的社民黨和法國的共產黨都表示反對，戴高樂也反對，因為他認為彼時的法國還沒有強大到能在聯盟中獨領風騷的程度。也許將軍生氣是因為那時他并不在位。1945年，戴高樂在讓·莫奈的鼓動下，其實公開表態過支持將魯爾區和薩爾州并入一個歐洲聯邦（他對英國是否該參與其中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管眼下麻煩纏身的歐盟將來如何，當年的團結夢想在讓德國重新回到歐洲大家庭懷抱這件事上，比所有再教育項目加在一起都管用。

\* \* \* \* \*

1945年12月15日，《周六晚報》刊登了一篇有關日本軍事占領的文章，標題不同尋常——現在看來不同尋常，當時則并不稀奇。標題是這樣寫的：《美國大兵正在教化日本鬼子》，作者是威廉·沃登（William L. Worden）。新聞電頭一欄寫的是發自東京，由轟炸機寄出的航空信。

電頭上方是沃登一文的概要：“當日本佬還等別人教他們如何思考，而他們狡猾的同胞卻回避這項工作時，美國兵以活生生的例子證實了其有效性。”

再往下讀，讀者得到的信息是“普通日本人和野蠻人沒多大區別——戰爭證實了這點”。

但希望還是存在的，因為“眼下向日本人傳授民主和文明之道的人群中，最有辦法的似乎是美國大兵，盡管其更拿手的是教訓日本人”。

“日本鬼子”是野蠻人的形象在戰時深入人心。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兩枚原子彈導致20萬人死亡，事后，杜魯門總統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對付畜生就要用畜生的辦法。”[32]

軍事占領的非凡之處在于，類似的想法很快就煙消云散了。這倒不是說再教育日本人，讓他們變成熱愛和平的民主主義者這一思路沒有遭到過巨大質疑。美國國務院里的日本文化和社會專家統稱為“日本通”，他們迅速指出傳統日本生活具有自上而下的集體主義這一特點。據稱，日本人從來不會表現得像獨立的個體，而是習慣于接受地位更高的人發號施令。天皇具有神圣的地位，備受人民愛戴。用某位“日本通”[[5]](#_5_Zuo_Zhe_Zhu__Ci_Jun_De_Shou_X)的話來說，他的臣民“既遲鈍麻木，又墨守成規”。據東京占領區的英國代表所言，“在現代世界里”，日本人“同任何非洲部落一樣，不適合搞自治，不同的是他們要比后者危險得多”。[33]

“知日派”關于日本人性格的那套理論往往源于從相識的日本精英那里聽來的說法。與“日本通”抗衡的是“中國通”，這批人多是同情左派的人士，以及原羅斯福政府內的新政派。這些官員的想法占了上風，至少在占領最初幾年是這樣。8月11日迎來了關鍵性時刻。這一天，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這位“知日派”中的祖師爺、前駐日大使、副國務卿被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撤了職。9月，艾奇遜聲明“滋生戰爭思想的日本現有社會和經濟體制將被改變，戰爭思想將因此無法延續”。[34]

麥克阿瑟將軍篤信宗教，他在戰時有關“東方思想”的一套理論往往十分粗鄙，比如說，他認為東方人的思維既幼稚又殘忍。他相信，改造日本人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使命。在執行這項使命的過程中，他常說自己得到了華盛頓、林肯和耶穌基督的引導。理想情況下，日本人應該皈依基督教。但是不論如何——這里麥克阿瑟和康拉德·阿登納想到了一塊兒——復興既應該是精神上的，也應該包括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復興。不過，麥克阿瑟走得可比這位德國基督教民主派遠多了。他說過，對日本的占領將觸發“一場精神革命……一場在全世界社會史上絕無僅有的大震動”。[35]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訪問東京期間，出人意料地管麥克阿瑟叫“圣保羅再世”。[36]然而，這位美國欽差大臣對探索日本文化，或了解這個國度并無興趣。他的夜晚大都是在家里看牛仔片度過的。麥克阿瑟的翻譯佛比安·包爾斯（Faubion Bowers）日后回憶道，在將軍長達五年的駐日時間里，“只有16個日本人跟他說話超過兩次的。所有這些人里，沒有一個人的頭銜是首相、大法官或最大大學的校長”。[37]

跟德國不同的是，日本沒有被盟國分而治之（蘇聯人本想將北方島嶼北海道占為己有，但在美國人說不后也沒大動干戈）。占領日本是美國人的一出戲，而作為盟軍最高司令官的麥克阿瑟，則擁有幾乎至高無上的權威。但是，盡管他統領著一個民選的日本政府，真正治理國家的還是日本人。對于美國為什么更熱衷于再教育日本人，而不是德國人，有幾點可能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德國的經驗為日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基礎。在德國，由于盟友的阻撓，或由于德國人的頑固不化或地區差異，再教育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但在日本，一切都是美國說了算，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于最高司令官閣下把日本人看成是幼稚的野蠻人，頭腦簡單，可以改造。他們既不是基督教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就日本人的思維狀態來看，還真像是零年。

考慮到太平洋戰爭的慘烈程度，以及日美雙方大打宣傳戰時的無所不用其極，日本人居然肯心甘情愿拜美國人為師，著實讓人訝異。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朝鮮戰場上的麥克阿瑟抗命，撤了他的職。麥克阿瑟離開日本時，日本人畢恭畢敬地為他送行，這樣的場面很難想象會出現在德國。日本人還立法授予麥克阿瑟日本榮譽公民的頭銜。甚至還有人打算在東京灣為最高長官建一座生祠。十幾萬日本人在通往機場的路上，夾道歡送恩人，許多人熱淚盈眶，對著麥克阿瑟的豪華座駕大聲道謝。日本的一份大報甚至在社論里感嘆道：“噢，麥克阿瑟將軍——將軍，將軍，是您，把日本從彷徨和饑餓中拯救出來。”[38]

下面這封信，是一位有著強烈共產主義傾向的日本律師寫給最高司令官的：“為了日本人民的未來，（占領當局的領導們）帶來了自由、平等和仁愛的和平曙光。在他們的大力協助和認真指揮下，日本人建設了一個民主國家……為了展示對這一豐功偉績的感激之情，我們將舉行一場群眾集會，歡迎占領軍。”[39]這封信寫于11月，距離廣島和長崎被炸只過去三個月。

解讀日本人行為的一種方法是將其看成典型的東方式溜須拍馬，既不真誠，也以自我為中心，而且很契合長久以來奉迎強大統治者的傳統。也許這層因素在起作用，但其遠未反映出歷史的全貌。我相信，這種感激之情大體上是真誠的。由于有從被征服國家搶來的戰利品，多數德國（非猶太血統）平民直到戰爭最后階段還過著不錯的生活。跟德國人比起來，日本人就要慘多了。他們的城市多半陷入火海——這點德國也一樣——但日本人已經連著幾年靠吃不飽的食品配給勉強度日了，除此之外還要受日本軍方和憲兵欺負，他們盛氣凌人的勁兒恐怕比德國國內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1945年，不少德國人依舊對元首抱有好感，但是很少有日本人還會為軍國體制說好話，因為它帶給他們的只有痛苦。

因此，當如此富有、高大且普遍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美國人踏上日本領土時，他們的確被看成是解放者，許多日本人也準備好了學習怎么變得自由自在和不拘一格。這不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決定向一個外部大國學習。中國在幾個世紀里曾經是日本學習的楷模，直到19世紀下半葉，歐美才成了效仿的典范。從某種角度來看，20世紀激進的日本民族主義是對一輪浩浩蕩蕩的西方化趨勢的回應——西方化意味著經濟自由主義、大眾傳媒、好萊塢電影、政黨、馬克思主義、個人主義、棒球、爵士樂等等新興事物。經過二戰的浩劫，多數日本人都渴望回到現代性的軌道上來。他們把現代性和西方世界聯系起來，到了1945年以后則主要和美國聯系起來。

這一進程是否真能叫再教育則值得商榷。但新主人和手下不少學生顯然就是這么認為的。至于怎么“重塑”日本則是個問題。“日本通”覺得這個想法很荒唐，況且，最想把再教育日本的工作捏在手里的官員恰恰對這個國家及其歷史沒什么了解。在他們眼里，類似德國的去納粹化在日本行不通，也沒法從一個成熟文明身上剝去新近附著在其表層的有害意識形態，因為日本沒有成熟的文明。改革派認為日本文化爛到骨子里了。

然而，不同于“知日派”，皇宮和官僚體制內一批老的日本精英并不覺得有必要全盤推倒重來。比較符合他們心意的是小規模且循序漸進的改革。但對于查爾斯·凱茲上校和最高司令官周圍的其他新政派而言，這些改革的力度遠遠不夠。凱茲說過：“（日本領導人）盤算的是挑出一棵有病蟲害的樹，修剪樹杈……我們覺得，要除去病害，不僅要砍掉樹杈，還要連根拔起。”[40]

要肅清日本的“封建”文化，不能只是扯掉日本的旭日旗（被美國大兵稱為“肉丸”），取締贊美日本軍事實力的音樂或演出，禁止日本擁有武裝力量，或者起草一份讓日本放棄戰爭的新憲法，因為這些都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這些手段在人們眼中必不可少；1945年，起草和平憲法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是誰奇思妙想、出此計策的尚無定論，有人說是幣原喜重郎。1945年，他時任日本首相，長期以來崇尚和平主義。是他，建議麥克阿瑟出臺和平憲法。“封建”的家庭法律被廢止，女性權利得到了保障。這種變化讓管理日本的精英很不安，甚至連立場相對自由的政客也看不下去了，比如前外相重光葵就在日記里寫道：“占領軍所制定的方針，跟單純遵守《波茨坦公告》一比，已經大變樣了……他們提出的是自上而下改造日本。”[41]

他說得沒錯；改革者一開始就是這么做的。所有被認為“封建”的日本傳統和慣例都必須斬草除根。每當看到日本婦女在公共場合為孩子哺乳，美國大兵或平民都會立刻出面予以制止；制作傳統劇的木劍道具被沒收了；講述武士英雄故事的歌舞伎演出被取締了。日后成為歌舞伎研究領域大家的厄爾·恩斯特（Earl Ernst）一天晚上走進東京的帝國劇場，叫停了正在上演的《寺子屋》。這是18世紀一部著名劇目里的一出戲，講的是一位昔日的武士領主被勒令殺子獻祭，出于對大名的忠誠，曾經的家臣殺了自己的兒子頂替。這類“野蠻”的戲碼是不可容忍的。為了熏陶日本大眾，戲劇公司應美國人的要求，推出了一臺吉爾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作品，《日本天皇》（Mikado）。然而，日本公眾并未受到熏陶，反而明顯感到不知所措。

任何事物哪怕跟“封建主義”只沾上一點邊，就會面臨被取締的命運。甚至在遠古自然崇拜的神道教里具有神圣地位的富士山，其形象也被禁止出現在電影、藝術作品和公共澡堂的磚墻上。澡堂里的富士山裝飾畫很常見。自19世紀以降，神道教被實實在在地改造為某種國教，鼓動天皇崇拜，宣揚日本民族獨一無二，具有神圣血統，因而注定要統治亞洲的劣等人。禁止將神道教列為國教倒不失為一個好主意。12月15日的最高長官政令申明：

本政令旨在實現政教分離，防止出于政治目的濫用宗教，并確保所有宗教、信仰和信條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享有完全同等的機會和保護。[42]

命令裕仁天皇在電臺里宣布他跟所有人一樣只是一介凡人，也不像是一步昏招。但天皇玉音的真正內容是他和日本人民的聯系并不“建立在天皇乃天神下凡這一錯誤概念上”。這讓美國人很滿意。多數日本人對天皇的聲明絲毫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們從來不懷疑他身上除了神性還有人性。但他們將裕仁看成是天照大神降臨人間的統治者，這點天皇本人也從未否認。總而言之，極少數日本人似乎對此真的在意。真正沮喪的只有極端民族主義者，而且一直耿耿于懷，他們辯稱神道教代表了日本文化的精髓，跟其他宗教不能一視同仁。

有些文化再教育工作只能讓人生厭，而且往往曇花一現，比如取締歌舞伎演出或刀光劍影的武打片。有些做法太過荒誕不經，以至誘人發笑。比如有個管轄農村地區的美國兵，以為教日本人跳方塊舞就能陶冶他們的民主精神。但在一些事情上，美國人或許走得太遠了，就連相對順從的日本人也受不了了。舉例而言，一支美國教育使團曾詳細研究過是否可以廢除日語里的漢字，將日語書寫體系全盤西化，繼而還推薦做這樣的探索。方案無果而終。另一方面，日本的教育體制經過了大刀闊斧的改造，這和德國的情況不太一樣。只吸納單一性別學生的精英學校讓位給男女同校、綜合性的教育體系，學制是小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位于日本中部、離京都不遠的近江可算是日本的亞琛。1945年秋，一支美軍巡邏隊決定檢查當地的一所小學。一看到美國兵，學生們便嚇得尖叫起來。當被問到他們“喜不喜歡美國人”的時候，學生們都使勁地搖頭。學校的教室里依然掛著戰時海報，上面的日本兵擺著英勇威猛的造型。該校的某位老師是退役軍官。美國人還在一張寫字臺的抽屜里找到了一頂血跡斑斑的水兵帽。這些情況都不可容忍，于是美軍命校長開除退伍軍官，并保證所有跟戰爭有關的東西都被清理干凈。

六個月后，同一批美國人中有幾個乘著吉普車，再度造訪學校。這次，孩子們看起來沒那么害怕了。一名軍官吹起了口哨，曲子是《史瓦尼河》。讓美國人興奮異常的是，孩子們居然用日語跟他一起唱起來，接著還唱了《友誼地久天長》和《杯酒高歌》。同樣讓軍官們欣慰的是，他們發現教科書經過了妥善的修改；所有提及戰爭、日本尚武歷史及天皇等話題的“封建”段落都用油墨涂黑了。充滿善意的校長用英語發言，他保證道，所有戰時海報都會一把火燒了，另外還要再開除幾名老師，其中三人當過兵。[43]

縱然許多日本人對美國勝利者相對和善的表現感到如釋重負，對強塞給他們政治精英的民主改革也感激涕零，但他們心中對美式再教育還是有著五味雜陳的感覺。《朝日新聞》曾刊登過一封初中生的來信，內容甚是精彩，恰到好處地展現出日本年輕人對他們父輩立場180度大轉彎的共同看法：就在一天前，他們還被教導要崇拜天皇，支持亞洲的圣戰，可是才過了一天，同一批老師卻教他們譴責日本封建主義，支持“德謨克拉西”。

這名學生在信的開頭寫道：許多大人很擔心，因為孩子們在軍國主義的熏陶下長大，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會不會很困難。但實際上，近幾年的親身經歷讓青少年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了。他們只知道，日本一直在打仗。和平就像“脫離黑暗，步入讓人頭暈目眩的陽光下”。他們之前所學的任何知識都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謬論：“你讓他們如何再信任領導人，甚至大人呢？”真正讓人擔心的倒是成年人，因為他們對剛過去的事情仍然很彷徨，內心充滿矛盾，要擺脫軍國主義思想顯然更難。[44]

這個孩子的話代表了日本近代史上最熱心于政治的一代人的心聲。這代人中大多都是左派，且都對日本原來的體制派充滿了不信任感。美國人來日本是來傳授自由、和平主義和民主等學問的，但一到冷戰，還是這批美國人，卻支持起了過去的體制派，這讓人們深深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要知道，體制派里不少人還背負著戰爭留下的血債。1960年，首相岸信介——戰時日本的阿爾伯特·施佩爾——批準通過了《美日安保協定》，日本就此淪為美軍在亞洲的永久性軍事基地。一些與《朝日新聞》投稿者意氣相投的日本人涌向東京街頭，抗議日本間接卷入越南戰爭。締結協定的好處多多，但似乎讓人聯想起日本過去在亞洲的戰爭。日本左派對日本為虎作倀，協助美“帝國主義”很是惱怒；而右派對不得不遵守“美國人”制定的和平憲法也不買賬。話雖如此，兩派還是存在共同點。在雙方看來，美國占領似乎從來沒有結束過。

一些人覺得外國征服者的饋贈“德謨克拉西”來得有點不費吹灰之力。漫畫家加藤悅郎曾有一副著名的作品，畫的是一群興高采烈的日本人，把手伸向空中，當中還不乏頭戴軍帽的人。掛著金屬罐的降落傘從天而降，罐體上寫著“民主革命”的字樣。[45]那場面就好像天賜甘露一樣。有些東西人們本該自己去爭取，現在得來全不費工夫，這有些丟臉。

美國人這么做有時是存心羞辱，但矛頭并不直接對準普通日本人。美國占領時期最具符號意義的一張照片攝于1945年9月，起因是裕仁天皇來到麥克阿瑟將軍的官邸，拜謁最高長官（其實更像是下級覲見上級）。44歲的天皇身著全套禮服，在眾目睽睽之下直挺挺地站著。跟65歲的最高長官相比，他只是個毛頭小伙兒。身旁的麥克阿瑟個頭高大，神態故作隨意，讓他顯得不怒自威：卡其襯衫領口敞開，雙手自然地背在身后。

所有大報都刊登了這張照片。因為照片明顯帶有冒犯君主之意（lèse-majesté），日本政府閱后大為震驚，立即禁止報章繼續轉載。翌日，麥克阿瑟宣布這一禁令作廢，并下令出臺新措施，保障出版自由。這并不是說美國人查禁起新聞來就不像在德國那么起勁了，他們勁頭不減。比方說，人們不準談論廣島，同樣遭到封殺的還有關于美國的負面報道，或對最高長官當局的批評之聲。（1946年，一部名為《日本的悲劇》的日本電影甚至因為對天皇在戰時的角色過于苛責而被列為禁片。畢竟，麥克阿瑟已經免除了他的所有罪責。）

但退一萬步來講，民主也絕非一句空話。隨著降落傘從天而降的金屬罐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革命性變化。不過，當時最有見地、最真誠的作家高見順就辛辣地指出，有種恥辱感依然縈繞在心頭，揮之不去。他在9月30日的日記里寫道：

當我想到本該由人民自己的政府賦予的自由無處可尋，只能由外國軍隊開先河似地施舍給我們時……我心中就不免涌起羞恥感。因為愛日本，所以感到羞恥，為日本羞恥。[46]

這種情緒可以理解，但是諸如此類的論調略有些誤導性。關于占領有很多大話，有一句至今還能聽到，大意是美國人一手鑄就了日本的現代國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國人的循循善誘，日本在戰敗后只用了一到兩年時間便從“封建主義”一舉轉型為民主國家。事實上，早在19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了民主制度，只是其存在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國不過是在戰后的日本和西德創造了恰當的條件，使這些制度得以恢復，根基更為穩固。這一過程并不總是自然而然的。日本政客和官僚往往都是在受到外壓后，才著手推行大快人心的改革。然而，讓美國人和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完全由美國人一手打造的某樣產物既會成為戰后日本身份認同的基石，也成為一種負累。

雖然日本憲法第九條直到1946年才被收錄進來，因此不在本書討論范圍，但在這里依舊值得花些筆墨進行引述，因為其比任何事物都更能表現1945年的理想主義：

1.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2.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1953年，理查德·尼克松作為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造訪日本，他發言稱憲法第九條是個錯誤，這一表態讓日本人嚇了一跳。日本人沒有理由不修憲，美國不會反對，美國甚至還希望日本成為一個強大的盟國，對抗共產主義，云云。但多數日本人都不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他們拒絕修憲，是因為對憲法充滿了自豪。和平主義讓一個曾經在歷次血腥戰爭中屠戮了上百萬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擁有了一種嶄新的道德目標意識，甚至是道德優越感。日本會帶領世界進入一個和平的新時代。在日本人眼里，倒是美國人，因為拒絕拋棄打仗傳統應該受到譴責。他們先是在朝鮮和越南動武，后來還攻打了伊拉克和阿富汗。

這一認識多多少少是戰后五十年內日本社會輿論的基調。但是和平主義是有代價的。理想主義和現實很快便會分道揚鑣，而日本人也違背了憲法的規定，成立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一開始美其名曰警察部隊，后來則更名為日本自衛隊。這種改弦更張不僅虛偽，而且未能解決一個讓日本左右兩派都怨聲載道的問題。日本的安全仍然依賴美國；和平主義是靠昔日征服者提供的核保護傘才取得的。東亞從未出現過類似北約或歐盟的組織，可以讓日本同其鄰國建立信任，為自己重新定位。

多數日本人依然堅定不移地支持憲法第九條，反觀民族主義右派則對其強烈敵視。另外，這一法條還使得日本人在對待本國歷史問題上總是閃爍其詞。只要自由派和左派把捍衛和平主義事業當成是為戰時罪行贖罪的必要修行，右派就會堅稱日本并不比其他參戰國更罪孽深重。如果說南京大屠殺或馬尼拉大屠殺構成了剝奪日本主權的理由，那么日本就完全有理由去盡量淡化這些“事件”的重要性。這種政治分歧對外以歷史辯論的面目示人，但實則兩極分化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幾十年來，日本和亞洲鄰國的關系一直深受其害。除了日本對美國的單方面依賴外，這也是1945年的部分遺產。多災多難的一年在人們的宏愿中畫上了句號。

[[1]諾埃爾·科沃德爵士（1899—1973），英國演員、劇作家、流行音樂作曲家。](#_1_7)

[[2]喬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國著名小說家兼詩人。](#_2_7)

[[3]作者注：喬治·班克羅夫特（1800—1891），美國史學家兼政治家。](#_3_6)

[[4]托洛茨基（1879—1940），共產主義蘇聯的主要領袖，猶太人，斯大林的政敵，“不斷革命”理論的創始人，流亡墨西哥城期間遭斯大林派出的克格勃特工暗殺。](#_4_6)

[[5]作者注：此君的首席幕僚是約翰·普羅富莫（John Profumo），這位政治家后來因為他和應召女郎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關系黯然下臺。](#_5_6)

## 第九章 同一個世界

本書之前提起過布萊恩·烏爾庫哈特，年輕的英軍情報官。1944年9月，他曾警告上峰，把盟軍空投到荷蘭小城阿納姆附近會面臨巨大風險，上峰卻讓他去休病假。烏爾庫哈特本來很可能因此變得憤世嫉俗——不顧他的極力反對，“市場花園行動”后來還是被付諸實施，葬送了幾千條年輕的生命。“蒙蒂”一心想要蓋過他的美國對手喬治·巴頓將軍的風頭，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六個多月后，對己方的自大和愚蠢失望透頂的烏爾庫哈特成了進入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首批盟軍中的一員。一開始見識蠢事，現在又目睹此等慘象，以致戰爭最終結束后，他都郁郁寡歡。

即便如此，他居然也沒有掉進憤世嫉俗的陷阱。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我從沒有細想過，事情再也不會回到過去了。我對舊秩序的感觸不太深，也不認為我會懷念它。我倒真是覺得，眼下的重中之重在于防止此類災難再次發生。”[1]

戰前，烏爾庫哈特對國聯的誕生很興奮。他回憶道，自己的國際主義熱情源于兒時在私立女子寄宿學校讀書的經歷。學校名叫巴德明頓（Badminton，即羽毛球之意），校長是比阿特麗絲·M. 貝克小姐（Beatrice M. Baker），脾氣古怪，大家都叫她BMB。烏爾庫哈特的母親也在巴德明頓任教。他的嬸嬸露西無論在學校里，還是在生活中，都是女強人BMB的搭檔。6歲時，烏爾庫哈特是全校兩百多名女生中唯一一個小男孩。BMB小姐很同情左派。跟當時許多人一樣，她對綽號“喬叔叔”的斯大林很有好感。在1930年代期間她還接濟了從歐洲大陸逃來的猶太難民，這種事多數私立寄宿學校校長當時都不太會做。她甚至讓女生——其中包括我母親，她在戰時還是個小學生——在布里斯托市（Bristol）的大街上游行，手舉橫幅，上面寫著“世界工人大團結！”的口號。

戰爭結束后，烏爾庫哈特得到了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短期雇傭，供職于英國外交部一個特設部門，工作內容是從納粹占領下的荷蘭搜集情報。但是由于荷蘭已經解放，所以沒什么可干的——這也是戰爭遺留下來的眾多官僚主義怪現象中的一個小例子。這項任務因此沒持續多久。烏爾庫哈特的第二個雇主是英國外交官格拉德溫·杰布（Gladwyn Jebb）。杰布負責組建新成立的聯合國，他是聯合國憲章的起草者。在職業生涯的剩余時間里，烏爾庫哈特為這個世界性機構盡忠職守、鞍前馬后。聯合國的理想不斷鼓舞著他，盡管他也不護短，中肯地質疑其在實踐中暴露出的缺陷。

四十年后，他這樣記錄1945年秋天那段奮發進取的歲月：

……很難再度體會那段意氣風發的日子里的新鮮感和激情澎湃。戰爭依然鮮活地存在于所有人的心靈和親身經歷中。我們許多人曾入伍打仗，其他人也就是幾個月前才結束了抵抗運動地下活動的狀態，重新拋頭露面。為和平而努力的夢想實現了。百廢待興、一切都必須從頭再來的事實則進一步激勵著我們。[2]

烏爾庫哈特在聯合國秘書處有許多好友，其中一位在前文中也有述及，即法國抵抗主義戰士斯蒂法尼·艾賽爾。在落入蓋世太保之手后，他遭到嚴刑拷打，后被送去布痕瓦爾德和朵拉集中營。他出生于1919年，跟烏爾庫哈特歲數一樣大。艾賽爾有著不平凡的背景。他的父親弗朗茨·艾賽爾（Franz Hessel）是位聞名遐邇的德國作家和翻譯家，曾翻譯過普魯斯特（Proust）的作品。老艾賽爾還是《朱爾與吉姆》（Jules et Jim，一個講述法德情侶三角戀的故事）里朱爾（Jules）的原型。這個故事后來被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çois Truffaut）搬上了銀幕，成了一部名片。同烏爾庫哈特一樣，斯蒂法尼·艾賽爾也希望在全球舞臺上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激發他雄心壯志的不只是對戰爭習慣性的厭惡和對和平的渴望，而是一種更崇高的思想。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是“世界主義和集中營”——集中營里，來自許多國家和不同階級的人被扔在一起——“把我推向了外交”。[3]在戰爭結束后三年，他協助起草了史上第一部《世界人權宣言》（《宣言》于1948年正式實施）。艾賽爾于2013年去世，享年95歲。

毋庸置疑，烏爾庫哈特和艾賽爾都是不平凡的人。但是他們的理想主義情懷源于親身經歷過的破壞，這點并沒有什么與眾不同之處。人們普遍相信應該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秩序，且由一個比國聯更富活力、辦事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組織維持這一秩序。有人想得很遠。甚至早在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前，世界政府的主張者就經常宣揚末世論。阿諾德·湯因比在戰時曾大聲疾呼，要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唯有一個警力遍及全球的世界政府才能做到。湯因比的話顯得有些荒誕不經，但美國國務院里一些高層人士對此很當回事。1945年4月，一份蓋洛普民調（Gallop poll）顯示，81%的美國人希望美國加入“一個擁有警力的世界組織，以維護世界和平”。[4]

鑒于世界政府或世界聯邦的觀念十分模糊，秉承這一路線的思想家便傾向于將個人理念加諸未來。毫不令人意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認為世界聯邦應該遵循他的非暴力原則。湯因比則主張英美兩國應當聯手，讓警力遍及全球，至少未來一段時間內可以這么做。他的初衷是建立某種“民主的盎格魯——美利堅世界聯邦”。[5]他不是唯一這么想的人。1939年，時任英國駐美大使的洛錫安勛爵（Lord Lothian）就把大英帝國視為建立世界聯邦政府的模板。這種想法也許同樣讓人感到其不僅自私，而且完全是癡人說夢。然而，支持某種自由的盎格魯——撒克遜式霸權的聲音無論在英國還是在美國都不鮮見。丘吉爾一度也對其篤信不疑。這種觀念偶爾還是會跳出來作祟，滿足一下英語國家夢想家們的自尊心，其中包括白宮的一兩位主人。

為《紐約客》（New Yorker）撰稿的懷特（E.B.White）在雜志里評論道，1945年春，各國若要就起草第一份《聯合國憲章》開會的話，舊金山作為會議地點再合適不過了。畢竟，他說：“美國被世界各地的人們看成是美夢成真的典范，是一種微縮版的全球國家。”[6]如果說這種得意忘形的情緒今天看起來十分迂腐，那么其至今也并未徹底壽終正寢。話雖如此，懷特還是很清楚地意識到美國的夢境上沾著一些污點。5月5日，就在舊金山會議開幕后一周，他提到，加州某地出現了“一伙舊秩序的衛道士（文件是這么形容的），企圖在一些特定區域限制向非‘高加索人種’提供住房”。[7]

這里還要提一下歐洲人。將歐洲統一視為通往大同世界第一步的通常是隸屬反納粹、反法西斯抵抗陣營的歐洲人。早在1942年，法國抵抗組織“戰斗”（Combat，別名為全國解放運動，簡稱MLN）就發表過一份宣言，宣布“歐洲合眾國——通往世界聯盟路上的一個階段——即將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我們正為之而戰”。[8]“戰斗”組織的一位主要人物是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他多數時候表現得含蓄而內斂，后來和另一個反法西斯抵抗組織來往甚密，得知后者發表歐洲統一宣言的時間更早——1941年，地點是在意大利的文托泰內（Ventotene）。這是個小型的火山島，靠近那不勒斯。阿爾蒂諾·斯皮內利（Altiero Spinelli）等意大利左派曾被墨索里尼關押在島上的一座監獄中，監獄為18世紀波旁王朝（Bourbons）所建，暗無天日。所謂的《文托泰內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出自獄囚之一的政治思想家埃內斯托·羅西（Ernesto Rossi）之手。他提出只有反動派才會醉心于民族政治，所有進步主義者都應該為“一個堅實的世界國家”而奮斗。第一步先是歐洲聯邦，再接著是世界聯邦。

統一歐洲的夢想當然要比這些宣言老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9世紀的神圣羅馬帝國。自那時起，大歐洲的理想經歷了諸多變遷，但有兩條中心思想一直沒變。其中一條是統一的基督教國家，歐洲是其精神和政治核心。這一目標一直為天主教徒所推崇——比如伊拉斯謨（Erasmus）——而在法國天主教徒中間尤其如此。比方說第一代敘利公爵（1560—1641）馬克西米連·德·貝蒂納（Maximilien de Béthune）就曾構想過一個基督教歐洲共和國，土耳其人想加入的話，就必須改宗，皈依基督教。

與之相聯系的理想是永久和平。1713年，另一位法國天主教徒圣——皮埃爾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發表了他的《歐洲永久和平方案》。依照這份方案，歐洲會有一個議會，一支軍隊，較大的成員國會享有平等的投票權。

在早期泛歐主義者看來，永久和平和基督教統一往往是一回事。和平統一是一種宗教觀念，一種基督教烏托邦。其未必要局限于歐洲大陸，而是同基督教一樣，是普世性的抱負。在理想狀態下，上帝的人間天國里是不需要國家邊界的。

啟蒙運動后，理性主義者采納了一種新型的宗教普世主義，只對措辭稍做了點改動。19世紀的法國詩人兼政治家阿爾方斯·德·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于1841年寫下一首歌頌歐洲統一的理性主義詩歌，名為《和平馬賽曲》：“在啟蒙的道路上，世界走向統一/ 我是每一個會思考者的同胞/ 真理就是我的祖國。”1848年，法國處于革命動蕩之中，作為外交部長，拉馬丁發表了一份《歐洲宣言》，不僅將法蘭西共和國吹捧為歐洲的模板，而且還是全人類效仿的對象。

二戰末期出現了一種從宗教理想主義到理性理想主義的類似轉向。1940年，那時美國尚未參戰，一個名為美洲基督教聯會的黨派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求為“正義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當時或許為時尚早，但這一直都是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新教牧師和普通信徒有時還會得到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的鼎力相助。美國各大城市都成立了“世界秩序全國宣教組織”。名為“和平六大支柱”的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陳述了建立一個世界性組織的必要性。唯恐有人懷疑這一聲明是異想天開者的杰作，委員會主席一職落到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肩上。1930年代早期的杜勒斯是希特勒的崇拜者，1950年代在艾森豪威爾手下擔任國務卿，是個好斗的冷戰急先鋒。

杜勒斯在制定一些十分粗糙、更別提不太道德的政策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他支持法國針對越盟民族主義者的殖民戰爭。此外他還在1953年協助推翻了民選的伊朗政府，把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Mohammad Mosaddeq）趕下了臺。摩薩臺被認為對共產主義不夠強硬，而且威脅到了英美兩國的石油利益。于是，英國特工聯手中情局——杜勒斯的弟弟艾倫（Allen）是中情局頭子——策劃了一場政變。但是，杜勒斯的反共熱忱不光是企業利益驅使的結果，他本人推崇基督教道德論，相信跟奉行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作斗爭根本上還是一項道德使命。他表示，相信聯合國具有他所謂的“道德力量”，并擔任了舊金山會議美國代表團的顧問。[9]考慮到當時的局勢，以及他跟美國保守主義的關聯，杜勒斯就對日使用原子彈一事的回應似乎有些出格，但也并非一點都不像他：“如果我們這個虔誠的基督教民族覺得那樣使用原子能在道德上沒有負擔的話，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會接受這樣一種判斷。”[10]

廣島遭遇的滅頂之災讓常常從宗教道德論當中獲得啟發的“同一個世界”論調變得更為世俗和著眼當下。科學家率先站出來，警告使用原子彈的影響，他們當中一些人曾參與制造這一殺人武器。1945年7月16日，美國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進行了首次核試驗，爆炸的驚人威力甚至讓研發原子彈的領軍人物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發出了近似宗教冥想的感慨。他引用了印度教經文《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里的一段話：

如果有一千個太陽

綻放出漫天的奇光異彩

這有如圣靈逞威……

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毀滅者。

相比之下，愛因斯坦在聽聞廣島被炸后說的第一句話則顯得平淡無奇：“哦天吶！”[11]

兩個月后，愛因斯坦將一封信托人轉交給《紐約時報》，信的另外幾位作者有參議員富爾布萊特（J.W.Fulbright）和最高法院助理法官歐文·羅伯茨（Owen J.Roberts）等顯赫人物。他們在信中寫道：“第一枚原子彈摧毀的不僅是廣島這座城市，同樣被引爆的還有我們世代相傳、早已過時的政治理念。”[12]這些理念包括國家主權。舊金山會議上通過的《聯合國憲章》只是一個開始。愛因斯坦等人宣稱：“如果我們想避免一場核戰爭，就必須放眼于訂立一份世界聯邦憲法，締造一種行之有效、世界通用的法律秩序。”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曾主張由聯合國控制核能，但一等蘇聯引爆核彈，他就立馬改變了主意。1945年11月，愛因斯坦在接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采訪時表示：“原子彈的秘密應該被托付給一個世界政府，而美國應當機立斷地表明愿意把秘密移交給世界政府。”

使用核能需要講道德，對這點表述得最簡明扼要的也許莫過于身為基督徒的老社會黨人、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了。在《大西洋月刊》刊登愛因斯坦采訪的當月，他在加拿大國會兩院做了一次演講。廣島的事對艾德禮的觸動很深，他以英法雙語提議科學和道德和諧共存。據《泰晤士報》報道，艾德禮相信“學者以巨大的熱忱投入研究，但倘若沒有同樣炙熱的道德熱情的話，幾個世紀以來建成的文明將會毀于一旦”。[13]

\* \* \* \* \*

1945年，真實世界開始重建的方式也許和高屋建瓴的理想主義有所關聯，分享這一思想的有原抵抗運動戰士、為和平而戰的軍人、震驚于原子彈破壞力的科學家和基督教大同世界論者，但關聯遠沒有達到他們所希望的緊密程度。塑造戰后國際體制（實際上這一工作戰時就已啟動）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道德理想。鑒于政治性解決方法向來就不甚理想，新秩序必然是有缺憾的。

《聯合國憲章》誕生于舊金山，但追根溯源的話，則還要說到丘吉爾和羅斯福于1941年8月在紐芬蘭沿岸普拉森舍灣（Placentia Bay）的會晤。英國剛剛挺過了不列顛戰役，只剩下一口氣。就在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很快珍珠港事件也將爆發（1941年12月7日）。羅斯福極力想通過溫和的方式，鼓動美國選民支持美國在歐洲戰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于是，兩位首腦乘著各自國家的戰艦赴會，起草了《大西洋憲章》。羅斯福坐的是美國海軍USS奧古斯塔號（USS Augusta），丘吉爾坐的是英國海軍威爾士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

耐人尋味的是，一心想在《憲章》里提出建設一個未來世界性組織的人卻是丘吉爾。羅斯福因為國聯的失敗先例已經心灰意懶，而且鑒于美國國內對卷入國際事務的反對聲浪讓他很敏感，遂回絕了丘吉爾的提議。羅斯福也不支持英國的帝國主義事業，盡管他同湯因比一樣，也相信英美應該聯手，當幾年世界警察。羅斯福在談及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原因時，引述了他在同年1月向全世界宣布的“人類四大基本自由”。這“四大自由”因為漫畫家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煽情的作品而名揚后世，它們分別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

其實，《大西洋憲章》后來證明只是這些崇高原則的精辟表述罷了。但其中一條對后世的確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一條款主要出自美國人之手。《憲章》不僅表明“希望那些曾經被武力剝奪自治權的國家能夠重新獲得這一權利”，而且更進一步：“所有人都有權選擇在什么樣的政府治下生活”。這種權利也應得到尊重。[14]

這一新聞立刻傳到了那些為脫離殖民帝國而戰的獨立運動者耳中。越南的胡志明和印尼的蘇加諾等民族領袖一遍遍地引用《大西洋憲章》的條文，以支持他們渴望政治獨立——以及渴望美國支持——的訴求。5月8日，塞提夫的阿爾及利亞抗議者因為要求平等遭法國殖民者槍擊，他們高舉的橫幅就寫著：“ 《大西洋憲章》萬歲！”

《大西洋憲章》起草時，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因為“公民不合作主義”正身陷囹圄。他從英美兩國的宣言中嘗出了虛偽的味道；他把《憲章》斥為一套虛情假意的陳腔濫調。翌年，他發動的“撤離印度”運動（Quit India）卻又響應《憲章》關于民族自治的主張。此外，尼赫魯還呼吁成立一個“世界聯邦”，以保障這種權利。

丘吉爾必須盡快行動，說服國會放心，只有納粹占領下的國家才享有“自治權”，殖民地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畢竟，正如他在1942年時的一番著名表態，他“給國王陛下當首相，可不是為了做拆分大英帝國的那個人”。羅斯福沒工夫磨嘴皮子，他很同情尼赫魯，但畢竟眼下還在打仗，他不想讓丘吉爾太為難。反觀丘吉爾，則對被美國人在帝國事務上“管頭管腳”大為不悅，因為美國人自己手腳也不干凈，特別是在菲律賓。這么想固然沒錯，但丘吉爾忘了一點，美國人早在戰前就承諾會給菲律賓人獨立，這一進程只是因為日本入侵被打斷了而已。

從《大西洋憲章》到聯合國僅一步之隔，不過彼時的聯合國還算不上是一個維護全球安全的國際組織，而只是對抗軸心國的同盟。包括中國和蘇聯在內的26個國家于1942年1月簽署了《大西洋憲章》。盡管一開始對國際組織有所保留，但最終卻是羅斯福給這一聯盟起的名字。當時距離珍珠港事件過去僅僅幾周，心情愉快的丘吉爾正在白宮參加代號“阿卡迪亞”（Arcadia）的會議。羅斯福苦思冥想，到底給新的世界聯盟起什么名字才好呢。然后，一天早飯前，靈感來了。他一頭沖進丘吉爾的衛生間，對著剛洗完澡、身上還滴著水的英國首相興奮地大叫：“就叫聯合國！”丘吉爾回答說這個名字不錯。

戰時官僚、規劃者、外交官和盟軍領導人自始至終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將戰時聯盟轉化為一個穩定的、謀求和平的戰后國際秩序。如何避免再次出現世界性的經濟蕭條，如何防范未來的希特勒們再次發動世界大戰，以及如何在不激怒美國保守派的情況下實現這點——他們動輒為此類國際任務貼上“共產黨”陰謀詭計的標簽。不論全新的國際組織將呈現何種形態（丘吉爾滿腦子依舊是“英語國家人民”，斯大林想的是“熱愛和平”的人民，而羅斯福盤算的是和諧的大國聯盟），其必須有實實在在的威信，因為這恰恰是昔日國聯所缺乏的。新的聯合國要具備維持和平的能力，如有必要可以訴諸武力。為了有效發揮這一影響力，大國之間必須和睦相處。于是就有了在莫斯科、德黑蘭和雅爾塔的會議。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在會上勾勒出戰后秩序的雛形，有時只是粗略勾抹，三位巨頭運籌帷幄，仿佛全世界是個大棋盤，波蘭人、希臘人和其他民族只是小卒子，可由他們任意擺布。

與此同時，美國組建了新的國際組織，用以應對毀于戰火的國家面臨的人道主義援助和食品短缺問題。1943年，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成立，丘吉爾最初很不把這個組織當回事。還是在浴室，有人聽到里面傳來他的歌聲：“UNRRA！UNRRA！UNRRA！”似乎浴室變成了音樂廳。戰后，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不可避免地被美國國內的共和黨人指責對共產主義太過心慈手軟。這是有原因的：鑒于西歐國家政府被認為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大部分援助都流向了東歐國家和蘇聯的加盟國。在這些地方，援助物資多數會落到有后臺的人的手里。救濟總署的工作往往混亂無序，特別是在早期。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它，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死去。

在斯大林紅軍的攻勢下，精疲力竭的德國人節節敗退，沿著冰天雪地的烏克蘭平原一路后撤。與此同時，西線盟軍已經在諾曼底搶灘登陸。到了這個時候，幾個大國已經對未來聯合國的組織架構有了大致概念。首先得有聯大，還得有大國控制的安理會。各國為打敗德國所進行的經濟合作——譬如租借條約等——為國際貨幣體系奠定了基礎，并拿出了遏制經濟民族主義和惡性投機的國際規則。此外還要設立一個國際刑事法庭。

1944年，貨幣體系在新罕布什爾州一家名叫“布雷頓森林”的度假酒店成立了。這個會議原名為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之所以在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召開，有兩個原因：新罕布什爾州的參議員是國會銀行和貨幣委員會的成員，他是共和黨人，反對貨幣監管。所以有必要說服他改變想法。另一個原因是這家酒店接待猶太客人，這在類似的鄉間賓館中并不多見。畢竟，如果財政部長亨利·摩根韜等大員被擋在門外，這可真是太不像話了。

1944年11月，羅斯福第四次當選美國總統。當時，他已經全身心地投入到戰后聯合國事務中，這點從他的競選演說就可見一斑。在羅斯福看來，全世界需要一次全球性新政，而且應加強聯合國的力量，捍衛全球和平。正如他當時所說的那樣：“依我的陋見，很明顯，如果這個國際組織能發揮點實際作用，美國人民就必須在這之前賦予我國代表付諸行動的權力。”[15]盡管將羅斯福和他的理想同“共產主義”混為一談的聲音并沒有消失，多數美國公民如今似乎都和總統意見一致。

就在羅斯福第四次參選前，幾個大國還圍繞聯合國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地點選在敦巴頓橡樹園（Dumbarton Oaks）。這是位于華盛頓特區喬治敦的一座豪華莊園。美、英、蘇——所謂的三駕馬車——在戰時負責制定盟國的政策。這一次，第四個大國，中國也應邀與會。人們希望，這四個大國將攜手維護戰后世界的治安，雖然各方對中國能否擔當此任信心有限。丘吉爾和斯大林都很睥睨蔣介石的政權，但是美國人很想給委員長面子。（后來，在舊金山會議上，四大國進一步壯大為五大國，因為法國也急需挽回顏面。）

然而，在敦巴頓橡樹園，各方對聯合國的具體架構還是存在爭議。哪些國家有資格加入？聯合國的使命是否僅限于安全（蘇聯人的立場），還是應參照美國人的想法（后來也的確實現了），納入經濟和社會事務？要不要建立一支國際空軍？誰又來為聯合國部隊提供兵員？是不是所有成員國都有權對聯合國行動投否決票——國聯正是這種安排——還是只有大國才有這一權力？還有，否決票針對的到底是哪些范疇？只是行動么，還是要算上調查和討論議題？各國之間達成妥協，譬如否決權這種難題被擱置了起來。原則上，所有“熱愛和平的國家”都有權加入聯合國。所謂“熱愛和平的國家”這一稱法很對感情豐富的美國人的胃口，但對于斯大林而言則有種更特殊的意義，因為他慣于譴責蘇聯的批評者與和平為敵。比方說，芬蘭在1940年曾抵抗過蘇聯紅軍，所以就是和平的敵人。

就這樣，舊金山會議的籌備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4月27日，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齊聚在這里，團結一心，同仇敵愾。聯合國也從戰時同盟的性質轉型為一個“全世界民主組織”——羅斯福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16]

不幸的是，總統已經病入膏肓。盡管位于雅爾塔的沙皇夏宮氣勢恢宏，但那兒的條件并不舒適（臭蟲特別折磨人），而且會議開得他心力交瘁。他時日無多了。羅斯福于4月12日與世長辭。新總統哈里·杜魯門對民主世界秩序的期待跟他的前任相比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6月，就在簽署《聯合國憲章》前不久，杜魯門從堪薩斯城大學拿到了榮譽學位。隨即，他便以一股美國佬的樂天派精神宣布：“各國在一個世界共和國里相處，就跟我們在美國這個共和國里相處一樣容易。”[17]

\* \* \* \* \*

五十個國家的國旗在太平洋上吹來的風中獵獵作響。5000名各國代表抵達了舊金山歌劇院，參加舊金山會議開幕式。幾十萬前來一睹究竟的看客把大街小巷擠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除了德國、日本和它們的盟友外，世界各國都派了代表，或者嚴格說來也不是所有國家；還是有些例外的。而且似乎也并非所有與會者都有資格到場。比如阿根廷，該國軍政府對法西斯陣營明確表示同情，直到戰爭末期才改弦更張。阿根廷受邀與會是美蘇之間博弈的結果。蘇聯想讓蘇維埃加盟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而想獲得拉丁美洲支持的美國就堅持要拉攏阿根廷。

另一方面，二戰的發祥地波蘭卻沒有受到邀請，因為各方對誰能代表合法政府無法達成一致。蘇聯支持名為盧布林委員會（Lublin Committee）的波蘭過渡政府，而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則繼續聲稱自己才是正統。既然是這樣，就沒辦法遂蘇聯人的愿，請盧布林委員會來舊金山開會了。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許諾過丘吉爾和羅斯福，波蘭會進行自由選舉，波蘭戰時地下組織的16位領導人甚至還被請去和俄國人好好談談。但自此之后這些人就杳無音信，給人不祥的預感。用《紐約客》作者懷特的話來講，“波蘭問題就像一只臭鳥在舊金山上空盤旋”。[18]

話雖如此，會場上還是洋溢著充分的樂觀情緒。阿拉伯代表在當地看熱鬧的人眼里特別具有異國風情。據《揚基人》雜志報道：“那些熱衷追星的美國人推搡著，爭相湊近看阿拉伯人，還對一個人說，‘傻透了，哦？你說是不？’”

美國一樣讓阿拉伯人納悶。敘利亞代表法里德·澤內丁（Farid Zeineddine）接受《揚基人》采訪時談了他的感受：“依我看，美國人好像都戴眼鏡，都嚼口香糖。也許他們不得不戴，因為樓太高了，得瞪大眼睛，才能上上下下看個清楚。”[19]

也有人以更為犀利的目光打量著這一切。日后成為英國工黨領袖的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以《每日先驅報》專欄作家的身份在舊金山采訪。作為忠實的歐洲社會主義者，他擔心“美國如今的地位將帶來危險”。美國太富有了，太強大了，在戰爭中又毫發無損。“美國的經濟前景”，他說道，“似乎蓋過了會議的風頭。”另外，當地影院播放的反映納粹集中營解放的新聞紀錄片并未“引起人們拍手叫好”。（布爾戰爭期間，英國人在馬弗京解圍后曾歡呼雀躍。）[20]

隨著太平洋戰爭進入最后幾個月，是年春天全美院線上映的其他影片毋庸置疑都旨在提振人們低落的精氣神，比如約翰·韋恩（John Wayne）的《重返巴丹半島》，以及他和埃羅爾·弗林（Errol Flynn）合演的《反攻緬甸》。但那時還是有氣氛輕松的娛樂片可看的，包括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沙場義犬》，多蘿西·拉莫爾（Dorothy Lamour）出演的《邊城壯士》，以及喜劇組合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的作品《女生來了》。

雖然與會代表的住宿費需自理，但舊金山終歸要比雅爾塔舒服多了。作為丘吉爾的外交顧問，格拉德溫·杰布參加了戰時大部分會議，包括雅爾塔會議。他形容自己在舊金山感受到了“讓人嘆為觀止的熱情好客”。[21]四個大國（很快將擴充為五個）的領導人在美國國務卿小愛德華·斯特丁紐斯（Edward R. Stettinius Jr.）的主持下，在費爾蒙特酒店（Fairmont Hotel）頂層一間閣樓的圓形圖書館里進行了會晤。據《時代》周刊描述，“藍色天花板下擺著兩張雙人沙發，上面套著綠色坐墊”。[22]級別較低的代表則在下面的樓層開會。

大國之間就總的原則迅速達成了一致。但是它們和其余小國則劍拔弩張，大國主導和民主的國際組織這一對目標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作為小國代表，口若懸河的澳大利亞外長赫伯特·伊瓦特博士（Herbert Evatt）十分反感大國在安理會中享有否決權，但是小國不得不作出讓步。蘇聯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是大國中立場最極端的。他不斷堅持蘇聯應有權否決其不愿在聯合國范圍內討論的議題。這一態度幾乎導致會議擱淺，直到美國人派了一支外交使團去莫斯科斡旋，斯大林這才授意莫洛托夫做出退讓。

當莫洛托夫設下盛宴，款待英國外交部長、溫文爾雅的安東尼·艾登和美國國務卿愛德華·斯特丁紐斯時，氣氛似乎一派祥和，至少在三個大國間是如此。對于斯特丁紐斯，布萊恩·烏爾庫哈特形容“他儀表堂堂，都適合去演戲了，而且長著一口白得不太正常的牙齒”。[23]正如俄國人設宴時的慣例，三個人大吃大喝了一通，還被拍下了互相敬酒的照片。其中一張里，就連一貫以冷臉示人的莫洛托夫都硬裝出一副爽朗的神情——他在蘇聯政界有個綽號，叫“鋼鐵屁股”，原因是他在辦公桌邊一坐就是幾小時。天色不早了，幾位紳士逐漸感到了濃濃的倦意。

接著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心情依然大好的莫洛托夫鄭重其事地告訴貴客，他總算可以透露發生在那16個波蘭地下黨領導人身上的事了。他們因為跟蘇聯紅軍作對，“搞陰謀顛覆”被捕，這一罪行最高可判死刑。艾登一開始驚得目瞪口呆，隨即便出離憤怒，要求莫洛托夫作出詳細解釋。被艾登生硬口氣惹毛了的莫洛托夫也不買賬，一臉不悅。方才的歡樂氣氛瞬間蕩然無存。會議又一次陷入危險之中。

但是，這次小風波只是過眼云煙。一廂情愿的人們眼里看不到現實。《民族》雜志（The Nation）告訴美國的自由派，一旦波蘭舉行“真正的自由選舉”，“俄國的道德地位”就會“得到極大的強化”，“對蘇聯的不信任感也會降到最低”。[24]蘇聯人允許自由選舉的承諾很模糊，而且只是一塊遮羞布。在雅爾塔，西方盟國極力揪著這點不放，直到現在，也沒人愿意對其避而不談。只有蘇聯人最清楚，那16個大無畏的波蘭人曾在艱苦絕倫的條件下奮不顧身抗擊德國人，到頭來卻被蘇聯秘密警察嚴刑拷打，還被扣上了“勾結納粹”的帽子接受審判。6月21日，就在舊金山會議進行過程中，蘇聯法庭作出宣判。除了兩個人外，其余14名波蘭人后來都被殺害于蘇聯監獄中。

即使16名波蘭人正在莫斯科遭受皮肉之苦，各大國仍在商量把人權宣言寫入《憲章》序言（《世界人權宣言》要晚一點，到1948年才出臺）。這一啟蒙思想和基督教普世主義的光輝成果在斯蒂法尼·艾賽爾和許多人眼里是戰后秩序的最大貢獻。根據這一思想，人權應不分信仰、文化和國別地造福一個社群，還應造福全人類。普世的人權跟紐倫堡審判使用的“反人類罪”法律有關聯，這一法條繼而又和種族滅絕的概念聯系起來。1944年，波蘭律師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定義種族滅絕是“人為地、系統性地對一個民族、種族、宗教和國家團體的所有人或部分人進行滅絕性的屠殺”。

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提出過人權應該或可以被強加給別人。恰恰相反，參加舊金山會議的英國外交顧問、歷史學家韋伯斯特（C. K. Webster）就說：“我們的政策是避免‘承諾人權’，盡管我們不會反對宣言。”[25]宣言應運而生，為其起草藍本的是南非政治家、布爾戰爭的英雄揚·史末資將軍（Jan Smuts），他在國聯和聯合國成立之初都出過力。下面一段文字是各大國于6月在舊金山最終敲定的版本：“我們聯合國的子民決心再次重申我們對基本人權、對人類尊嚴和價值、對男男女女和大國小國一律平等的信念……”

邁克爾·富特在《每日先驅報》的專欄里專門表揚了蘇聯的道德領袖風范。他指出，戰前，內維爾·張伯倫的英國政府曾封殺過有關納粹暴行的新聞。但是畢竟當時的“受害者只有自由派、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猶太人”。他不無傲慢地寫道，如今，“這些人的權利將有幸被納入史末資將軍起草的基本自由憲章序言內。這份憲章甚至還將適用于南非的黑人，不過真是這樣么？”富特對這點的質疑有憑有據，但是他也心安理得地對波蘭問題散發的臭氣熟視無睹。他甚至夸獎蘇聯人，因為他們就“附屬地人民的政治權利”所發表的看法比“任何國家都更有邏輯，也更明確”。

在6月底會議結束前，還爆發過另一場危機，這一次禍出黎凡特（Levant）。5月29日，法軍在大馬士革的街頭同敘利亞人發生了巷戰，還轟炸了這一歷史悠久的古都，以及阿勒頗（Aleppo）、哈馬（Hama）和霍姆斯（Homs）幾個城市。在敘利亞要求法國人交出敘利亞特別部隊的指揮權，由敘利亞國民軍收編后，法國人叫來了增援。

翌日，敘利亞總統、外交老手舒克里·阿爾·庫瓦特利（Shukri al-Quwatli）給杜魯門總統寫了封信，表達了同胡志明和蘇加諾一樣的情緒，不過效果較后面兩位要好多了。他既憤慨、但又有理有據地寫道，法國人拿著從美國那兒借來的錢買武器，不去打德國人，倒來屠殺敘利亞人。美國人在1944年就承認敘利亞是個獨立國家，那么：“現在《大西洋憲章》又在哪兒？四大自由呢？您讓我們怎么看舊金山會議？”[26]

美國人無需慫恿，就同敘利亞人站到了一條戰壕里。歐洲帝國主義在華盛頓不得人心，法國帝國主義首當其沖。當時，印度支那在美國人眼里是一片蠻荒的異域，但敘利亞和黎巴嫩則不同，這兩個國家跟中國相似，長期以來美國都施之以一種“善意的家長制”。這里面既有傳教士熱情，也涉及商業利益：貝魯特有美國大學，耶路撒冷有基督教布道所，還有“門戶開放”的經濟政策。那時美國政策制定層中間流行一個詞，“道德領袖風范”。毫無疑問，正如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觀點，這種說法流露出的道德情緒很真誠，但同樣真誠的還有領導世界的野心。

鑒于1941年英軍攻占黎凡特時，盟軍已經承諾會在戰后承認敘利亞的獨立自主，他們很難忽視庫瓦特利的訴求。于是，丘吉爾命令他在當地的代表伯納德·帕蓋特將軍（Bernard Paget）開車把法國人送回兵營。這個任務不難，因為法軍人數很少，無力抵抗。左傾的《曼徹斯特衛報》以充滿愛國主義的興奮之情報道了這一事件的經過。該報記者“昂首闊步地和水兵們一起進入大馬士革……一旁是成群結隊的大馬士革市民，他們既吃驚，但又高興地鼓掌……在市民的一片噓聲中，一隊卡車、坦克和架著布倫式輕機槍的運兵車載著法軍駛離了這座城市，一旁是負責護送他們的英軍裝甲車……”[27]

戴高樂將軍聞之勃然大怒，在他眼里，這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一起令人發指的陰謀：“我們現在沒法跟你們大動干戈，但你們羞辱了法國，背叛了西方。我們不會忘記這事。”[28]

表面上，敘利亞危機是對在舊金山會議上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一次完美測試。如果要找個合法理由踐行《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精神的話，這個機會再好不過了。盡管法國人在1941年曾許下諾言，但他們還是試圖恢復殖民統治。英國人理直氣壯地滅了法國人的威風，所以才有了《曼徹斯特衛報》語氣驕傲的報道。

當然，事情也并沒有這么簡單。英國人在中東其他地方搞的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針對不同的對象給出不同的承諾。早在1916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行將崩潰時，英法兩國就通過一紙《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把黎凡特瓜分為各自的勢力范圍：法國得到了敘利亞和黎巴嫩，英國則拿下外約旦（Transjordan）和伊拉克。1941年，就在法國戰敗后一年，英軍挺進大馬士革，承諾支持敘利亞獨立，同時也承認法國的特權。這兩種表態明顯自相矛盾。實際上，英國人心里真正盤算的是在黎凡特一家獨大。所以他們樂見敘利亞人挑釁法國。法國人只要敢瘋狂反撲，就可以此為口實把他們徹底踢出敘利亞。而1945年初夏正好是這樣一種局面。

敘利亞危機有些落入窠臼的味道，不禁讓人聯想起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沖突。不管怎么說，英法兩國都將失去它們在中東的主導地位，盡管當時這點在舊金山會議上還不是十分明朗。很快，發號施令的就會變成美國和蘇聯。英國對不遠未來的展望，在戰時一份計劃里便初露端倪。倫敦當局滿心希望英美能在聯合國的授權下建立軍事基地，聯手維護戰后世界和平；美國分管亞洲，英國分管中東。美國人已經明確表示，對被選為美軍基地的區域，當地不享有主權——即所謂的戰略托管地。所以在戰后最初幾個月里，一個非正式帝國就已開始顯現雛形。英國人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們在這個新世界里注定只能扮演跑龍套的角色。

敘利亞不是唯一要求獨立自主的國家。民族解放其實是舊金山會議的一大議題。邁克爾·富特說得沒錯，蘇聯比起西歐盟友更支持民族解放事業，盡管個中理由并不十分豁達。然而，盡管聯大隨著時間推移會成為鼓吹反殖民主義的重要講壇，去殖民化在1945年尚未被提上議事日程。殖民主義列強所能作出的最大讓步，也就是遵循《聯合國憲章》的精神，承諾保障“非自治地區”居民的“福祉”。且推行自治時會“考慮到每個地區和其人民的特定情況，以及它們程度各異的發展水平”。旁遮普（Punjab）的原總督威廉·馬爾科姆·海利男爵（Baron William Malcolm Hailey）在沙赫布爾（Shahpur）和紐波特帕格內爾（Newport Pagnell）都有封邑。他在《泰晤士報》上撰文，讓讀者們放心，“這里尚未出現突破我們政策的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很明顯，聯合國機構無意對殖民大國運用《憲章》原則的情況進行干預”。[29]英國、法國等殖民列強所要做的只是定期向聯合國秘書長匯報仍處于它們管轄之下“地區”的形勢。

\* \* \* \* \*

鑒于一些地方的人們對世界政府寄予厚望，舊金山會議的最終結果必然令人失望。要讓一個世界政府運轉起來，各國政府就得放棄主權。所有大國中，只有政客商人宋子文（T. V. Soong）代表的中國表態稱“如有必要，可舍棄部分主權”。[30]中國甚至還準備好了放棄大國否決權。但是由于蔣介石對中國的控制已經顯得風雨飄搖，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高風亮節并未引起多大反響。

在為《紐約客》撰寫的稿件里，懷特準確地指出了會議的一對主要矛盾。他寫道：“第一波鼓動國際主義的熱潮似乎在倒向民族主義，而不是與之拉開距離。”[31]他從飄揚的國旗、軍裝、軍樂、秘密會談、外交動作中讀出了“一種對全球社會的否定”。在國際主義的漂亮辭令下，他聽到了“越發響亮的引擎轟鳴：叫著主權，主權，主權”。

另一位身在舊金山的觀察者是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他剛從美國海軍復員。肯尼迪同意“世界聯邦主義者”的看法，認為“一個成員普遍遵守其原則的國際組織會使問題迎刃而解”。但他也意識到，除非人們對戰爭是“終極邪惡”的普遍看法強大到足以讓各國政府團結一心，否則一切終將無功而返。而這在他看來不太可能實現。[32]

就算美國對日本投下了兩枚原子彈也沒能促進厭戰的情緒。長崎之劫過去一周后，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在倫敦為前來訪問的格拉德溫·杰布和他手下的聯合國執行委員會舉辦了一場歡迎午餐會。會上，他發表了一篇演講。在場的聽眾中有蘇聯代表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加拿大代表萊斯特·皮爾森（Lester Pearson）和美國代表斯特丁紐斯。后者還帶了助手，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的阿爾杰·希斯（Alger Hiss）。希斯后來被控為蘇聯人當間諜。英方代表是堅定的國際主義信徒菲利普·諾埃爾——貝克（Philip Noel-Baker），擔任他助手的是歷史學家韋伯斯特，后者戴著一頂網球帽，以遮擋攝影師的鎂光燈。貝文在演講里盛贊這一出色的委員會很快會為在舊金山開啟的工作畫上句號。因為日本遭受了可怕新式武器的打擊，聯合國這一國際組織能否發揮作用愈加變得迫在眉睫。不過，貝文繼續說，他認識到必須“小心翼翼地灌輸”“世界政府的觀念”。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歷史、集體記憶和傳統。時間長了，這些也許都能得到克服，正如他，歐內斯特·貝文，也設法克服了他工人階級的出身，出人頭地。舊金山的“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但是要營造“正確的氛圍”卻有待時日。在這之前，“國與國之間的合作，特別是發揮正面和負面影響的大國間的合作，是我們可以采納的唯一有效方法”。[33]

貝文說得沒錯，但他無意間揭示了世界政府理想的巨大缺陷。其要有效運轉，就得依賴大國聯盟。如果聯盟成員一條心，某種全球威權主義——類似拿破侖戰爭失敗后，梅特涅操縱下的神圣同盟——就會威脅世界。如果聯盟人心渙散，那么羽翼未豐的聯合國就形同虛設，然后另一場或許更具破壞性的戰爭就會日漸迫近。

到頭來，各大國沒能擰成一股繩。很難說冷戰到底是何時開始的。無論羅斯福多么努力地想拉攏斯大林——甚至為此毫無必要地為難丘吉爾——早在雅爾塔會議上，大國間就已出現嚴重裂痕。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當時還沒管這叫冷戰，但是他在1945年9月末聲稱自己在倫敦目睹了冷戰的苗頭。

美、英、蘇、法、中五個大國的外長齊聚倫敦，和意大利、芬蘭以及巴爾干國家商討若干和平條約。他們在所有重大事宜上都談不攏。出于維護大國聯盟和諧的考慮，美國已經同意承認蘇聯在波蘭扶植的過渡政府，并對其合法性不予追究。對于匈牙利局勢，美國也準備如法炮制。在會議報告中，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表明，美國政府“分享蘇聯希望在中東歐出現親蘇政府的意愿”。[34]

但是莫洛托夫另有打算。除了蘇聯外，共產主義在另外兩個大國里也是一股強大的勢力：在法國，共產黨的實力依舊如日中天，在中國，暗流涌動的內戰很快將全面爆發。如果莫洛托夫能羞辱中國國民黨和法國人，而且連帶美國一塊羞辱，那么對共產主義事業將大有裨益。他制定的戰術是要求法國和中國退出條約談判，因為它們并未在相關國家的投降協議書上簽過字。這么做為的是嚇唬法國人，羞辱中國人，順便再給英國人來個敲山震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回憶錄里不禁對莫洛托夫冷酷的外交手腕大加贊賞：“1945年，參加倫敦會議的莫洛托夫先生正值春風得意”。[35]

原抵抗運動領袖、日后晉升臨時政府主席[[1]](#_1_Zhe_Li_De_Yuan_Wen_Shi_presid)的法國外交部長喬治·皮杜爾（Georges Bidault）不斷遭到蘇聯人的輕慢、挑釁和羞辱。莫洛托夫使了一計，要求英美兩國外長推遲會議，同時也不通知皮杜爾，于是法國人只能白跑一趟。莫洛托夫希望皮杜爾一怒之下會返回巴黎。中國外長則索性被忽視了，好像房間里根本沒這個人。壞脾氣的貝文被撩撥得火冒三丈，但最后只好服軟，腆著臉跟蘇聯人賠不是，也許還因此做出了讓步。

見這些策略未能奏效，蘇聯人便采取訛詐。貝文和伯恩斯被告知，如果中法兩國不退出，蘇聯就將停止合作。伯恩斯拒絕繼續被盟友玩弄于股掌之間，于是會談前功盡棄。在杜勒斯看來，這一刻，一切真相大白。其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的時代已經作古；標志著蘇聯共產黨卸去了偽裝，再也不是我們的‘朋友’。他們在世界各地公開與我們為敵的時代已經來臨”。[36]

這位老資格的冷戰斗士當然沒有看走眼。而且他也不是唯一一個窺見戰后世界秩序裂痕的人。漢森·鮑德溫（Hanson W. Baldwin）是《紐約時報》的軍事新聞編輯，不同于杜勒斯，他是一位自由派。在一篇刊于10月26日的報紙專欄中，鮑德溫認為原子彈的發明意味著全世界——尤其是兩個大國——面臨著一個可怕的選擇。選擇之一是加強聯合國。這種情況下，各大國就不可避免地要放棄一大部分國家主權，同時還要廢除安理會的否決權。俄國人將有權查看美國人的核設施，反之亦然。

這是鮑德溫個人傾向的解決方案，并非基于道德層面的考慮，而是出于自保。杜勒斯則一如既往地抱有更為道德化的觀點。他寫道，聯合國將一直處于弱勢地位，因為“對于道德判斷無法達成全球性的共識”。[37]對他而言，冷戰既是政治沖突，也是道德沖突，是正義與邪惡的一場較量。

不過，漢森·鮑德溫也沒那么天真。他并不指望蘇聯人或美國人能同意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拿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意味著“世界被分為相互猜忌的兩大集團，這樣的世界也許會保持常年的穩定，但最終將發展成世界大戰”。

一語成讖。時至秋冬之交，1945年之春的宏愿已然褪色。不會有世界政府，更別提全球民主了；甚至都不會出現四、五個國際警察。安理會兩個歐洲國家所剩的權力不久之后就將因它們的帝國爆發流血沖突、走向滅亡而進一步削弱。蘇聯人和美國人正在逐步轉向公開對抗。中國在經歷了抗戰后元氣大傷，分裂為兩大集團，腐敗而士氣低落的國民黨盤踞關內的大城市，而共產黨則統治著鄉村和北方大片領土。

在1945年的秋冬季節，美國報紙仍在報道中國陪都重慶傳來的積極態勢，國共兩黨的談判仍在進行，好似一場形勢未明的皮影戲。雙方都大談“妥協”、“停戰”和“民主”，且誰都不想“挑起”內戰。10月14日，《紐約時報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對蔣介石委員長的領導能力表達了充分信心。該文如今讀起來頗為耐人尋味：

撇開其民主化的意識形態不談，現在的蔣比除了斯大林以外的任何國家元首都更有權力，他的頭銜也比斯大林多。除了擔任中華民國總統[[2]](#_2_Yuan_Wen_Ru_Ci__1945Nian_Jian)，軍隊首領和國民黨總裁之外，他還是起碼43個組織的頭目……委員長即國家。他的話就是王法，其他國家領導人交由下屬辦的事，蔣委員長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

這對他沒什么好處。整整四年后，委員長只能退居福建沿海的一個小島上施展他的權威。該島過去叫福爾摩沙（Formosa），如今叫臺灣。

\* \* \* \* \*

就這樣，零年在感恩和焦慮的基調中落下了帷幕。人們對世界大多數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過去那樣對美好未來抱有幻想，同時也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擔心。上百萬人依然饑寒交迫，沒有興致迎接即將到來的新年。此外，新聞報道往往都很嚴峻：處于占領下的德國恐會因食品供給發生騷亂；巴勒斯坦被恐怖主義行徑攪得動蕩不安；印尼的戰火依然在燃燒，配備“全套美制裝備”的英軍和荷蘭海軍陸戰隊正竭力鎮壓原住民的暴動。[38]

但是在1945年最后一天，人們閱讀世界各地報紙所得到的印象是：多數人都急于回歸自己的生活，對全球新聞不太關心。在世界大戰中，無論哪個角落都很重要。但到了和平年代，家是人們心里唯一的牽掛。

于是，英國人聊天氣，談運動。據《曼徹斯特衛報》報道，“由于戰時禁止播報天氣，搞得我們現在業務都有點生疏了，連昨晚西北地區的大霧都沒預測準”。但也有利好消息，“德比郡和蘭開夏郡的滑翔機俱樂部有望成為英國第一個恢復營運的類似俱樂部，戰爭爆發后，這一運動就被叫停了”。

法國人聊美食。僅僅一年前，美國大兵還在覆蓋皚皚白雪的阿登森林（Ardennes）里浴血奮戰，如今則被請去法國的阿爾卑斯山區滑雪度假。《世界報》（Le Monde）從霞慕尼（Chamonix）發來報道：“法國大廚準備的菜肴讓所有人樂開了懷。法國文明的這一方面如此受歡迎，讓人嘖嘖稱奇。”該報還以興奮的口吻宣布，憑J3、M、C和V類配給證，人們可在12月“在過去三升葡萄酒的基礎上，再多領取一升”。

拜羅伊特（Bayreuth）的《弗蘭克州報》（Frankische Presse）看法比較消極，該報回顧了德國人經歷的艱難困苦。“人們蜷縮在地窖和地堡里，筋疲力盡，眼神焦慮，內心不住地顫抖，他們別無所求，只希望戰爭結束，甚至不指望打什么勝仗。”該報還刊登了其他新聞：兩名德國人自告奮勇，申請由自己來處決紐倫堡的戰犯。來自小鎮馬爾堡的埃里希·里希特說他愿意砍掉戰犯的腦袋，而且不要錢。來自萊比錫流離人員收容站的約瑟夫·施密特自告奮勇要求實施絞刑或斬首，不過“每殺一個人都索要酬勞”。人們也沒有忽視文化的慰藉作用。多年來，拜羅伊特交響樂團將首度上演克勞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作品。“這位法國作曲家全方位的工作，使法國音樂擺脫了德國浪漫主義和新浪漫主義的影響。”而這居然發生在拜羅伊特，瓦格納（Wagner）[[3]](#_3_Wa_Ge_Na__1813__1883__De_Guo)的故鄉！

東京《日本時報》刊登的社論頭條擲地有聲：“告別舊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在這辭舊迎新之際，日本對過去一年毫無遺憾。因為這是痛苦和磨難的一年，是失落和迷惘的一年，是屈辱和報應的一年。讓我們發自內心地長舒一口氣，把這充滿苦澀回憶的一年拋之腦后吧。”該報還揭秘：“日本曾制訂計劃，用蠶、蝗蟲和桑葉磨成粉，制成面粉，再配合其余十幾樣食物替代品，以應對美軍入侵時出現的糧食危機……（這一計劃仍在調研階段）。”記者西澤榮一解釋道，歌舞伎大多數主人公都是封建時代的人物，這點固然讓人遺憾，但還是有極少數的例外。比如，17世紀時有一個叫佐倉宗吾的村長，因為向大名大膽進諫，懇請減少農民稅負，被釘上了十字架。“他就是一位獻身民主事業的烈士。”

《紐約時報》的口氣稍許樂觀一些，其文章打趣道：“紐約的酒神風向標（Bacchanalian barometers）昨日發出暴風警告，意味著本市今晚將度過1940年以來最縱情狂歡的一個跨年夜。”比起文章來，《時報》里的廣告更能體現新老世界之間幾乎難以想象的鴻溝：“本品與眾不同——奶油般潤滑的花生醬在口中融化——再多抹一點嘛，媽媽，這可是小飛俠香滑花生醬（Peter Pan）哦！”

如果說從新年夜世界各地眾生態一覽中能總結出什么，那就是某種正常狀態又回歸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人是幸運的，盡管處于戰后最苦不堪言的一段時期，但他們還能抬起頭來。對于依然困在德國、日本戰俘營或任何凄慘境地中的人而言，回歸常態是一種奢望。

國家千瘡百孔，肩負重建任務的人們無暇慶祝，甚至無暇哀悼逝者。眼下有活要干。這一認識讓人看清現實。比起戰爭和解放的大起大落，現實要灰色，有序，但也平淡多了。當然，戰火并未熄滅，一些地區爆發了反抗宗主國的殖民戰爭和剿滅本國敵人的內戰，新的專制政權也被扶植起來。但對上百萬的人而言，曾經經歷大場面的興奮之情足以伴隨一生。對于往事，有些人不愿再憶起；另一些人或許境遇較好，回首往事時還帶著一絲留戀——那個有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因為之前的經年破壞，以及之后將陸續上演的一幕幕大戲——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印巴沖突、巴以沖突、柬埔寨大屠殺、盧旺達大屠殺、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等——零年在全世界集體記憶中變得模糊了。但還是在零年，戰爭廢墟上的重建工作成績斐然，對于零年之后長大成人的一輩，這一年或許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們當中有人在西歐或日本長大，很容易把父輩的成就看成是理所當然的：福利國家、似乎剛有起色的經濟、國際法，以及看似無堅不摧的美國保護下的“自由世界”。

當然，這樣的世界不會長久，沒有什么是永恒的。但這不是我們不向1945年的男男女女，向他們的苦難、憧憬和抱負致敬的理由，縱然許多期待終將化為灰燼，一如世間萬物。

[[1]這里的原文是president，但是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總統，喬治·皮杜爾事實上從未擔任過法國總統，只是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1946年6月24日—1946年12月15日）擔任過臨時主席。](#_1_8)

[[2]原文如此，1945年蔣介石所任的職務是國民政府主席。](#_2_8)

[[3]瓦格納（1813—1883），德國著名音樂家、作曲家，著有《尼伯龍根的指環》這部偉大的歌劇作品，同情納粹，反猶，作品得到納粹的青睞。](#_3_7)

# 跋

戰爭是否真的結束于1945年？有人提出全世界對抗狀態直到1989年才走向終結，理由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和其余中東歐地區在這一年才最終脫離了共產主義統治。1945年，斯大林把歐洲一分為二，這是二戰最深的一道傷口。但是背信棄義之后依然是背信棄義。1938年，在英法兩國的綏靖縱容下，實行議會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次被希特勒瓜分——正如內維爾·張伯倫所言，“這一糾紛發生在一個遙遠的國家，發生在我們根本不了解的人之間”。1939年，英國對德宣戰，名義上是為了恢復波蘭的領土完整。但這一承諾從來就沒有兌現過。

但到了1989年，隨著蘇聯帝國的瓦解，人們滿懷希望，貫穿歐洲脊梁的這道巨大傷痕終于有可能愈合了。不止如此：雖然中國發生了學潮，但在這一充滿奇跡的年份中，人們燃起過短暫的希望，全世界終于可以團結在一起了。如今世上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人們談論著新的世界秩序，甚至是歷史的終結。柏林墻終于出現了裂痕。

1989年12月31日，我和幾個姐姐帶著父親，打算在柏林墻下迎接充滿希望的新世紀。他在1945年目睹柏林被毀之后只故地重游過一次。1972年，在昔日家庭災難陰影的籠罩下，我們一家人曾在柏林度過圣誕節和新年夜。那次經歷讓人抑郁。柏林又陰又冷。穿越東西德邊境耗時良久，令人厭煩。兇巴巴的邊防士兵拿著鏡子檢查我們的汽車底盤，確保我們沒帶違禁品，或者在車底下藏了人。

1972年，東柏林和我父親記憶中的沒什么兩樣。斯大林式的馬路雖然寬闊，但空空蕩蕩，這座城市的色調陰沉，戰爭的廢墟依舊清晰可見。父親開著全新的雪鐵龍轎車，來到了昔日他被迫為納粹戰爭機器賣命的原工廠大門前。這段旅途讓他充滿了沉甸甸的快感。工廠是一棟大型紅磚建筑，看起來戒備森嚴，有點像德皇威廉時期的工業堡壘。工廠附近是我父親曾經待過的勞工營，木頭營房跟紙糊的一樣，對冰雪、跳蚤、虱子和盟軍炸彈的侵擾均沒有招架之力。里面的東西一樣不少——瞭望塔、囚犯用作公廁的彈坑，以及公共浴室——似乎過去只是被凍結了起來。

1989年，這座勞工營消失了，我記憶里是被拿去改造成停車場了，一旁的簡陋攤位上，攤主兜售著在油膩的咖喱醬熱氣里熏制而成的香腸。

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下，我們一行散著步，穿過勃蘭登堡門。這一舉動在幾乎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里難以想象，若有人敢以身試法，必然會挨槍子。我們被裹挾在東德人、西德人、波蘭人、美國人、日本人、法國人和其他來自天涯海角的人組成的人流中，漫步穿行于柏林市中心，體嘗著這份恬淡的自由，我至今還記得父親臉上那股子興高采烈的勁兒。一旁依舊站著身著制服的士兵，但他們無力出面制止，只是盯著人群。一些當兵的臉上還帶著釋然的笑容，他們終于不用再朝同胞開槍了。全世界似乎一團和氣，這還是破天荒頭一遭。

12月31日的晚上很冷，但還沒到天寒地凍的地步。在走向勃蘭登堡門的路上，我們隔著老遠就聽到了人們的歡呼聲。父親的步履卻有些遲疑；他不喜歡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德國人扎堆的地方。他也不喜歡乒乒乓乓的響聲；這會勾起他太多回憶。數以萬計的人——多半是年輕人——聚攏在柏林墻的周圍，有些還爬上了墻頭，高聲歌唱，大喊大叫，手里搖晃著被德國人稱為“塞克特”（Sekt）的甜味氣泡酒酒瓶，瓶塞躥了出來，黏稠的泡沫如雨點般澆灑在人們頭上。

有些人高喊口號：“我們是一家人！”（Wir sind das Volk!），有的則唱道：“我們同根同種！”然而，那晚的空氣里并沒有飄散著民族主義或咄咄逼人的氣氛。世界各國的人們齊聚于此，就像參加一次政治集會式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Woodstock），只是沒有搖滾樂隊。人們慶祝自由、重逢和對美好世界的向往。在這個世界里，昔日的苦澀經歷不會重蹈覆轍；不會有鐵絲網，不會有集中營，也不會有殺戮。年輕的感覺真好。如果說貝多芬的《世間眾人皆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這一作品有寓意的話，那么其在柏林這個無與倫比的新年夜里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

在午夜過去差不多一刻鐘后，我和姐姐突然意識到自己和父親在人群里走散了，人群里三層外三層，擠得不能動彈。我們四處找他，身旁焰火劃破夜空，響起一片震耳欲聾的爆鳴聲。周圍四處都是人們的臉龐，在火光的照耀下看著有些歇斯底里。我們擠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父親。沒了他，慶祝活動變得索然無味。在惴惴不安中，我們回到了酒店。

斷斷續續睡了幾小時后，房門開了。父親就站在門口，臉上掛了彩，纏著繃帶。午夜鐘聲敲響時，柏林的人群以一聲聲巨響慶祝新年來臨，父親所站的地方恰好是他曾經躲避英國人空襲、“斯大林管風琴”和德國狙擊手打冷槍的地點，就在這時，一枚炮仗不知怎的找上門來，正中他的眉宇之間。

# 注釋

第一部分　解放心態

## 第一章　歡騰

［1］引自本·謝潑德，《漫漫回鄉路：二戰后續》（紐約：Alfred A. Knopf出版社，2010），69頁。

［2］馬丁·吉爾伯特，《戰爭結束的這天：1945年5月8日——歐洲的勝利》（紐約：Henry Holt出版社，1994），128頁。

［3］布萊恩·烏爾庫哈特，《經歷和平與戰爭的一生》（紐約：Harper & Row出版社，1987），128頁。

［4］這則故事在大衛·斯塔福德的《終章，1945：二戰末期丟失的章節》（紐約：Little, Brown出版社，2007）一書中曾有詳述。

［5］摘自朱可夫回憶錄，轉引自吉爾伯特，《戰爭結束的這天》。

［6］西蒙娜·德·波伏娃，《時勢的力量》（紐約：G. P. Putnam’s sons出版社，1963），30頁。

［7］吉爾伯特，《戰爭結束的這天》，322頁。

［8］同上，319頁。

［9］烏爾庫哈特，《經歷和平與戰爭的一生》，85頁。

［10］大衛·考夫曼，邁克爾·霍恩，《加拿大人在荷蘭，1944—1945》（荷蘭拉倫：Luitingh出版社，1981），119頁。

［11］邁克爾·霍恩，《不止是香煙、性愛和巧克力：加拿大軍人在荷蘭，1944—1945》，載《加拿大研究學報》1981年秋/冬刊，156—173頁。

［12］引自霍恩，《不止是香煙、性愛和巧克力》，166頁。

［13］同上，169頁。

［14］引自約翰·威爾盧比，《占領德國早期美軍的性行為》，《軍事史學刊》62期第1卷（1998年1月），166—167頁。

［15］伯努瓦特·格魯，弗洛拉·格魯，《四只手寫日記》（巴黎：Denoël出版社，1962）。

［16］參考帕特里克·布伊松，《1940——1945：放蕩的歲月》（巴黎：Albin Michel出版社，2009）。

［17］魯迪·范·丹齊格，《獻給迷途士兵》（阿姆斯特丹：Arbeiderspers出版社，1986）。

［18］布伊松，《1940—1945：放蕩的歲月》，324頁。

［19］烏爾庫哈特，《經歷和平與戰爭的一生》，81頁。

［20］本·謝潑德，《破曉之后：解放貝爾森集中營，1945》（紐約：Schocken出版社，2005）。

［21］同上，99頁。

［22］同上，133頁。

［23］理查德·沃爾海姆，《樹葉做成的床》，《倫敦書評》2003年12月4日刊，3—7頁。

［24］謝潑德，《破曉之后》，138頁。

［25］阿迪娜·格羅斯曼，《猶太人，德國人和盟軍：在被占領德國的近距離接觸》（新澤西：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7），188頁。

［26］謝潑德，《漫漫回鄉路》，299頁。

［27］同上，70頁。

［28］諾曼·劉易斯，《那不勒斯1944：身陷意大利迷宮的情報官》（紐約：Eland出版社，2011），52頁。

［29］約翰·道爾，《擁抱戰敗：二戰后的日本》（紐約：Norton出版社，1999），126頁。

［30］同上，102頁。

［31］西奧多·科恩，《重塑日本：美國占領的新政》，由赫伯特·帕辛編輯（紐約：自由出版社，1987），123頁。

［32］《致唐納德·金的一封信》，轉引自奧蒂斯·凱麗編輯的《來自被毀滅帝國的書信：日本、中國、朝鮮，1945—1946》（東京&amp;紐約：Kodansha出版社，1984），96頁。

［33］威廉·L. 沃登，《美國大兵教化日本鬼子》，《周六晚報》1945年12月15日，18—22版。

［34］要了解更多有關“潘潘女”文化的信息，約翰·道爾的《擁抱戰敗》提供了出色的借鑒。

［35］道爾，《擁抱戰敗》，134頁。

［36］約翰·拉切爾達，《征服者來喝茶：麥克阿瑟治下的日本》（新澤西New Brunswick：拉特格斯大學出版社，1946），51頁。

［37］同上，54頁。

［38］道爾，《擁抱戰敗》，579頁。

［39］吉勒·麥克唐納夫，《帝國之后：盟軍占領的血腥歷史》（紐約：Basic Books出版社，2007），79頁。

［40］克勞斯——迪特瑪·漢克，《美國占領下的德國》（慕尼黑：R.Oldenbourg出版社，1995），201頁。

［41］達格馬爾·赫爾佐格，《法西斯主義后的性：20世紀德國的記憶和道德》（新澤西：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5），69頁。

［42］約翰·威爾盧比，《美軍的性行為》，167頁。

［43］格魯勒，《四只手寫日記》，397頁。

［44］麥克唐納夫，《帝國之后》，236頁。

［45］野坂昭如，《美國羊棲菜》（東京：新潮社，2003），首次出版于1972年。

［46］麥克唐納夫，《帝國之后》，369頁。

［47］《泰晤士報》（倫敦）1945年7月9日。

［48］約翰·威爾盧比，《美軍的性行為》，158頁。

［49］《紐約時報》1945年6月13日。

［50］佚名，《柏林女人——在淪陷城市的八周：一部日記》（紐約：大都會圖書出版社，2005）。

［51］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乗II》（東京：巖波書店，1987），285頁。

［52］同上，278頁。

［53］引自唐納德·金，《如此可愛的國家永不會滅亡：戰時日本作家的日記》（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0），149頁。

［54］拉切爾達，《征服者來喝茶》，23—24頁。

［55］漢克，《美國占領下的德國》，199頁。

［56］同上。

［57］理查德·貝塞爾，《德國1945：從戰爭到和平》（紐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9），204頁。

［58］伊麗莎白·海內曼，《有丈夫有何不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社，2003），100頁。

［59］引自威爾盧比，《美軍的性行為》，169頁。

［60］金，《如此可愛的國家永不會滅亡》，171頁。

［61］威爾盧比，《美軍的性行為》，160頁。

［62］庫爾喬·馬拉帕爾泰，大衛·摩爾譯，《皮膚》（紐約：《紐約書評》出版社，2013），39頁，首次出版于1952年。

［63］轉引自赫爾曼·德·利阿格·波爾，《向導》季刊，1985年5月，250頁。

［64］同上，251頁。

［65］布伊松，《1940—1945：放蕩的歲月》，411頁。

## 第二章　饑餓

［1］J. L. 范德波，《二戰中的鹿特丹》（鹿特丹：Boom出版社，2006），679頁。

［2］《紐約時報》1945年5月12日。

［3］謝潑德，《破曉之后》，109頁。

［4］埃德蒙·威爾遜，《導游手冊上不存在的歐洲：意大利、希臘和英國廢墟的素寫》（倫敦：Secker &amp; Warburg出版社，1948），125頁。

［5］同上，120頁。

［6］安東尼·比弗，阿爾特密斯·庫珀，《光復后的巴黎，1944—1949》修訂版（紐約：企鵝出版社，2004），103頁。該書首次出版于1994年。

［7］斯蒂芬·斯彭德，《歐洲目擊者》（紐約：Reynal &amp; Hitchcock出版社，1946），107頁。

［8］同上，106頁。

［9］威爾遜，《導游手冊上不存在的歐洲》，136頁。

［10］同上，146頁。

［11］同上，147頁。

［12］馬勞伊·山多爾，《匈牙利回憶錄，1944—1948》（布達佩斯：Corvina出版社與中歐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1996），193—194頁。

［13］卡爾·楚克邁爾，《致美國戰爭部的德國戰地報告》，（哥廷根：Wallstein出版社，2004），142頁。

［14］斯彭德，《歐洲目擊者》，15頁。

［15］《紐約先驅導報》1945年12月31日。

［16］凱麗編，《來自被毀滅帝國的書信》，15頁。

［17］道爾，《擁抱戰敗》，103頁。

［18］同上，63頁。

［19］麥克唐納夫，《帝國之后》，315頁。

［20］羅納德·斯佩克特，《帝國的廢墟：日本投降和爭奪戰后亞洲的戰斗》（紐約：蘭登書屋，2007），56頁。

［21］引自貝塞爾，《德國1945》，334頁。

［22］《紐約時報》1945年10月27日。

［23］小朱利安·塞巴斯蒂安·巴赫，《美國的德國，占領期的回憶》（紐約：蘭登書屋，1946），26頁。

［24］《每日鏡報》1945年10月5日，轉引自謝潑德，《漫漫回鄉路》，129頁。

［25］引自謝潑德，《漫漫回鄉路》，156頁。

［26］參謀長聯席會議第1380/15條令，第296章節，轉引自科恩，《重塑日本》，143頁。

［27］麥克唐納夫，《帝國之后》，479頁。

［28］國會發言，轉引自科恩，《重塑日本》，145頁。

［29］引自諾曼·M. 奈馬克，《俄國人在德國，蘇占區的歷史，1945—1949》（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5），181頁。

［30］科恩，《重塑日本》，144頁。

［31］同上，142頁。

［32］赫爾曼·德·利阿格·波爾，《向導》季刊，246頁。

［33］威利·A. 波爾克，《黑市，1945—1948》（布倫瑞克：Westermann出版社，1986），76頁。

［34］坂口安吾，《墮落論》平裝新版（東京：筑摩書房，2008），228頁。該書首次出版于1946年。

［35］道爾，《擁抱戰敗》，139頁。

［36］藤原作彌，《満州、少國民の戦記》（東京：新潮文庫，1984），82頁。

［37］引自貝塞爾，《德國1945》，337頁。

［38］楚克邁爾，《德國戰地報告》，111頁。

［39］歐文·海門特，《置身大屠殺幸存者中間：美國陸軍少校歐文·海門特發自蘭德斯堡難民營的書信》（辛辛那提：美國猶太人檔案館，1982），63頁。

［40］卡洛·戴斯特，《巴頓，戰爭天才》（紐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6），755頁。

［41］參考謝潑德，《漫漫回鄉路》，235頁。

［42］《揚基人》1945年8月10日刊，6頁。

［43］引自斯塔福德，《終章，1945》，507頁。

［44］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命運之旅，報告與自白：1940—1948年的亡命天涯》（慕尼黑：Piper出版社，1986），276頁。

## 第三章　復仇

［1］諾曼·M.奈馬克，《仇恨之火：20世紀歐洲的種族清洗》（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1），118頁。

［2］塔德烏什·博羅夫斯基，《去毒氣室請這邊走，女士們先生們》（紐約：Viking出版社，1967）。

［3］吉爾伯特，《戰爭結束的這天》，38頁。

［4］謝潑德，《破曉之后》，113頁。

［5］魯斯·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戰場柏林：日記，1945—1948》（紐約：Paragon House出版社，1990），99頁。

［6］漢斯·格拉夫·馮·雷恩多夫，《東普魯士日記（1945—1947年一個東普魯士醫生的日記見聞）》（慕尼黑：DTV出版社，1967），67頁。

［7］同上，74頁。

［8］奈馬克，《俄國人在德國》，72頁。

［9］貝塞爾，《德國1945》，155頁。

［10］岡田和裕，《満州安寧飯店》（東京：潮書房光人社，2002），103頁。

［11］同上，128頁。

［12］奈馬克，《俄國人在德國》，108頁。

［13］佚名，《柏林女人——在淪陷城市的八周：一部日記》（紐約：大都會圖書出版社，2005），86頁。

［14］奈馬克，《俄國人在德國》，79頁。

［15］引自布伊松，《1940—1945：放蕩的歲月》，387頁。

［16］同上，251—252頁。

［17］楊·格羅斯，《恐懼：奧斯維辛后的波蘭反猶主義》（紐約：蘭登書屋，2006），82頁。

［18］安娜·比孔特，《我們來自Jedawabne》（My z Jedawabnego）（華沙：Prószyński i S-ka出版社，2004），盧卡什·索默爾翻譯章節。

［19］哈琳娜·溫德·普雷斯頓1977年7月26日所做的證詞，www.yadvashem.org/yv/en/ righteous/stories/related/preston\_testimony. asp.

［20］托尼·朱特，《戰后：1945年后的歐洲歷史》（紐約：企鵝出版社，2005），58頁。

［21］格羅斯，《恐懼》，40頁。

［22］奈馬克，《仇恨之火》，122頁。

［23］謝潑德，《漫漫回鄉路》，122頁。

［24］克里斯蒂安·馮·克羅科，《女人的時刻》（紐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1），96頁。

［25］克里斯蒂安·馮·克羅科，《波美拉尼亞之行: 一片神秘大地的報告》（慕尼黑：德意志袖珍書出版社，1985），215頁。

［26］赫伯特·胡普卡編，《西里西亞的最后一天》（慕尼黑：Langen Müller出版社，1985），138頁。

［27］同上，81頁。

［28］厄恩斯特·榮格，《占領的歲月》（斯圖加特：Ernst Klett出版社，1958），213—214頁。

［29］克羅科，《女人的時刻》，110頁。

［30］麥克唐納夫，《帝國之后》，128頁。

［31］瑪格麗特·舍爾，《布拉格日記：1945—1946》（波恩：聯邦流離人員部，1957），12頁。

［32］同上，48頁。

［33］同上，99頁。

［34］同上，41頁。

［35］麥克唐納夫，《帝國之后》，406頁。

［36］迪娜·波拉特，《麻雀的墜落：阿巴·科夫納的生活和時代》（加州：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9），214頁。

［37］同上，212頁。

［38］同上，215頁。

［39］阿巴·科夫納，《我的小妹妹和精選詩集，1965—1985》（俄亥俄州歐柏林：歐柏林大學出版社，1986）。

［40］朱特，《戰后》，33頁。

［41］哈羅德·麥克米倫，《戰爭的爆炸，1939—1945》（紐約：Harper &amp; Row出版社，1967），576頁。

［42］威爾遜，《導游手冊上不存在的歐洲》，147頁。

［43］數據轉引自羅伊·P. 多梅內科，《審判意大利法西斯，1943—1948》（北卡羅來納州教堂山：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1999），149頁。

［44］威爾遜，《導游手冊上不存在的歐洲》，157頁。

［45］麥克米倫，《戰爭的爆炸》，193頁。

［46］同上，501頁。

［47］阿蘭·斯卡弗，溫迪·斯卡弗，《所有的悲傷：移民回憶希臘反法西斯抵抗運動，1941—1949》（澳洲悉尼：Hale &amp; Iremonger出版社，1994），95頁。

［48］麥克米倫，《戰爭的爆炸》，499頁。

［49］馬克·馬卓爾編，《戰爭結束后：重建希臘的家庭、民族和國家，1943—1960》（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0年），27頁。

［50］麥克米倫，《戰爭的爆炸》，547頁。

［51］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7月13日刊。

［52］麥克米倫，《戰爭的爆炸》，515頁。

［53］威爾遜，《導游手冊上不存在的歐洲》，197頁。

［54］斯佩克特，《帝國的廢墟》，90頁。

［55］謝文慶，《馬來亞的華人和馬來族沖突，1945—1946：共產主義仇殺和伊斯蘭抵抗運動》，《東南亞研究學報》第12輯（1981年3月），108—117頁。

［56］吉迪昂·弗朗索瓦·雅各布斯，《季風的前兆》（南非開普敦：Purnell父子出版社，1965），124頁。

［57］斯佩克特，《帝國的廢墟》，174頁。

［5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革命時期的爪哇：占領與抵抗，1944—1946》（雅加達：Equinox出版社，2005）。

［59］L. 德容，《二戰中的荷蘭王國》第11版（荷蘭國家出版社，1986）。

［60］西奧多·福萊恩德，《印尼的命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3），27頁。

［61］楊·A. 克蘭切編，《荷屬東印度的決定性歲月，1942——1949：日本侵略、奴役歐洲人和誕生自由印尼的革命——生還者的回憶》（北卡羅來納州杰斐遜：MacFarland出版社，1996），193頁。

［62］斯佩克特，《帝國的廢墟》，179頁。

［63］德容，《二戰中的荷蘭王國》，582頁。

［64］安德森，《革命時期的爪哇》，166頁。

［65］斯佩克特，《帝國的廢墟》，108頁。

［66］讓·路易·普朗什，《1945年的塞提夫：事先宣告的屠殺史》（巴黎：貝漢出版社，2006），139頁。

［67］馬丁·埃文斯，《阿爾及利亞：法國未經宣布的戰爭》（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68］弗朗索瓦絲·馬丁，《法屬東京的悲劇時刻：1945年3月9日—1946年3月18日》（巴黎：Berger-Levrault出版社，1947），133頁。

［69］大衛·G. 瑪爾，《1945年的越南：追求權力之路》（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5），333頁。

［70］馬丁，《法屬東京的悲劇時刻》，179頁。

［71］同上，129頁。

［72］斯佩克特，《帝國的廢墟》，126頁。

第二部分　清理廢墟

## 第四章　回家

［1］詳細分析請見蒂莫西·斯奈德的權威力作《流血之地：希特勒和斯大林夾擊下的歐洲》（紐約：Basic Books出版社，2010）。

［2］伊姆雷·凱爾泰斯，《無命運的人生》（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

［3］引自迪恩克·洪迪烏斯，《大屠殺幸存者和荷蘭反猶主義》（康涅狄格州韋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2003），103頁。

［4］同上，101頁。

［5］羅杰·伊高，《四十連士兵！……回憶錄》（巴黎：Albin Michel出版社，1986），95頁。

［6］瑪格麗特·杜拉斯，《戰爭》（紐約：萬神殿出版社，1986），15頁。

［7］同上，14頁。

［8］同上，53頁。

［9］坂口安吾，《墮落論》，227頁。

［10］道爾，《擁抱戰敗》，58頁。

［11］佚名，《聲音集》第一卷（東京：朝日新聞社，1984），103頁。該書為讀者來信集。

［12］同上，104頁。

［13］比爾·莫爾丁，《回家》（紐約：William Sloane出版社，1947），18頁。

［14］同上，45頁。

［15］同上，54頁。

［16］尼古拉·托爾斯泰，《大臣與大屠殺》（倫敦：世紀哈奇森出版社，1986），31頁。

［17］引自格里格爾·達拉斯，《1945：永不結束的戰爭》（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5），519頁

［18］托爾斯泰，《大臣與大屠殺》，13頁。

［19］同上。

［20］尼古拉斯·貝塞爾，《最后的秘密：英美兩國把200多萬俄國人交給斯大林》（紐約：Basic Books出版社，1974），86頁。

［21］同上，87頁。

［22］博里沃耶·M. 卡拉潘迪奇，《南斯拉夫最血腥的春天：鐵托的卡廷森林和古拉格》（紐約：Carlton出版社，1980），73頁。

［23］麥克米倫，《戰爭的爆炸》，436頁。

［24］謝潑德，《漫漫回鄉路》，80頁。

［25］貝塞爾，《最后的秘密》，18—19頁。

［26］同上，133頁。

［27］同上，138頁。

［28］同上，142頁。

［29］同上，140頁。

［30］達拉斯，《1945》，560頁。

［31］《揚基人》1945年8月24日刊。

［32］達拉斯，《1945》，549頁。

［33］奈馬克，《仇恨之火》，109頁。

［34］同上，110頁。

［35］雷恩多夫，《東普魯士日記》，169頁。

［36］胡普卡，《西里西亞最后一天》，265頁。

［37］榮格，《占領的歲月》，195頁。

［38］本作者同弗里茨·施特恩的談話。

［39］引自貝塞爾，《德國1945》，223頁。

［40］胡普卡，《西里西亞最后一天》，64頁。

［41］《揚基人》1945年9月21日刊，16頁。

［42］奈馬克，《仇恨之火》，112頁。

［43］同上，115頁。

［44］安東尼·波龍斯基，伯雷沙拉夫德魯克伊，《波蘭共產主義統治的肇始》，《倫敦和波士頓：勞特里奇和Kegan Paul出版社，1980》，425頁。

［45］格羅斯曼，《猶太人，德國人和盟軍》，199頁。

［46］格羅斯曼轉引自他人，148頁。

［47］同上，147頁。

［48］《紐約先驅論壇報》1945年12月31日。

［49］海門特，《置身大屠殺幸存者中間》，21頁。

［50］格羅斯曼，《猶太人，德國人和盟軍》，181頁。

［51］引自哈吉特·拉夫斯基，《新開端：貝爾森集中營的大屠殺幸存者與德國的英占區，1945——1950》（底特律：恩州立大學出版社，2002），64頁。

［52］羅森薩夫特本人從未在以色列定居。很明顯，他告訴一些以色列人，“你們跳霍拉舞的時候我們卻在火葬場被一把火燒了”。（轉引自謝潑德，《漫漫回鄉路》，367頁）。

［53］海門特，《置身大屠殺幸存者中間》，47—48頁。

［54］引自沙布泰·特維斯，《本-古里安：燃燒的大地，1886—1948》（波士頓：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7），853頁。

［55］阿維賽·瑪格麗特，《利用大屠殺的人》，《紐約書評》1994年2月14日刊。

［56］湯姆·賽杰夫，《第700萬：以色列人和大屠殺》（紐約：希爾&amp;王出版社，1993），99—100頁。

［57］特維斯，《本-古里安》，871頁。

［58］同上，870頁。

［59］海門特，《置身大屠殺幸存者中間》，66頁。

［60］特維斯，《本-古里安》，873頁。

［61］《哈里森報告》，以美國駐政府間難民委員會特使厄爾·G. 哈里森命名。

［62］杜魯門于1945年8月31日寄給艾德禮的信。

［63］資料圖片1049/81/177，引自《重生》，會議記錄，梅納赫姆·羅森薩夫特整理（華盛頓DC，2001），101頁。

［64］貝塞爾，《最后的秘密》，8頁。

## 第五章　瀝干毒藥

［1］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戰場柏林》，27頁。

［2］呂克·烏伊斯，斯蒂芬·東特，《打擊通敵行為，1942—1945：過去永在眼前》（布魯塞爾：CRISP出版社，1991），147頁。

［3］袖井林二郎編，《親愛的麥克阿瑟將軍：美占期的日本人來信》（紐約：Rowman &amp; Littlefield出版社，2001），70頁。

［4］同上，87頁。

［5］同上，78頁。

［6］美國國家——戰爭——海軍協調委員會政令，轉引自漢斯·H. 貝瓦爾德，《美占期的清算日本領導人行動》（加州：伯克利大學出版社，1959），7頁。

［7］轉引自弗比安·鮑爾斯，《日本如何贏得戰爭》，《紐約時報雜志》1970年8月30日刊。

［8］科恩，《重塑日本》，85頁。

［9］參見弗朗茨·諾伊曼，《龐然大物：國家社會主義的結構和行事方式，1933—1944》，由彼得·海耶斯重新作序（芝加哥：Ivan R Dee出版社，2009，與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博物館合作出版）。該書首次出版于1942年。

［10］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戰場柏林》，100頁。

［11］同上，101頁。

［12］詹姆斯·F. 騰特，《萊茵河上的使命：在美占區的再教育和去納粹化》（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2），55頁。

［13］楚克邁爾，《德國戰地報告》，137頁。

［14］蒂莫西·R. 沃格特，《蘇占區的去納粹化：勃蘭登堡州，1945——1948》（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0），34頁。

［15］同上，38頁。

［16］湯姆·鮑爾，《遭背叛的誓言：美英兩國和戰后德國的去納粹化》（紐約州花園城：雙日出版社，1982），148頁。

［17］同上，8頁。

［18］漢克，《美國占領下的德國》，487頁。

［19］科恩，《重塑日本》，161頁。

［20］杰羅姆·伯納德·科恩，《戰時和重建時期的日本經濟》（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49），432頁。

［21］科恩，《重塑日本》，154頁。

［22］袖井林二郎編，《親愛的麥克阿瑟將軍》，176頁。

［23］同上，177頁。

［24］拉切爾達，《征服者來喝茶》，25頁。

［25］科恩，《重塑日本》，45頁。

［26］道爾，《擁抱戰敗》，530頁。

［27］凱麗編，《來自被毀滅帝國的書信》，107頁。

［28］查默斯·約翰遜，《通產省與日本的奇跡：工業政策的增長，1925—1975》（加州：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2），42頁。

［29］特奧多羅·阿貢西羅，《重要的歲月：日本在菲律賓的冒險，1941—1945》（菲律賓奎松城：R. P. Garcia出版社，1965），672頁。

［30］斯坦利·卡諾，《按照我們的形象：菲律賓的美帝國》（紐約：蘭登書屋，1989），327頁。

［31］同上，328頁。

［32］陶涵，《委員長：蔣介石與中國走向現代的奮斗》（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9），323頁。

［33］基恩寫給狄柏瑞的書信，摘自凱麗編，《來自被毀滅帝國的書信》，128頁。

［34］斯佩克特，《帝國的廢墟》，41頁。

［35］文安立，《冷戰與革命：美蘇對抗和中國內戰的起源：1944—1946》（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3），90頁。

［36］關于安寧飯店的書有兩本，一本是岡田和裕，《満州安寧飯店》（潮書房光人社，2002），另一本是藤原作彌，《満州、少國民の戦記》，均在第二章引用過。

［37］彼得·諾維克，《反對維希政權的抵抗力量：在法國光復后清算通敵者》（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8），40頁。

［38］同上，77—78頁。

［39］轉引自比弗，庫珀，《光復后的巴黎》，104頁。

## 第六章　法治

［1］藤原作彌，《満州、少國民の戦記》，175頁。

［2］馬勞伊，《匈牙利回憶錄》，188頁。

［3］伊斯特凡·狄阿克，楊·托馬什·格羅斯，托尼·朱特編，《歐洲報復的政治原因：二戰和后續》（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0），235頁。

［4］同上。

［5］同上，237頁。

［6］同上，235頁。

［7］同上，134頁。

［8］同上，135頁。

［9］馬卓爾編，《戰爭結束后》，31頁。

［10］李·薩拉菲斯，《德斯卡提的治安，1942—1946》，摘自馬卓爾編，《戰爭結束后》，215頁。

［11］阿蘭·斯卡弗，溫迪·斯卡弗，《所有的悲傷》，165—166頁。

［12］E. D. A. 莫爾斯海德的譯文。

［13］引自約翰·W. 鮑威爾，《日本的細菌戰：美國掩蓋的戰爭罪行》，《亞洲學者公報》第12期（1980年9/10月刊），9頁。

［14］勞倫斯·泰勒，《將軍站上審判席：本間雅晴，山下奉文和麥克阿瑟》（印第安納州南本德：Icarus出版社，1981），125頁。

［15］“審判馬來亞之虎”，《揚基人》1945年11月30日刊。

［16］泰勒，《將軍站上審判席》，137頁。

［17］A. 弗蘭克·里爾，《山下將軍的案子》（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49），34頁。

［18］理查德·L. 萊爾，《山下的先例：戰爭罪行和指揮責任》（特拉華州威明頓：研究資源出版社，1982），111頁。

［19］泰勒，《將軍站上審判席》，195頁。

［20］萊爾，《山下的先例》，118頁。

［21］引自J. 肯尼斯·布羅迪，《審判皮埃爾·拉瓦爾：在二戰法國定義叛國、通敵和愛國》（新澤西州新布朗斯維克：交易出版社，2010），136頁。

［22］《時代》雜志，1932年1月4日。

［23］杰弗瑞·沃納，《皮埃爾·拉瓦爾和法蘭西的黯淡》（紐約：麥克米倫出版社，1969），301頁。

［24］關于米塞特的罪行，詳見特賽爾·波爾曼著，《米塞特集團：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和其親信》（阿姆斯特丹：Boom出版社，2012）。

［25］《時代》雜志，1945年10月15日。

［26］讓——保羅·古安特，《皮埃爾·拉瓦爾》（巴黎：Fayard出版社，1993），517頁。

［27］雅克·夏龐蒂埃，《為自由服務》（巴黎：Fayard出版社，1949），268頁。

［28］胡伯特·科爾，《拉瓦爾》（倫敦：Heinemann出版社，1963），283頁。

［29］古安特，《皮埃爾·拉瓦爾》，527頁。

［30］楊·梅耶斯，《米塞特》（阿姆斯特丹：De Arbeiderspers出版社，1984），277頁。

［31］同上，275頁。

［32］古安特，《皮埃爾·拉瓦爾》，537頁。

［33］引自諾維克，《反對維希政權的抵抗力量》，177頁。

［34］喬治·凱南，《回憶錄1925—1950》（波士頓：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67年），260頁。

［35］道爾，《擁抱戰敗》，445頁。

［36］泰爾福德·泰勒，《剖析紐倫堡審判：個人回憶錄》（紐約：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92），29頁。

［37］斯彭德，《歐洲目擊者》，221頁。

［38］《揚基人》1945年5月18日刊。

［39］德懷特·D. 艾森豪威爾紀念委員會網站。

［40］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4月20日。

［41］倫敦《每日鏡報》1945年4月20日。

［42］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4月28日。

［43］謝潑德，《破曉之后》，166頁。

［44］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9月27日。

［45］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11月9日。

［46］謝潑德，《破曉之后》，171—172頁。

［47］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11月8日。

［48］厄恩斯特·米歇爾，《DANA報告》，1945年1月9日。

［49］麗貝卡·韋斯特，《紐約客》，1946年10月26日。

［50］泰爾福德·泰勒，《剖析紐倫堡審判》，25頁。

［51］同上，26頁。

［52］厄恩斯特·米歇爾，《DANA報告》，1946年2月15日。

［53］榮格，《占領歲月》，176頁。

［54］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戰場柏林》，63—64頁。

［55］泰爾福德·泰勒，《剖析紐倫堡審判》，167—168頁。

第三部分　絕不讓歷史重演

##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參見赫爾曼·朗格拜恩，《斷絕一切希望：納粹集中營中的抵抗力量，1938—1945》（紐約：Paragon House出版社，1994），502頁。

［2］《曼徹斯特衛報》1945年7月27日。

［3］倫敦《每日電訊報》2003年7月11日。

［4］《曼徹斯特衛報》1945年7月27日。

［5］同上。

［6］哈羅德·尼克爾森著，奈格爾·尼克爾森編，《哈羅德·尼克爾森日記，1907—1964》（倫敦：Weidenfeld &amp; Nicolson出版社，2004），321頁。

［7］哈羅德·麥克米倫，《命運的潮汐，1945—1955》（紐約：Harper &amp; Row出版社，1969），32頁。

［8］同上，33頁。

［9］尼克爾森著，《哈羅德·尼克爾森日記》，318頁。

［10］威爾遜，《導游手冊上不存在的歐洲》，135頁。

［11］同上，186頁。

［12］諾埃爾·安南，《變化中的敵人：德國的戰敗和重生》（紐約：Norton出版社，1996），183頁。

［13］保羅·艾迪遜，《現在戰爭結束了：英國社會史，1945—1951》（倫敦喬納森·凱普出版社和英國廣播公司，1985），14頁。

［14］同上，13頁。

［15］西里爾·康納利，《地平線》1945年6月，在《觀念和地位》中再版（倫敦：Weidenfeld &amp; Nicolson出版社，1953），27頁。

［16］《曼徹斯特衛報》1945年6月5日。

［17］《曼徹斯特衛報》1945年6月26日。

［18］羅伊·詹金斯，《艾德禮先生：一部臨時工自傳》（倫敦：Heinemann出版社，1948），255頁。

［19］斯蒂法尼·艾賽爾，《憤怒吧！》（法國蒙彼利埃：Indigène Editions出版社），10頁。

［20］杜拉斯，《戰爭》，33頁。

［21］亞瑟·庫斯勒，《瑜伽士和政委》（紐約：麥克米倫出版社，1945），82頁。

［22］艾迪遜，《現在戰爭結束了》，18頁。

［23］安南，《變化中的敵人》，183頁。

［24］溫斯頓·丘吉爾，《對學術青年所作的演講》，蘇黎世，1946年9月9日。

［25］尼克爾森著，《哈羅德·尼克爾森日記》，333頁。

［26］讓·莫奈，《回憶錄》（巴黎：Fayard出版社，1976），283頁。

［27］參見特賽爾·波爾曼，《從一片澤國到鳳凰涅槃：J. A. 林格斯的生平（1885—1965）》（阿姆斯特丹：Boom出版社，2006年）。

［28］道爾，《擁抱戰敗》，537頁。

［29］同上。

［30］同上，538頁。

［31］歐文·拉鐵摩爾，《亞洲的解決方案》（波士頓：Little，Brown出版社，1945），189頁。

［32］科恩，《重塑日本》，42頁。

［33］森田芳夫，《朝鮮終戦の記録：米ソ両軍の進駐と日本人の引揚》（東京：巌南堂書店，1964），77頁。

［34］布魯斯·康明斯，《朝鮮戰爭的起源：獨立政權的解放和誕生，1945—1947》（新澤西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1），88頁。

［35］《揚基人》1945年11月2日刊。

［36］凱麗編，《來自被毀滅帝國的書信》，32頁。

［37］《揚基人》1945年11月2日刊。

［38］康明斯，《朝鮮戰爭的起源》，392頁。

［39］斯佩克特，《帝國的廢墟》，163頁。

［40］同上，160頁。

［41］同上，148頁。

［42］凱麗編，《來自被毀滅帝國的書信》，197頁。

［43］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傳，1883—1946：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客》（紐約企鵝出版社，2005年），779頁。

［44］尼克爾森著，《哈羅德·尼克爾森日記》，325頁。

［45］朱特，《戰后》，88頁。

## 第八章　教化野蠻人

［1］道爾，《擁抱戰敗》，215—217頁。

［2］安南，《變化中的敵人》，160頁。

［3］同上，162頁。

［4］德布林和福伊希特萬格，轉引自騰特，《萊茵河上的使命》，23頁。

［5］轉引自騰特，《萊茵河上的使命》，39頁。

［6］尼古拉斯·普羅內，凱斯·威爾遜編，《二戰后對德國和其盟友的政治改造》（倫敦：Groom Helm出版社，1985），198頁。

［7］君特·格拉斯，《剝洋蔥》（哥廷根：Steidl出版社，2006），220—221頁。

［8］約翰·金伯爾，《美國占領下的德國社區：馬爾堡，1945—1952》（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1），168頁。

［9］普羅內，威爾遜編，《二戰后對德國和其盟友的政治改造》，173頁。

［10］《揚基人》1945年7月20日刊。

［11］同上。

［12］斯彭德，《歐洲目擊者》，229頁。

［13］《揚基人》1945年7月20日刊。

［14］斯彭德，《歐洲目擊者》，44頁。

［15］同上，46頁。

［16］同上，158頁。

［17］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戰場柏林》，82頁。

［18］奈馬克，《俄國人在德國》，399頁。

［19］同上，402頁。

［20］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戰場柏林》，66頁。

［21］巴赫，《美國的德國》，228頁。

［22］同上。

［23］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戰場柏林》，92頁。

［24］巴赫，《美國的德國》，218頁。

［25］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7月11日。

［26］道爾，《擁抱戰敗》，190頁。

［27］波伏娃，《時勢的力量》，17頁。

［28］同上，33頁。

［29］科琳娜·德福朗斯，《萊茵河左岸的法國文化政治，1945—1946》（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大學出版社，1994），126頁。

［30］德布林，《命運之旅》，273頁。

［31］引自莫奈，《回憶錄》，339頁。

［32］巴頓·J. 伯恩斯坦編，《原子彈：關鍵問題》（波士頓：Little，Brown出版社，1976），113頁。

［33］道爾，《擁抱戰敗》，218頁。

［34］同上，77頁。

［35］愛德華·T. 因帕托，《麥克阿瑟將軍：演講和報告，1908—1964》（肯塔基州帕杜卡：Turner出版社，2000），146頁。

［36］包爾斯，《日本如何贏得戰爭》。

［37］同上。

［38］《每日新聞》，引自道爾，《擁抱戰敗》，549頁。

［39］袖井林二郎，《親愛的麥克阿瑟將軍》，33頁。

［40］道爾，《擁抱戰敗》，77頁。

［41］引自包爾斯，《日本如何贏得戰爭》。

［42］引自《占領日本》，麥克阿瑟紀念館圖書檔案館協辦的研討會，1975年11月，129頁。

［43］拉切爾達，《征服者來喝茶》，165—166頁。

［44］佚名，《聲音集》第一卷，115頁。

［45］道爾，《擁抱戰敗》，67頁。

［46］金，《如此可愛的國家永不會滅亡》，118頁。

## 第九章　同一個世界

［1］烏爾庫哈特，《經歷和平與戰爭的一生》，85頁。

［2］同上，93頁。

［3］斯蒂法尼·艾賽爾，《跟世紀共舞》（巴黎：Editions du Seuil出版社，1997），99頁。

［4］馬克·馬卓爾，《治理世界：思想的歷史》（紐約：企鵝出版社，2012），208頁。

［5］同上，194頁。

［6］E. B. 懷特，《狂野的旗幟：〈紐約客〉雜志關于聯邦世界政府和其他事宜的社論》（波士頓：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46），72頁。

［7］同上，82頁。

［8］門諾·斯皮林，邁克爾·溫特爾編，《歐洲身份和二戰》（紐約：麥克米倫出版社，2011），126頁。

［9］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戰爭或和平》此版附特別前言（紐約：麥克米倫出版社，1957），38頁。該書首次出版于1950年。

［10］尼爾·羅森多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核分裂癥》，收錄于約翰·劉易斯·蓋迪斯等編輯的《冷戰政治家對抗原子彈：1945年以來的核外交》（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64—69頁。

［11］約瑟夫·普雷斯頓·巴拉塔，《世界聯邦的政治：聯合國，聯合國改革，核軍控》（康涅狄格州韋斯特波特：Praeger出版社，2004），127頁。

［12］《紐約時報》1945年10月10日。

［13］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11月20日。

［14］湯森德·胡普斯，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羅斯福和聯合國的誕生》（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0），41頁。

［15］丹·普雷什，《美國，希特勒和聯合國：盟軍如何贏得二戰并構建和平》（倫敦：I. B. Tauris出版社，2011），170頁。

［16］羅斯福的話引自馬卓爾，《治理世界》，209頁。

［17］1945年6月28日，“接受堪薩斯城大學頒發榮譽學位后的講話”，trumanlibrary.org/ publicpapers/viewpapers.php？ pid=75.

［18］懷特，《狂野的旗幟》，82頁。

［19］《揚基人》1945年6月15日刊。

［20］《每日先驅報》，1945年5月。

［21］本書作者和格拉德溫·杰布外孫英尼格·托馬斯的談話。

［22］《時代》雜志，1945年5月14日。

［23］烏爾庫哈特，《經歷和平與戰爭的一生》，94頁。

［24］《民族》雜志，1945年6月30日。

［25］馬克·馬卓爾，《人權讓人意外的勝利：1933—1955》，《歷史學刊》47卷第2冊（2004年6月），392頁。

［26］威廉·羅杰·路易斯，《英國在中東的帝國，1945—1951：阿拉伯民族主義，美國和戰后帝國主義》（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84），163頁。

［27］《曼徹斯特衛報》，1945年6月4日。

［28］路易斯，《英國在中東的帝國》，148頁。

［29］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10月6日。

［30］懷特，《狂野的旗幟》，80頁。

［31］同上，81頁。

［32］小阿瑟·M. 施萊辛格，《一千天：約翰·F. 肯尼迪在白宮》（波士頓：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65），88—89頁。

［33］倫敦《泰晤士報》1945年8月17日。

［34］國務卿伯恩斯的報告，http:// avalon. law. yale. edu/ 20th\_ century/ decade18. asp.

［35］杜勒斯，《戰爭或和平》，27頁。

［36］同上，30頁。

［37］同上，40頁。

［38］《紐約時報》1945年12月31日。

# 鳴謝

如果不是因為作為訪問學者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科爾曼學者&amp;作家中心短暫訪學的經歷，很難想象我能寫就此書。對此我要感謝吉恩·斯特勞斯（Jean Strouse），科爾曼中心能力出眾的主任，還有她至關重要的副手瑪麗·多里尼（Marie D’Origny），以及向來助人為樂的保羅·德拉韋達克（Paul Delaverdac），你們把中心變成了作家的天堂。

在本書的研究階段，我從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xton）、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秦郁彥（Hata Ikuhiko）、阿維夏伊·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本·布蘭德（Ben Bland）和蓋爾特·邁克（Geert Mak）等人的建議中獲益良多。在阿姆斯特丹的NIOD研究所期間，大衛·巴爾諾（David Barnouw）和約格力·梅赫伊岑（Joggli Meihuizen）為我提供了大力幫助。馬克·馬卓爾（Mark Mazower）和杰弗里·惠特克羅夫特（Geoffrey Wheatcroft）很熱心，在不同階段都閱讀過書稿，幫助我揪出了自己斷然不可能找到的錯誤。本書倘若仍有言辭不當之處，自然全是我本人的責任。

威利出版社的安德魯·威利（Andrew Wylie），金·奧（Jin Auh）和杰奎琳·柯（Jaqueline Ko）給予了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對此我深表感謝。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還在威利出版社時，先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參與了本書的出版工作，繼而又轉投企鵝出版社，為我當起了編輯。他在兩項工作中的表現都堪稱完美。我在這里還要感謝企鵝出版社的麥利·安德森（Mally Anderson），他見證了本書從無到有的整個過程。

最后，我要對我的父親列奧·布魯瑪（Leo Buruma）和我的朋友布萊恩·烏爾庫哈特表達誠摯的謝意。他們抽時間跟我講述了自己在1945年的經歷。我將本書獻給這二位，聊表感激和敬意。

對于內子堀田江理（Eri Hotta）的耐心和鼓勵，在這里也一并表示感謝。

# 索引

（按漢語拼音順序排列，頁碼參見本書邊碼）

A

阿布斯，赫爾曼·約瑟夫，181—182，183，186

阿布斯諾特，羅伯特，152

阿登納，康拉德，282，283，294，297

阿多諾，特奧多爾，289—290

阿爾及利亞，121—124，125

阿爾及利亞饑荒，121，122

阿根廷，319

阿基諾，貝尼格諾，189，191

阿基諾，科拉松·“柯莉”，191

阿基諾三世，191

阿勒頗，323

阿倫特，漢娜，228

阿姆斯特丹，14，15，136

阿納姆，2，16，307

阿涅萊維奇，摩爾德察，161—162

埃斯庫羅斯，《歐墨尼得斯》，209—210，225

艾德禮，克萊門特，167，243，249—252，262，271，273，289，313—314

艾登，安東尼，150—151，168，321

艾立松先生，4

艾奇遜，迪安，296

艾賽爾，弗朗茨，309

艾賽爾，斯蒂法尼，252，309，322

艾森豪威爾，德懷特，17，18，42，71—72，181，305，312

艾森豪威爾和集中營，226—228

艾森豪威爾，瑪米，226—227

艾希曼，阿道夫，206，228

《愛國者》報，135

愛倫堡，伊利亞，79

愛因斯坦，阿爾伯特，313

安德烈亞斯——弗里德里希，魯斯，171—172，177—178，180，235——236，283，285—288，290—291

安東，81，196，203，204

安東妓院，196—197

安南，諾埃爾，247

安寧飯店，196—197

安特勒爾姆，羅貝爾，138—139

安田，187

岸信介，187，259—261，262，270，303

昂納克，埃里希，51

奧本海默，羅伯特，313

奧爾德魯夫集中營，226—227

奧格特洛普神父，24

奧雷斯基，J.，163—164

奧倫多夫，奧托，182

奧尼爾，康，181

奧斯維辛，93，133，161，163，182，183，206，228，229，231，232

奧匈帝國，95，158，170

B

八號法律，177—178，181

八十年戰爭，14

巴丹死亡行，213—214

巴登—巴登，73，292

巴頓，喬治，41，71，143，160，181，307

巴赫，朱利安·塞巴斯蒂安，46，47，288

巴勒斯坦，100，163—168，244

巴黎，24，25，58，273巴黎歐戰勝利日，19—22

巴托夫，哈努赫，160

白俄羅斯，319

《白皮書》，167

白思華，40，212

百威小鎮，75

班杰拉，斯捷潘，170

班克，羅夫特喬治，278

斑疹傷寒，29，56，61，81，165，228

坂口安吾，68—69，70，140

報復，9，75—80，86，98

在亞洲報復，111—113，117，118

捷克人報復德國人，95—98

波蘭人報復德國人，90—95

蘇聯人報復德國人，79—80

在意大利報復，105，106

蘇聯人報復日本人，80

報復猶太人，90

猶太人的報復，98，99—101

在越南報復，126 詳見審判

鮑德溫，漢森·W.，329

鮑爾斯，弗比安，297

鮑威爾，邁克爾，248—250

北朝鮮，191

北海道，297

北野政次，211，212

貝當，菲利普，103，137，171，198—200，219，222

審判貝當，221—22

貝多芬，路德維希·凡，278，283，337

貝爾福，詹姆斯，166

《貝爾福宣言》，166—167

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15，21，29，31—32，55—57，64，70—71，76—77，162，163，165，226，280，307

解放貝爾根—貝爾森，29—30

貝爾根—貝爾森審判，228—230，234

貝爾庫姆，彼得·范，117—118

貝爾庫姆，卡拉·范，118—119

貝克，貝阿特麗絲·M.，308

貝克，卡爾，282

貝拉，庫恩，205，207

貝洛，伊姆雷迪，206

貝奈斯，愛德華，95，97，159

貝尼托·墨索里尼，103，104，105，272，311

貝塔西，克拉拉，104

貝文，歐內斯特，327，328—329

貝希爾，約翰內斯，284，285

本島等，175n

本—古里安，大衛，164—167

本間雅晴，188，213

比爾利，羅伯特，277—278，279，284

比克瑙集中營，163，206，228

比利時，84，102，207，253

公訴通敵行為，207

幣原喜重郎，300

別列什科夫，瓦列金，20

賓科，哈達薩，56—57，229

波茨坦會議，153—155，167，173—174，279，300，329

波爾，海因里希，70

波爾熱夫人，85—86

波伏娃，西蒙娜·德，20，25，291—292

波蘭，62，253，335

德國占領波蘭，87—88

在波蘭被錯誤指責為納粹的德國人，93，94

波蘭強制將德國人遣返回德國，154—160

昔日德國領土上的波蘭德國人，91，92

波蘭猶太人，86—90，134，160—162，164，165，168

波蘭戰時地下運動領袖，320，321—322

波蘭迫害猶太人，86—87

波蘭搶劫猶太人資產，89—90

波蘭報復德國人，90—95

波蘭和西里西亞，92—93

波蘭和蘇聯，88，91，92，319—322，323，328

波蘭和聯合國，319—320

波斯尼亞，103

伯恩哈德王儲，24

伯恩斯，詹姆斯·F.，328—329柏林，22，33，59—60，72，284

柏林英美駐軍，42

柏林毀滅，4—5

柏林戰爭結束，21

《柏林每日鏡報》，72

《柏林女人》，42，83

柏林墻，22，285，335—337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德布林），72

勃朗寧將軍，F. A. M.“博伊”，16

博羅夫斯基，塔德烏什，75—76，77

《薄珈梵歌》，313

布達佩斯，59—60，133，205

布丁斯基·拉斯洛，207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133，226，231，232，241—242，252，280

布拉德福德，約翰·P.，281

布拉格，96，158—159

布拉斯科維茨，約翰內斯，16

布萊堡，147

布萊恩·烏爾庫哈特，15，16，21，29，31，307—309，321

布萊克，威廉，249—250

布萊希特，貝托爾特，《三便士歌劇》，283—284，285

布雷頓森林會議，317—318

布雷斯勞，158

布魯恩，158

布魯塞爾，273

布伊松，帕特里克，26

C

財閥，186—187，260，261

曹晚植，264，267，269

查理曼大帝，281

娼妓業，24—25，28，33，48，49

德國娼妓業，42—43

日本娼妓業，34—38，45

長春，196

長崎，271，296，298，309，327

常石，沃倫，266

朝鮮，34，106，191，262—270，272，273

朝鮮的喪權辱國，265，268，269

朝鮮的神道教寺廟，263

朝鮮的蘇聯人，264，266—269

朝鮮的政治對抗，264—265

朝鮮分裂，270

朝鮮戰爭，270，298

出生率流散人員集中營出生率，31—33

荷蘭出生率，28—29，31

私生子出生率，28—29，31，38

楚克邁爾，卡爾，40，60，71，179

D

達豪，71，76，77，165，166，226達豪被殺的黨衛隊看守，76

達揚達揚，188—189

大阪，60

大寶皇帝，121

大東亞共榮圈，187—188

大馬士革，323—325

大麥粒行動，65

大町，196—197

大衛·肖，152

大西洋憲章》，314—315，323，324

《大西洋月刊》，313

大英帝國，詳見英國

大政翼贊會，184

《大眾報》，86

戴高樂，夏爾，18，19—20，50，124，125，137，170—171，198—199，201，221，222，252—253，255，271，292，295，324

戴維斯，拉斯蒂，152—153

丹齊格，魯迪·范，27

但澤，158

道爾頓，休，271，273

德巴利，威廉·西奧多，35—36，186—187

德彪西，克勞德，332

德布林，阿爾弗雷德，72—73，279，293

德國，39—43，59—60，62，64，70，72—73，253，335

《德國零年》，40，242

德國民主復興文化協會（文化聯盟），284，285

德國社會主義團結黨，285

德國文化，278，283，289，294

英國文化和德國文化，278

摧毀德國文化，158—160，282

德國文化及其改造，277—295，297

德黑蘭會議，154，210，316，329

德拉瓦河谷，145—146

德累斯頓，180

德尼埃，阿爾貝爾，123

德斯坦，瓦勒里·季斯卡，201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80，271—272

德國人為何不攻擊德國人，77

捷克人報復德國人，95—98

被錯誤指控為納粹的德國人，93，94

蘇聯入侵地區的德國人，91，92

和德國人親善，24，39—43，45

勾結德國人的法國人，84—86，101，103

德國人和猶太旅，98—99

科夫納計劃對付德國人，99—101

波蘭人報復德國人，90—95

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囚犯，75

德國士兵返鄉，139—141，144

蘇聯人報復德國人，79—80，82—84

德意志銀行，182，183

德意志綜合新聞社，232

鄧尼茨，卡爾，17

鄧斯東，查爾斯，182

抵抗運動，169—172，201

共產主義和抵抗運動，102—103，109，175

法國抵抗運動，71，199，201，252，253

抵抗運動政治勢力，253—254

《地平線》，248，254，290

蒂蒙尼耶，勒內，293

東德，180，271—272，335—336

東京，60，61，62，69

東京審判，185，234

東條英機，212

杜拉斯，瑪格麗特，138—139，252—253

杜勒斯，艾倫，312

杜勒斯，約翰·福斯特，312，313，324，328，329

杜魯門，哈里，18，154，166，167，296，297—298，319，323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318

多列士，莫里斯，50，199

朵拉—米特堡集中營，163

E

俄國人，145，146，148

被強制遣返蘇聯的俄國人，150—153

俄國兵，詳見蘇軍

俄羅斯，9

另見蘇聯

恩斯特，厄爾，300

《厄爾河愛國者報》，85

《惡心》（薩特），290

餓死計劃，79

F

法國，57—58，101，102，106，252—253，335

法國和阿爾及利亞，121—124

法國黑市，58

英法關系，255，325

法國妓院，201

法國通敵者，84—86，101，103

法國共產黨，50，84，102，198，199，252，272，328

法國文化，290—294

法國經濟重建，252，253，255

法國食品供應，58

法國的德占期，26—27，28，50，84—86，201

德國被占領，292—295

德國的同性戀，26—27

法國和印度支那，詳見法屬印度支那

法日關系，120

法國猶太人，220

法國光復，20，50，85，120，171

法國和中東，325

法荷關系，220

巴黎，詳見巴黎

戰俘返回法國，137—139

法國清洗運動，198—201

法國抵抗運動，170—171，199，201，252，253

法國和敘利亞，323—325

法國和聯合國，326，328，329

法國抵抗組織“戰斗”，310—311

法蘭西革命，197—198，199

法斯賓德，賴納·維爾納，141

法西斯主義，175，236

共產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102—103，109，175

法屬印度支那，111，120，124，253，324

法屬印度支那饑荒，121

越南，102，106，120—122，124—127

返鄉，131—168

作者父親返鄉，6，132—133，139

英美士兵返鄉，144—145

德國人被強制遣返德國，154—160

德國士兵返鄉，139—141，144

日本士兵返鄉，139—144

猶太幸存者返鄉，134—136

戰俘返回法國，137—139

俄國人被強制遣返蘇聯，150—153

猶太復國主義和返鄉，161—168

非洲，253

菲律賓，111，188—191，212，315

日本入侵并占領菲律賓，188—190

麥克阿瑟和菲律賓，188—191，213—218

馬尼拉，詳見馬尼拉

肺結核，61，165

費林格，茲德涅克，155

芬基爾施泰因，哈亞，89

《風中的母雞》，141

佛蘭德斯，102

佛朗哥，弗朗西斯科，176，244

弗拉德，丹尼爾·J.，64—65

弗蘭克，安妮，29，55—56

弗蘭克，漢斯，231

《弗蘭克州報》，331

弗里茨·紹克爾，231

弗里茨—克羅科，麗布薩，91—92，94

弗里德堡，漢斯—格奧爾格·馮，15，18

弗里克，弗里德里希，181，183

弗羅斯特，約翰，16n

福克斯，查爾斯，16

福特文格勒，威廉，4

婦女婦女獨立，8，23

女性投票權，51，85，186

另見性

《婦人畫報》，38

《復興報》，90

富爾布萊特，J. W.，313

富士山，300

富特，邁克爾，320，323，325

G

甘地，圣雄，310

《趕走暴政》（諾雷爾），136

岡村寧次，194—195

高見順，44，46—47，304

戈林，赫爾曼，231

戈寧中校，30

哥穆爾卡，瓦迪斯拉夫，159

哥薩克人，145，146，148—149，151—153，168

歌德，約翰·沃爾夫岡·馮，241，278，279，283，284

歌舞伎，300，301，332

格但斯克，158

格拉斯，君特，280，287

格雷西，道格拉斯，126

格雷澤，伊爾瑪，228，230

格魯，伯努瓦特，25—26，27，40，43，51

格魯，弗洛拉，25

格魯，約瑟夫，296

格洛博奇尼克，奧迪路，145

葛羅米柯，安德烈，327

工黨，253，254

共產黨，共產主義，6，64，82，186，250，254—255，272，312，328，335

反納粹反法西斯抵抗運動里的共產黨，102—103，109，175

中國共產黨，192—197，203—204，261，328，330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97

法國共產黨，50，84，102，198，199，252，272，328

德國共產黨，50—51，66，67，180

共產黨和德國復蘇，181

共產黨和希臘，109，110

匈牙利共產黨，205

印尼共產黨，120

共產黨和國際主義，112

共產黨和意大利，105—106，272

共產黨和日本，102，272，305

共產黨和猶太人，88

馬來亞共產黨，112—113

共產黨和納粹，181

共產黨和人民審判，203—207

共產黨和聯合國，316，317

《姑娘，管好你自己》，47—48

古德斯密特，齊格弗里德，134—135

廣島，60，66，271，296，298，304，

廣島，60，66，271，296，298，304，309，312—313

國家抵抗理事會，252

國聯，9，308，309，314，316，318，322

國民解放運動，310—311

果戈理，尼古拉，284

H

哈貝，漢斯，280

哈里森，厄爾·G.，167

哈馬，323

哈塔，穆罕默德，114—115，119

哈特格拉斯，阿波利那利，165

哈嚴，瑪利亞，22—23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250—251

海利男爵，威廉·馬爾科姆，326

海門特，歐文，71，162，163—164，166

海涅，海因里希，2

漢普頓，萊昂奈爾，19

豪斯，特奧多爾，178—179

好萊塢電影，286—287，290，320

何應欽，195

《和平馬賽曲》（拉馬丁），311

河內，120，121，124—127

核武器，詳見原子彈

荷蘭，253，308

阿納姆，2，16，307

出生率，53—55

荷蘭黑市，68

法國和荷蘭，220

荷蘭饑荒，53—55

荷蘭猶太人，134—136

荷蘭解放，53，84，132，134

荷蘭解放日，14—15

荷蘭道德恐慌，50

奈梅亨，2，132—133

荷蘭的瑪納行動，53—54

公審荷蘭通敵行為，207

鹿特丹，256—257

荷蘭戰爭紀念碑，136

《荷蘭國家日報》，50

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218，220

荷蘭娛樂委員會，24

荷屬東印度，111，114

另見印度尼西亞

荷屬東印度民事管委會，116—118

荷屬門諾派，2

赫伯特，A. P.，277

赫爾，科德爾，225，235

赫爾利，帕特里克·杰伊，192

赫尼施，約瑟夫，93

赫斯，魯道夫，231

黑人美國種族主義，280，287

日本黑人，45

黑市，58—60，68，70—72，82，105

法國黑市，58

德國黑市，71，179，288

日本黑市，68—70，140

荷蘭黑市，68

胡佛，赫伯特，297

胡普卡，赫伯特，158

胡耶，P. J. G.，119

胡志明，121，126，127，315，323

虎父，117

虎克黨，188—191

華沙，60—61，75—76，256

華沙猶太區起義，161

懷特，E. B.，310，320，326

《回家》（莫爾丁），143

惠特尼，科特尼，176

霍姆斯，323

霍奇，約翰·R.，265—267

J

饑荒，53—59，61—65

阿爾及利亞饑荒，121，122

集中營饑荒，55

德國饑荒，61，63—65，67—68

荷蘭饑荒，53—55

印度支那饑荒，121

日本饑荒，61—62，63，67—68，298

蘇聯饑荒，79

基督教會聯邦理事會，312

基督教民主黨，271，273，282，289

基督教普世主義，311，322

基勒，克林斯汀，296n

基南，約瑟夫·B.，185，186

吉爾伯特，馬丁，20

吉爾伯特和沙利文，300

集中營，4，13，76，89，94，95，133—134，179，226，309

奧斯維辛集中營，93，133，161，163，182，183，206，228，229，231，232

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詳見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比克瑙集中營，163，206，228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133，226，231，232，241—242，252，280

達豪集中營，詳見達豪集中營

朵拉—米特堡集中營，163

艾森豪威爾參觀集中營，226—228

集中營電影和新聞片，227，279—280，320

集中營饑荒，55

奧爾德魯夫集中營，226—227 詳見流散人員集中營和滅絕營

紀德，安德烈，290

《寂靜》（博羅夫斯基），76，77

加里寧格勒，78

加繆，阿爾貝爾，310—311

加藤悅郎，303

甲殼蟲樂隊，23，51

《架空會見記》（紀德），290

講德語的難民，62—63

蔣介石，62，66，102，124，191—193，195，196，318，326，330

杰布，格拉德溫，308，320—321，327

杰斐遜，托馬斯，286

杰克遜，羅伯特·H.，236—237

捷克斯洛伐克，62，253，335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97

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俘虜，75

捷克斯洛伐克強制遣返德國人，154—160

捷克斯洛伐克針對德國人的報復，95—98

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衛隊，96—97

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97

切爾諾維茨，158

解放 13—16，20，22—23，37，51，76，86

解放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29—30

殖民社會和解放，111

法國光復，20，50，85，120，171

解放希臘，208，209

解放荷蘭，53，84，132，134

性欲和解放，23—29，38—39，50

《解放報》，19，20

解放心態，13

解放日，14—15

《今日》，286

金，唐納德，61，186—187，193—194，268—270

金博爾斯基，切薩羅，94

金日成，191，268，270

金澤爾，埃伯哈德·漢斯，15

近江市，302

近衛文麿，34

井深大，72

舊金山會議，310，312—314，318—327

爵士樂，289—290，291

爵士樂，289—290，291

軍國主義，174，175，179，183，185，276

普魯士，171，173，175，182，279

K

卡爾米，伊斯雷爾，99

卡爾沃科雷西，彼得，237

卡斯特納，艾里希，68

卡廷森林大屠殺，233

卡瓦賈·納茲穆丁，244

開羅，248

凱恩斯，約翰·梅納德，270—271，290

凱爾，羅伯特，216

凱爾泰斯，伊姆雷，133—134

凱南，喬治·F.，225，235

凱特爾，威廉，18

《凱旋門》（雷馬克），290

凱茲，查爾斯，176，299

《坎特伯雷的故事》（《夜夜春宵》），248—250

康德，伊曼努爾，278

康納利，西里爾，248，254，290

康斯坦丁一世國王，107

柯尼斯堡，158

科博，帕斯卡爾，198—199

科爾文，瑪爾塔，32

科夫納，阿巴，99—101

科隆，60，180，282，288

科切夫耶，148

科沃德，諾埃爾，275

克恩滕州，145—146

克拉科夫，87

克拉默，約瑟夫，228—230

克萊，盧修斯，65，66，177，185

克萊夫林格，魯道夫，3

克萊因，弗里茨，228—230

克里，保羅，ix

克虜伯，阿爾弗雷德，181，183

克羅地亞，102，103，145—149

克羅科，克里斯蒂安·馮，91

肯尼迪，約翰·F.，326—327

庫拉拉，費利珀，188—189

庫斯勒，亞瑟，253

庫瓦特利，舒克里·阿爾，323—324

奎松，曼努埃爾，188

L

拉克西，馬加什，205

拉馬迪埃，保羅，57

拉馬丁，阿爾方斯·德，311—312

拉齊羅夫村，88

拉斯基，哈羅德，246—247

拉斯洛，巴爾多希，207

拉特利奇，小威利·B.，216—217

拉鐵摩爾，歐文，261

拉瓦爾，皮埃爾，200，218—225，229

萊比錫，180

萊格，沃爾特，237

萊姆金，拉斐爾，322

萊納，弗里德里希，146

萊維特，索爾，226

蘭姆斯多夫，94，95

《藍色天使》，40

勞雷爾，何塞·P.，188，189，191

勞雷爾，薩爾瓦多·“多伊”，191

老兵返鄉，139—145

另見返鄉

老兵犯下的暴力行徑，144

勒南，內斯特，286

雷恩哈德太太，5

雷諾工廠，200，253

冷戰，9—10，103，270，272，294，303，327—328

黎巴嫩，324，325

黎凡特，323—325

李承晚，267，269，270

李夏爾，馬爾特，201

里賓特洛普，約阿希姆·馮，231

里希特，艾里希，331—332

里希特，赫爾姆特，92

理性理想主義，311—312

立陶宛，160，168

利特文斯卡，索菲亞，229

利沃夫，89

列維拉比，162

林格斯，J. A.，257

劉易斯，諾曼，33—34

流散人員，131—133

亞洲流散人員，131

流散人員返鄉，詳見返鄉

流散人員集中營，6，13，71，76，160

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詳見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出生率，31—33

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猶太人（1945），160

詳見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滅絕營

魯堅科，羅曼·A.，233—234

魯梅林博士，5

鹿特丹，256—257

路易·雷諾，200

呂運亨，263—264，266，267

呂運弘，266

綠十字株式會社，212

《亂世佳人》，286，287

倫伯格，158

倫敦，57

倫敦《泰晤士報》，41，145，227，228，229，277，314，326

倫敦歐戰勝利日，18—19，21，22

倫多夫，漢斯·格拉夫·馮，78，82，156

羅貝，保羅，157

羅伯茨，歐文·J.，313

羅伯特森，布萊恩，278

羅哈斯，曼努埃爾，189，190—191

《羅蕾萊之歌》（海涅），2

羅馬，59

羅馬尼亞，62，154，159，253

羅塞里尼，羅伯托，40，242

羅森菲爾德，內蒂，134

羅森薩夫特，梅納赫姆，57

羅森薩夫特，約瑟夫·“約西勒”，56—57，162—163，229

羅斯福，富蘭克林·D.，154，292，317，318—320，327—328

羅斯福和《大西洋憲章》，314—315，323

羅斯福之死，319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314，323

羅斯福和聯合國，316—318，319

羅西，歐內斯托，311

洛克威爾，諾曼，314

《洛桑條約》，155

洛錫安勛爵，菲利普·凱爾，310

“馬德隆”，20

M

馬爾丹，弗朗索瓦絲，125

馬爾庫塞，赫伯特，177

馬科斯，費迪南德，191

馬克思，卡爾，257

馬拉比，A. W. S.，119

馬來亞，111，112—114，125，212

馬勞伊，山多爾，59，205

馬尼拉，60，188—90

馬尼拉大屠殺，212—217，306

馬薩達之戰，161

馬斯科羅，迪奧尼，138

馬歇爾，理查德，184

瑪拉帕爾泰，庫爾喬，49，149

《瑪麗婭·布勞恩的婚姻》，141

瑪利亞，馬克，艾里克，290

嗎哪行動，53—54

麥克阿瑟，道格拉斯（盟軍最高司令官），41

麥克阿瑟和日本，35，37，65，66，174—176，183—186，191，211，261，304

麥克阿瑟和日本再教育，296—301

麥克阿瑟認為日本人很幼稚，296—297

日本人寫給麥克阿瑟的信，174—175，185

麥克阿瑟和菲律賓，188—191，213—218

麥克阿瑟和威洛比，176，211

麥克阿瑟和山下奉文，213—217

麥克米倫，哈羅德，103—104，107—110，150，245

曼，托馬斯，286

《曼徹斯特衛報》，244，250，324，331

毛澤東，9，102，192—193

梅瑞狄斯，喬治，278

梅塔克薩斯，揚尼斯，107，109，110

梅特涅，克萊門斯·馮，327

《每日鏡報》，64，227

《每日先驅報》，19，21，320，323

《美國觀察家》，286

美國文化，289—292

好萊塢影片，286—287，290，320

《美國羊棲菜》（野坂昭如），40，44—45，55

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168

美國在朝鮮，265—269

美國最高法院，216

門諾派，2

盟國間懲治戰犯委員會，233

盟軍管制委員會，42

蒙巴頓勛爵，路易斯，111，115

蒙哥馬利，伯納德·“蒙蒂”，15，16，54，207

孟加拉，56

孟加拉饑荒大雜燴，56

米克洛什，霍爾蒂，205—206

米蘭，59

米奇尼克，亞當，86

米塞特，安東，218—221，222—224

米歇爾，恩斯特，231—234，241

密特朗，弗朗索瓦，138

滅絕營特雷布林卡滅絕營，89—90

另見集中營，流散人員集中營民主化

德國民主化，173，177，178，276，280—281，287，289

日本民主化，175—176，185，276，279，287，295，298，302—305

《民族》雜志，322

摩根韜，亨利，65—66，276，317

摩根韜計劃，65，276，278

摩薩臺，穆罕默德，312

莫爾丁，威廉·“比爾”，143—144

莫爾奈，安德烈，222

莫蘭，謝伍德，61

莫洛托夫，維亞切斯拉夫，321，328

莫奈，讓，253，255，256，295

莫斯科的歐戰勝利日，20

莫扎特，沃爾夫岡·阿瑪德烏斯，283

木戶新一郎，118

慕尼黑，180

N

拿破侖一世，292，327

內戰，149—150

《那不勒斯1944》（劉易斯），33—34

《納粹集中營》，279

奈梅亨，2，132—133

南京，193，194—195

南京大屠殺，194，306

南斯拉夫，102，103，146—150

鐵托和南斯拉夫游擊隊，103，145，146，148—151

尼赫魯，賈瓦哈拉爾，315

尼克爾森，哈羅德，245—246，254—255，271

尼克爾森，奈格爾，145，146

尼克松，理查德，305

《年輕的心》，38

鲇川義介，260—261

紐波特帕格內爾，326

紐倫堡審判，183，185，216—218，226，228，230—237，244，322，331

《紐約客》，310，320，326

《紐約每日新聞》，22

《紐約時報》，41，54，154，192，313，329，330，332

紐約市，22，332

紐約市的歐戰勝利日，19，21，22

《紐約先驅論壇報》，21—22

農業，63

挪威，84

諾埃爾—貝克，菲利普，327

諾雷爾，K.，136

諾伊曼，弗朗茨，176—177

《歐墨尼得斯》（埃斯庫羅斯），209—210，225

O

歐戰勝利日，17—22，48

歐洲

歐洲分裂，335

歐洲統一愿景，253—257，295，310—311

歐盟，9，273，294，306

P

帕蓋特，伯納德，324

帕潘德里歐，喬治奧斯，208

帕蓬，莫里斯，200—201

帕維里奇，安特，102，149

潘潘女，36—38，69

《噴趣》雜志，277

皮杜爾，喬治，328

皮爾森，萊斯特，327

皮爾斯，雅克，24

《皮膚》（瑪拉帕爾泰），49

皮薩切克，格奧爾格，93

“漂洗運動”（Persilschein），179

樸正熙，270

普雷斯伯格，艾默里克，248—250

普魯士，157，253

普魯士主義，171，173，175，182，279

普羅富莫，約翰，296n

溥儀，亨利，258，259

Q

《73艦隊潛艇戰》，287

啟蒙運動，276，311，322

契科夫，安東，284

強暴，38，39，42，84

蘇軍強暴德國女人，83—84

喬治二世國王，109

《橋》，278

親善行動，24

“親我的屁股”，98—99

青島，193—194

清洗戰時通敵者，235

清洗法國戰時通敵者，198—201

清洗德國戰時通敵者，172—173，176—183，279，293

清洗日本戰時通敵者，172—176，183—187 詳見審判

丘吉爾，克萊蒙蒂娜，245

丘吉爾，溫斯頓，19，91，103，107，150，154，155，227，244，246，247，250—252，254，256，271，273，310，318—320，324，328—329

丘吉爾和盟軍勝利，17，18—19

丘吉爾和《大西洋憲章》，314—315

1945年丘吉爾參加競選，8，10，243—245，250

丘吉爾和希臘，109，110

丘吉爾和聯合國，316—317

丘吉爾和戰爭罪，210，225—226，235

《去毒氣室請這邊走，女士們先生們》（博羅夫斯基），76

R

讓—保羅·薩特，290，291—292

《讓我們對德國人別太粗魯》（科沃德），275

《人道報》，200

人民法院，203—207，267

人權，322

日本，8，9，34—39，61，64，70，72，106，111，257—262，272，273，332

日本的盟軍軍糧，67—68

盟軍占領日本，35—38，43—48，65，260，276，279，295—306

日本的美國文化，290

美軍勾搭日本女人，44—47

日本武裝力量，306

日本黑市，68—70，140

日本工商界精英，185—187

中日沖突，102，112，184，192—197，299

日本和共產主義，102，272，305

日本憲法，305—306

日本民主化，175—176，185，276，279，287，295，298，302—305

日本的經濟控制，260

日本疾病，61

日本教育，301—302

日本的封建主義，175，185，186，188，299，300，302，305，332

法日關系，120

廣島，60，66，271，296，298，304，309，312—313

日本饑荒，61—62，63，67—68，298

日本和印尼，111，115—116

日本和朝鮮，262—267

麥克阿瑟和日本，35，37，65，66，174—176，183—186，191，211，261，296—301，304

日本和馬來亞，112

日本和偽滿洲國，詳見偽滿洲國

日本軍警（憲兵隊），183—184，188，214，259

長崎，271，296，298，309，327

近江市，302

日本愛國組織，184

日本偷襲珍珠港，188，216，314，316

日軍入侵菲律賓，188—190

日本娼妓業，34—38，45

整肅日本戰時官僚和政治體制派，172—176，183—187

重建日本，261—262

日本的改革派官僚，251，259，260

對日援助，65—66

日本和抵抗運動，169，171，172

日本在東南亞的統治，112，115

日本和蘇聯，66—67，69，80，297

日本投降，262，265，271

東京，60，61，62，69

美國在日軍事行動，303

日本的書寫體系，301—302

日本人在華日本人，79，80—81

日本神風隊員，140，141—142

日本人寄給麥克阿瑟的信，174—175，185

麥克阿瑟對日本人的看法，296—297

日本兵返鄉，139—144

蘇聯人報復日本人，80

審判日本戰犯，212—218

日本人和西方男子氣概，40—41，45

日本文化，296，297，299

歌舞伎，300，301，332

日本文化和改造，276，287，295—306

神道教，263，300—301

《日本的悲劇》，304

日本和朝鮮，262—267

《日本時報》，332

《日本天皇》（吉爾伯特和沙利文），300

日產，187，259—260

日俄戰爭，80

榮格，恩斯特，94，157，234

S

撒切爾，瑪格麗特，273

薩爾特，阿瑟，63

薩克維爾—威斯特，維塔，271

薩拉希·費倫茨，206

薩雷，基亞伊，113

“薩蘇”樂隊，291

塞提夫事變，122，124，315

塞族，146，148，149

賽爾伯恩伯爵，朗代爾·帕爾默，150

《賽克斯—皮科協定》，325

賽提夫，122，124，315

《三便士歌劇》（布萊希特），283—284，285

三井，187，260

三菱，187，260，261

沙赫特，雅爾瑪，231，251

山下奉文，40，212—217，218

傷寒，61

舍爾，瑪格麗特，96—98

社會民主黨政府，253

社會主義，250，254，273

英國社會主義，245，246，248—250，271

神道教，263，300—301

神風突擊隊飛行員，140，141—142

審查問卷，177

審判，233

希臘審判，207—209

希臘人民法院，203—207，267

另見戰犯審判

圣—皮埃爾神父，311

《圣詹姆斯宣言》，233

圣戰紅軍，113

施萊辛格，維尼弗雷德，19，21，24

施密特，約瑟夫，332

施尼茨勒，格奧爾格·馮，183

施佩爾，阿爾伯特，258

施特萊徹，尤里烏斯，231

施托姆，維姆，50

施瓦茨科普夫，伊麗莎白，237

石井四郎，210—212

《時代》雜志，143，219，221—222，321

史迪威，約瑟夫，191—192

史丁生，亨利，65—66

史密斯，赫伯特·A.，230

史沫資，揚，322，323

《世界報》，331

《世界人權宣言》，309，322

世界政府，309—311，327，329—330

《大西洋憲章》和世界政府，314—315，323，324

原子彈和世界政府，313

大英帝國為世界政府提供模板，310

國聯和世界政府，9，308，309，314，316，318，322

聯合國和世界政府，詳見聯合國

市場花園行動，16，307

舒恩菲爾德，所羅門，60—61，161

舒曼，羅貝爾，294，295

斯賓格勒，奧斯瓦爾德，288

斯大林，約瑟夫，8，17，18，20，91，97，106，132，147，149，150，154，155，170，195，199，205，210，243，272，316—320，327—328，330，335

對斯大林的良好印象，150，154，308

斯大林格勒，60

“斯大林管風琴”，4，5

斯科特，T. P.，147，153

斯洛文尼亞，145—149

斯彭德，斯蒂芬，58，60，226，281—283

斯皮內利，阿爾蒂諾，311

斯特丁紐斯，小愛德華·R.，321，327

斯特雷奇，約翰，57

《死亡工廠》，279—280

四大自由，314，323

《四只手寫日記》（格魯姐妹），25

《寺子屋》，300

泗水市，116，118—120

宋子文，326

蘇丹·沙里爾，115

蘇哈托，120

蘇加諾，111，114—116，119，120，189，315，323

蘇聯，313

蘇聯，9，17，18，54，64，66，103，254，272，323，325，330

蘇聯原子彈，313

中蘇關系，80—82，195—197

冷戰和蘇聯，9—10，103，270，272，294，303，327—328

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97

蘇聯二戰死亡人數，78—79

蘇聯和原納粹黨黨員，180—181

蘇聯和德國再教育，284—285

德軍從蘇聯撤退，79

蘇聯占領德國，39，42，67，82—84，284—285，292

蘇聯和德國的復蘇，181

蘇聯和希臘，110

蘇聯和日本，66—67，69，80，297

蘇聯和朝鮮，264，266—269

蘇聯入侵滿洲，66—67，69，195

蘇聯和紐倫堡審判，233—234

蘇波關系，88，91，92，319—322，323，328

被強制遣送蘇聯的俄國人，150—153

蘇聯的饑荒，79

蘇聯和聯合國，316，318，319，321，328—329

蘇聯軍人，79

哥薩克人，145，146，148—149，151—153，168

波蘭哥薩克人，88，91，92

蘇聯軍人報復德國人，79—80，82—84

蘇聯軍人報復日本人，80

蘇門答臘，114，118

蘇臺德區，95，155，157，158，253

索尼公司，72

索洽，利奧波德，89

T

塔爾維西奧，98

塔魯克，路易斯，188，190，191

太平洋戰爭，34，67，175，297

坦普勒，杰拉德，65

湯因比，阿諾德，308，309，310，314

陶里亞蒂，帕爾米羅，272

特來切克，海因里希·馮，288

特雷布林卡，89—90

特呂弗，弗朗索瓦，309

特殊慰安設施協會，34—35

特維斯，沙布泰，165

《特種部隊》（巴托夫），160

《藤原彌也》，69

天主教，311，312

田中角榮，102

鐵托，約西普·布羅茲，103，145，146，148—151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250

圖沃希，約翰，154

土耳其，155，311

托莫老哥，118

W

《瓦爾基茨停戰協定》，208—209

瓦勒里，保羅，286

外約旦，325

威爾遜，埃德蒙，57，59，104，106，107，110，246—247

威爾遜，哈羅德，271

威洛比，查爾斯，176，211

韋伯斯特，C. K.，322，327

韋尼澤洛斯，埃萊夫塞里奧斯，107

韋斯特，麗貝卡，232

韋斯特林，雷蒙·“土耳其人”，119—120

維昂，鮑里斯，291

維盧奇奧蒂斯，阿瑞斯，108

偽滿洲國，66，80，81，184，193，203—204，210—211，212，257—261

新京，258

滿洲（中國東北），66，69，80，187，195—196，203，330

蘇聯入侵滿洲，66—67，69，195

溫伍德少校，230

文化聯盟，284，285

《文托泰內宣言》，311

《我們在日本的使命》，276

沃登，威廉·L.，295

沃爾夫，弗里德里希，284

沃爾夫，馬庫斯，284

沃爾海姆，理查德，31

烏得勒支，48

烏得勒支大學，2—3，6—7

烏克蘭，156，168，170，319

聯合國，9，31，308—309，312—330

布雷頓森林會議，317—318

聯合國憲章，310，313，314，322，326

鄧巴頓橡樹園會議，318

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64，316—317

舊金山會議，310，312—314，318—327

聯合國和敘利亞危機，323—324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170

烏斯塔沙，102，145，149

《無命運的人生》（凱爾泰斯），133—134

X

X兵團，116

西德，183，271，272，282，336

西格蒙德·瓦爾伯格，182

西貢，120，124—127

西科爾斯基，弗拉迪斯拉夫，91

西里西亞，92—95，155—158

西西里，253

西澤榮一，332

希臘，102，106—111，191，207—209

雅典，106，108—109，209

希臘偷牛罪，207—208

希臘內戰，107—111

希臘和共產主義，109，110

希臘國民解放陣線，106—110，207，209

希臘解放，208，209

希臘和蘇聯，110

希臘審判，207

希臘和土耳其，155

希利，丹尼斯，253—254

希姆萊，海因里希，181，220，225，226，230

希斯，阿爾杰，327

希特勒，阿道夫，8，71，78，92，95，107，132，146—148，159，161，166，171，172，175，178，183，235，251，282，298，312，335

希特勒和阿布斯，182

希特勒和霍爾蒂，206

希特勒和米塞特，219—221

希特勒和再教育，278，280，281

希特勒青年團，2，115

夏龐蒂埃，雅克，222—223

夏泰尼奧，伊夫，123

憲兵隊，183—184，188，214，259

《獻給迷途士兵》（丹齊格），27

小津安二郎，141

肖克羅斯，哈特利，244

辛頓，德里克，29—30

欣維爾，伊曼紐爾，57

新加坡，212

新京，258

新開始團體”，242

新耶路撒冷”思潮，249—253，257

新政改革派，175—176，186，244，261—262，272，296，299

信息管制委員會，288

《星條旗》報，41，143

性，51

流散人員集中營內的性欲，31—33

勾搭軍人，23—28，39—51，84—86

性欲和德國占領法國，26—27，84—86

私生子出生率，28—29，31，38

性欲和歐洲的解放，23—29，38—39，50

娼妓業，詳見娼妓業

強暴，詳見強暴

性病，28，48—50

匈牙利，205—207，253，335

匈牙利德國人被強制遣返德國，154—160

匈牙利審判，205，206—207

敘利，馬克西米連·德·貝蒂訥，公爵，311

敘利亞，323—325

Y

雅典，106，108—109，209

雅爾塔會議，92，151，155，316，319—320，322，327—329

雅各布斯，G. F.，114

雅加達，116，117

亞琛，281—282，302

亞歷山大，哈羅德，151

亞洲，8，34，102，111

亞洲的報復行動，111—113，117，118

亞洲流散人員，131

《揚基人》，61，72，154，159，214，215—216，226，265，266，281，320

《耶路撒冷》（布萊克），249—250

野坂昭如，40，44—45，55

野板參三，261

伊高，羅杰，137

伊拉克，131，325

伊拉斯謨，311

伊朗，312

伊斯蘭穆斯林，113，121—122，155

伊索爾尼，雅克，199

伊瓦特，赫伯特，321

以色列，100，161—168

以色列《新消息報》，161

意大利，102—106，108

意大利和共產主義，105—106，272

意大利法西斯，102—106

意大利道德恐慌，49

意大利的報復，105，106

音樂和藝術促進理事會，247—248

印度，167

印度尼西亞，102，111，112，114—120，122，125

印尼“準備好”暴力浪潮，116—118

印尼清洗共產黨，120

印尼獨立，114，119—120

日本和印尼，111，114—116

印尼自由戰士，116—119

印度支那，詳見法屬印度支那

英國，243—251，273，335

英國的社會政治態度變化，243—248

英國保守黨，243—246，248，273

英德文化交流，278

英國文化促進，247—248

1945年英國大選，8，10，243—245，250

英國食品供應，57，65

英法關系，255，325

英國和德國復蘇，181

英國和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167

英國工黨，243—244，246—248，250，271，273

倫敦，詳見倫敦

英國和馬來亞，111

英國和中東，325

英國對世界政府的模范作用，310

英國的新耶路撒冷精神，249—251，270—271

英國改革計劃，251

英國社會主義，245，246，248—250，271

英國和聯合國，326

英國外交部，167—168，181，226，308

永井荷風，43—44

猶太復國主義，99，100，161—168，244

猶太感恩紀念碑，136

《猶太紀事報》，162

猶太旅，98—99，161

猶太人，71—72，103，122，158，160—168，177，289，312

猶太人和共產主義，88

猶太人和集中營，詳見集中營

法國猶太人，220

流放德國人對比猶太人的苦難，157—158

藏匿和幫助猶太人，89，171—172

猶太人返鄉，134—135

霍爾蒂和猶太人，206

匈牙利猶太人，206

拉瓦爾和猶太人，220，221

反納粹法律對比反猶太法律，178

猶太人和米塞特，219—220

荷蘭猶太人，134—136

掠奪猶太人資產，89—90，178

波蘭猶太人，86—90，134，160—162，164，165，168

報復猶太人，90

猶太人的報復，98，99—101

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規模，161，165

美國和猶太人，162，167

猶太人的財富，88，89

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99，100，161—168，244

“猶太人的血不會白流”，99

猶太事務局，168

裕仁天皇，174—175，176，301，304

原子彈，312—313，329

越盟，120—121，124，312

越南，102，106，120—122，124—127

越南戰爭，142，303

Z

再教育，276—277

再教育德國，277—295，297

再教育日本，276，287，295—306

另見德國文化，日本文化

贊根，威廉，182

澤內丁，法里德，320

扎耶，J.，223

戰略托管地區，325

《戰爭》（杜拉斯），138—139

戰爭罪審判，210—237

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戰犯審判，228—230，234

審判本間雅晴，213

匈牙利戰犯審判，206—207

審判石井四郎，210—212

審判日本戰犯，212—218

審判拉瓦爾，200，218—225，229

審判米塞特，218—221，222—224

為審判戰犯新列的法律條目，234，322

紐倫堡，183，185，216—218，226，228，230—237，244，322，331

東京審判，185，234

審判山下奉文，212—217，218

張伯倫，內維爾，255，323，335《朝日新聞》，141—142，302—303

珍珠港，188，216，314，316

拯救歐洲猶太人委員會，165

殖民主義，111，315，325—326

志賀直哉，141—142

中東，324—25

中國，34，66，79，102，108，191—197，330

中國嬰兒買賣，69—70

中國內戰，9，62，102，191—197，328

中共，192—197，203—204，261，328，330

中日沖突，102，112，184，192—197，299

中國的日本平民，80—81

中國和馬來亞，113—114

南京，詳見南京

中蘇關系，80—82，195—197

青島，193—194

中國和聯合國，316，318，326，328，329

重光葵，300

《重建》，286

重慶，330

《周六晚報》，36，295

《朱爾與吉姆》，309

朱可夫，格奧爾吉，17—18，21，79

朱莉安娜王妃，24

朱特，托尼，90，101

住友，187

爪哇，118

《準備報》，134—135

資本主義，177，181

《自由人民報》，206—207，309，312—313

宗教普世主義，311—312

租借條約，270，317

最高司令官（SCAP），詳見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佐倉宗吾，332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by Ian Buruma

Copyright © 2013 by Ian Buruma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零年 : 1945 / (荷) 布魯瑪著 ; 倪韜譯.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1（2015.2 重印）

書名原文: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ISBN 978-7-5495-6290-9

Ⅰ. ①零… Ⅱ. ①布… ②倪… Ⅲ. ①世界史－研究－1945 Ⅳ. ①K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07283號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桂林市中華路22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發行熱線：010-64284815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臨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華路　郵政編碼：276017

開本：635mm×965mm 1/16

印張：25.25 字數：360千字 圖片：27幅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2次印刷

定價：68.00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